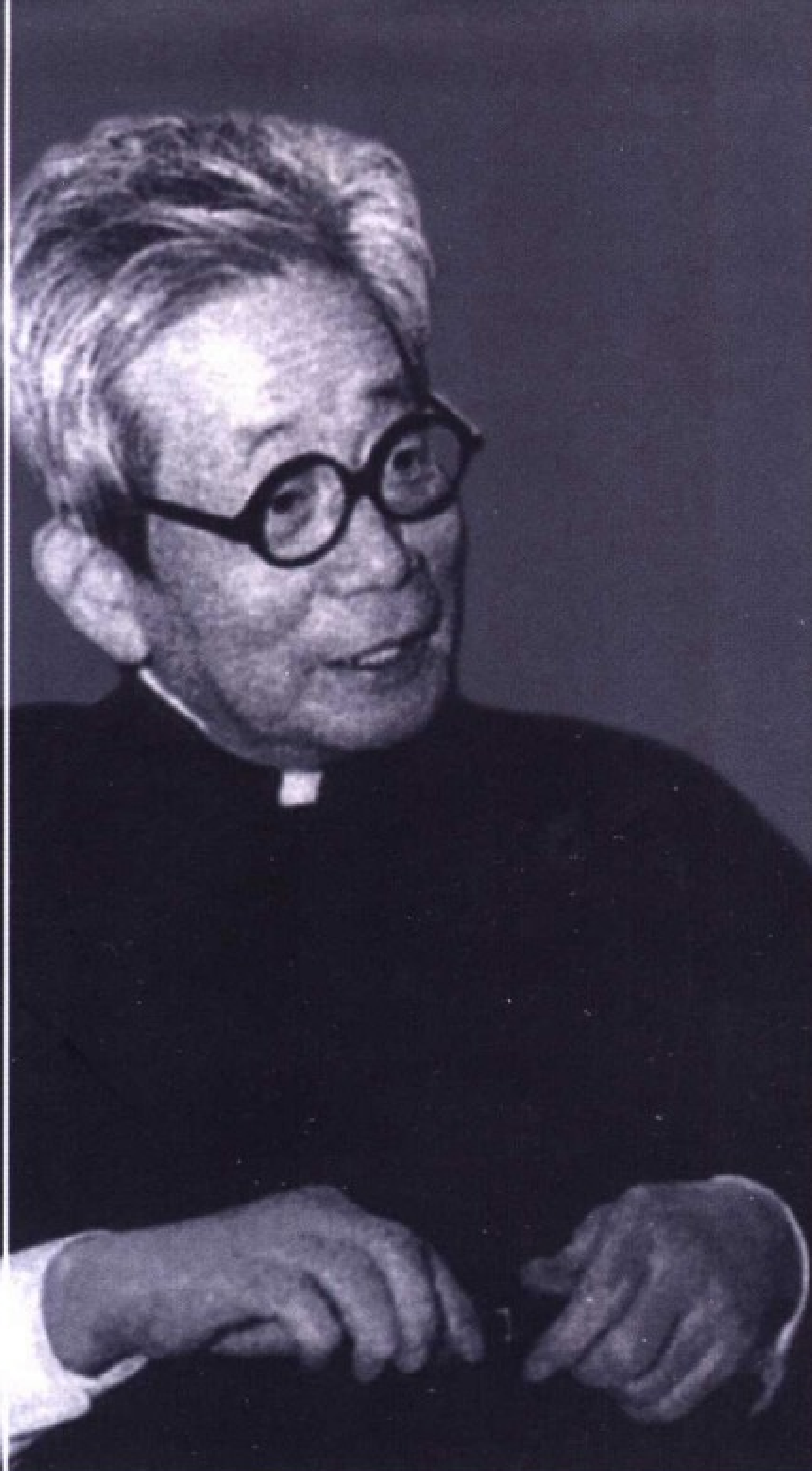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1944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IXANDRE 1977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个人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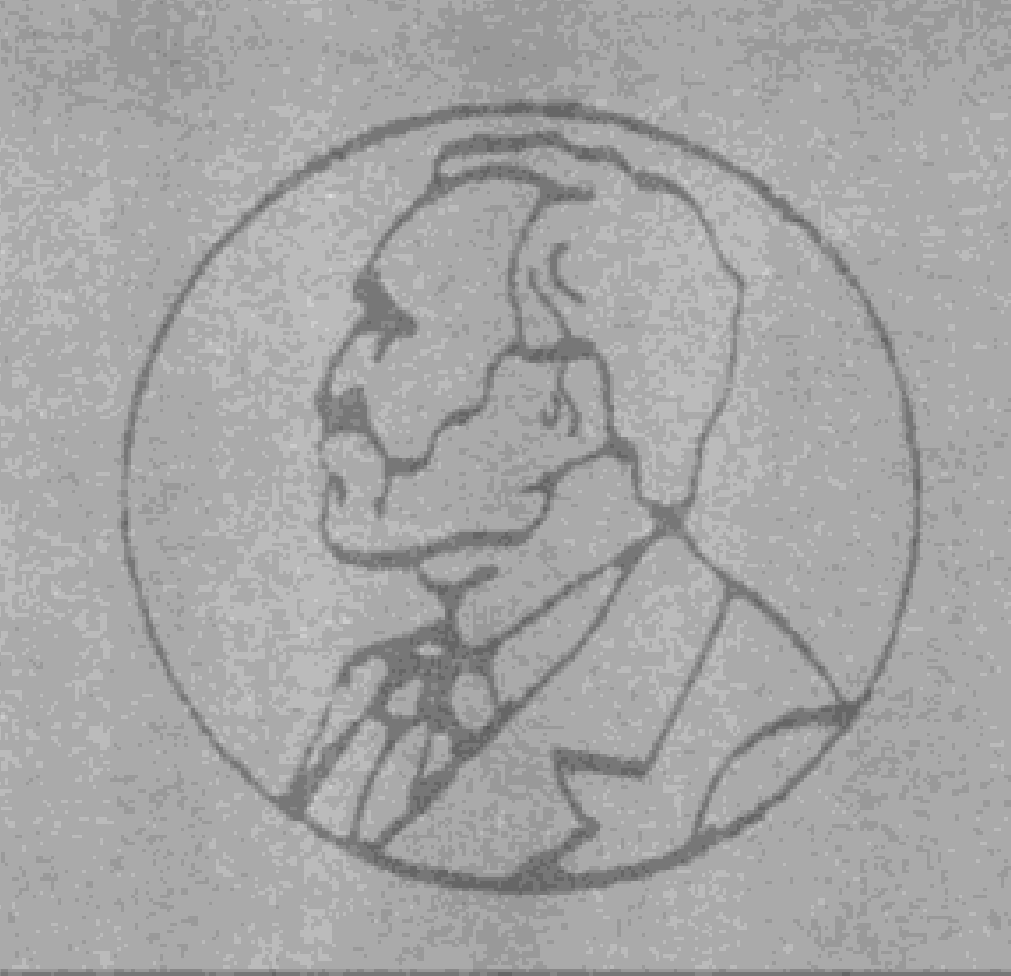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上

［日本］大江健三郎／著

杨炳辰　王新新／译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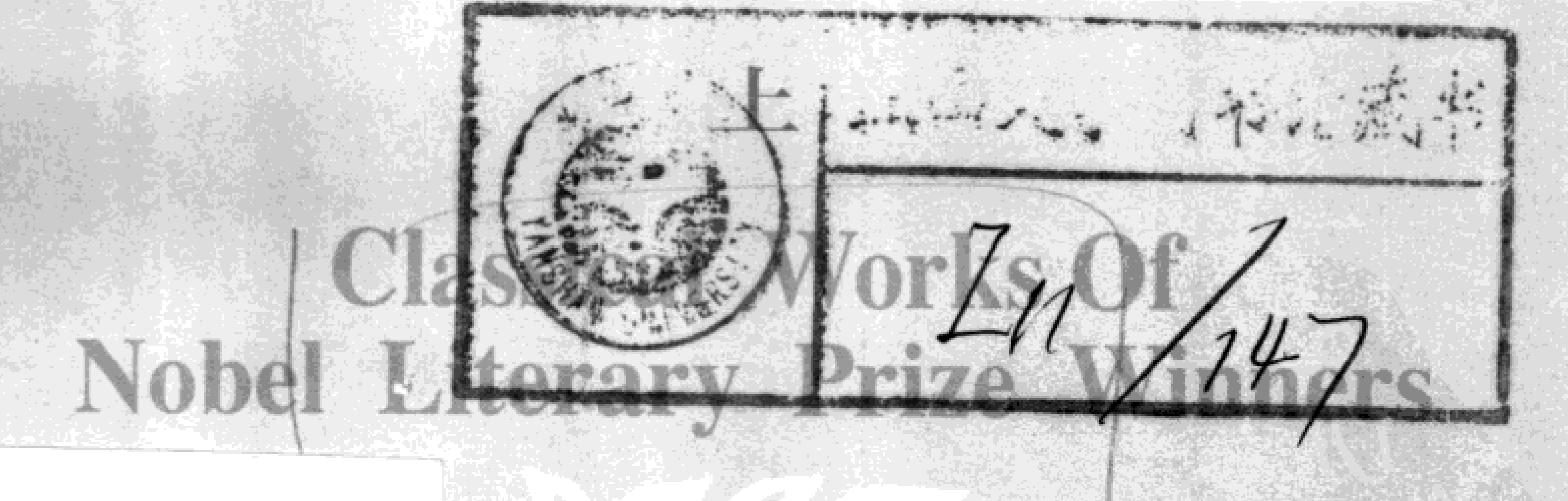
主编／刘硕良

个人的体验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日本］大江健三郎／著

杨炳辰　王新新／译



漓江出版社



〔日〕大江健三郎(1935～)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战后日本存在主义与大江健三郎

叶渭渠

一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始于明治30年代，即20世纪初。当时日本哲学界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和计哲郎出版《尼采研究》（1919）之后，介绍与研究工作逐渐走向系统化。到了昭和初期，即30至40年代，西田几多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自我，与禅学的“无”的思想结合，推演出“无”的存在的形式，即“他要超越主客对立，追求‘物我相忘，主客相没’时的自我，非理性的自我。这个非理性的‘自我’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绝对孤立的自己，不是理智的，而是带有忧伤烦恼的、情感内向的思维方式”，从而对存在哲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1931年九鬼周造发表的《存在哲学》一文第一次将Existentialism译为“存在主义”，并且介绍了存在主

义的基本理论。稍后的1933年，如前所述，三木清引进“不安的哲学”的同时，从人学的立场出发，主张用理性与感情的统一来创造“新人的类型”，主张自我是行动的自我、实存的自我，并从客观转向主观，引入自我的内部，表达了自我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先于本质存在”的命题，从而明确地表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①]。翌年开始在文学上译介了西方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堀口大学译《墙》、臼井浩司译《恶心》、《密室》等，同时陆续出现了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如村山知义的《白夜》、高见顺的《应忘故旧》、三好十郎的《幽灵庄》等。但当时在日趋严重的绝对主义的重压下，存在主义没有适宜的发展土壤，没有流行起来形成一种文学思潮，不久就在军国主义思想的钳制下被扼杀了。这就造成日本存在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遭到彻底失败，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领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特别是美国投掷原子弹对广岛、长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给日本国民的心理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他们在急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感到无法把握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命运，在绝望和孤独中忍受着战后现实的沉重负担，普遍产生一种抑郁的精神，企图从苦闷彷徨中诉诸自我否定、非理性的东西，这才给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气候。

战后日本哲学界以“实存主义研究会”及其会刊《存在主义》为中心，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又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积极

---

①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46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译介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萨特的论著和基本思想，另一方面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战后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剖析被战争扭曲的自我的存在问题。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非常广泛和深远，其影响不仅限于哲学界、文学界，而且及至一般的大学生。其特点是：一是将反对战争的反人性的抗议与检讨战争历史教训结合起来；二是将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现行体制与探索社会的前景结合起来；三是按照日本的思维方式阐述西方的存在主义，使之适合于日本理论知识的诸领域，并通过美学理论的阐释和文艺作品的形式对日本社会意识产生影响。60年代日本经过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之后，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萨特和波伏瓦[①] 访问日本后，又兴起一股存在主义的热潮，研究对象不仅限于萨特，而且扩大到卡夫卡、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波德莱尔、马尔罗等，使存在主义的解释更加多样化。

日本存在主义在美学上的表现，首推今道友信依据西方存在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美学和艺术创作的存在概念，他不是从艺术存在的真实的现象出发，而是从艺术的“定义”出发，而这种艺术的“定义”乃是一种非理性的创造力，而且归根结底是非存在的表现形式，即包罗万象的创造性和否定方式的表现形式。从今道的观点来看，不存在给人们打开通向死亡的道路，他认为这种死亡不是存在的东西毁灭，而是人类灵魂最高的瞬间，是它的升华，是对有感觉的物质实体的完

① 波伏瓦（1908—1986）：法国女作家、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她的小说主要阐述存在主义的主题。代表作品有《女客》、《人总有一死》、《名士风流》（见漓江版）等。

全解脱。他还企图以此来说明艺术的宗旨，认为艺术是要使灵魂不完全地或部分地从具体实践中解脱出来，免除惶恐不安和空虚的感觉。这样在世俗存在的条件下真正发挥人的才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艺术创作和人掌握艺术作品。①

战后的1946年，以翻译出版《墙》单行本为契机，萨特主张“介入文学”的思想，对战后日本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存在主义作家们按各自的方法，尝试着以存在主义来表现文学的整体，将存在主义文学倾向向社会扩展，反映战后社会的整个危机意识。

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内容，首先是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和反省人的存在的价值。如上章所述，战后派作家大都有战争的体验和“转向”的体验，战后具有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积极从自我内部追究战争的责任、“转向”的责任，从痛苦的体验中否定过去的自我，重新寻找自我的恢复和自我存在的新价值，在绝望中探索一种新的信念。这是一种逆反心理，从逆反中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只有从他们这种受战争创伤的逆反意识中才能准确地捕捉其真实的意义，它既有对现实的严峻认识，也有自我的再检讨。日本存在主义文学就是主要反映人的命运被战争所蹂躏和被政治所主宰，完全丧失作为人的资格和价值。它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一是人被现实的力量所压倒，处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对自我、对社会所进行的主观的反抗；一是社会巨大的机械力制约着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是脆弱的，于是将人放在特异的

①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470页。

位置上，从观念世界揭示人的存在的不合理性。

其次是探讨人的自由问题。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基于战争的历史教训和思想体验认为，关系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自由问题”。为寻回在战争中丧失的自我，就必须重新检讨人的自由问题，即获得“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创造”问题。他们以为，只有自我享有充分的自由，才能重新确立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日本存在主义对战争和权力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实际感受和思考，它力图充实人的存在的内容。这种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带有对战争和战后现实的否定的含义以及对人们掌握自我命运的鼓励作用。本多秋五曾概括说，存在主义文学所“追求的最终的东西，如果用一个名称来表达，那就是人的自由”(《物语战后文学史》)。与此相关，就是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强调尊重人，发出了尊重人性的呼唤。这是建立在批判战争的非人道、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

对战后存在主义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埴谷雄高和野间宏，其功绩在于努力促使存在主义日本化。埴谷雄高在《死灵》中提出“意识=存在”的新理念，强调了意识是一切存在物互相凭依的状态，是“自己=他人”、“他人=自己”这样一种完全是观念性的自我世界，企图以此观念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思想。野间宏追求的不是观念性的自我，而是非常肉体性的自我。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和“自他”的关系是极其肉体性的感觉。他通过《阴暗的图画》描写主人公看见勃鲁益尔的画，自己的性欲与战争和社会黑暗压迫下的痛苦叠合起来的故事；以及《崩溃的感觉》通过描写主人公看守一个吊死的学生的尸体、回想起战争期间自己自杀未遂时的崩溃的感觉，和由于看守尸体、不能与女友发生性行为而产生的死的感觉与

性欲相互混杂起来的故事，来揭示自我的问题与自他的问题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观念性的自我或肉体性的感觉，来肯定自我的完成，并在这里确立它与存在主义的接点。野间宏曾提出：必须将人作为心理条件、生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统一体来把握，上述的作品就是在创作上的实践。

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恢复与高速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存在主义从探讨战争和战后人的基本存在的关系，转而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但又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对战争的体验逐渐淡薄，有些人就根本没有战争的体验，脱离了战后初期的存在主义对战争和战后生活的积极关心，虽然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这种转变，主要是如上所述的日本社会，既充满和平与发展又充满荒诞、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一种反映。文学要表现这种与战后初期不同的社会现实与生活，无论在观念上和形式上，自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对战争和战后生活的关心，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以及新时代的核武器对人类的威慑等现代社会问题的关心，以及作出存在主义式的思考。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我们新的一代文学家必须在可怕的孤独中进行暧昧的战斗”（《传统与文学》）。所以说，存在与虚无几乎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调。

从创作上来说，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就是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存在主义作家，他们分别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核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以此来说明互相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以观念作为探索的手段，并且使其成为探索的目的。

二

大江健三郎（1935— ），小说家，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坐落在一森林峡谷间的大濑村。童年时代，他是在那片大森林里度过的。林中自然的绿韵，成为哺育他的摇篮。他当时最爱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拉格洛芙的《骑鹅历险记》，从它们的主人公的历险故事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是将会与野鹅结伴而行，便泛起一种官能性的愉悦，自己的感情仿佛也被净化了。所以他自己说，这两部作品“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的依据”，因为他发现住在森林恐怖笼罩的世界里，在林木的悠悠的绿簇拥下容易进入梦乡，获得一种安适和解放。这种从小的感受性，滋润着他的文学想像力。

大江的小学时代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在县里念高中时，他过着寄宿生活，开始爱好文学，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学系，先选教养专业，后改攻法国文学，迷恋上了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7年在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习作小说《奇妙的工作》，接着在《文学界》上发表了处女作《死者的奢华》、《饲育》，因后者获芥川奖而正式登上文坛。从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更新文学的观

念和构建特异的文体，以此来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他与开高健的出现，被认为是战后文学新一代的诞生。

他结婚后，第一个孩子是脑功能障碍儿，取名为光。光一出生就处在濒死的状态，整天躺在特殊的玻璃箱里，大江面对自己的毫无生存希望的初生婴儿，曾经对光的生与死作过痛苦的选择。但他每天都去医院隔着玻璃窗探视，望着孩子那个脑袋、那张脸，他想起埃利亚德的话："人类生存是不可能被破坏的"，就培养起一种坚定的想法："既生之则养之。"几个星期过去了，婴儿还活着，他确实是存在下来了。于是他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接受了这个孩子存在的事实。光生存下来了，但幼年的光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他六岁那年，大江带他去森林中小屋小泊，他听见从林间传来鸟声，竟对鸟儿的歌声作出意想不到的反应，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这是……水鸡。"于是大江看到了希望，全身心地培养他学习作曲，让他把小鸟的歌声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为一个作曲家。大江由此感受到儿子为自己实现了自己幼时的能够听懂鸟类语言的预言。这个"可悲的小生命"诞生的意外事件，以及从光的音乐中感受到"阴暗灵魂的哭喊声"，后来成为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个人的体验》到近作《燃烧的绿树》都将焦点对准他与患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并引发出他的随笔集《生的定义》。

从他的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他多次赴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多年后仍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度着无休止的忧心忡忡的人生，于是他通过"广岛"这个透视镜，把即将宣告死亡的"悲惨与威严"的形

象一个个地记录了下来，并写了随笔集《广岛札记》，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而生存下去。

在直接接触广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后，反过来他又品尝到因为儿子的残疾而深藏在自已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他把两者作为有机联系的综合体来加以思考，并规划其行动。也就是说，他同时面对儿子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频繁的死与生，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后果问题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以及采取“战斗的人道主义的”行动。比如以最大的爱心和耐心将濒临死亡的幼小生命培养成一个很有造诣的作曲家；他又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全人类最关心的反对核试验运动。

概言之，他经历过生活于森林小村庄的自然环境、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及家中残疾儿的三重生活体验，并把这些生活体验作为文化问题总括来思考，这便成为他探讨人类追求生存愿望的根源，以及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的源泉和永恒的主题。

大江是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作为新生一代的存在主义作家而开展文学创作的。大江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萨特小说的形象》。他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像力的表现，三是追求“介入文学”。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是从心理、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但是他是具体通过日本的状况、个人所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和性危机来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

大江在接受萨特等存在主义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他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学者渡边一夫的影响。他说，从渡边那

里，他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他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他得以植根于自己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其二是渡边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对他的影响，促使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人从时代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这对大江健三郎的人生和文学的形成，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大江受到渡边一夫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的追求精神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比如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的乡土、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只对日本读者说话，并表示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要“重新发现《源氏物语》”，并在实践中以这种思想为根基，尽力运用日本传统文学的丰富的想像力、日本古老神话的象征性，以及日本式的语言和文体，以保证吸收存在主义文学理念和技巧并使之日本化。

三

大江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的状态，以及人在被闭锁在“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我们读过大江的《死者的奢华》、《他人的足》、《人羊》，乃至后来的《感化院的少年》等，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小说的特质，是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作家在这方面的感觉是敏锐的，但他所探索的，不是人的消极的、否定的一面，而是人在现代闭塞状态下求生存的积极的、肯定的一面。应该说，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吸收和对战后时期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承，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其次他积极把日本史转型期的重大事件加以文学化。由此可以看出，大江非常重视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且把它们视为作家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作家主体性实现的一种方式。

缘此，他的作品常常带上浓重的政治影子，也就是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通过文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将批判天皇制、反核武器具体到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政治命题形象化。尽管如此，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现政治的实相，更不是将文学简单化为政治的载体，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想像力而加以发挥。

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灵魂》，幻想着模仿百年前在山谷的农民暴动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或者幻想着地面上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大洪水涌来等等。从表层来看，似乎是作家面对政治危机、核危机、破

灭与死亡，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虚无中，但从深层来看，却含有更为积极的内容，它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并深入探索今日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为此作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观照世界的"眼"，强调了作家意识与"眼"的密切联系，以及"眼"和观照的必要联系。他把设定视点和导入"眼"作为创作小说的秘密，并且解释说：

> 这种观照，其本身只有通过设定独自的视点，真正导入被选中的"眼"，最浅显地给作家提供一个为了创造超越于自己世界的线索。我正是以这种思考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语言与文体，眼与观照》）

继《洪水涌上我灵魂》之后，大江自认为最得意、最令他怀念的《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的出现，最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上述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作家设定的视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是从宇宙派遣了"二人帮"来地球摆脱"地球危机"；一个是从"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创造了无限大的宇宙空间，让巨人创造者和破坏者在这宇宙空间展开格斗。实际上，作家是通过这一视点而导入自己独特的"眼"，以超越于自己设定的虚幻世界，来完成一个新的真实的观照世界。这两者的联接点就是想像力。于是作家插上了想像力的翅膀，遨游于现实的世界。这样，作家意识，也可以说作家的目的意识，就自然地流贯于小说的世界和人的实存的世界

这两个内与外、表与里的世界。

日本文学评论家武满彻写道："我们（人类）处在迷失现代文明的总体性的状态。信息的泛滥把人驱赶到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但那是人自己招来的。这种前景被闭锁在黑暗中。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同时代的游戏》是继《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之后又一部强烈希求恢复总体性的书。而且与前作比较，在这里构筑的言语空间更多样性地具有作为时代战略的确实的具体性。读者在这一语言的迷宫里不仅不会迷失自己，而且可以感觉和体味到超越于它的总体性的一致。于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的黑暗的轮廓。"（《同时代的游戏》解说）

可以说，大江文学虽然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吸收存在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于文学理念，而吸收文学理念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取舍与扬弃而加以日本化的。他的上述由"眼"与观照统一构成的文学观，以及具现在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特征之一。

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像力的表现，以及传承日本式的想像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是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另一个特征，他发挥想像力作用的时候，总是把想像力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想象未来，回忆过去。他认为"思考过去和未来，保持总体的记忆和想像力是切实必要的。为了获得这种记忆和想像力，必须抑制所有面的一方的力量。必须通过拒斥被抑制的心，在自由地解放的精神上，回忆过去，想象未来"（《记忆与想像力》）。大江最后强调这种想像力是抵抗"邪恶势力"的手段，正是一般民众和艺术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因而他提倡的想像力是"政治的想像力"，

这是他思考想像力的出发点，也是大江发挥想像力的立足点。

然而，文学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是不同质的两个世界，所以大江主张运用想像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而这座桥是把桥墩深埋在人的本质性的实存之中，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比如，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到《个人的体验》、《叫喊》就是通过性的形象或想像力的语言对现实的再创造，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包括对战争问题，以及天皇制、《日美安全条约》等体制问题的见解。又比如，反核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但大江没有使用政治概念的语言，而是将这个问题植入人性的深层，并使用想像力的语言表现出来。《摆脱危机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世界，展现现代人在政治争斗、右翼躁动和核劫持的面前，对人性的呼唤。他在《现状和文学创作的想像力》一文中说明，这是他“对周围现状的认识，并反复发挥自己文学创作的想像力”。也就是说，大江在想像力的世界里，表述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实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还有一个特征，表现在他将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干来培育其存在主义文学的枝叶。大江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与森林，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与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这固然是由于大江出生在四国岛上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的村落里，与森林、村落有着浓密的血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抱有一种密切的亲情。他在作品中常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看做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并且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从早期的《感化院的少年》起，经过《万延元年的足球

队》、《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直至今年3月刚全部问世的三部曲《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特别是以这些传统的东西扩展为文学的空间，从实质上说，拓展为更具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乃至时代空间，并且加入民族的神话，东方神秘的哲理——再生与救济，从而使创作既获得独自的、更为丰富的想像力，又紧密地贴近时代与社会。因此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广而言之，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在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以为“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于是他在这一领域里开辟了一块“性＋政治”的试验田，把性与政治作为表现人的存在和状态的两个重要的表征，并且实实在在地耕耘着。他的试验性的作品《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自不用说，他的《日常生活的冒险》、《叫喊》也都是抱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以性为通路，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向现实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挑战，向现今的权威主义者挑战，来寻求人的真实存在。正如《叫喊》的主人公最后在现实的压迫下，在孤独和焦灼中，不得不呼喊出“我是人”！

在这些作品里，大江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用了一些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用语，但其着重点是强调性与政治的表里关系。他没有在生理的因素上多做文章，而是利用生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系统，多角度地通过形象来叙述人性的本质和根源，以及人深深扎根于生的欢悦的愿望，同时把“性”

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索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的可能性，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视角。大江面对某些评论家对他的这几部作品的充满道德意识的抨击，在《文学笔记》中作了如下的辨析：

只要是关于性的人，那么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移位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

由此可见，关于性问题，大江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严肃问题来思考的，性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形象，而是由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他探求的性，不是性的自然属性，也不是分割了性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而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复杂性相对应，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也包括政治因素相统一的，反映了人的性被压抑和求解放的愿望。性现象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社会现象复杂性的反映。大江闯进了前人难以取得成功的这一领域，自觉地将这一命题作为作家的命运，巧妙地把握了性与政治统一的创作原理和方法，并大胆地付诸创作实践而取得了成功。

当然，大江在这一领域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采用独特的文体来建构其作品。他既反对规范主义的古典文体，也反对个性主义的特异文体，而主张“存在论”的文体，即感觉与知性结合的“比喻·引用文体”。也就是说，比喻是感觉性的，引用是知性的，两者邂逅而形成大江文体的特质。在大江文学中，比喻文体的表现扮演着重要的暗喻、讽刺和批判角色，同时成为发挥文学上的想像力的一羽重要的翅膀。但比喻文体的表现只能在容许的限制范围内，并不能无限制地扩

张，相反它是受到引用文体的知性的制约，使比喻文体的感觉性纯化和洗练化，以保持想像力的向性作用。举例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卷首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这就是大江的文体的规范句。它既表现感觉的观念，又表达了知性的思考，为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的故事交替展开，为在语言空间中充分发挥其具有导向性的想像力作了坚实的铺垫，使作者也使读者进入一个确实存在的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确保在想象世界中维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感。

大江强调文体对于保持文学上的想像力的生命的必要性时就曾指出：

> 第一，正如从最先作为问题点那样，不能将语言作为单纯的概念来使用，而常要通过与现实的事物、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对应，来使用表现物本身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必须根源化、物质化。
>
> 第二，与作家自己拥有的语言世界、自己的意识世界一样，要自觉认识到其片面的性格，并且克服它。因此也要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的状况相对应，同时争取使用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的多样语言。也就是说，必须将语言多样化。由此，一个作家的语言最好是总体化的，即能够覆盖一个时代总体状况的语言。（《状况与文学的想像力》）

也可以说，大江发现了想像力与语言的相位，让其文学的想像力立足于语言的总体化的位置上，使语言物质化根源化的作用和与状况对应的语言多样化作用互制互补，既扩大其想象的活动范围，又保持与实存世界最直接、最具体的联系。这就

是大江“存在论”文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大江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根本保证。

大江文学的异彩，正是在和（日本）洋（西方）文学的相互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从日本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也是源于此吧。

正如柘植光彦总结这一时期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时指出的：“实际上，有的作家受萨特的影响，也有的作家没有受萨特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毋宁说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更强烈些。尽管如此，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状况给所有的作家都带来了以共同感觉作为基础的共同的主题。战后文学的存在主义倾向，首先是自律地产生，其次是通过与萨特的邂逅产生巨大的漩涡。”

大江将存在主义日本化而取得成功，于 1994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日本文学再一次走向世界。

目　　录

上　　册

下　　册

·随　　笔·

·附　　录·

八、说出真相吧

——谷川俊太郎《鸟羽》

鹰四和星男搬来了一个煤油取暖炉，它呈箱形，颜色似乎制造不出丝毫温暖的气氛。鹰四他们进来时，我看见他们的肩上背上落着砂粒般干硬的雪霰。雪很令妻子和桃子兴奋，甚至耽误了做晚饭。我下楼到正房吃晚饭时，雪已经铺满了前院，可那积雪还很松软，并不很厚实。纷扬不止的大雪和黑暗封闭住了我的视野。我仰起头让雪落在脸上，不由觉得自己仿佛驾一叶小舟飘荡在落雪的大海上，有些保持不住平衡了。如粉的细雪扑进眼里，眼里便不由得泛起泪水。我记得过去山谷里下的雪好像都是有黏性的薄片，足有拇指指肚大小。我品味着几分对雪的回忆。可对这山谷中雪的记忆却已掺杂在我曾生活过的城市里各色飞雪的回忆之中去，不甚分明了。不过这些落在我皮肤上的细雪也像那些陌生城市里飘落的雪一样，对我来说没有一丝亲近感。我踢散积雪，漫不经心地走着。小时候山谷里下第一场雪时，我曾急切地吃了一把。那时我真觉得雪里含着从覆盖山谷的天空到我脚下的大地之间所有矿物质的味道。鹰四他们敞开大门，借着檐灯的微光望着雪花在黑暗中飞舞。他们已被雪弄得如痴如醉，惟我独醒。

“POD的煤油暖炉怎么样？就这么一个颜色适合仓房的。”妻子说。作为醉雪的补偿，她还没有开始喝威士忌。

“又不在仓房长住，雪停了，我明后天就走，我可没工夫在意炉子适不适合房间。”

“阿鹰，从北欧进口的煤油炉给运到这山谷里，这有多神哪！”妻子见我漠不关心，转向鹰四说道。

“这东西山脚的人们绝对买不起，超级市场的天皇把它摆在那儿，就是要挑拨全村的人。”鹰四说。

我忽然想到鹰四也许就是依据这种理论去煽动他足球队里的年轻人的。可我没把这个想法继续深入下去，我已经没有热情去考虑鹰四和山谷的联系了。我就像是个虚幻的人，在围炉旁默默地吃饭。我觉得鹰四和他的“亲兵们”已经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我的质变。谈话继续进行着，它像跨过凹陷一样越过我，毫无阻力，毫不停滞。只有鹰四会微妙地顾及到我的沉默，时常想把我引到谈话中，可我没有顺应他。这并不是存心拒绝，只是觉得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在运S哥遗骨回来的雪铁龙车里，我不能忍受弟弟歪曲事实的回忆，以至于不能保持沉默，是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在为努力地寻找在山谷中开始新生活的突破口而急切地想把在这山谷里发生过的一切同自己的现在联系起来。而今，这种动机早已荡然无存，我也才能明白地看清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鹰四自己与妻子相连成一条边，而我则被作为与他们对立的另一个顶点加入进去，鹰四就是这样使谈话呈一个三角形的布局。然而我这个“点”不指望和他们中任何一个保持关系，我孤立无援，只是一个人像噩梦中的反抗一样手脚沉重地面对颓丧的心境。

“阿蜜你说过的吧，在S哥被杀的那天傍晚，我在土间含

着麦芽糖呆呆地站着。”我没理睬鹰四诉说的眼神，于是鹰四怯怯地将视线移开，转向妻子。于是我明白了鹰四也对他的伎俩不能释怀，自感有罪。但实际上弟弟的心理同我所经历的事没有关系，我并不是因为弟弟的所为而受到了伤害，相反，这些日子来，我得到了些从内心深处观察其他事实的机会，这倒都是弟弟的贡献。“菜采嫂，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这个小孩子的感受和周围的情景都清清楚楚地想起来了。我是站在土间里吃着糖来着，但那不单单是吃着玩。怕化开的糖汁从嘴里流出来，我可是边吃边灵活地转着舌头，好把牙床和嘴唇之间的口水弄干净的，一滴口水也没流呢。阿蜜的记忆里也有用想像力修饰了的地方。他说从我嘴里流出了麦芽糖汁的口水，像血滴似的，那哪儿对呀。我拿出我吃糖的所有看家本领没让口水流出来，那是个鬼把戏嘛。当时天都擦黑了，可从阴暗的土间门口望去，院里的地面放着光，比现在的积雪白亮得多呢，那时阿蜜刚刚把S哥的尸体运回来。妈妈在客厅里精神失常了，也不知妈妈是什么时候打开拉门开始骂她幻觉中那些站在院子里的佃户的，因为客厅是主人坐在那里向院子里的人做各种吩咐的地方吧。于是我这毛孩子就被逼到了逃脱不掉的困境里，被可怕的暴力围攻着了。尸体也好，疯狂也好，都是最直接不过的暴力。所以我精心地吃着麦芽糖，希望以此使自己的意识像伤口能被隆起的肌肉遮盖住一样藏在肌肉里，不去理会外面残酷的现实。于是就想出了这个鬼把戏。如果这个鬼把戏玩得好，也就是说如果麦芽糖化成的水一滴也没流出去，那我马上就能从周围可怕的暴力世界逃脱出来。虽然想法很天真，但我一想到那些与暴力有关的事情，就总会不可思议地想到我的祖先，他们与周围的暴力相抗相争才生存下来，并且能把生

命延续到我这个后代子孙身上。他们可是生活在可怕的暴力时代呀。在我生存着这个事实背后，与我血脉相连的先人不知要与多少残暴的力量对抗过啊。一想到这些我都要晕过去了。”

“阿鹰，你也能努力战胜暴力，把生命的车轮延续下去就好了！”听了鹰四坦率的表白，妻子带着赞赏的语调，同样坦诚地说。

“今天我趴在临时便桥上，紧盯着近在眼前随时可能掉下去摔死的孩子，那时我对暴力想了很多，在土间吃糖的情景也全都想起来了。那可不是新做的梦。”鹰四说完，沉默着又一次向我投以探询的一瞥。

我冒雪回到仓房，想从这台在山谷中第一次被点燃的北欧产的煤油取暖炉上找出点阴沉的滑稽来，便在炉前像只猴子似的蹲下，透过开在黑色圆筒上的圆洞朝里面看。那里面的火苗不停地跳动着，颜色就像晴朗天空下的大海。忽然一只苍蝇飞过来撞到我鼻子上，摔落到左膝上不动弹了。一定是被对流式的炉子加热了的空气升到天棚，把这只打算在榉木屋梁后面蛰居到春天的苍蝇给搞糊涂了。这只苍蝇真大，过去在山谷人呆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严冬季节里胖得这么圆滚滚的苍蝇。也许在马棚里能看到这么大的，可这只苍蝇和它们不是一个种类，它显然就是那种围着人转的苍蝇，只是个头大得不同寻常。我朝苍蝇斜上方十厘米左右的地方劈了一掌，抓住了它。不是吹牛，我是抓苍蝇的高手。记得那年盛夏，一次事故使我右眼失明，我卧床休养，有数不清的苍蝇飞来骚扰我。我调整左眼对远近距离的感觉，磨练出一抓一个准的本领，狠狠报复了那群苍蝇。

我观察了一会儿夹在指间像静脉瘤一样簌簌抖动的苍蝇，

不禁感叹起来。我还得出结论，它的形体真是和“蝇”这个汉字一模一样，我的指尖稍一用力，苍蝇就体裂八瓣了，满满的体液滚将出来，沾湿了手指。我不由觉得指肚上的污秽再难洗净了。厌恶的感觉像炉里的热气，向我周身笼罩过来，又渗透到我体内。可是我只是把手指往裤子的膝盖上擦了擦。我觉得这只死去的苍蝇就像是一个在我神经机能中支撑运动中枢运转的开关，于是我全身麻痹，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我把自己的意识与圆筒上面小洞里的火苗同化为一体，于是圆洞的这一边，我的肉体也不过就是毫无意义的一团肉而已。就这样摆脱掉肉体的责任，让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觉得很舒服，我嗓子发干，火辣辣地刺痒。我琢磨着应该在火炉扁平的头部放上一只装满水的壶，这时我意识到，我正在做心理准备——不仅明天早晨不能出发去东京，而且明天以后，我也许要在这仓房的二楼呆上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我的耳朵已经听出雪是真的下起来了。在山林环绕的山谷的夤夜中，只要开拓一下已经习惯了的幽深的寂静，并训练出能反应更细微声音的听觉，就可以感受到相当多的声音。可是现在山谷里已经万籁俱寂。落下的积雪层吸收了山谷和周围广大森林里的一切声音。隐士阿义现在仍在密林深处独自一人生活，尽管他已经习惯了森林里日常的静寂，可面对雪夜里这种绝对的安宁，怕是他也要不习惯的。隐士阿义在大雪森林中冻死的时候，山脚的人们可看到过他的尸体？他在这雪夜里无声的黑暗中，面对自己反叛社会即将惨死的前景，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是陷入了沉思，还是正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在森林深处，隐士阿义没准也挖了一个长方形坑穴（就像我在自家前院里挖的那个我曾在里面呆过一天的坑穴一样），躲在里边避雪呢。我已经把一个毫无价

值的污水净化槽埋到我前院的坑里了。我怎么就没好好爱惜那个洞呢！我想象出一幅情景：在森林深处并排有两个洞，老洞里是阿义，新洞里是我，我们两个都抱膝坐在潮湿的地上，沉静地等待时机。以前我曾觉得等待时机这个词是用在积极的意义上，而现在我脑海里浮现的这个字眼的含义却是再消极不过了。而且试想一下自己在洞底被自己手指抓下的泥土和石子埋住压死，竟也丝毫不觉得恐怖和厌恶，倒是很想去承受和顺从。在忙乱于山谷之旅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在一步步走着“下坡路”。我又想到，既然我已经开始一个人在这仓房二楼独自生活，那么如果我要把头涂成红色，肛门里塞上黄瓜自缢而死的话，就不会有人来阻拦我了。而且这里有支持了一百多年的榉木屋梁。如此一番展开联想以后，我才又体会到一种新的恐怖和厌恶，当即制止了想仰头确认一下榉木大梁的脖子的转动。

半夜里，前院响起了像马蹄踏在湿地上的声响。那声音一下一下蹬在地面上没有回声。在上了霜的细长的玻璃窗上（对这间屋子包括里面这扇玻璃窗在内所进行的现代化改良是在战争末期，为了收容流离失所的人而安装了电灯和仓房侧面的厕所，可结果流民听说了母亲精神失常的传言，就远远避开，没进过这间仓房）擦出一块像老式镜子那样的椭圆形，向下一望，只见鹰四赤裸着身体，正在前院的积雪上绕着圈跑。借着地面、屋顶和檐前的几丛小灌木上积雪的反射，檐下的灯光一改傍晚的昏黄，光线充足起来，照得前院一片亮白。雪依旧下个不停。这不禁使我形成了奇怪的成见：这一秒之内所有雪片描绘出的线条将在大雪满天这段时间里一成不变，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举动了。一秒钟的状态可以无尽地延伸。声音被雪层吸

收了去。时间的方向性也被飘降的大雪吸收进去，消失得杳无踪迹了。这无处不在的“时间”，赤身裸体奔跑着的鹰四是曾祖父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一百年来所有的瞬间都层层重合成这一瞬间。浑身赤裸的鹰四停下来，走了一会，然后跪到雪地上，用两手来回抚弄着雪。我看见弟弟瘦骨嶙峋的臀部和他那多节虫一样柔软弯曲着的修长的腰身。接着鹰四用力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横倒在雪下。

鹰四赤裸着站起来，浑身沾满了雪。那与身体不大协调的长长的双臂像大猩猩一样颓丧地下垂着，他慢慢地向灯光更亮的地方走回去，我看见他的阴茎勃起着。它就和运动员胳膊上隆起的肌肉一样，让人感到被禁欲主义压制的力量和莫名的怜悯。就像不遮掩肌肉，鹰四也没遮掩阴茎。他正要从敞开的门口进去时，等在土间里的姑娘一步迈出，打开浴巾把赤裸的鹰四裹住了。我的心脏收缩得发痛。可是那不是妻子，是桃子。面对毫不遮掩勃起的阴茎、冻得浑身直抖的鹰四，桃子竟毫不退缩地迎上去给他披上了浴巾。我觉得她就像是鹰四纯洁的妹妹一样。他们一言不发地走进屋里关上门。被檐灯照亮的前院转眼间只剩下封闭百年的茫茫大雪那几乎静止的运动。我感到对于弟弟藏在内心的深渊，我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并且已经到达了它从未达到过的深度，尽管其中的含义还不十分清楚。到明天早上，弟弟赤裸的身体弄乱的雪地上的痕迹，会被后下的雪掩盖住么？除非是一条狗，不然没有谁会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那可怜而又徒然勃起的阴茎。鹰四在一个我未知的黑暗世界里积累起他的经历，这使他像一条孤独的狗，把切实的直率融进自己的个性中。狗不能用语言表达它的忧郁，同样鹰四也有什么心头的郁结不能用一种通用的语言与别人交流。要

是狗的灵魂钻进了我的体内该会是什么样呢？我琢磨着，一面就睡了过去。一只特制的红色大狗把肥胖的身体贴伏在我头上。在黑暗中想象这种情景并不难。那只狗胖得滚圆，尾巴像条长鞭子一样夹在双腿间，遮住阴部，软瘫瘫地浮在黑暗中，用探询的目光回头望着我。它不是那种在夜半大雪中坦率得让人一览无余的狗。我真的叫了声“哇”，赶跑了红色的狗，然后告诫自己别再把那条狗叫回到黑暗里来，又重新睡去。

快到正午的时候，我睁开眼睛醒来。是除夕。从正房传来很多年轻人的笑声。外面并不太冷，雪还在下，天空仍很阴暗，而地面上的光线却柔和而明亮。俯瞰下去，山谷中村落的景致因雪而变得单调，并没勾起我心底扭曲的回忆。四周的森林也因为雪的覆盖显得不那么阴沉可怕了。森林像是退远了一些，而洼地里则满是飞雪飘降，仿佛开阔了许多。我觉得自己旅居在一个风景抽象、舒适陌生的地方。昨晚弟弟蜷伏过的地方并没有被踏乱，原来的凸凹上覆盖了新的积雪，像是昨晚遗留痕迹的缩小模型。我一面往下看，一面侧耳细听一会从土间里侧传来的笑声，这笑声使那边的气氛像是学生宿舍。然后我走进土间，一进去，围坐在炉子周围的足球队的年轻人们立刻沉默下来。我感到畏缩，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无理闯进的怪物，侵扰了围绕着鹰四的这些年轻人的欢聚。妻子和桃子正站在炉灶旁干活。我的心里模模糊糊地指望着她们能替我解围，便走到炉灶旁，却发现她们还沉浸在对山谷中第一场雪的陶醉之中。

“阿蜜，我买来了一双长靴，还是赶早去超级市场买的呢。”纯真的桃子快活地说，“超级市场估计到要下雪，又进了好多新货呢。听说运货的小卡车让大雪截在那边过不了桥呢。

可怜的阿蜜得了思乡病，又没法走了。”

“仓房冷不冷？那儿还能住上些日子吗?”妻子问道。她的眼睛叫雪闹得充了血，但和喝醉时不一样，眼底闪着活泼的光芒。妻子昨晚大概没喝威士忌而且睡得很好。

“啊，还行。没问题。”我答道。声音无精打采。我感觉到带着并非关心的好奇等我答话的那些年轻人，现在轻蔑而满足，毕竟在这大雪来临的日子里，山谷中大概只有我是保持清醒的，感觉麻木的人。

“能不能给我拿点什么吃的?”

我希望小伙子们对我的轻蔑更深，并自然而然地对闯入者置之不理，于是我扮演了一个可怜的挨饿的丈夫。

“阿蜜，会拾掇山鸡吃么？昨天在桥上落难的那孩子的父亲今早和伙伴打来送过来的。”鹰四悠然平静地说道。在足球队队员的面前，他藏起了裸身在雪地里滚来滚去的狗一样的自我，把自己用自信和权威武装起来，树立起另一个新形象。

“等我吃饱了，想办法试试吧。”

年轻的人们终于不再忍耐，故意一齐叹气来嘲笑我。过去在山谷中正经男人从不自己动手做菜。大概现在这种想法也仍然存在。年轻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他们的领袖轻而易举地让迟钝的哥哥上当了。人人都为雪而沉醉兴奋起来，想找点快活的消遣。山谷的人们就都这样以沉醉的心情迎来了初雪，这种心情会一直持续十来天。这期间，他们常常饶有兴致地跑进雪地里，全然不把寒冷当成一回事。他们为醉雪带给体内的暖热而兴奋不已。可是那一段充满激情的时间过去以后，便会宿醉，接着就没有一个人不想从雪里逃脱出来了。这个多雪地区的人们对雪并不具备很强的忍耐力。体内的热情彻底冷静下来以

后，他们仍然无法抵御寒冷的侵袭。如此一来，就开始有人生病了。这就是山谷中人们同雪打交道的模式。我热切希望飞雪带给妻子的沉醉能够持久。我像从前年底来问安的佃户们那样，背朝火炉坐下，开始吃推迟了的早餐。

“一伙毛头小青年，是可怕的不良少年，是放火抢劫不在话下的危险的年轻怪物，这不仅是这个村的，近郊各村的人也都这么看，所以暴动胜利了。比起城镇正门对面的敌人，农民们也许更害怕本地上的暴力团伙。”鹰四把刚才因我的闯入而被打断的话重新讲下去。他正把万延元年农民暴动中青年组织所起到的作用讲给他们听，重新描述当时的情景，好让山谷中的年轻人也继承他的记忆。

“听阿鹰讲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事，他那些队员怎么都听得那么开心?”我压低声音问侍候在旁的妻子。我觉得奇怪。至少在我的理解里，万延元年暴动时，青年组织所起的作用里充满了残忍的暴力，没有任何地方能引起如此快活的放声大笑。

“阿鹰还穿插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话呢，阿蜜，他可不用成见看暴动，阿鹰可不像你，把暴动看得一片忧郁、一团沉重。这不正是他生气勃勃的地方么?”

“万延元年暴动里能挖掘出那么愉快有趣的插曲么?”

“你没问过我这个呀。”妻子反驳我，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阿鹰说，从这儿到城镇的各村的村长和官吏都得跪在路边，农民们空着手一个一个敲着他们的脑袋走过去。他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笑得最开心了。”

一个一个敲村长和官吏的脑袋，这的确是农村的不良少年想出来的土气而滑稽的法子。可是那些村长、官吏们的脑袋叫

儿万民众一个一个敲过去，脑壳里面便被敲得像豆腐渣一样稀碎，惨死在那儿了。

“众人的队列走过去后，老人们趴着死在泼上了人粪人尿的家当前面，这些阿鹰讲过没有？那些年轻的体育健将们听了，没得意地放声大笑吧？”我无意责难鹰四和他的新伙伴，只是出于好奇才这么说罢了。

“有啊，阿蜜。如果真像阿鹰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充满暴力的话，在它面前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总不如有点滑稽的事就尽量笑一笑，这才是健全的符合人性的态度呢。”妻子说着走回到灶边。

“青年组织里的那伙人确实很凶残，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凶残给参加暴动的普通农民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到了必须和敌人搏斗拼杀的时候，他们都不用沾手，有青年组织的人肯定是靠得住的。一般的农民在暴动过后不用担心被追究杀人放火的罪名，所以能踊跃参加进来。参加暴动的所有人都会担心，万不得已不是要亲手去杀人么，而这次暴动事先就解除了这种不安。先不说在村长头上咚地打一下，直接使用暴力的血腥行动也都是由青年组织承担。他们具备那种彻底完成任务的素质。暴动队伍朝城里进军的时候，一路上各村里如果有拒绝参加暴动的地方，青年组织就肆意地放火烧房，那些从房里跳出来的、不让放火的都被杀得干干净净。偶然免遭一死的村民们因为害怕也就参加了起义。虽说他们都是农民弟兄，可实际上却是一群近乎疯狂的不良少年，他们以武力胁迫老实的农民。善良的农民就怕这个，结果使从山谷到城里的所有农民一个不剩地参加了暴动。一旦把哪个村子拉到暴动队伍中来，就挑选村里的不良少年，组成新的青年组织。也没有什么规章，

只是要向革命青年组织创始人的这个山谷青年组织宣誓忠诚，另外就是只要是使用暴力的事，就毫不犹豫地去干。这样，暴动把山谷里的青年组织作为参谋总部，各村里由本村的不良少年组成的队伍作为基层组织进行活动。山谷青年组织每解放一个新的村落就把那个村里的不良少年都叫出来，让他们告发哪一家大富搞过歪门邪道，然后就去袭击。正好在愤愤不平的不良少年眼里，大部分有钱人家都是贼窝。到了城边上的时候，农民暴动的事早就传到了那里了，所以有些大官把财产、书籍、账簿之类藏到寺院里。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暴动指挥部的，也是那些村里的不良少年。他们刚从明理保守的大人们的管束中解放出来，世世代代保持权威地位的大官也好，或是担心着生死问题的寺院也好，他们才不管呢，结果寺院被袭击，藏匿起来的财产全在院里烧毁了。然后，从没被当人看的不良少年成了村里掌握大权的新的领导组织的成员。为什么不良少年组成的青年组织这么突出呢，总结起来看，首先，在村子里，他们属于没有位置的人，在村里的日常生活中，其他人常常把他们当作多余的人对待。其他的大人们总是和本村的人往来密切抱成一团，而对外来事物往往抱怀疑态度，可不良少年就正相反，甚至可以说他们这伙人只和外来的人才会自由地结交。另外，一旦他们进入暴动的领导层中开始行动，由于素质和自由散漫的问题，他们立刻就闹糟了许多事，以至于他们都没法再回到村子集体里去了，不论他们放火还是杀人！所以他们和其他农民不同，希望暴动总能继续下去，他们成了暴动队伍中的青年军官。他们觉得，比起本村的人来，反倒是和外来的伙伴们在一起更踏实。实际上山谷里的青年组织经常照料他们。在暴动接近尾声、队伍打算从城里撤走时，有几个留在后面的不

良少年因为企图强奸商人女儿被逮捕了。只是逮捕不良少年的并不是城里的势力。大伙都挤到正门进行团体交涉，可是从那儿攻不进城去，所以官方一直都是持旁观态度，直到暴徒离城。即便暴动队伍已经开始从城里撤走，可还有几个不良少年恋恋不舍地在镇上结伙游逛。他们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城里走吧，而且燃起无端的性欲。不知怎么回事，还穿上了抢来的女人的衬衣（年轻人们发出嘘声，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伙人想起队伍驻扎在城里时，有人家没招待他们，他们就想去袭击那家人，强奸他家的女儿，于是闯进一家棉花店。可是，一个料到暴动队伍要撤退的警备人员起了野心，要抓住这伙穿着女式和服长衬衫的人。他是看守的头领，于是指挥'番非人'这种最低级的手下人真的把这伙不良少年逮着了。总算有一个人逃了出来，报告给山谷青年组织后，暴动队伍便受命再次攻城，青年组织冒着极大的危险返回去救出几个强奸未遂的流氓。他们很快就抢回了俘虏。成了事件导火线的棉花店被捣毁，'番非人'们也被收拾了一顿，那个叫青吉的看守头头的家被放火烧了。然后，听说一张布告上面还写着首歌：'野心勃勃想立功，手拿细绳充英雄，家中起火心里急，神色狼狈是青吉。'哈哈！"

小伙子们也齐声哈哈大笑起来。我吃完了饭，摞起用过的碗碟拿到水池去时，妻子却现出戒备森严的生硬表情说：

"阿蜜，你要是想反驳阿鹰，就直接和他们争论去好了。"

"得了，我不想插嘴他的宣传活动，"我说，"我只想把山鸡做了。放哪儿了？"

"阿鹰把它挂在房后的木钉上了，那山鸡肥得像小猪似的，又漂亮，有六只呢！"桃子代妻子回答了。她们在竹篓里

放了许多蔬菜，看来是要为运动量极大的足球队员们准备一顿富含维生素的午餐。

“山谷里的青年组织本来是为老实巴交的农民所惧怕的，但在暴动过程中，他们也渐渐地受到了尊敬。也许他们所使用的暴力都是乱拼硬凑出来的花架子。但不管怎么说不只是山谷，他们在全藩都成了引人注目的英雄。后来暴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仍旧无拘无束，从前的不良少年现在举止就像山谷中的贵族。实际上有一段时间，青年组织仍旧保持着势力，随时可以把暴动的民众从山谷中发动起来，其他各村不良少年的组织也仍守着各自的据点。暴动解散的时候，山谷的青年组织和其他村的暴动参加者们一起约定，如果藩内开始镇压就马上再次组织暴动，到时候哪个村犹豫，就先烧掉哪个村的房子。这样一来藩上就只好暂且不追究暴动领袖。在那一段平安时期里，山谷的青年组织不仅大吃大喝抢来的战利品，好像还大肆勾引村里的姑娘媳妇们。不过也可能是姑娘媳妇勾引他们（那些年轻人为这么无聊的笑料居然也笑得很起劲）！因为青年组织到底是由不良少年组成的嘛。他们还有武装，倚仗权势横行霸道，这样的社会状态那就是乱世一个。有人因为和他们争执而被杀，他们中不受女人喜欢的家伙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强奸了再说。对于恢复了和平生活的农民来说，他们成了新的为非作歹的强权。过了不久藩上的搜查官来到山谷里时，他们已经从村民中脱离出来，很是孤立了。结果他们躲在仓库里负隅顽抗，山谷里的伙伴却背叛了他们，约定好的援助一项也没兑现……”

在火炉旁围坐成一圈的人中发出了愤慨的评论。我感到年轻人们正把自己和万延元年农民暴动中的青年组织重合到了一

起，他们单纯得让人难以置信。鹰四没指定说农民暴动的领袖是曾祖父的弟弟，只讲述了包括他在内的山谷青年组织的整体情况，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站在灶前把身上烘得暖暖的，然后来到世田和，在曾经挂过兔子、野鸡和山鸡之类的板壁的木钉上，看到了六只山鸡。那里是我们家里温度最低的地方，盛夏里猫都趴在那排木钉的下面睡觉。我们家的男丁曾一度在各方面都兴旺顺利，现在鹰四又试图在生活中一切细微处模仿那个时代的形式。就连把山鸡用绳子捆住脖子吊到木钉上去的方法也要坚持和祖父、父亲的吊法一模一样。内脏被掏空了的山鸡屁股里居然塞满了海带。可是在过这种真正生活的根所家的那个时代里，他还不懂事，所以他是靠着格外困难的钻研和努力，才重现了洼地里这个家的正规生活秩序，使得人们能从各方面重新体验当时的生活。

我把六只肥壮的山鸡横放在雪地上，拔下黑色和暗红色花纹的羽毛，羽毛立刻和雪片一起被风吹散，只剩下重一点的羽毛梗残留在我的脚边。羽毛下面的肌肉又凉又硬，并且有种厚实的弹力。羽毛之间的绒毛像棉花一样，上面满是透明可爱的虱子，我觉得它们像是还活着。我怕把带着虱子的绒毛吸到肺里，就一边只用鼻孔微弱地呼吸，一边继续用冻僵了的手指拔毛。突然，正是“起了鸡皮疙瘩”的奶油色的薄皮破裂开，我探进去的指尖感觉到里面像是有什么异物。从薄皮一点点破开的裂口上露出受了伤的红黑的肉，上面还沾着血块和霰弹颗粒。我拔下几乎光秃了的身体上最后的几根羽毛，用力把它的脖子一圈圈拧起来扭断。脖颈还差一点就要被拧断了，可我心里不知什么东西阻止我用上最后这点儿力气。我松开它的头，扭曲着的脖颈像弹簧一样猛地弹回来，尖嘴扎到了我的手背

上。我第一次把鸡头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物体进行观察，凝神把握它在我内心唤起的感受。我背后低低的说话声和突然的哄笑声都被这山腰里覆盖在世田和与桑田上的积雪吸收了，只有新降的雪发出细碎的摩擦声，细微得让我怀疑这是不是打到我耳朵上的雪片互相碰撞发出来的声音。

山鸡的脑袋上裹着一层细密的茶色短毛，发出燃烧般红色的光泽。它眼睛周围像鸡冠花一样的红地上嵌着黑点，简直就是肉质草莓。而且它干枯了的白色双眼——可那不是眼睛而是一簇极小的白毛，真正的眼睛在它正上方，像一段黑线似的眼睑紧闭着，我扒开它的眼睑，看见里面盛满水汪汪的东西，就像被剃刀割破了皮的葡萄，一开始还有一种可怕的震慑像脉搏的跳动一样不断袭来，但盯着看了一会儿，也就不觉得怎样了。这不过是只鸡的眼睛。然而白色的“伪造眼”却不是那么脆弱了。在我的注意力被鸡头吸引住之前，在拔下它身上最后的几根毛时，我就一直觉得这只“伪造眼”在盯着我。所以我才不愿意花时间找刀，而打算直接抓住带着“伪造眼”的脑袋，拧断了它的脖子。我的右眼几乎没有视力，在这一点上，和山鸡的“伪造眼”近似，可是它也只具备这种没有视力的负面作用。如果我要像友人那样赤裸着、涂红脑袋、肛门里插上黄瓜自缢而死的话，我就应该在上眼睑画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绿色“伪造眼”，这样才比友人的装扮更具效果。

我把六只拔光了毛的山鸡并排放在雪地上，把头转上一百八十度，用独眼的方式警惕地四下里张望，看着没有猫啊、狗啊之类的，然后回土间去找柴禾。

“……想背叛同伙的人当然要被青年组织驱逐出去，”鹰四继续说着，“要是往城里逃跑立刻就会被抓住，可要是孤立

无援地留在山谷里，不仅得不到同伴的保护，从前倚仗权势欺压过的农民也会同样狠狠地报复他们呀。所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碰碰运气，想办法逃出森林到高知县去。要说他们的逃跑成没成功……”

我正把一捆旧稻草从地板底下拖出来，向妻子要火柴盒的时候，弟弟中断了他的讲话，向我问道：“阿蜜，山鸡肉够肥么？”也许他讲的这些都不是很可信。至少我对万延元年农民暴动以后青年们的活动和生活并不知道得那么详细。

“啊，肥得很呢，是上等山鸡。森林并没有荒废嘛。”

我把稻草放进用鞋踩实的雪坑里，摆成一圈，点着了火。粘在山鸡皮上的细绒毛很快被烧掉，发出一股煳味。不一会儿，山鸡身上就布满了烤化的肉质那焦茶色的细线，鸡皮也被熏烤得颜色变深，到处都露出黄色的粒状脂肪。这一下让我想起死去的友人说过的一句话：“被烧死的黑人因为身体瘫软鼓胀，看不清细模样，像一个粗制的木偶。”在我背后，有一个人和我同样认真地凝视着我所看的东西。回头一看，那人是鹰四。因为炉子和辩论的火热，他的脸涨红得几乎能把落下的雪片刷地溶化掉。我相信山鸡这副被烧掉绒毛的模样也在弟弟心里唤起了与我同样的回忆。

“听说我那个死去的朋友在纽约见到你的时候，向你要了本关于争取公民权运动的小册子吧。说是上面登着黑人被烧死的照片。”

“啊，对啊。那张照片太可怕了，属于那种揭露暴力本质的东西。”

“那个朋友还说，你突然说，我把真相讲出来吧，吓了他一跳。他一直很不安，说不知道你除了跟他说的那些事以外，

心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你挺犯难，可最后也没能说出来。什么事啊？他直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个问题。他死的时候带着的这个疑问真有什么内容么？"

鹰四脸上的红潮渐渐退去。他抑郁地眯起眼，而让他觉得晃眼的，也许不光是雪地反射的白光，还有在他内心涌起的回忆。他又把目光落在山鸡上。然后他说："我把真相讲出来吧。"他的声音让我觉得他以前在纽约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就是这种语调。"这是个年轻诗人写的一句诗呀。那时候我把它当成口头禅了。我所考虑的绝对的真相，如果谁说出去了，要么被人杀死，要么自杀，要么变成不堪入目的疯子、叛逆的怪物，只能选择其一。那件事实一旦说出口，就等于在怀里抱了一个已经点了火的炸弹，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想一个活着的人会有勇气把这种事的真相告诉别人么？"

"但是走投无路时，痛下决心，讲出真相，这种人也是有的呀。不过他大概是既不会被杀死，也不用自杀，更不能变成疯狂的怪物，总能想办法活下去的。"我一边猜测鹰四突然饶舌的意图，一边反驳他。

"不，那简直比登天还难。"鹰四把我想到的见解一脚踢开，语气坚决，显然他是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要是真有人说出了真相后仍旧没被杀也没自杀、也没变得和正常人不一样极度乖戾凶狠，还继续活下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他所说的事，实际并不是我说的那种像点着引线的炸弹一样危险的事。只会是这样，阿蜜。"

"那么，把你说的那种真相说出去的人，就一点出路也没有了么？"我有点退缩，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可是，那些作家怎么样？有些作家通过他们的小说说出真相后，不是都还继

续活下去了?”

“作家么?的确他们中有些人说出了准真相的事情，并且没被打死，也没发疯，仍旧好好地活着。他们是借小说的虚构情节蒙蔽别人。他们蒙上虚构的外衣，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不论是可怕的、危险的，还是厚颜无耻的事都可以写出来，这正是作家行业本质上的弱点。至少作家自己在吐露真相的时候，都能意识到自己借着小说的外衣便什么都可以说出来，所以对自己作品中的所有毒素早就都有免疫力了。结果这也传染给了读者，很容易使他们以为小说里没有对真实灵魂的直接揭示。这么一想，其实在印刷出来的文章里并不存在我所说的那种真相，最多也只能看到某些作品摆出来的不惜陷入危险也要揭露事实的姿态。”

烧掉了绒毛的山鸡摆成一排，膘肥肉厚的身体上落了积雪。我每次拿起两只，用力互相拍打它们，以磕掉积雪。它们发出的嘣嘣响声，直响到我胃里。

“我那朋友说，你说‘说出真相吧’的那天，他看见你想从背后吓唬他之前，你好像在看那种尸体烧焦的照片想心事来着，他没有错吧。那时候你是不是在药品商店的柜台前面，想象着你要是说出真相，就会变成照片上那样烧焦的死尸?”

“没错，我想他多少理解了我一点儿了。而且，我觉得我也明白他自杀方式的含义。”鹰四直率地说道。这又使我想起在机场他悼念朋友的那番话给我内心带来的波动。“他是你的朋友，我这样自信了解他也许你觉得很可笑，但我从菜采嫂那儿听到他的事儿以后，真还反复琢磨了一下。他把头涂成红色，赤身裸体地（我想到妻子和弟弟还不知道，他的肛门里塞上了黄瓜）上吊，也许是在大喊‘说出真相吧’之后，立即自

杀的。即使他没喊过这句话，但他也只是认识到一瞬间后再也无法复活的尸体就会红着头、裸着体地摆在别人眼前这一点以后才勇敢地跳下凳子的。这种行为本身不就等于一字不差地喊‘说出真相吧’一样么？不是么？阿蜜！用红头裸体的死尸向活着的人做最后的自我表白，这种决断难道不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么！他是用自己的行动说出了真相才死去的。我不知道他说出的是什么样的真相，但不管怎么说他绝对是说出了真相。我从菜采嫂那儿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在心里对你那死去的朋友说：‘OK，我听见你喊出来的真相了！’”

我明白了鹰四的话。

“我的朋友替你付了胶囊钱绝没吃亏。”

“如果我要讲出那件事的真相，我想让你来听。那件事对你说出来以后才会发挥出真相的威力。”鹰四像个为冒险而兴奋的孩子，天真地说。

“因为我是你的亲人？”

“是的。”

“那么，你要说的真相，是妹妹的事么？”我问。我心中的疑惑几乎要令我窒息。

话音刚落，鹰四立刻绷直身体，用毫不掩饰的凶狠目光逼视着我，让我怀疑他会不会向我扑上来。可是弟弟只是用强烈的戒备来探出隐藏在这话背后的动机。过了一会，弟弟松弛下全身的肌肉，把脸掉转开。

我们沉默不语地看着山鸡肉上新落的雪。阴冷的寒气砭人肌骨。弟弟也跟他那相貌魁伟的单衣伙伴一样，嘴唇青紫，浑身打颤，我想赶快回到土间，却又觉得我们的谈话该有个平静的结尾。正当我漫无目标地寻找安全的话题时，鹰四先于我把

两个人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

“阿蜜，我劝你到山谷来，并不只是为我的计谋打算，好能在卖掉仓房和地产时对村公所的人说是受住在山上的哥哥的委托来办手续的。我是想在我说出真相的时候，你能做我的证人，我希望我说出来真相是在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别再提仓房和地皮的事了。”我说，“我是，我想那可怕的真相你最后对谁也不会说出来的，要是你把它当做内心深处的秘密的话。同样，我最终也没找到我的草庐和新生活。”

说完之后，我们并肩回到屋里。我们都给冻透了。桃子正给炉边的年轻人分午饭的炖菜。这是山谷里的鹰四他们合宿以后的第一顿饭吧，让人记起新年时山谷青年合宿的风俗。勤劳能干的星男在远离新伙伴圈子的角落里，给一大堆比赛用足球一个一个认真地擦上保革油。我把六只山鸡肉块交给妻子，穿上新长靴，踢踏着积雪回到仓房。

九、放逐者的自由

过了很久，那雪依旧飘摇如粉，不曾变成花瓣大小的薄片。我心里的期待又落空了。我仍是没有适应这雪。我不踏进飞雪世界，闷在仓房里专心翻译书稿。我甚至把饭也带了来，这样，只是需要往炉上的水壶里加水时，我才回正房。正是这时，我看见了鹰四和他的伙伴们，他们一个个搞得如痴如狂，然而却不见宿醉的劳顿和放纵的神情，仍然是一派天真烂漫。新下的雪将积雪带来的破败颓唐覆盖无余，不断更改着积雪的外观。于是正房里这群狂热的人们便一直对雪酩酊酣醉，甚至无暇镇静下来。这时，我想到不妨把雪融了再放到壶里，这样一来，我的日常生活便更加彻底地与正房分开了。我便这样耽于远离尘嚣的静谧之中，懒于表情，倦于举动，在越来越大的雪中度过了整整三天。

然而，就在元旦这天，阿仁一家从早晨开始就两次搅乱了我的隐居生活。先是一大早，阿仁的长子叫醒我，告诉我说阿仁令相当于根所家现家长的我去打新水驱邪。阿仁的儿子神经紧张，活像个容易被土俗陈规烦扰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递给我一张用硬铅笔画在邮赠广告背面的难以辨认的打水路线图。我就着台阶下微暗的灯光，眯起不惯光亮的眼睛瞧了一遍。我

想把阿仁的这幅今年打水路线图记下来，可到底没有做到。我垂头丧气地返回二楼，把外衣严严实实裹到身上。阿仁那可怜的儿子，像条全身湿透的狗一样抖个不停，一句话不讲，耐心地等着我，想来是他娘老子命他与我同去打水吧。走近正房，我看见炕炉里的余烬闪着红光，鹰四和妻子在炉边并体而眠。鹰四的背后睡着星男、妻子的毛毯里睡着桃子，但是盖在毛毯里的鹰四的胳膊分明伸到了妻子的侧腹，瞧那样子，真像是只有他们两人同眠，有点旁若无人。就在我站在门口半感为难地看着他们的时候，阿仁的儿子很是麻利地从灶边临时找来了一个完成这项神圣使命所需的大水桶。于是，我便和阿仁的儿子一起，走进了漫天大雪的黑暗之中。

飘落的雪花，使我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皮肤灼热而厚重。可我的情绪反而镇静得有些萎靡不振了。想到我和妻子之间癌症般致命的性冷淡，我的心情抑郁难解。如果能像个疲惫不堪的士兵，从这冷淡的沼泽里，步履沉重地逃将出来，这还不是最好的么？然而我并没有承认妻子和鹰四会直接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在黑暗的雪野中赶着路，我的大脑一片空虚，只是偶而会闪现出一个神秘的幻景：赤裸的鹰四满身雪水，勃起的阴茎上那曾被禁欲抑制了的强大欲望，沿着他放在熟睡的妻子侧腹的手指传导到妻子身上，将她性冷淡的郁结消融殆尽。

从山谷的大路到水边去的路上，雪依旧很柔和。阿仁的儿子，想必在他母亲摆弄着历书和方位表测算打水路线的时候就已经在旁边看了个烂熟，现在他充满自信，踏着没膝的积雪一个劲儿往前走。来到能看得见河面的地方，我被因积雪而变得狭窄的漆黑水面吓呆了。尚有睡意的大脑空间里浮游着的幻景残片俨然坠落尘埃。这漆黑一团的水面令我想起了某种令人恐

惧又令人生厌的东西，于是，我喃喃地念起咒语："我与这河谷毫不相干"，以求些解脱。我纵然能够不去理会其中的含义，但是那被大雪围困的漆黑河水却还是我回到这块洼地以后见到的最骇人的东西。见我一脸茫然，阿仁的儿子误以为我是害怕被深深的积雪陷住脚才畏缩不前的，便耽了片刻，终于从我的手里夺下水桶，跪将下去，从满是积雪的斜坡一路下滑，独自到水边去了。接着，一阵害羞似的水声轻轻响过之后，阿仁的儿子便蹚着积雪，把河水打了上来。除了我那个水桶，他还提着个不知什么时候拾来的空奶粉筒，毕恭毕敬往里盛满了河水。

"这新水也不是不分给你!"让我这么一说，阿仁的儿子像要护住它似的马上用两手盖住了他的小筒。

这样一来，我明白了他的小脑袋瓜里刚刚成形的固执想法：不是我自己亲手打来而是打发阿仁儿子打来的我的新水不过是冒牌货，而盛满阿仁儿子空筒里的他的新水，才是他自己亲手打来的货真价实的东西。阿仁家与根所家的新水原来是不分彼此的，所以，如果我肯下到水边打些水来，阿仁的儿子也会分得一些我们共有的货真价实的新水，他该会满意的。然而，在我畏缩不前、使我名下的新水沦为假货的时候，阿仁的儿子却想到把他自己名下的新水盛到他捡来的空筒里，带给他那个臃肿不堪的母亲。这孩子的母亲胖得几乎转不过身来，要是她的儿子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满脑子荒诞不经的家伙，这些举动倒不是身不由己。我彻底清醒过来，于是我开始觉得，大清早跑到河边来，实在是愚不可及。我郁郁不乐地回到石板路上。打水真该是鹰四他们干的活儿。为了不再见到那几个梦乡里的人，我在上房门前把水桶递给阿仁的儿子，要他提到房

里，然后返回仓房。肩膀冻得酸痛，闹得我新做的梦变得险恶不堪。在这噩梦里，从漆黑的水面伸出两只巨大的手掌，力量大得惊人，猛然抓住我的双肩，吓得我心惊胆战。

傍晌，那孩子又来叫我，告诉我说阿仁要带着她那细瘦的一家人来拜年。我走下台阶，便看见阿仁对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坐在门口的横框上，她的身体还是胖得令人难以置信，活像一只突然滚进来的沉甸甸的大球。我料想要让她的身体转个方向会费掉她不少力气，便走下房来，和她的家人一起并肩站到了她的斜前方。阿仁在白雪纷杂无向的反光照耀下显得格外年轻，脸上的皮肤像金属脸盆一样油亮亮的，没有一丝皱纹，她脸上的肉抖个不停，盯着我只顾呼呼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门房到这儿不过几米远的距离，却把她搞得像一头就要溺死的猪。只要她不说话，全家人也都默不作声，于是，强打精神走下房来的我，反倒感到穷极无聊了。姑且不论这个前后上下都裹着黑口袋似的东西的女人，她的家人们也都身着新年盛装，可我呢，还是穿着那件睡觉时也未曾脱下过的灯心绒衬衣，外面套了件毛衣，胡子都没刮。我开始担心，这岂不要让阿仁害上被害妄想症，因为她特来贺年，却受到了如此的轻视。可阿仁却在好不容易整调好呼吸之后，嘶哑着轻声清了清嗓子，致意道：

“新年好啊，蜜三郎先生！”

“阿仁，你新年好！”

“哪里、哪里！什么好不好的。我就是这么个可怜虫了！”阿仁一下子强硬起来，“要是碰上逃难，我又逃不了，不是喂狗还不就是活活饿死么！”

“又翻上老皇历了。什么逃难，还不是万延元年大暴动以

前才有的事!"

"哪儿啊，我就见过逃难，仗打败了，占领军坐着吉普军开进来那会儿，老人啦，动不了的人啦，全搬到山谷里去了，全村的壮丁不是都跑到林子里去了？那就是逃难!"阿仁的话里满是顽固愚钝的自信。

"阿仁，那可不是！头一辆吉普车开来的时候，我就在山脚，我可知道，美国兵还给我瓶龙须菜罐头呢，可大人们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末了还是交到小学教员室那儿去了。"

"才不是呢！大伙儿可都逃难来着!"阿仁不为所动，固执己见。

"蜜三郎先生，阿仁她脑袋有点毛病!"阿仁一直缄口不言的丈夫插嘴说。听了她的话，孩子们都表现出令旁观者感到难过的不安，骚动起来。

我不由得想起，在我那个仓房遭到袭击的噩梦里，觉得阿仁真是个绝对无处可逃的人，可你瞧阿仁，她那被肥肉挤得像肚脐似的小眼睛，让白雪晃得眯成一条缝，她用牙咬着薄薄的嘴唇，露出肮脏的、仿佛布满鳞片的耳朵，真像安上了手柄的一轮圆月亮！她的身体虽然发育失调，可分明保持着那么一种坚定的理智，她做出的疯狂举动或许是阻止出售仓房独间儿的新战术吧。然而应该领教阿仁这番计谋的实在不该是我，该是鹰四，鹰四已经变卖了包括阿仁住处在内的根所家的全部地皮和房产，若是大家能认清鹰四穷凶极恶的本性，这也全然有赖于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背叛这个肥胖绝伦、满心绝望的中年妇女那可怜的计策。这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感受性。

"大洼村全完了！人心都坏了!"阿仁说，"昨晚的除夕夜，从村里，从'乡下'来了多少人到有电视机的人家疯挤，

闹得人家都没法儿准备过年了，什么也干不了。好可怜啊！”

“你们也去看电视了？”我问孩子们。

“啊！去了！看红白歌会来着。要是哪家关上窗闸板偷着看电视，大伙就气得擂他的窗闸板！”阿仁的次子自豪地回答，“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直闹到家家的电视机全都歇了气，还不肯回家呢！”

在我回到仓房二楼的小窝里之后，阿仁一家人冒着大雪慢腾腾地向上房挪去。那是给鹰四他们拜年去了。从窗子往下看，阿仁的身体简直像个摇摆不停的雪人，中间那颗圆脑袋已经秃了顶。不一会儿，我又从仓房的窗子瞧见，几个年轻人抱着阿仁，将她搬进门房去。那做坏事的家伙踢着积雪，在抬阿仁的年轻人身旁跳来跳去，尖声喊叫，指挥着他们。于是，阿仁的孩子们像是忍俊不禁，便爆发了一阵天真烂漫的大笑。

1月4日早晨，为打长途电话，我第一次下山。虽说连下了几天雪，但通向村公所前面广场的那条狭窄的石板路却并不难走。船底形的路上落着薄薄的一层新雪，下面的雪早被踩硬实了。在这几十个小时里，山脚下的那些男人们为庆贺新年，聚在一起喝得烂醉，可这些足球队的少年们却排着队，踏着雪，跑上跑下，大运动量地训练着。走过超级市场时，我却见到了一幅令人担心的不祥情景，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和谐的感觉。眼下的超级市场，紧闭着黄绿斑驳的大门，宛如一辆涂着迷彩的战车。几个从“乡下”赶来的农妇候在檐下，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一人带一个小孩，呆呆地站在那儿，既然她们胳膊上挎着空空的购物篮子，那么她们大概是为了买些东西才在这儿等超级市场开门。有的孩子已经累得蹲到了雪地上。看来店门前的这帮农妇已坚韧不拔地等候了很久。自从元旦以来，

超级市场就一直没有营业。现在，大门依然紧闭，也见不到店员的影子。那么，“乡下”的这帮女人提着空篮子在这里等个什么劲儿呢?

我满腹狐疑地走过去。让超级市场挤对得早已偃旗歇业的山脚下的几家店铺，一律是房檐低垂，屋内昏暗，房主们只能躲在最黑暗的角落朝外边窥视。白雪皑皑的石板路上人迹罕至，我甚至见不到一个行人，也好打听一下“乡下”的那群女人干吗要怪模怪样地守在那里。而且就算有谁到这条石板路上来，只要我走上前去搭讪，他就可能就地解手以避开我。邮局的服务员，我等长途电话时，他总能同我聊聊吧?可那邮局也同歇业的店家一样，不扫檐下的积雪，任其堆在门前。

只有一扇前门打开着。我跨过门前的雪堆，走进邮局昏暗的屋里。窗口找不到一个服务员。于是，我大呼小叫地要不知躲在哪里的服务员替我接通长途电话。

“雪把电话线压断了，通不到市外!”立刻就有一个老人，从与我近得令我意外的那个低处的角落愤愤地回答。

“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我问。那声音唤起了我一部分陈旧的记忆。

“修电话的那帮小子住在根所家，叫他们他们也不来干活啊。”老人说。他激愤的声音越发高亢起来。我想起来了，他是我小时候就这么易怒而平庸的老邮政局长，可我到底没有搞清，他是用怎样的一种姿态躲在这样低的地方工作的。我回转过身，还是往超级市场的方向走，注意到前面有两个男人相对而立，轮番把手伸向对方的头顶。只是回去的路上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我躲避不及，低埋下头走近他们，却早忘了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惦记着在紧闭的大门前傻等的那群

“乡下”女人们。走近一看，非但那些女人还站在原地，这短短的时间里竟又多出了十几个人。女人们还是沉静地伫立等候，只是刚才还在跑来跑去或是蹲在雪地上的小孩子们现在却已经怯生生地抽噎着，搂住妈妈的腰。我停下脚步，想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可在我面前，又有一群男人正在大打出手。他们与我离得这么近，令我感到害怕，又很是大惑不解。对这种有如约会的规规矩矩、默不作声的斗殴，我只好盯着看。

这是山脚下几个已过中年、一本正经的男人，都穿着没打领带的西装（这还是山脚地区最常见的盛装），一个个醉得烂泥一般。他们古铜色的脸上闪着热气，喷出来的狂热的气息，在风雪中宛如沸水。他们全然不管满脚的积雪，踩在松软的雪堆里，更加坚定从容，双脚站得稳稳的。每一出手，他们紧握的拳头总会打到对方的耳朵、下颚或者脖子。这简直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斗犬在嘶咬：愚钝坚忍，默默无声。这时，一个矮小的男人脸上酒后的红晕眼见着消失了，几乎缩成了一团。然而他又挨了一下，于是一声惨叫从他那苍白干硬的面部皮肤上渗出热汗似的涌了出来。可是，他却匆匆地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拽出个什么东西，用手攥着它，打在对方的嘴巴上。随着一声用铁钩撬开牡蛎似的闷响，一小块带着红血泡的碎片向我这边飞来。那被打的男人双手捂着依旧醉红的下半边脸，弓着腰朝我跑过来，打人的男人则放开脚步全速追赶。我分明地听到了挨打的人精疲力竭衰弱已极的呻吟，也听到了追赶人呼哧呼哧的喘息。我转过身目送他们渐渐跑远。然后，我蹲下来，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落到了脚边的雪地上。那雪地早已被踩得一塌糊涂，却还清洁白净，上面有一块杏核大小红色的凹陷。在凹陷的底里，有一颗黄褐色的树芽般的东西，它小小的根部还

粘着什么玫瑰色的形如木耳的东西。我伸出手指把它拿到手里，猛然感到心里绞痛般的恶心，将它扔了出去。那是颗带根的残缺的牙齿。我蹲在地上，活像只呕吐不止的狗，孤立无援、虚弱无力地环视着四周。超级市场大门前的女人们，依旧木然地盯着天空兀立不动，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的小孩子们紧紧抓住母亲粗劣的外套下摆，怯生生地往这边偷看，好像我成了他们的新的威胁。周围人家里，人们一定是一直在肮脏的玻璃门后的阴影里窥视着这一幕，但他们却缩头缩脑，不肯出来。我慌得撒腿就逃，脚踩着路边还没踩实的绵软积雪，满心是梦魇中遁逃时无依无靠的焦灼，一口气逃到石板路上去。

我震惊不已。自从把自己关在仓房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想与鹰四谈一谈了，我要谈谈我刚才遇到的这一切。我把鹰四叫到上房的檐下。在房里合宿的少年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我不愿意进去。

“从元旦开始，山脚那边就总是在打架啊，阿蜜。”鹰四回答。他倒是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讲述，但全然不睬我极度的震惊。“村里的大人们近来总是火气很大，新年放假，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事儿做，往年都是那些小伙子早早儿地就生事打架发泄一下，可是这些‘一等乱民’现在正和我住在一起刻苦训练呢。所以呀，没法子，懂事理的大人们才开始自己打架。原来他们看见年轻人打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调停说和，好借此宣泄一下心中郁积的暴力情绪，可现在，他们自己也打个不停了。可他们打起架来，怕是没人出来劝架吧？成年人打架可和年轻人不同，他们彼此打成一团的话，谁要参与进去又不吃亏怕是难了。这样一来，他们打架，也就无人过问，没完没了了！”

“反正我可是没见过像他们这么打架的，那些人把牙都给连根打下来了！”我唠叨着，心里很难接受鹰四那和平常一样平静的分析，“他们就那么一声不吭，挥着拳头使足力气打来打去。就是喝醉了，这也不对劲呀，阿鹰！”

“在波士顿，我去参观过总统的故居。演《我们自身的耻辱》的那帮人结队去过。我们坐小客车回家路过贫民区的时候，就看见两个黑人青年打起来了，其中的一个举起砖头吓唬人，那人的前胸和肌肉可差点劲儿。对方呢，却站得远远的，迎接挑衅。就是我们的车从他们身边开过去的那一刻，那个一时疏忽的男人，向前凑得太近了点，结果，砖头一下砸在他头上，他摔到地上，脑袋给砸开了瓢，脑浆都出来了。可住在附近的人，全都坐在家里阳台的摇椅或者是大扶手藤椅上，一声不响地盯着看。山脚那里的暴力不过只是停留在打掉一颗牙的程度，还没出过人命呢。我们日本人打起架来，不是思前想后不敢打，就是体力不佳打不动，可在心理上，恐怕倒是应该承认，山脚那边和黑人滋事的贫民区没有什么两样。”

“可能是吧。在我的记忆当中，山脚那边，而且是一大早就公然大打出手，真还是头一遭。搁在从前，要不了打这么凶，小孩子们早就跑到派出所去叫巡警了。可是今天早晨，人们都只会躲在家里，冷眼旁观呢，阿鹰！”

“派出所没有人嘛，还在刚开始下雪的那天夜里，巡警就让市里的电报召去了。下了这么多天雪，公共汽车也不通，电话线也叫大雪压折的树枝给搞断了，这山谷里的人哪个晓得巡警们现在怎么欢度新年呢！”

鹰四的话，让我察觉出一种相当可疑的迹象。然而，我打消了问其究竟的想法。我又何尝不希望把自己同鹰四和他的那

支足球队的活动隔绝开来。鹰四仍像着了魔似的义无反顾，我感到跟他走下去是危险而又麻烦的。而且时至今日，我再也没有心思对鹰四评头品足。

“超级市场过年放假吧？大门关着，可是门口却聚了一群‘乡下’女人，这是怎么回事？过年这一个星期似乎不靠超级市场，省吃俭用也过得去啊，可那群女人却只管一动不动地守在紧闭的大门前，岂不奇怪？”我换了个话题，可鹰四却说：

“怎么，已经聚起来了？”他的话重又让我怀疑起来。“今天下午，在超级市场还要有点活动呢！阿蜜，你不去看看？”

“我可没那份心思。”我本能地提高了警觉，一口回绝。

“也不问问是什么活动，先就咬定没心思去看？你这个仓房的隐士！”鹰四的话，留有明显的余地，敷衍着我。

“就算是吧。我对山脚要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兴趣。”

“对山脚的一切你都没有兴趣去看！不用说，你更没有兴趣亲身参加了！好像你阿蜜不是活在这块洼地上的！”

“因为下雪，我也只好在这儿呆下去了。不管山脚那边要出什么怪事，我只希望在出事之前从这儿出去，然后决不再想林子里这块洼地的事！”

鹰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近乎嘲弄的含混的微笑，默然摇了两三下头，退回屋里去了。我感到他不愿意我看见年轻人在他屋里进行的作业，而我也不想干预什么，便折回二楼的仓房。

桃子来送午饭时，让我从仓房窗户看一看超级市场的房顶挂起的新旗。桃子孩子气地急于让我中计，十分天真可爱，搞得我没法回绝她的提议。超级市场的土仓顶上，有红黄两种兴奋的三角旗正在风中飘扬。透过山谷里下个不停的雪片，看上去这倒像是擦痕累累的旧影片里映出的场景。我转过脸来，见

桃子正满眼期待地盯着我看，我当然不晓得这两种旗子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这旗子为什么让你这么高兴?”

“为什么?”桃子反问了一句。她全身颤抖，显然，她很想讲出来，却又有所忌讳，这种矛盾的感情撕扯得她目露凶光。

“阿蜜，你见到这旗子觉得难过?”

“等回到东京，我给你寄几种好玩的旗子来，阿桃。”我对弟弟的这个最小的“亲兵”打趣道，然后开始吃午饭。

“四点钟，到山脚那边看看，可能就会知道出什么事了，像你这样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也会的！可是从四点开始哟！你是想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的，是不是？可是，我不能出卖足球队呀，阿蜜!”

桃子在这大雪天竟光着身子得意地穿着那件印第安皮袄，它皱皱巴巴、针脚宽大，连浅黑色的皮肤也遮盖不住。一眼看去，她像个滑稽落伍的女恐怖分子，引人发笑。

“阿桃，我可是绝对不想知道要出什么事，你谁也没出卖。”

“你这种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可真没劲!”桃子委屈极了，愤愤地说。然后就转身回到自己未曾出卖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下午四点，从谷底传来了为数甚众的人们的叫喊声：“啊——啊——啊——啊——”声音缭绕不绝，一声高过一声。那喊声十分急促，又夹杂着快乐的亢奋，不断冲击着精神深处充血的黏膜皱褶之类最为隐秘的部位。听到这喊声，我不禁手足无措，就像裸露癖的丑态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喃喃地说出声来：“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然而立刻，仓房的一角

就仿佛有什么莫名的东西应了一声。我又变得狼狈起来，摇头叫道："不！不！"外面的喊声越发激昂震耳，持续不断。可是忽然，喊声平静下来，只剩下一种低沉的嘈杂，如同无数只蜜蜂在飞舞。偶尔会有几声嘶哑的吼叫打破这种嘈杂，与小孩子的尖声惨叫和欢乐的呼喊相抗衡。在喊声不断传来的时候，我暂且还能安心译书，可这种莫名其妙的断续尖叫却扰乱了我，使我再也无法专心做事了。我只好站起身来，让玻璃吐出的凉气直逼我滚烫的面颊和双眼，透过昏暗模糊的玻璃窗，瞧一瞧黄昏早已降临的山谷空间。现在，只是一些纤小的雪粒还在悄悄下个不停。围在看似弥漫乳色暗雾的山脚四面的森林一片漆黑，飘雪的天空也仿佛是捂住山脚的一只黑褐色巨掌。我瞪大发痛的眼睛，凝神寻找超级市场的旗子，发现那旗如同沉到脏水里的陶片，呈现出朦胧的柔色，像收起翅膀的小鸟，悄然垂下，浮出雾来。我全然不知超级市场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而，那群女人在两个中年男人默不作声地殴斗时一声不响，在紧闭的大门前巍然不动的画面却留在了我的心底，挥之不去，尽管我曾被山脚处传来的喊声惊吓了一番。我焦急不安、筋疲力尽地走回桌边。我成功地阻止了自己下山，可是我却无法阻止自己去思想：山脚那边一定是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一定与鹰四及其足球队成员有关。我无法重新开始工作，便在译文草稿纸上一丝不苟地为一节中午吃的焖牛尾的关节骨画了幅阴影速写。尾骨色如牡蛎，上有七扭八歪的凹凸，满是像被虫子蛀了窝似的小坑，关节两端附有胶质的圆盖儿似的东西，谁能猜得出在牛还活蹦乱跳的时候，它为牛尾增添了怎样的力气？我信手涂鸦了很久之后，放下铅笔，用牙将那圆盖儿上胶质的残渣啃下来，看味道是否有什么不同。

只有烹煮时使用的汤料和冷油的味道。我的整个身心觉得疲惫不堪，郁郁寡欢，无法解脱。到五点，窗外已经是一片黑暗，夹杂着几声高呼的低沉的嘈杂仍在继续，醉汉们激越的叫喊也混了进来。随着一阵沉重的金属撞击声，阿仁的儿子们亢奋得喋喋不休、精神抖擞地回家来了。往日里他们经过仓房时，总是蹑手蹑脚，生怕影响我的工作，而今，他们全不顾忌二楼的这个孤独者了。看情形他们也和大人们一样，与山脚的共同体参加了一场具有正规意义的行动。很快，鹰四和合宿的少年们也回到了上房，院里很是喧闹了一阵。直到入夜，山脚那边还不时传来几伙醉汉寻衅争斗的吵闹声，又突然爆出了一阵粗鲁的狂笑，响了很久以后才消失。

晚饭是妻子自己送进来的。她头上包了块头巾，那是块我在桥边人群里的女人堆中看到过的图案俗艳的印花布。想来妻子一心要模仿山谷傻妞儿们粗放的魅力，可那让头巾衬托得很显眼的宽宽的前额却令人觉出了一种抑郁。况且今晚她还没开始喝她的威士忌。

“脑袋打扮得好年轻！足球队的朝气让你返老还童了！”我说出的话真是下流，简直是一个妒火中烧的丈夫在讨厌地嚼舌根。妻子却默默不语，从容地打量着恼羞成怒、满脸通红的我。过了一会儿，她表现出一种还没烂醉却又必须是喝酒之后才有的、坦率得让人奇怪的宽容，直接提起了我最为关心但又羞于启齿的话题。

“这块布可是超级市场给我的，阿蜜。你没见市场上的红旗？那是超级市场的天皇免费送给顾客们每人一件超市商品的信号啊。四点钟开始的时候，可真不得了。在仓房也能听见叫喊声吧？先是那群‘乡下’的女人，再是山脚的女人们，然后

就是孩子们，甚至男人们都一窝蜂地往超级市场的门口挤，乱成了一团。我为抢到这块头巾，挤得都要贫血了。”

“这服务可真叫完全彻底！每人一件是怎么回事？大概不是每人拿一件店里商品，叫你拿个够吧！”

“阿鹰在超级市场前面把那些抢到了战利品的人一个一个拍照下来了。大多数女人拿出来的都是些穿的和吃的，可是天黑以后有些男人拿出了更大的东西。这好像都是那些在抢赠品时拿到酒的男人们喝醉了又挤进去干的。开始的时候，免费提供的商品不在货架上，是堆在别处的。可是那些‘乡下’女人挤得太厉害了。所以一下就闹个一团糟！”

我本是一个软弱的局外人，无心对这力量的性质和方向说长道短，我想躲在畏缩的苦笑里，却不得不突然被拉回现实的疑惑中。我受到这一具有绝对力量启动的冲击，便有了一个令人生厌的表现。我脑子里不再是单纯的惊愕，而是充满了烦扰丛生的危险的顾虑。

“可超级市场不是不放酒么？”

“大概是拥进市场的那帮人在没乱起来的时候，发现放赠送品的台子上摆着酒瓶吧。那里可是有好多的威士忌、清酒和烧酒啊！”

“这是阿鹰干的？”在说出弟弟的名字时，我隐隐感到恶心，同时，我觉得为了避开这整个令人不快的现实世界，我几乎巴望退回婴儿时代去。

“可不是，阿蜜。阿鹰把山脚下酒馆里的存货买了来，事先运到超级市场去了。不过，超级市场的顾客每人赠送一件免费商品的计划，原来倒真的是超级市场天皇和他所有的连锁店要在每年一月四日实施的啊。把去年下半年的收购单据给店员

一瞧，那些不值钱的衣料和食品就安排送给我们啦。阿鹰附加上去的特殊工作只是：把酒瓶混到赠品当中，将开门时间推迟，做好混乱的准备，还有，一旦顾客开始进店，就马上让店员们偷懒，给顾客们行动的自由。他只做了这些。可你看看今天闹出的这起大乱子，我真觉得阿鹰具有制造事端的组织天才。”

“阿鹰什么时候把力量都渗透到超级市场那儿去了？其实混乱不过是自然发生的，阿鹰还不是只会过后大吹牛皮！”

“新年放假时店员和仓库警卫都回家探亲了，超级市场的天皇想让山脚的青年人补空来着，阿蜜。为了补偿死掉几千只鸡的损失，他对过去的养鸡伙伴刻薄得很，还停发人家工资，阿鹰他们的计划就是在接到申诉之后才开始的。山脚的女人们一直受超级市场盘剥，这回也能拿回点东西，是不是不赖？”

“可事情不能就这么没事儿似的过去吧？再说醉汉们把大宗商品都拿走了，在山脚和‘乡下’这里，这可是大规模的盗窃事件呀！”说话时，我觉得一阵抑郁的旋风吹得我全身发凉。

“阿鹰可不想就这么了结。今天，超级市场的经理一直叫足球队的小伙子们软禁着。大概从昨天开始，阿鹰该开始他真正的活动了，足球队员们也正盼着哩！”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让阿鹰给煽动起来了呢？”我徒然愤愤不平地叫道。

“养鸡失败以后，山脚的年轻人都觉得走投无路了，阿蜜。”妻子慢慢释放着一直暗暗抑制着的兴奋，说道，“他们不表现出来，可确实满腹牢骚。前途真是暗淡啊，不论他们是多么老实能干的青年！那些孩子才不是喜欢踢足球呢，实在是因为没别的事可做，才左思右想一脚踢向乌云的。”

妻子热泪盈眶，仿佛眼里的每一丝光泽都生气勃勃地宣泄着渴求。以前每到这种时候，妻子那双近视的眼里就会布满血丝，可今天却全然不见这种征兆。我这才发觉：自从退居仓房，妻子并不是借助酒精来摆脱临睡前那种莫名其妙、根深蒂固的恐惧的。结果，她不再夜不能寐，郁郁寡欢，俨然成了个新人。妻子和鹰四的那群“小亲兵”同样遵从了这样的训示：“人生苦短，滥饮何益?”她无需我这做丈夫的帮忙，她正自己越过这困难的深渊。我怀着失败者的心情又怀念起为等鹰四在机场喝得酩酊大醉、断然说自己不想接受再教育的妻子了。

“阿蜜，要是你有意干涉阿鹰的行动，那你接近阿鹰的时候，你可得当心别叫足球队员们抓住!”妻子敏感地捕捉到了我保守畏缩的关切背后隐藏的用意，立刻盯着我反驳说。在我的眼里，她就像回到了那次不幸的生育之前一样的活泼、固执。“我们从超级市场回来的路上我发现好像住持还要来跟你商量今天事件的善后对策呢。可他叫拿着武器的年轻人吓着了，马上逃回去了。阿鹰还能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早已把自尊心压缩到最小限度，藏在不显眼的地方，可妻子却犹如从贝壳里将肉掏出来一般，将它生拽出来，再戳上一刀。我变得怒不可遏起来。

“我觉得，我与山脚那边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这并不是说我对阿鹰反感，也不是出于相反的感情，我不想再对阿鹰和他那支足球队的所作所为评头品足。我不管这儿要出什么事儿，只要交通恢复，我就马上离开山脚，忘掉这一切!”我的话实际上使我重新认识了我的一切想法。到明天，就算那莫名其妙搅乱我情绪的、充满贪欲的叫喊再度涌来，我也不会停止翻译——那是我与自杀了的友人的心灵对话。事实上，我在寻

找译词时，常要想：我的朋友在这里要使用哪个词呢？在这一刹那，我觉得已经与早逝的朋友融成了一体。于是这时，我这满脸涂得通红自缢而死的友人，便比活着的任何人都更加贴近我了。

“我要跟阿鹰一起留下来，阿蜜。我能让阿鹰的行动给迷住，大概是因为我这辈子还没做过违反法律的事呢。我甚至不理睬自己的孩子变成一头小兽儿似的。这好歹也是遵守国家法律呢。”妻子说。

“可不，我不也是这么活过来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我自己根本无意对别人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也没有那种资格。只是有时候发作性地忘到脑后罢了。”

我们把目光移转开去，彼此都无话可讲。过了一会儿，妻子怯生生地把脸凑近我的膝盖，带着自惭者过分的温存，轻声细语地说：“那儿粘着死苍蝇呢，阿蜜，干吗不取下来？”

我也以无限柔和的心情，用我那叫墨水弄脏了的指尖，将那乌黑干硬的小东西从膝头刮到地上。我心里想：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是夫妻，今后，怕也只能这样一起生活下去了。我知道，若是离婚，两人的心境都会变得更糟，而且两颗心也只会在痛苦中纠缠难解。

“按叔本华的观点，你把苍蝇抖掉了，那苍蝇的‘自在之物’并没有死亡，只是苍蝇的现象死在那里了。阿蜜。它都这么干硬了，倒真有点儿‘自在之物’的感觉呢！”妻子仔细打量着那块小小的黑东西，第一次喃喃地说出对我不含刺激、而单纯是为着缓和紧张气氛的话来。

夜里，我半睡半醒时，如同幻听一样，耳边传来少女的叫喊声，然而这叫声既不含恐惧也不带嗔怒。我把它当做白天的

记忆的延伸连接到梦境当中，准备继续睡觉。然而叫声又一次响起来，我的记忆和梦境一下就没了踪影。我的大脑像银幕一样，那影像分明是正大张着嘴狂叫不已的桃子。正房里人声嘈杂，一派森严，我爬起来，摸着黑蹑手蹑脚地走近微光浮动的窗子，朝正房那边窥探。

雪已经停了，前院里的积雪被檐灯照得通亮。鹰四穿着衬衫和运动裤，他面前站着的年轻人则身穿短浴衣，袒胸露足。屋檐下，足球队员们已经站好了队伍，他们穿着制服般相似的棉睡袍，全都抱着胳臂，只有鹰四面前的年轻人未着棉袍，给人一种刚被人从青年们的小团体排斥出去的感觉。他朝着鹰四，自管不住声地惨声申辩。鹰四修长的双臂懒懒地垂在两侧，身体略微前倾，站在那儿，像是很专心地听着年轻人讲话的样子，可实际上，他丝毫没打算弄清这个弱者到底要申辩什么。只见他完全是突如其来地跳起身，猛击年轻人的头侧。骇人的残暴贯通他肉体的核心，像放射出危险的紫色闪光。那年轻人全无反抗，挨了比他瘦小、肩膀也不如他宽阔的鹰四的几记击打，踉跄着后退，一脚陷进雪里，仰面倒下。可鹰四却不肯罢手，朝这仰倒在地的青年俯下身去，继续毒打。

目睹兄弟如此残暴，我所感到的全然是肉体上的憎恶，像一根大棒直插入胃里。我满嘴胃液的苦味，低下头退回黑暗里，盖上了毯子。鹰四既然这样不断痛打那毫不反抗且年少于他的年轻人的脸部，显然他已不再是什么“志愿暴徒”，那痉挛般的残暴，那固执连续的暴力，表现出一个罪犯的素质。我在鹰四身上发现的这暴力罪犯的光环，在令人生厌的反刍过程中渐渐扩展生辉，像不祥的极光一样照耀着整个山脚，在它的照射下，超级市场的小变故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我大概只有逃

身于排他的小睡中，才躲得开这可厌的暴力凶光。可大脑活像口热浪翻腾、碱水飞溅的大锅，不见有睡眠侵袭。在一阵徒劳的努力之后，我在黑暗的深处睁开眼睛，眺望泛白的窗户。那窗子上些微的光时而变得明亮，时而变得暗淡，变成了黑暗孔洞的盖子似的东西。这忽明忽暗的变化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我怀疑是不是几天来在白雪强烈的反光中我用眼过度，使我那只好眼出现了异常。失明的不安，给疲惫燥热的大脑带来片刻的空白，倒缓和了我的紧张情绪。这孤独的肉体上的不安，使我竟意外成功地把弟弟的暴力行径造成的震撼撇到了意识之外，只顾瞧着窗子的明暗变化出神，沉浸在被净化了的不安中。没过多久，鲜亮的光线掠过了狭长的窗子，我才知道，那明暗变化并不是我视力的衰弱带来的幻影，只是对面出了月亮而已。我重又爬起身来，眺望着月光中白雪覆盖下的森林。它的表层既有被白雪照亮的地方，也有因此而显得极黑的凹陷，那阴影里仿佛聚集着无数野兽。流云一旦遮蔽了月亮，兽群青铜色的暗影便进一步加深，最后退回到黑暗当中。而森林顶端的积雪一旦被月光照亮，兽群便重又慢慢地踱步出来。

月光下，前庭的檐灯只能打出一个昏黄暗淡的狭小光圈。我没注意灯光下的东西，可放眼望去却发现那挨打的年轻人双臂抱着身子，蜷伏在被踩得零乱不堪的雪地上，身旁扔着打了捆的毛毯、棉衣、餐具之类的东西。合宿的年轻人已经把他放逐了。他把头深深地埋在缩成鞍形的双肩中间，一动不动，如同一只遇到危险的潮虫。月色下森林带给我的些微振奋，骤然消失了踪影。我也把头缩进了毛毯那微温的黑暗里，只顾往胸口和膝盖哈些热气，可还是全身冰凉，浑身发抖，牙齿格格直响。过了片刻，我听到有脚步声往仓房后边转了一阵，然后便

远去了。听上去，那人不是去通往山脚的石板路，倒是往林子里去了。既然听得到踩雪的声音（尽管这声音很微弱），它就绝不是小狗为捕获雪中迷路的野兔而跑进林子去的脚步声。

第二天清晨，妻子来送早饭时我还没起床。她也怀着对不加掩饰的暴力行径的厌恶，谈起了半夜里的事情。那个年轻人违反了足球队的纪律，背地里将从超级市场偷带出来的小瓶烧酒一饮而尽，然后将桃子唤到正房的小耳房里，企图侮辱她。桃子顺从地接受酒醉少年半夜里的邀请，她穿着一件自己从超级市场挑来的睡衣，样子活像个《天方夜谭》中的妓女。那少年毫不迟疑，立即开始向城里来的这个迷人女孩动手动脚。可桃子却强烈地反抗，大叫不止，闹得少年懵头懵脑，直到被鹰四痛打之时，还是惊诧莫名，转不过弯来呢。桃子受了刺激，发了歇斯底里，脸和身子紧贴着里间墙壁睡下，到早晨也不起来。据说少女扔了那件引起可怕误解的睡衣，把所有的衣服全副武装上身，屏息躺倒下去。被放逐的少年的那件印有‘光’字商号的武器还丢在前院，妻子来仓房时还在杂沓的雪地上见过它。

“刚才听到脚步声响，我以为那小伙子在仓房后面转了一下，就上森林那边去了。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还不是穿过树林去高知？就像万延元年暴动那会儿，那些背叛组织、被放逐的年轻人逃进林子里那样。”妻子做着梦一般的解释。在我看来，她的同情与其在于桃子，倒不如说更在于那个少年。

“你不知道，那林子有多密多难走。这么个大雪天，半夜里要横穿树林，简直就是不想活了。你受阿鹰讲的那些暴动故事的影响太大了！”我打算把妻子空幻想法压下去。

“即便被阿鹰他们足球队赶出来，在山脚那边住下也不是不行啊。阿鹰还没有那么大的强制力呢。昨晚上那可怜的年轻人不过是把桃子无意的媚态给扩大解释了，阿鹰对他大打出手的时候，要是剩下那些年轻人反戈一击，他没准儿早让人打个半死了呢！”

“阿蜜，还记得在机场阿星一脸哭相对你说的话么？你现在不理解阿鹰，也不了解阿鹰！”妻子怀着坚定的自信，反驳我说，“阿鹰和你一起生活过，他朴素、弱小，可打那以后，他过的生活是你理解不了、也想象不到的！”

“就算那个年轻人因为被赶出了阿鹰把持的小圈子而在感情上走投无路，感到无法在山脚住下去了，可是从万延元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逃亡者还不都是要沿着大路往海边跑？他干吗非要躲到林子里去？”

“那年轻人清楚，他们暗地给超级市场造成的混乱，已经够得上是一桩罪行。如果他过了小桥，沿着大雪弥漫的道路去邻村，十有八九得叫等在那儿的警官抓起来，再不就是被超级市场的天皇雇来的打手报复一顿，可能那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的吧。其实你不光不了解阿鹰的真实想法，你也同样不了解足球队青年的集团心理！”

“那是自然。虽说我生在山脚这儿，可我至今并不认为我和这山脚之间有一条纽带，而且这条纽带能让我充分理解山脚的这群年轻人，恰恰相反。”说完我做了一点让步，“我只是客观地谈了一下有常识的人的意见。要是在阿鹰的煽动下足球队员们给搞得集体疯狂，我常识性的观察当然也就大错特错了！”

“虽说是别人的事，可也不能就简单地说成‘疯狂’啊，阿蜜。你的朋友自杀时，你可没这么简单草率漫不经心啊，是

不是?”妻子穷追猛打，毫不让步。

“那，让阿鹰派人到树林里找一下吧。”我软了下来。

在我避开上屋，从后面到世田和洗完脸返回来时，正遇见那群年轻人亢奋地从屋里跑到前院来。

一个身穿樵夫旧防水衣的小个子男人，他拉着一只用带叶的竹条扎成的雪橇，上面载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将一块用各种布片胡乱缝缀起来的破布直裹到脖颈，样子活像个蓑草虫。他们走进前院来，被鹰四迎面撞上。那群年轻人正昂然从屋里跑出来，劈头撞向那人，那人上身向后一仰，抽身想逃，被鹰四唤住了。早晨的阳光被杂乱的积雪四散反射上来，照得我眩晕地眯起眼睛，可我还是迅速把他和十几年前记忆里的隐士阿义对上了号，认出了他那两眼细小、瘦削孱弱的侧脸。隐士阿义脑袋很小，看上去像个被印第安人取出骨头后做的“缩头”，要说耳朵，只有拇指的第一骨节那般大小。周围是令人发窘的空间。那小脑袋上扣着顶浅浅的方帽，这倒像一个老式的送信车夫。一张瘦长的小脸夹在那顶饱经风霜的帽子和蜡黄的胡须之间，满是褐斑和灰毛，正紧张地抖个不停。鹰四一边制止背后的年轻人，一边像哄一头胆怯的山羊一样同他亲昵地低声说起话来。老人仍然仰着身，眼睛半睁半闭，两片干裂的褐色嘴唇像两根要夹住什么东西的手指，飞快地嚅动着，回答着鹰四的问话。然后，隐士阿义大摇其头，仿佛深悔不该拉着雪橇从林子里跑到这儿来，而他的一切在这强光之下也仿佛都成了丢丑的东西。鹰四向他的足球队发号施令，让他们把破衣烂衫的年轻人从雪橇上抱下来，抬到屋里去。随后，被鹰四勾住了肩的小个子隐士阿义，也一边无力挣扎着，一边被那群如同肩扛祭祀神轿的人们一样欢天喜地的年轻人领进了屋里。前院上只

剩下我一个人，看着沾满冰雪的竹雪橇放在松软的雪地上。那叫绳头胡乱捆了几道的新做成的竹雪橇，犹如做了什么坏事受到处罚一样。

“菜采嫂正招待隐士阿义吃饭呢，阿蜜。”转过头去，我看见鹰四叉开双腿站在那里。他被阳光晒得黧黑的脸上泛着勃勃的红润，褐色的眼里闪动着酩酊的凶光，一时间令我生出错觉，仿佛是背朝着盛夏的大海同他讲话。“晚上，隐士阿义照例到山脚去。天亮前后他正要回林子，见一个小伙子正一个劲儿往林子深处走。他就跟在后面，直到那小伙子踉踉跄跄走不动了，就把他救下了。阿蜜，你信不？大雪封山的，那小伙子是想横穿树林到高知去呢。他把自己当成了万延元年暴动中年轻人的一员了！”

“在隐士阿义把他带回来以前，菜采子就这么想过。”我说完这句话，就不吭声了。被伙伴们放逐的耻辱和绝望迫使小伙子在厚厚的积雪中艰难地穿越一团漆黑的树林，他八成是把自己想像成了头上顶着发髻的万延元年的农民的后代了吧！那单纯的孩子，身陷午夜森林的黑暗之中，在雪地里蹒跚前行，恐惧渐渐吞噬着他。为了确认从万延元年至今已有一百年的时光流逝而去，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昨晚，若是那小伙子摔倒冻死了，他的死法大概和万延元年被放逐的青年该是全无二致的吧。共存于森林高处的所有“时间”一起涌进并占据了奄奄一息的青年的大脑。

“我要他们把自己与万延元年的青年同一化，既然那小伙子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最初的征兆，那么，这个倾向可能很快就传给整个足球队！我还要把它传给山脚上所有的人。我要把一百年前祖先的暴动唤回山谷，我要比诵经舞更现实地再现它！

阿蜜，这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想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用处呢，阿鹰？”

“有什么用处？哈哈！阿蜜，你的朋友缢死时，他是不是想过，他的死会有什么用处？还有，阿蜜，你想过没有，你这样活下去有什么用处？山谷里新式暴动即便成功了，也可能没有任何用处。可是至少，我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曾祖父的弟弟的精神勃勃，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渴望！”

回到仓房时，太阳的光热已融化了冰雪，那穿过厚厚的雪层流淌下来的雪水声像一道帘子围住仓房的四周。我幻想着，就像曾祖父用从森林彼岸的文明世界带回的枪支来保护自身以及财产一样，我要用这水声把我同山脚下发生的一切隔绝开来，努力独善其身。

十、想像力的暴动

大鼓、小鼓、铜锣。诵经舞游行队伍奏起的音乐，一大早便开始响个不停。乐声缓缓地流淌着，执拗地持续着，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就是这样的旋律，整整演奏了四个多小时，我透过仓房的内窗，目送隐士阿义爬上去森林的石板路。他的雪橇上装的已经不是破布，而是我妻子送给他的新毛毯。他沉思默想般地低垂着头，两脚用力踏着地面，稳稳地走上倾斜的雪路。紧跟着，诵经舞蹈的音乐便响了起来。在妻子端着饭团和未启盖的鲑鱼罐头，带着罐头起子到二楼仓房送上午饭时，我开口向她询问道——我沙哑的嗓音里满是对这种挥之不去、避之不及的音乐的厌恶，粗鲁得十分陌生，令我自己听着都大吃一惊："这不合时宜的诵经舞乐，也是你们阿鹰首领的创举么？阿鹰还打算用诵经舞乐唤起山脚人对万延元年暴动的联想吧？这样搅得四邻不安，简直拙劣透了！只有阿鹰和你们这帮随从才会神魂颠倒呢！山脚那些家伙一个个怕惹是非、循规蹈矩，是用鼓啊锣呀什么的就能煽动起来的么？"

"可是，这音乐至少叫你阿蜜急不可耐了呀！你可是打算对山脚的一切概不过问哩！"妻子冷静地反击道，"超级市场从

今天早晨起重新正式营业了。那个鲑鱼罐头可是从超级市场抢来的战利品，阿蜜，你要想完全彻底干净利索地跟这事儿划清界线，不吃也罢。我再给你找点别的什么吃。”

我不是想参与鹰四他们的行动，只是不想理睬妻子的挑衅，才兀自打开罐头。况且，我也不喜欢吃鲑鱼。昨天抢劫超级市场，在山脚一般居民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偶发事件。妻子告诉我，今天早晨，鹰四他们便四处张扬，说昨天的抢劫是违法行为；还说，既然山脚的人们已经参加了这场抢劫，他们便没有理由不继续抢下去。

“就没有人反对阿鹰他们的煽动？没有人今天早晨看清了内情，后悔了，把昨天抢来的东西再送回去？”

“在超级市场前面倒是开过村民大会，可是到底没有人吭声。在超级市场做会计的那群女孩子把从前市场的利润率告诉大家了，售货员们也不讳言商品自身质量低劣，这时候往这样的地方还东西？这气氛也起不来呀！就是有人见势不好有心变卦，这也不是他能自行其事的气氛哪。”

“骗小孩子呢！”我一面恨恨地嚼着干硬零碎的鲑鱼，一面说道，“我都要吐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对超级市场的愤恨情绪现在还挺高涨的！好几个女人被怀疑是小偷，叫人搜过身。她们哭着讲她们的遭遇呢，阿蜜！”

“好一帮笨蛋！”我感到很难把自己舌头上那块抢来的鲑鱼肉咽下去。

“阿蜜，最好你也到山脚去，瞧瞧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漫不经心地说着，走下楼去了。我立刻把沾满唾沫的鲑鱼肉和米粒一古脑儿吐到手上。

诵经舞的音乐还是响个不停，搅得我心烦意乱，困乏无力。我的耳朵不得不去注意正在出现的重大变故，耳鼓深处仿佛听得到暴乱的声音。诵经舞乐带给我的厌恶，恰似病人膏肓的肝脏，不停地遭受着无法治愈的污染。那污染的根源，便是好奇心理的毒素。然而，在找到一个与鹰四他们策划的大变故没有直接关系的理由之前，我控制自己不走出仓房；而且在此之前，既不准自己下山去山脚，也不准派侦察兵去。那单调乏味的音乐，全然表现出感情的缺乏。也许正是鹰四为了向我炫耀他的行动仍在继续才把这音乐奏个没完吧。如果我对于现在山脚下发生的事情有所反应，那也只是我对鹰四拙劣的心理攻势的更为拙劣的屈服。我要忍耐。过了一会儿，山脚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大概是鹰四已经把轮胎上缠着铁链的雪铁龙开到山脚下，正带着孩子们疯呢。如果说山脚的人们早已一律变成了暴徒，那么他们的领袖鹰四则正开着雪铁龙，对暴徒们进行着大阅兵。

我注意到炉子的火势有些弱，是油罐里的煤油快用完了，备用的油也消耗殆尽。得找个人去超级市场买些回来，否则只有亲自动身往山脚那边去一趟了。我终于在充满烦扰的忍耐中从苦役里解救了出来。从早上起来，那诵经舞乐就一直嘲弄着我折磨着我，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

桃子倒是在上房，可她歇斯底里发作之后，还在卧床不起，妻子在照顾她，显然她们俩指望不上。冻伤的年轻人已被送往医院；足球队全体成员现在都和鹰四、星男一起，在山脚那边主持那一派喧腾吵闹的局面，能够派得出去的人，只有阿仁的几个儿子了。我站到紧闭的房门前叫了一声，但并不指望他们即便叫那音乐搞得入了迷，还能同体胖心悲的母亲一起关

在冷森森的家里。我只是希望周围的一切能够为我不得不自己下山提供更充足的条件。不见孩子们的回答。我正满意地打算从紧闭的房门前抽身离开，却没想到就在这时，阿仁用一种兴高采烈、颇有张力的声音叫起我来，我打开门往屋里看，如同不习惯黑暗的鸟儿一样，目光惊慌彷徨，一边寻找阿仁——倒不如说寻找她的丈夫，一边忙不迭地解释：

“啊，阿仁，要是你儿子在家，我想叫他们到山脚去一趟。炉子没油了！”

“我儿子呀，他们一大早就到山脚去了。蜜三郎先生！”阿仁像一艘从海雾里冒出来的巨轮，那硕大的身躯慢慢分明了起来。她的话显得出奇的和气。圆鼓鼓的脸上，两颗滚烫发亮磁石般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这边。正如她的声音所显示的那样，阿仁在那张将马鞍倒置而成的坐椅上面振作起来。“鹰四手下的那帮孩子来叫的，连我家金木也到山脚去了！”

“阿鹰他们来叫了？金木先生是老实人，怎么连他也卷进去了？”我带着几分保留，愤愤地表示对阿仁丈夫的同情，我的保留也真是得其所哉。而阿仁却并不希望我对她的丈夫表示什么同情。

“那群孩子把村里每家每户都叫遍了！蜜三郎先生！尤其是那些没从超级市场拿回东西的人家，他们肯定要叫到，都倾巢出动了！”阿仁说。她那双让肥肉挤得更细的小眼睛咄咄逼人，铺满肥厚脂肪的皮肤上慢慢荡起涟漪，努力想挤出一丝微笑来。阿仁从平日里痛苦的喘息中游离出来，重又变成了昔日那个充满好奇的闲话大王。“我们家呀，孩子早早儿就都到山脚去了。可我丈夫还没呢，有两个小伙子就到门口来喊：‘都去超级市场啰！’听我儿子中间回来讲，要有不上超级市场去

拿东西的人家，他们可有得喊呢！管你是有钱还是有势呢，这群孩子两个人一组，来回地喊：‘都去超级市场啰！’你瞧，听说村长的儿媳妇，邮政局长的老婆，也全给哄到超级市场拿了东西呢。校长的闺女哭啊哭的，把一大箱没用的洗衣皂搬回家去了！”阿仁说完突然像含了一口水似的，把嘴紧闭起来，从鼻孔里发出一阵呼呼的声音。接着，她那满月一般的胖脸上泛起了红晕，我知道她这是在笑了。“这真叫平等啊，蜜三郎先生！村里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做可耻的事，这有多好！”

“没有人同情超级市场的天皇么，阿仁？”我问道。从这个病态肥胖的妇人用“可耻”一词布下的陷阱中，我感到一种不甚分明的危险。可是我姑且避开这个话题，向她询问与这带有硝烟气味的闲话不甚相干的事情。

“同情那个朝鲜人！?”阿仁立刻愤愤地把我顶了回去。直到昨天以前，她还同山脚下多数人一样，一边痛斥超级市场给山脚带来的惨状，一边缄口不提那显赫的超级市场东家竟是一个朝鲜人。可现在，她竟冲口强调地道出“朝鲜人”这个词儿来。抢劫超级市场仿佛给山脚居民与超级市场的天皇之间的势力关系一下来了个颠倒，如今阿仁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那个用经济手段征服了山脚的男人不过是个朝鲜人。“自打朝鲜人到这洼地来，山脚的人就没有过好日子！仗一打完，朝鲜人就从这山脚占地捞钱，一个个全抖起来了！我们不过是把他们抢走的东西拿回来一点儿，他有什么可同情的?”

“阿仁，朝鲜人当初也不是自己愿意来山脚的呀。他们是被他们的国家强行带来的奴隶劳工。据我所知，山脚的人可没受过他们主动的坑害。战争结束以后，即便是在朝鲜人集结地的土地问题上，不也没给山脚哪个人造成直接损害么？干吗要

歪曲自己的记忆呢?”

“S家的老二可是叫朝鲜人杀的!”阿仁立刻对我充满了戒心，惊诧地说。

“那也是因为在那之前，S哥的同伙杀了朝鲜人，人家报仇嘛，阿仁。这你不是知道么?”

“反正朝鲜人一进洼地，就没干过好事!大家都这么说!把那帮朝鲜人斩尽杀绝才好呢!”阿仁蛮横无理地竭力争辩道。一时间她眼里充满怨恨，暗淡无光。

“阿仁，朝鲜人可是从来没有单方面地加害洼地的人们啊。战后的这些纷争，双方都有责任。这些你也是知道的，可怎么还这么说呢?”听了我的责问，阿仁黯然地将自己的大脑袋低垂下来，如同放下了什么沉重的负担，对我的话不再理睬。我只看得见她海象般的脖颈随着剧烈的喘息一起一伏。我带着无法排遣的愤懑长叹一声，“闹起这样愚蠢的骚乱，最后遭到恶报的还不是山脚的人么，阿仁。超级市场的天皇根本不会因为他的一家连锁店遭抢就受到什么打击，山脚的大多数人却要因为抢来了战利品痛苦地内疚下去。连知道好歹的大人们都叫阿鹰这个外来户煽动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嘛!”

“村里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做可耻的事，这有多好!”阿仁顽固地低着头、重复说。我终于弄清了她所谓“可耻”一词的独特含义。

我的眼睛总算适应过来，看得见屋里微暗的角落了。只见阿仁坐在座椅上，在她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堆满了各种廉价罐头瓶。它们立在她身旁，犹如阿仁与无法克服的饥饿作战时足以信赖的援兵。这些正是阿仁的“羞耻”，这些端庄肃穆、令人咋舌地现出本相的小“羞耻”团伙。见我不出声地打量那一

排罐头瓶，阿仁索性恬然不惊地从高耸的双膝中间取出一听罐头，那罐头的瓶盖启了一半，活像只赫然高扬的半圆形耳朵。于是，阿仁便咕容咕容地嚼起罐头里那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给我看。我想到了动物蛋白对她的肝脏会有不良影响，可是话到嘴边，我却改了口。“阿仁，我给你打点水来吧?”

“吃着可不像你看着那么干巴巴的!”阿仁回了我一句。然而她却满怀率直——这只是在我和阿仁少年时代支撑着根所家时才能见到——的情感，继续说道：“蜜三郎先生，多亏了鹰四先生的暴动，我才有了这么多吃也吃不完的东西！这些罐头不值几个钱，可真是多得吃不完呢！把这些全吃光了，我就再什么都不吃了，让自己像从前那么瘦，然后衰弱而死!”

“哪儿会呢，阿仁。”我以回到山脚以来第一次与阿仁和解的心情安慰她说。

“不会？我这样的可怜虫，直觉还挺准的！在红十字医院里，人家对我说，我想多吃东西不是我身体的要求，是我心里的要求！只要是心里不再想吃的话，我马上就能够瘦下去，然后一死了事!”

我不由得感觉到一种孩童般无常的悲哀。母亲死后，我全仗阿仁的帮助，才克服了无数困难，在山脚度过了少年时代。我默然摇着头，踏着积雪走出房来，关上门，将这个被埋在也许会致其肝脏于死地的大食物堆里体味着幸福与“羞耻”的“日本第一肥婆”，关在了微暗的安宁之中。

石板路上的积雪被人踩得结结实实的，成了浅黑色，路面也滑溜溜的。我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动。关于那场对超级市场的抢劫，是对也好，是错也好，我丝毫无心干预，只是，我已下了决心，绝不卷进鹰四他们的行动。要是超级市场完全陷入了

无政府状态，怕是无法靠正常的手续买到煤油了。我只是盘算着，如果有几罐煤油免遭劫难，那我就给阿鹰或是他同伙相应数量的纸币，把煤油罐提回来。我实在无心参加阿仁所谓山脚所有人都平等的“羞耻”活动。而且煽动这场小型暴动的那些人就没到我的门口强制性地喊什么“都去超级市场啰”，这样一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局外人，没人要求我与他们分享“羞耻”。

我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时，阿仁的长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到我面前来一齐走，就像一条同主人一起散步的家犬。他敏锐地打量着我的脸色，立刻领悟到不便上来搭讪，便只管往上一蹿一蹿地走路，抒发一下内心的兴奋。石板路两旁的住家往常都是房门紧闭，今天却一律敞开，人们在房檐下踏雪闲站，高声寒暄。山脚的居民竟全都变得兴高采烈。还有一群人从“乡下”过来，他们几家凑一堆儿，三三两两地聚在石板路上聊个不停，缓缓前行。他们都抱着从超级市场抢来的物品，却没有马上就回“乡下”去的样子，倒像是想在山脚再呆上一会儿。有时“乡下”的母亲要借用厕所让孩子大小便，山脚的主妇就很开通地请她们光顾。即便是祭日里，我也从没见过山脚和“乡下”如此自由宽宏地交往的情景。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山脚便早不见了这种热烈火爆的景象了。孩子们在石板路踩实的雪上打着出溜儿，模仿着没完没了还在继续的诵经舞乐。阿仁的儿子刚跑去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就马上又跑回到我的身边。站着聊天的大人们也都朝我温和地微笑，跟我亲切地寒暄。他们如此开放地对我，这在我返回山脚后还是头一遭。对这种不期而至的友好表示，我实在不能够很快适应下来。于是，我含糊地点着头，急步走过去，而山脚的这些俨然彻底解

放了的人们却自管酣笑畅谈，毫不在意。我心中的惊诧渐渐生根发芽并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起来。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对着围在他身旁的人群举起一本打开的账簿解释着什么。这男人在战时教师不足的时候，作为代课教师教过日本历史，战后当过农协文书。因为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些不声不响的足球队少年，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被新暴动首领们任命为专门委员，正在揭发超级市场的经营状况。一看到我，他脸上立即露出愤慨与得意并存的、扭曲了的微笑（只是这愤慨像装模作样的表演，而这得意才是自然的真情流露），停止了对小听众们讲话，大声叫道：

“蜜三郎先生！我们揭发了市场的双重账簿，把它送到税务署，天皇立刻就得下台，太可悲了吧！”

这突然的中断，令听众们非但很不满意，还跟着那男人回头瞧着我，将他们嘲笑超级市场偷税行为的抗议姿态做给我看。他们当中，竟然还夹杂着不少老人。一旦重新意识到这一点，我便发现我走在山脚石板路上见到的人群中，老人的数量多得简直难以置信。直到昨天，他们还龟缩在玻璃肮脏不堪的门内暗处打发日子，可是今天，他们也解放了自己，并使自己重新变成了山脚共同社会的真正成员。

突然之间，阿仁的儿子尖着嗓子大叫起来，炫耀着自己的重大发现。这声音让我也转过了脸去。

“那家伙！那家伙就是市场的经理！”

我看见一个男人，体态略显肥胖，四十岁不到，但短颈上扛着的脑袋却早已谢顶，他身穿皮衣，正蹒跚地从我们身边溜走。在孩子们的嘲笑和叫骂声中，他双臂在空气中挥来摆去，活像只爬到岸上的海狗，只顾拼命地逃跑。这个超级市场的经

理刚刚被解除了软禁。可由于那座桥一定会被足球队严密监视着，所以这位经理也只能被放养在山脚，其实和禁闭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瞧他一边遭人嘲骂，一边像邮递员赶着送报纸一样在石板路上逃跑的样子，真觉得滑稽可笑而又不可思议。此公在山脚形影相吊，莫非还有心拿出什么收拾残局的招术？有个孩子发明了向他投掷雪团儿的玩法，于是，所有的孩子立刻都凑起热闹来。他正跑着，脚踝上挨了一记，便软软地跌在地上。他挣扎着爬起来，顾不上掸去满身满脸的雪，便朝着那群狂热难缠的孩童，发出了被逐家畜一般的吼叫吓唬他们。可孩子们却越发来劲儿，只管投个不停。我的一只眼睛被素不相识的孩子们打瞎那天的那种即时的恐惧在干燥的口腔里复苏，于是在多年的疑问中——他们为什么要向我扔石块——我得到了一点暗示。那可怜的男人大发雷霆，一边双手抵挡着雪团的攻击，一边不断地发出微弱却又固执的尖叫。阿仁的儿子飞快地投了几个雪团，重又跑回我的身边，表情好像苏打水，翻涌着亢奋的泡沫。我向他问道：

“他喊什么？”

“他说雪一化，超级市场的天皇就要指挥暴力团来找我们！我们要武装对敌！”少年骄傲地说着，瞥了一眼他一直吃个不停的饼干盒底，就将纸盒丢在一边，然后又从鼓鼓囊囊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一盒新的，大嚼起来。

“你们觉得能打败暴力团？那帮人可是些暴力专家呀！”

“阿鹰会教我们怎么打的！他和右派打过仗，知道应该怎么打！蜜三郎先生，你打过仗么？”阿仁的儿子将满嘴的东西急不可待地一口咽到肚里，以不可思议的犀利顶撞起我来。

“干吗要让经理暂时逍遥法外？”

“这个……”少年支吾了一句，便抓住了我那含糊提问的核心，答道：“那个家伙，净说些无聊没用的话，山脚的人就是要给那家伙和超级市场的天皇点颜色看！蜜三郎先生，那家伙也是个朝鲜人!”

我对这些战后出生的孩子无缘无故敌视朝鲜人的做法感到十分厌恶。但我要是替超级市场的经理讲情，这少年马上就会纠集出一群小暴徒，让我抱头鼠窜的。

于是，我只是说道：“别再跟着我了。找你的伙伴玩去吧!”

“阿鹰命令我给蜜三郎先生带路的!”少年一脸困惑，一本正经地说。然而，由于我的断然拒绝，最后，少年只好又抓了把饼干填进嘴里安抚一下不满，停住了脚步。自从阿仁食欲异常以来，她的儿子头一次找到了这么多食物，这些食物远远超过了他日渐缩小了的胃的要求。他的心里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出于一种对胃的义务感，这瘦削的少年饕餮不已，终会呕吐狼藉。

超级市场周围的积雪已被人们踩得凌乱不堪，开始消融。石板路上一派森严气象。这是一个前兆，它告诉人们，冰消雪化之后，整个山脚就要变得泥泞难行，了无生气。在超级市场门前，还有几个人三三两两地闲散游荡。有一小伙人将电视机搬到了屋外来看；还有一些人正盯着看人家打开包装箱搬出些电器并让它开始工作这一串操作过程。

那几台电视机正在播映两家不同电视台的节目。蹲在电视机前面的小孩子们全神贯注，甚至有的孩子为能同时看到两台节目费尽了心机，欠着身子，站在能看到两台电视机的地方。而站在孩子们身后的大人们则似乎对电视不是特别在意，一片

嗡嗡嘤嘤。在这个城市里寻常度日的人们的消息，一齐到达戒严令尚未解除的山脚，发挥的作用却是相同的。电视上模糊地映出了一个少女歌手努着大下巴假笑的特写画面，给这山脚持续发生的事件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从包装箱里取出的电器被摆到了湿漉漉的地上，两个中年男人拿着凿子和铁锤在跟它们较量。他们是山脚的铁匠，可能他们也是被小伙子们特别起用的专门委员。在他们旁边围观的大半是些妇女。不用说，他们碰到这样的工作，今天肯定是头一遭。尽管他们是山脚手艺最好的技工，但干起这活来也不免笨手笨脚，叫人害怕。他们所做的其实全然是一种破坏：从机器上拆除生产厂家的铭牌和产品编号。只要技工的凿子从电暖炉底座上削去铭牌，将炉身鲜红的漆面弄出道深深的划痕，蹲在旁边的女人中间便会刮起一阵叹息的旋风，技工也便踌躇畏缩下来。他们对已化作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技术本身充满自信，可现在他们却在干些旁门左道之类的卑微活计。要不了多久，路上的积雪一化，超级市场的天皇就会从城里来到洼地恢复秩序。有鉴于此，那技工便忙着从这些器具上将能证明其抢自超级市场的证据消除干净，于是乎才做出这种幼稚之极的破坏工作。

我离开人群，往超级市场的入口走去。我能够觉出，足球队的年轻人正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虽然零星地夹在电视机前以及破坏作业现场周围的人群里，但与人们欢快的气氛格格不入。他们鬼鬼祟祟，活像几条黑乎乎的蛀虫，板着面孔，眼露凶光。我根本不管他们险恶的目光，径直去推入口的大门。门纹丝不动。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里面一片狼藉的惨象，怯怯地只管将把手拉来推去。

“今天不许再抢了！明天的份儿，明天再来抢！”

听到阿仁儿子的声音，我转过头去，见那塞了满嘴饼干的少年正在和他的伙伴们一道，聚在我的身后嘲笑我哩。大概是怕我揍他的脑袋，少年往他的伙伴们那边退了一步。

“我可不是来抢东西的，我来买点煤油。”

“今天不许再抢了！明天的份儿，明天再来抢！”少年的伙伴们附和着取笑我。这些孩子早已迅速地适应了“暴动”之下崭新的生活环境，活像一群天生的暴徒。

我有心叫这些漠然盯视我的足球队员帮忙喊，喊声越过孩子们危险的头顶：

“我要见阿鹰，带我去找阿鹰！”

那足球队的小伙子为难地低下他的奔儿头，一张难看苦相的方脸冷若冰霜，一声也不响。我变得急不可耐起来。

这时，阿仁的儿子已经恢复了自信。他安慰我似的说：“奉阿鹰的命令，由我给蜜三郎先生带路！”说完，不等我反应，便先行绕到通往仓库的岔路去了。我踏着路上深深的积雪，艰难地跟在后面追赶着他。不知哪儿来的一根冰溜重重地打在我的坏眼旁边，落到了地上。

在被改成超级市场的酒库后面，有一个以前晾晒酒樽的方形大院，院里建有一间木板房，曾经是超级市场的办公室。而今，这里是暴徒们的指挥部。房门口有一个年轻人在站岗。阿仁的儿子陪我走到这儿，便在院子一角那干净的雪地上蹲下身来等我。我在年轻人的监视中默默地打开房门，跨进充满热气和年轻人特有的兽类体味的房间。

“哦，阿蜜。我以为你不会来呢。安保那会儿，你不也没来看过游行么。”鹰四情绪很好。一块白布严严密密地直裹到他脖子，他正在理发。

“和安保那时候比什么！太夸张了吧。”我反唇相讥。

鹰四怪模怪样地斜坐在简易炉旁的一张小木凳上，那个孩子气的山脚理发师正在他的头上精心地修剪。理发师仿佛对这位暴动领袖怀有一种狂热的敬爱，一心要用自己的劳动做出点贡献。在鹰四身边有一个小姑娘，她的脖子圆滚滚的像个圆筒，满心的躁动不安让人一目了然，正亲昵地将肥嘟嘟的身体凑向前去，用一张打开的报纸接着剪下来的头发。在他们后面，房间的里侧，星南和三个足球队员在誊写印刷。看来，他们是要印刷和散发将袭击超级市场事件正当化的理论和情报。鹰四全然不睬我话里的锋芒，倒是他的同志们都停下手来，注意他的反应。或许，鹰四炫耀他在 1960 年 6 月的经历，并把它和这场小“暴动”牵强地联系起来，是要教育这些年幼无知的暴动参加者吧。

“你这个学运领袖不是痛悔什么‘我们自身的耻辱’么？现在怎么又改弦易辙了?”望着因火炉的热气和理发师的修剪而看上去像个年轻单纯的农民一样的弟弟，我好不容易才把这句话咽下去，没有质问出来。

“我不是来参观你的足球队的活跃景象的。我来买煤油，可有抢剩下的煤油罐么?”

“有煤油吧?”鹰四问他的同志。

“我去仓库看看，阿鹰。”星男马上应了一声，把一直握在手里的油墨滚子交给了身边的年轻人。在临出屋时，他竟还想到把刚印好的传单给我和鹰四每人一张。在协助鹰四的指挥工作方面，他无疑是个得力的“暴动”成员。

为什么超级市场的天皇只能忍气吞声？

给连锁店一个警告！
向税务署做过手脚！
再也不能在山脚做生意了！
超级市场天皇这类坏蛋会自杀吗？

“我这是先把基本的想法推广到基层，阿蜜，还有更复杂更强有力的举措和人才呢。就说这个小个子性感姑娘吧，她过去是超级市场天皇的通讯员，可现在，她已是我们的合作者了。她还想早点被解雇好上城里去。所以攻击起天皇来真叫勇猛果断！”鹰四做了个手势，显然是要阻止我对传单上的文字提出批评。

这几句好话让姑娘好不感动，她心形的脸庞泛出绯红，几乎要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她是那种在哪个乡村里都能找出一个来的姑娘，肯定自打十二三岁起，便成了周围村里所有年轻人欲望的焦点。

“听说昨天住持到我这里谈话，也叫你们拦住了？”我转过脸去，不再看那个不光对鹰四，甚至也对许多人故做媚态的姑娘。

“那可不是我干的，阿蜜。不过足球队员们昨天倒是对山脚有知识、有势力的人的举动看得挺紧，这不是很自然嘛。他们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可忽视啊。在烂醉的苦力打先锋、再次闯进超级市场那会儿，要是村里哪个有势力的人，朝跟在后面的山脚村民喊一声：‘住手，别再抢了’什么的，恐怕抢劫就是一开始那样的小事故，中途流产。可现在，山脚大多数人都已经卷进来了。如果村里的特权阶级超然事外，他们只能招人反感罢了。所以战术变了，没有人再监视他们了。反倒是我们的

同志还要到他们中间去，谈谈看法，听听建议呢。阿蜜，养鸡那伙人的核心人物，那位单衣英雄，他正想法儿由村里将超级市场收买下来呢。他说，要把天皇赶走，由山脚的人们集体经营，把超级市场办下去，这个计划多迷人，他的构想更是与众不同。我们就是专门负责暴力活动的!”

少年们扬起了一群被公认的同谋犯的笑声。看上去他们很是为鹰四的口才倾倒。

“不过在第二次抢劫以后，分配超级市场存货的工作就由我们管理了。因此，我们的任务相当艰巨。比如说吧，‘乡下’的一个部落，他们抢来的东西和别的部落比起来相差许多，这就不行了，这类事得杜绝。这是井然有序的抢劫啊，哈哈！明天分配之前，超级市场和仓库都要由我们的足球队员严密把守起来。今天晚上，这些年轻人就要睡在这儿了。这种井然有序的抢劫你说怎么样，阿蜜?”

“阿仁管这叫阿鹰的暴动，可要想让山脚的人们对暴动的关心尽量长久地持续下去，那就不该把暴动的物质能源迅速浪费掉。管理确实是很必要的。”听着鹰四自得的饶舌，我不禁坦诚地道出了想法。可他却毫无怯色，反倒逗趣地用一种挑战目光盯着我，说道：

“我的暴动，这话我爱听，当然我也知道这都是奉承话罢了。阿鹰，从山脚到‘乡下’那么多人，从大人到孩子，他们一齐热衷关心的可不单单是物欲填补的缺乏感啊。你没听见今天诵经舞乐的锣鼓一直响个不停？其实那才是最让他们精神振奋的，那才是他们暴动的情感能源呢！抢劫超级市场实际上算个什么暴动，不过是场小骚乱就是了，阿蜜，参加的人谁不知道这些啊。可他们通过参加暴动超越百年，体验到了万延元年

暴动的振奋，这是想像力的暴动！阿蜜，在你这样无意驱动这种想像力的人看来，今天在山脚发生的这些不也实在算不上什么暴动么?”

“不错。”

“就是的!”鹰四不觉重又显出严肃抑郁的神情，闭紧嘴唇不再说话。他好像开始感到现在在自己治下的这间办公室里让人理发都是无聊，便朝面前的椅子俯下身去，对着椅子上的一面小方镜板着脸照起来。

“找到了一罐煤油，阿蜜。阿仁的儿子带人给你送到仓房去了。”星男一直站在我的背后等我和鹰四说完，现在他接口说。

“多谢你，阿星。”我转过脸去，“我不算山脚的人，也没让超级市场盘剥过什么。这是油钱，阿星。要是没人收，就把它搁到放油罐的货架上好了。”

星男满脸为难，正要接我递过来的纸币时，两个年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来，同时伸出让油墨弄得黑乎乎的双拳，猛击星男的两肩。星南摔倒在地，后脑重重地撞到板壁上面。我感到惭愧：我那两只还攥着纸币向前伸去的白嫩细长的手，竟如此软弱无力！只见星男猛地跳起来，紧咬牙关，齿缝里像蛇一样呼呼作响。他向鹰四看了一眼，以确认鹰四对他出手反击的认同，可是他心目中的守护神却似乎对他摔倒时的嘈杂浑然不觉，皱着眉头定定地打量自己镜中的映象，一动也不动。见阿鹰不做声，旁边的姑娘尖着嗓子提醒道：

“你违反规定了，阿星!”

于是，星男意外地木然呆立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我心情抑郁难平，愤然走出办公室。诵经舞乐还在喧闹，

那声音直逼我飞跳的心脏，我不得不堵起耳朵，忙着赶路。在超级市场前面有个年轻的住持正在等我。我只好从耳朵上移下双手。

“我到仓房去了，听金木先生的儿子说你到这儿来了！”住持高声叫道。我马上看出，他和我一样激动，只是方向不同而已——我是抑郁得呼吸困难，他却是兴高采烈。“在翻寺院里的仓库时，我发现一份根所家寄存的文件。”

我从住持手里接过了那个大号的牛皮纸袋。这纸袋纸质低劣，肮脏陈旧，令人回想起物质匮乏时期。大概是战争刚结束时母亲将它存到寺里的。可是住持并不是为纸袋里的东西而感到兴奋的。

“阿蜜，这真叫人高兴，真叫人高兴！”住持放低声音，一再唠叨。“真是太叫人高兴了！”

我没想到住持会有这样的反应，便用怀疑的目光盯住他，咀嚼着他话里的含义，只好窘迫地一声不响。

“边走边说吧，好多人都竖耳朵听呢！”住持说罢，摆出与他平日里城府颇深的模样全然不同的断然态度，急急地走到了前面。我隔着外衣按住心脏，跟在他后面。“阿蜜，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恐怕整个日本的超级市场都要开始遭农民抢啦！这样的话，日本经济体制的扭曲马上就会大白天下，这时局可就要动荡了！常听人家说，再过十年，日本的经济肯定要运转失灵，可我们这些外行怎么能看出来究竟从哪里开始崩溃？可是突然之间，愤怒的农民们袭击超级市场了！要是接下来有几万家超级市场一个一个遭到袭击，这不等于是日本衰弱荒废的经济问题的焦点被放大了一样嘛！这挺有趣吧，阿蜜！”

“不过，山脚下对超级市场的袭击，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

连锁反应啊，不消两三天，骚乱平息了，山脚的人们还不是重新落个穷困潦倒!”善良的书生住持那亢奋激动的情绪刺激了我，我便带着几近悲哀的沮丧反驳他。“我根本无意干预这次骚乱，可是我很清楚，阿鹰根本不是那种策划有关时代发展进程大事的人！我只希望骚动以后，阿鹰不至于太凄惨孤立才好。但是，我是空怀这样的希望，看来这一次，阿鹰肯定就会走投无路在劫难逃了！他让山脚的所有人都分担了一份‘耻辱’，所以他尽管后悔，但再也不能赖掉他当学运领袖的责任了吧？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把阿鹰引到了这步田地，可却想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我只是觉得，在阿鹰的心里有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痕，因为我对他的所作所为绝不妄加干涉。可是，到底怎么产生了这一条裂痕，我却一直并不清楚。至少和阿鹰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白痴妹妹——哦，这你也知道——突然自杀以前，好像弟弟的心里还没有那条裂痕呢……”

我疲惫不堪，甚至觉得自己也参加了一整天暴动似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种无限的悲哀，便闭口不言了。年轻的住持倒是默默地听着我的讲话，可我分明发现，在他沉静善良的脸皮下面，隐藏着的是貌似善良、实则冷漠如坚硬铠甲般的面孔。不管怎么说，他妻子跑掉以后，他竟然还能在众口铄金的山脚泰然处之，足见这男人的意志何其坚强。他根本不会赞同我的观点，只是见我忧心如焚，便生怜悯，才默然不语的。我忽然想到，我仅仅担心自己兄弟个人的命运，而住持却不能不考虑山脚青年们共同的命运。石板路上络绎不绝的男女老少依旧和气地纷纷向住持和我微笑致意，我们沐浴在其中则如同彼此全然理解了一样，并肩沉默地走过去。来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时，住持不同我道别，却这样说道：

“山脚的青年们过去总是只盯着眼前无聊的琐事，闹得走投无路，无所适从。可是今天，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战胜更大的困难，要用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无法收拾的事态，他们毅然将这一切担在自己肩上，这多令人高兴啊，真是太令人高兴了！阿蜜，要是你曾祖父的弟弟还活着，我想他也会像阿鹰那样干的！”

石板路上的积雪一度被阳光晒得半融了，现在又重新结冰，走上去越发危险。我担心着我的心脏，急急地喘着气低头踏上石板路。这时，绛红浓重的光影笼罩了我的周围。自从降雪以来，这光影已经从山脚一带全然消失，而今，它又重新返回。风吹散了薄云，晚霞又出现在天空。这久未出现的光影，使冰压雪封的灌木丛仿佛重又缝缀在地面上。我在灌木丛间赶路，一阵紧似一阵的冷风吹得我周身颤抖。在超级市场办公室火炉的热气中微微发汗的皮肤现在已开始向寒风低头。我完全晓得，笼罩在我身边的绛红色光影会在我毛骨悚然的脸上刻下怎样的表情。我即使用双手揉擦也无法除去凝固在那上面的东西，只好像一辆误点的北方列车那样，机械地向上爬行。一时间，一种巨大的徒劳感攫住了我：我永远也走不到仓房中去了。然而抬起头来，我看见仓房已在白雪皑皑的黑暗斜坡前面，赫然如同披着红晕的一块沥青儿。

在正房的门前，黑压压地聚集了一小群妇女。她们俨然一致脱去了从超级市场流出、又一度流遍整个山脚的鲜艳服装，恢复了旧日洼地的风俗。她们清一色穿上了暗蓝色条纹的田间工作服，除了脸部以外，从头顶到指尖裹了个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我一走到前院，她们便像一群鸭子一样一齐回转过头，冷漠阴郁地看着我，可马上又转脸朝向站在土间的我的妻子，

开始异口同声地倾诉起来。原来是她们这些“乡下”妇女在请求扔掉第一天抢劫时鹰四所拍照片的底片。抢劫以后回到家，她们一跟丈夫或公公谈起鹰四拍照的事，便立刻被强令来这儿要求将底片丢掉。她们大概是参加暴动后第一批开始后悔的人。

紫色的夕阳刹那之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全是阿鹰说了算呀。我没法使阿鹰改变主意。我根本没有力量影响阿鹰的想法。阿鹰一向都是自己决定他要干些什么。”妻子用一种不带抑扬的声调，似乎有些厌烦但却又是耐心地一遍遍重复着。

那一直像谷底地下水一样不断翻涌上来的诵经舞乐突然停止了。于是，一种尖厉的失落感，同砖红色的晚霞一起埋到了漆黑森林里的洼地中间。

“啊呀，啊呀，这可怎么好哟！”那群年轻的农妇从心底感到困惑，一同叹息起来，一时打断了妻子的话。可是妻子却根本无心改变话题。

“阿鹰定下来的事，我是要服从的！一切都是阿鹰来做主。阿鹰向来就是自己决定他要干些什么！”

十一、苍蝇的力量。苍蝇妨碍我们灵魂的活动，吞噬我们的肉体，于是将我们战而胜之。

——帕斯卡[1]

到第二天的上午，“暴动”仍然在继续进行，然而诵经舞蹈的音乐已经停止，整个山脚笼罩着凝滞的寂静。桃子来送早饭时，我见她已经摆脱了暴力经历以及其后为时长久的歇斯底里，达到了一种奇特的成熟境界。她俯下已经变得苍白驯顺又有些木然的脸，眼睛不肯与我对视，迟疑着，嗓音沙哑地小声说话。今天早晨，阿鹰的亲兵们发现，超级市场的经理躲过桥头岗哨的眼睛，逃出了山脚。这经理是企图联系天皇和他手下的暴力团，才冒死涉过融雪以后水量渐增的河流，不顾通身湿透，沿着铺满积雪的道路跑去海边的。还是今天早晨，濒死的儿子被人从坍塌的桥上救了下来的那位父亲，暗地将猎枪和几种霰弹，送进了鹰四的房里。

---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哲学著作《致外省人书》、《思想录》等。

“他把猎枪借给我们，说要是超级市场天皇手下的暴力团来袭击阿鹰，就用这支枪来打他们！可有了枪反倒害怕！”桃子的声音胆怯抑郁，显然对这场“暴动”已经不甚期待。

我怕让桃子更感胆怯，便沉默不语，回避了开去。但对于借给鹰四的猎枪到底有什么用，我却有一种与她不同的解释。那猎枪并不是让鹰四在对抗超级市场天皇及其暴力团时同亲兵及村民协同作战使用的武器，倒可能是让鹰四在众叛亲离、大敌临头、孤立无援的时候使用的自卫武器。但不管怎么说，鹰四又找到了一位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他肯把珍贵的猎枪借出来用。鹰四一听到报告说“乡下”那边打算再抢超级市场的农民今早都未出动，便坐上那辆加着防滑链的雪铁龙，到竹林那边去搞宣传了。

桃子已与从前迥然不同，向我讲完了这些新闻以后，便像个温顺的小妹妹一样坦率地向我问道，到底这世上的人身上还有没有点善良的地方？见我一时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支支吾吾，她便接着说：

“那天早晨，我们坐车来四国。走着走着天亮了。这时候，我们的车走在海边，阿鹰问我们，到底这世上的人身上还有没有点善良的地方？然后自己回答说，有，当然还是有的。因为人类还要到非洲草原去捕捉大象，再远涉重洋把它们运回来，养在动物园里。阿鹰在孩子时就想，要是有了钱，就自己养一头大象。他还想把这间仓房加上栅栏来养大象，再把石墙下面的大树全部砍倒，好让孩子们不论在哪儿玩的时候只消抬起脸，就能够瞧见大象。”

桃子只是想让我听她说这些，才拿提问做引子的。她也并没有期待我这个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做出回答。自从桃子不意

遭到暴力袭击、变得畏缩胆怯以来，她总要想到，那主持“暴动”的暴烈的鹰四，在谈论大象的话题那会儿，曾经是何等的温存！她怀念儿时的阿鹰。很可能在鹰四的亲兵当中，第一个从“暴动”里脱逃出来的便是桃子吧。

桃子离开以后，我独自回味着大象的话题。在广岛遭到核攻击时，最先逃到郊外的是一群牛，然而，在更大的核战争要摧毁文明国家的诸多城市的时候，动物园里的大象会有逃跑的自由么？会有供核战争时用的防空壕，将这庞大的动物收容进去么？经过一场这样的战争，怕是所有动物园里的大象都要性命难保了。如果城市有希望再度复兴，我们会看到——一群被核辐射害得肉体畸形的人们聚集在哪个码头，欢送去非洲草原捕捉大象的代表——的情景么？或许只有到了那时，那些考虑人类是否还心存善良这个问题的人们才能够得到些启示吧。下雪以后，我就没读过报纸。即使现在核战危机已降临世界，怕我也是浑然不知。想到这里，我感到这种想法给我带来了一种恐惧和疲弱。然而，比起我全然独处时的同样感觉来，它并不显得更加浓重难刃。

那年轻的住持找出来交给我的纸袋里面，是曾祖父弟弟的五篇信札和有祖父署名的小册子《大洼村农民骚动始末》。小册子里记载的暴动，并非发生于万延元年，而是明治四年时废藩置县的诏令在该地引发的另一场暴动。所有信札上的地址和署名均隐而不具。大概是曾祖父的弟弟希望以此保守住两个秘密：新生活的地点和他自取的第二个姓名。

从日期上看，最早的一封信写于文久三年。正如住持所断，这位穿过树林去了高知的原暴动领袖，是通过从树林对面来的工作者处得到了前往新世界的资助的。在逃亡后的第二年

上，这青年便得以会见他心中的英雄约翰·万次郎，并获准参加其新的行动。森林对面来的那个人能够以有力的介绍者身份影响约翰·万次郎，看来他有可能是与土佐藩有瓜葛的秘密工作者。这封信，是青年报告他于文久二年年底，搭乘约翰·万次郎的捕鲸船驶离品川的情况的。青年在船上做水手。第二年年初，他们的船抵达小笠原岛，就势直奔渔场，捕到了两头幼鲸，尔后由于粮草缺乏而重返小笠原岛。晕船自不必说，加之与同行的外籍水手颇多龃龉，曾祖父的弟弟便放弃了捕鲸船上的工作。然而，这位长自林间洼地的青年，毕竟遇到了两头活生生的幼鲸。

第二封信的日期为庆应三年。文中突然展露出来的旷达自由的感觉，历历地表现出这个逃出森林的青年，由于几年的城市生活，已重新发现了他那在捕鲸船上时未曾释放出来的勃勃的幽默天性。在信中，这个在横滨读到了他平生第一张报纸的青年，把其中的一则趣闻报道，转写给了四国深山谷地的哥哥。

“今有趣事一件。此乃不许翻刻之报纸所载记事，然区区家信，但转无妨。合众国‘宾夕法尼亚’之地，有人大发其狂，遂以下述之事自戕，遍览其遗书如左。其书曰：我娶一携有一女之孀妇，然则我父爱恋其携来之女，遂妻之。故我父即为我婿，而所携来之女即为我母。何以其女乃成我父之妻？且我娶之孀妇得一子，则其子复为我父兄弟矣。而我为其叔父。何以其子乃成我继母之兄妹？且我父之妻亦即携来之女亦得一子。则其子为我兄弟，又复为我孙矣。何以其子乃成我子之子？我娶之孀妇，我之祖母也。何以其女乃成我母之母？我既吾妻之夫，复为吾妻之孙也，则我既吾祖父，又吾孙也。

“报纸上复载广告，称欲授日本贵公子之有志英学者云。又称往美利坚修业交易及遍览游历之志于出洋者恭请垂询云。”

这封信与下面的一封，竟然隔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曾祖父的弟弟，那个曾久困于边远的洼地、眼下以一种从中解放出来的激情在横滨热衷于趣闻报道，而且暗中希望远渡美国的青年，其实可能真的去了美国。不管怎么说，由于他的背叛，才使这场暴动彪柄于世，也在背后的山谷中留下了惨遭屠戮的无数死难者，而他却终于独自保住了这一片如此开阔的新天地。

明治二十二年春天突然回复的信札，俨然已是通晓世事的壮年手笔。这是一封给曾祖父的回答。此时曾祖父还住在山脚，他在给城里的兄弟寄信时，兴冲冲地将公布宪法的消息告诉了他。而弟弟的这封回信却充满了冷静的批判。他以抑郁的笔调诘问道：连宪法的内容是什么都还不清楚，怎么能单单因为宪法之名而神魂颠倒？他从一位高知县的士族、即有可能是森林对面来的工作者的朋友所写的文章中引了下面一段话：“且夫世之所谓民权也者，实有二种。英法之民权，乃恢复之民权，进乎下以取之者也。世之他种民权，亦可称之为恩赐之民权，赐乎上以与之者也。恢复之民权，以其进乎下也，其分量多寡，吾人可随意确定之。恩赐之民权，以其赐乎上也，其分量多寡，吾人鲜能确定之。设得恩赐之民权，而欲往更之以为恢复之民权，何事理递进，一似于此哉！”

曾祖父的弟弟预期，那即将公布的宪法，不过只给人些微恩赐的民权。他忧心忡忡，切望志在获得进一步民权的集团能够出现并展开活动。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曾祖父的弟弟俨然已是一个有“志”之人，密切注视着维新以后的政治体制。然而

他“志”在加入民权人士行列，所以传说曾祖父的弟弟在维新政府里做了高官，实在是虚假的讹传。

最后的两封信，与第三封相去不过五年，但由此看来，他的“志”显然已经衰落。他依然是通晓时代信息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与明治二十二年写信之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宏论天下国家的意志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个真诚挂念远方亲属的孤独老者鲜明的面容。文中提及的伊吉郎，便是我的祖父，《大洼村农民骚动始末》的著者。曾祖父的弟弟对他这唯一的一个侄子倾注了深切的感情，然而却怀疑他们是否有机会能彼此见面。曾祖父的弟弟通过书信热心帮助侄子逃避兵役，尔后的一封信里，他又为被迫从军的侄子深切焦虑。这两封信足以窥见万延元年暴动那粗暴的领袖深藏的精细柔情。

“尺牍拜读谨致颂安余始悉伊吉郎君欲缓从军不拘当签与否书以上呈若当签难遂则勿上呈此乃议定之事盖反复书简有误方生变故余今意欲草拟成章即有令室书至曰当签难遂故辄笔鉴此欲缓从军之书切勿上呈余意如右明鉴匆匆一复。

“久未颂安拜读尊帖遂悉足下之情而言之未详乞告实状。

“伊吉郎君渡清以降音讯杳然今攻威海卫出入死生之境甚悬想之乞复帖速告其安否借贴有达乞速致仆以观焉。”

残缺的信札只有这一些。想来曾祖父的弟弟便是在他的侄儿数载从军，远在威海工作战时不得相见，郁郁而死的。在之后，再也没有显示他还活着的证据。

将近中午时，诵经舞蹈的音乐重又奏起，这一次是固定在超级市场前面进行演奏。这诵经舞乐昨天是在几个地方同时震响，今天却一直只集中在超级市场门前，已不再能够唤起山脚人们的响应。演奏诵经舞乐的人，只剩下了鹰四以及他的那群

足球队员。在山脚的村民毫无反响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多少气力把这单调的音乐一直演奏下去？这一次音乐停止的那一刻，便是宣告“暴动”的反动时期开始的一瞬间。

星男来送午饭。他的眼睛看上去如同发着高烧，荒凉孤寂，惺忪朦胧。自打从鹰四他们的暴动中脱离出来，这毁灭性的耻辱便似乎在少年的心中膨胀起来，最后从他眼中渗出。然而，他对鹰四何以抱有这种耻辱感，我还是疑惑不解。当他在超级市场的办公室中因“违反规定”而被打倒时，鹰四视若无睹，这便相当于他同时放弃了责难星男的资格。尽管与山脚毫无关系却还是自由地参加“暴动”，又在技术方面给以实际帮助的，还不是只有星男一个人？莫非除去鹰四的体贴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将他与“暴动”联结起来？这样想来，我便同情地说道：

“好像阿鹰的‘暴动’搁浅了吧，阿星？”

星男却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敌视的目光盯着我。或许他是要表示，纵然自己已脱离出了“暴动”，也绝不会和我这个旁观者一同非难鹰四和足球队。

“电器也没那么多，再说，到底让谁拿走，一到这时候，谁也没有勇气承担责任了。”星男只是客观地分析着情况。

“不管怎么着，事情是阿鹰发起的，他必须要渡过这个难关。”我本想同样强调一下客观的情绪，却反而刺激了星男。他先前隐约闪烁的耻辱感突然爆发起来，几乎怒不可遏，热血骤然涌到了脸上。星男那一直定定地盯着我看的眼睛发出逼人的强光，其中隐含的意义让人一目了然。然而，他孩子气地咽了口唾沫，只说出了这一句话：

“从今晚天始，我也想住在仓房里，阿蜜。我不怕冷，在

下面睡就行。”

“这是干吗？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茫然地怯声问道。

星男那张颇具农民后代特色的脸上泛出猥亵的红晕，撅着干裂的嘴唇，吐出强烈的呼吸，说：

“阿鹰和菜采嫂要干那事。我不愿意睡在对面。”说完，脸色立刻变得一片苍白。

我看到星男那晒黑的脸上好像挂了层白霜。我一直以为，星男这异样的耻辱源于他脱离了鹰四的“暴动”，可原来他引为耻辱的恰恰是我这个旁观者的耻辱。在亲眼目睹了私通的丑行以后，少年不胜羞辱，犹如那丑行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如此一来，耻辱的乒乓球便又被狼狈不堪的我打了回去。由于湿潮的耻辱之火，我的视线模糊了起来。

“那样的话，阿星，趁白天把你的毛毯什么的都搬来吧。下边太冷，上二楼来跟我一起睡吧。”

星男那回视着我的眼睛里已消失了狂暴的烈焰和倾诉的目光，只留下惊诧的警觉。他一边幼稚地怀疑是不是我没听懂他的话，一边提心吊胆地担心我会不会大发雷霆打他一顿。这少年便像是在试探我一样瞧着我，然后，他边窥视我的举动，边用一种被厌恶和疲弱磨钝了的语调瓮声瓮气地说：

“我对阿鹰说，住手吧，别干了，别干这事了，干这事不行。可阿鹰，他还是干了。”说着，他那苍白粗糙的脸上竟挂上了一滴泪珠，如同溅上的一星唾沫。

“阿星，你说的这事要不是你空想出来或是你希望发生的，你就具体点告诉我，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要不你就什么也别说了！”我命令道。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果他说得不够具体，我便无法有切实的理解，也不会有所反应。大量的热血

涌进我的头颅，在里面嗡嗡作响；而我则充满嫉妒，找不出任何头绪做出一些现实的反应，只会在热血当中浮游颠簸。

阿星微微清了清嗓子，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恢复正常。他说得很慢，在每个词尾都加重一下语气，似乎是要引起我的注意。他无泪地啜泣着说：

“我对阿鹰说，住手吧，别干了！再不住手，我就揍你！我带上武器，跳进阿鹰他们睡觉的屋子一看，阿鹰光着屁股，只穿件运动衫，正扭过脸来瞧着我跨进拉门。他说，你还不知道嘛，足球队里就你一个人不会用武器！我不能揍他，只好站在那儿，不停地说，住手吧，别干了，别干这事了。可是阿鹰，他理都不理我，还是干了！”

星男的这些话，实在并未唤起我对鹰四和菜采子性行为的具体印象，倒是以前鹰四在这间仓房里说过的一些话的微妙余音，将通奸者这个词的实感从记忆表层中挖掘了出来。然而在两个通奸者里，我的妻子早已将性意识的萌芽连根剪断，纵然有片刻的欲望掠她而过，也无法将其移入性爱的土壤，使其自然长成。在小温室的角落，为给观叶植物的花盆换个位置，我和妻子肩头挨在了一起，就在这时，我们这一对自从婴儿出事以来，不，自从怀孕以来几乎未曾做爱的夫妻，竟霎时间同时觉到了沸腾的欲望。那时，我勃起的阴茎将裤子也顶起了老高，妻子粗暴地猛抓住它，眉间却满是痛苦和厌恶，然后奇怪地拖着脚步躲到卧室去了。过了一会儿，脸色苍白的她横卧在床上，借助阿斯匹林的力量，为自己辩解道：

“我手一接触到你，就觉得又怀上了一个大胎儿，我的子宫已经撑得老大，从性亢奋状态收缩下来，我就感觉到疼，好像有个什么大东西要流产一样，怕得我透不过气来。当然你是

不会理解的吧?”

可是听妻子这么一说，我也发现：我那从睾丸内侧一直伸到尾骶骨的勃起的阴茎的根部就在刚才觉出了一种挤榨般的痛楚，我现在仍然感到它在下腹周围隐隐作痛。

“阿鹰把我妻子强奸了？因为我妻子诉苦，你就进去阻止他?”我感到一种新的愤怒令我眩晕，问道。

星男还是无泪地啜泣着。他缓和一下脸色，回味了一下我的问话，然后，充满了惊愕，急急地否认道：

“不，不！阿鹰没有强奸！

“一开始，我从拉门这边往里看。那时阿鹰倒是摸着她的胸脯和大腿，她怕是太累了，懒得反抗，就随他去了。可我打开拉门时，菜采嫂正等着阿鹰开始干呢，我看见两条大腿在阿鹰的屁股两边温顺地摆成了个直角了嘛！我这回就对菜采嫂说，你要干这事我就告诉阿蜜去，可她却说，‘告诉也没有关系呀，阿星。’然后就不吭声了。到底阿鹰开始干时，她的腿也没动地方，不像是疼的样儿!”

渐渐地，通奸者的形象开始变得真实起来，我感到一种早熟的性欲冲动。

“看阿鹰在干，我厌恶得不得了，想把拉门关上。这时，阿鹰一边干，一边只把头扭过来盯着我说，‘明天，把你看到的全告诉给阿蜜去!’阿鹰的声音那么大，我真怕阿桃给他吵醒了，她可是歇斯底里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才好不容易睡着的。”

夜半时分，星男睡醒过来，发现睡在他身边的鹰四已从毛毯中离身而去。这时，从拉门对面与桃子睡在一起的菜采子身边传来鹰四的声音，这个鹰四正这样说道：“我觉得要被撕裂

了，在美国旅行那会儿，自然也是这样。”

我觉得要被撕裂了，在美国旅行那会儿，自然也是这样……星男此时还沉浸在睡梦里，后面的话自然无法都听清楚。开始他只能间断地捕捉到几个意义分明的词语，还不能理解讲话的脉络。再往后，星男逐渐清醒，于是他开始能够弄懂整句话的意思了。一种不由自主异样紧迫的东西使星男睡意全消……到达……被监视……怎么能没有欲望呢。相反……黑人居住区……出租车司机提出忠告，想制止……可是我觉得要被撕裂了。那将我撕裂的两种力量，我一律赋予内容，要是不弄清楚……想想看，这两种欲望：一种是替我的暴力人格辩护的欲望，另一种是惩罚这样的自我的欲望，它们在我的生命当中简直把我撕裂了。既然存在着这样的自我，那么，希望继续按照这种自我的形象生存下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吧？然而，这种希望越是强烈，那种要抹煞这可厌的自我的欲望也同样越发强烈，它们把我狠狠分成了两半！安保期间，我还是个学运领袖，一个不得已对不正当暴力进行反击的弱者，但我却参加了暴力团，不惜投身杀场，毅然采用绝对不正当的暴力。因为我希望接受这种自我的形象生活下去，想替自己的暴力人格做好辩护……

“阿鹰，干吗这样说你自己？干吗说你是什么暴力人格？”妻子一直没说话，这时却悲哀地问。

“我妻子没喝醉吗？”我打断星男的话，问道。然而，我用来勉强支撑语气镇静的那一点希冀，一下便叫少年踩了个粉碎。

“菜采嫂已经不喝酒了。”

“‘这和经历有关，这种经历，只要想继续活下去，就不

能和任何人说。’鹰四在使窃听者窒息的沉默之后说道，‘别打听这些了，只相信我要被撕成两半，也就够了。’

“‘是啊，既然知道你是怎样被狠狠撕成两半的了，也就没有必要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撕成两半了？’

“‘你说得对，我的生命的的确确是被撕成了两半的。只要暂时能平静地活下去，我就不想承认将我撼动、把我撕裂的事实。我像个瘾君子一样，刺激必须得逐渐加强。撼动我的刺激，一定一年比一年猛烈才行。’

“‘阿鹰，要是你到美国的那天晚上去黑人居住区也是为这种撼动的话，你觉得在那边有什么样的撼动在等你？’

“‘当时也没有明确预测出会发生什么。我不过是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只要到那里去，一定会狠狠撼动我一下。可结果，我和一个胖得像阿仁一样的黑人老太太睡了一觉，这个特别的夜晚就过去了。最初促使我跑到黑人居住区的，可不是性欲本能。即便是一种欲望，也是另外一种更深刻的东西。出租车司机说，半夜里跑到这些地方太危险。想阻止我。还说，要是我想和黑人妓女睡觉的话，他可以送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拒绝了。争执一番以后，我在一家酒店门前下了车，我走进去一看，这家酒店有一排长长的柜台，一直伸到黑暗中去；那些一本正经、默默站在柜台旁边的醉汉，当然全是黑人。店里的椅背对日本人来说是太高了，但我还是坐了上去。柜台正面是一面镜子，我朝镜子里一瞧，足足有五十个黑人正气鼓鼓地盯着我哩。那时候，我极想喝上一大杯伏特加。我这才知道我的心里满是惩罚自己的欲望。我一叫烈酒灌得大醉时，就会开始不分对手地乱打一气。一个撞进黑人居住区的奇怪的东洋人，我可能被打死就完事了。可一个大个子侍者到我跟前时，

我只要了杯姜汁饮料。我固然感觉到惩罚自己的欲望，可与此同时，我又吓得两眼发晕。我常常害怕死亡，更怕这种充满暴力的死。自从S哥被打死那一天开始，这就成了我无法克服的秉性……’

“就是在知道了阿鹰也有他害怕的东西的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感觉到对他的怀疑。”星男恨恨地说。他的声音里满是与他的年龄全然不符的黯然的遗憾。“于是，我就从拉门的缝隙往里看。阿桃怕黑，睡觉时也要点灯，我就借着那豆大的灯光看见了，阿鹰讲这些话时，把手放到菜采嫂的胸上，腿上。那时候，菜采嫂显得很累，懒得推开阿鹰的手，就听任他那样做下去……

“‘我慢慢地喝完那杯饮料，走出酒店，回到漆黑的路上。街灯只是偶尔有一盏半盏亮着。都是大半夜了，可是在那些高大黑暗的旧房子的太平梯和大门口，有不少黑人在乘凉，我走过时，能听见他们还嘀咕着我些什么。偶尔也有几句话听得分明，比如：I hate Chinese！Chahey！之类。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突然想到，那些黑人满身大汗地追赶上来，当的一下揍在我脑袋上，我就得栽倒下去，躺在肮脏的马路上一死了之。于是，我吓得冷汗淋漓，拐进了一条更加黑暗、也更加危险的岔路。汗出得那么多，甚至那个同我睡觉的黑女人，尽管她自己也是臭不可闻，还要说，这样满身汗臭的日本人真没有见过。可我一直跑到了公寓的里院——一边想像着挨到枪击的情景，让额头和眼睛之间火辣辣地发烧！在急行军这段时间，我全身热得要命，可那贫了血似的大脑里，却只想着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带队的女议员给我们做的那番可笑的训话，说对我们到美国后的举止很是担心。日本的报上大概也登过，有个东京的

银行职员被派到美国，呆了一个月以后，却从纽约的十二层楼上掉下来摔死了。旁边屋里睡着个八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她半夜里一觉醒来，就瞧见窗前窄窄的檐子上趴着个日本人，一丝不挂，还一次一次地用手抓窗户的玻璃。老太太吓得大叫大嚷。一听到她叫喊，那赤裸的日本人就掉到十二层楼下面的马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干吗要一丝不挂地去抓窗玻璃，而且他也没喝醉。反正那个女议员就是这么讲的。我觉得，这恐怕就是极度怕死的人自我惩罚的行动。我半夜三更在黑暗的黑人居住区赶路，与赤身裸体偷偷爬到十二层楼的窄檐上对着老太太的房间，实在是如出一辙的事情。然而对我来讲，还没有人睡醒了觉大叫大嚷，让我掉下去摔死呢。那时我纯粹偶然地碰到了一条稍微亮堂一点的大路，而且正有一辆出租车朝我开来。看到这辆车，我简直像在海里漂流时遇到了汽船一样，马上挥起了手臂。一旦崩溃，就没法抑制得住了。于是三十分钟以后，我就已经关在妓女的房里，用英语说我最见不得人的隐私，要她给我施加名副其实的处罚。我不知羞耻地哀求她说，做给我看看吧，大个子黑人强奸东方小姑娘是什么样子的？她就说，只要你给我钱，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阿星，要是你觉得你没能阻止阿鹰做的事就要对此负责的话，这就是你的误解了。”我打断了星男唉声叹气的饶舌。“在你对阿鹰喊‘住手吧，别干了，别干这事了’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你见到了阿鹰他们在做爱，可他们已经歇过一阵儿，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完事时，你还在睡觉哩。否则，阿鹰就不会跟我妻子照实讲你提到的那些话了。把这当成是诱惑的歌曲岂不很合适！”

“阿蜜，你不生气？”星男反问道。看起来，他的道德情

感完全无法容许我这样的态度。

“已经晚了。”我说，“现在我说，住手吧，别干了，别干这事了，不也是太晚了么！”

星男定定地用凝聚着厌恶的目光盯着我，那目光里仿佛正渗出剧毒。然后，这年轻人不再想那通奸的男人，把自己关进孤寂狭隘的自我里去。他抱着肮脏的脑袋，绵软无力地伏在膝盖上，哀哀地叫喊起来，那声音简直就是昨天傍晚“乡下”的农妇们悲叹的复制品。

“啊，我完了，我，怎么办啊，我用存款买了雪铁龙，从前的修配厂也回不去了！啊，我，怎么办啊！我完蛋了！”

诵经舞乐还是不断传进仓房里来。我还听到了几条狗在慌慌张张地叫，以及各种年龄的人在大声高叫。在星男讲话时，这些声音一直幻听似的在我的耳边萦绕；而今，它分明已经向仓房这边来了。这一片音乐和喧嚣，营造了一种与今天上午业已凝滞下来的“暴动”截然相反的氛围。我没有同那个兀自叹息着被世上一切健全的事物抛弃了的少年一起发出悲叹，独自站起身，透过窗子向院里望去。

一对“亡灵”做先导，后面是乐师和狗群，以及比我还是孩子时见过的任何诵经舞蹈更多的看客。他们蜂拥而来，挤得院里水泄不通。人群中央腾出一小片圆形的空地，“亡灵”们便开始在那里慢慢地兜圈子。敲大鼓、小鼓和铜锣的乐师都是足球队队员，他们一边挺胸腆肚用脊梁抵住看客们的拥挤，一边专心致志地演奏。两条红狗狂吠着，在圆圈里绕着那两个“亡灵”到处乱跑，脑袋上挨了几下，便蹦跳起来。而那两个“亡灵”也仿佛把这些狂热的狗撩拨得更加疯狂，俨然成了舞蹈演出中的一个环节。只要两条狗吃几下打，看客们便爆出一

阵残酷的欢呼。

那些“亡灵”的打扮，是我记得的各种夏日诵经舞蹈之中绝对没有见过的。男的戴了一顶软礼帽，在黑色的晨礼服上面套一件同样黑色的西装背心，胸口大敞着。那礼服是我祖父的遗物，我曾经见过它们与一件尖领衬衣一同放在储藏室的。为什么这个“亡灵”不用那件衬衣做礼服？或许这扮演者穿着不够合身，或许它已经朽烂不堪，或许如此打扮的扮演者是个相貌魁伟的小伙子，以自己穿着单薄为荣，只是遵从日常的生活原则才未如此选择？为使帽子能像头盔似的套在脑壳上面，帽子上还开着几条口子。最后边的口子撑成了个正三角形，那三角里乱蓬蓬的黑发底下，露出了白色的脖颈。他弓背弯腰，一面慢慢踱着，一面还威严地向周围的看客们不断点头致意。他突然伸手掏出放在晨礼服的衣袋里的几片肮脏的鱼干，惹得众狗发起狂来。它们用尖爪抓挠着踩硬了的黑雪，大声叫着狂奔不已。

跟在他后面还有一个“亡灵”，是我昨天在超级市场的办公室见到的那个小个子性感姑娘穿上朝鲜人的白衣服扮成的。被短褂子箍得紧紧的胸前还垂下两根飘来摆去的布带，微风吹来，她长长的裙裾慢慢鼓胀开去。这些令我想起了一块白色的绸子。这件看上去还是崭新的绸短褂和绸裙是怎么被人从隐蔽的地方找出来做了诵经舞蹈的戏装？大概是在S哥被杀那天，山脚的青年去袭击朝鲜人部落，他们不光抢了私造的酒和糖，甚至还抢来了朝鲜少女的盛装，而且足足藏了二十多年。也就是说，在第一次袭击时，他们除去杀人，还干下了许多单是S哥丧命已无法补偿的可怕事情。不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些，在第二次袭击时，S哥才立誓做个赎罪羔羊，带着绝望的忧郁，躺

在仓房阶下的深处沉思不动的么？杀了一名朝鲜人后，由于山脚的村民已提供了一具S哥的尸体，所欠的账便一笔勾销了。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事情过后村里把朝鲜人部落的土地让给他们，这里面也有这桩暴行隐藏其中呢？那山脚的姑娘不加掩饰地大做淫荡的媚态，跟在软礼帽、晨礼服、一身盛装的年轻人身后，学着招眼的影星一样昂然微笑，眯起眼来，小脸扬向蓝天，优雅地前进。她身上穿的那件白色的漂亮衣服，可是1945年夏天她的兄弟们恶毒地攻击朝鲜族部落之后抢过来的啊！

看客们心满意足，兴高采烈，面带笑容，不时发出天真或者残酷的叫声。那几个“乡下”女人，昨天傍晚还换上了洼地的工作服，从头到脚满是惨淡的忧愁，到这里来哀声恳求呢，可现在也跑到了这一伙中，她们仍然穿着暗蓝色条纹的工作服，加倍高兴地大笑不已。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穿朝鲜服的妻子两个人的“亡灵”，使从山脚到“乡下”的这些人们重又被唤起了新的振奋。

我使劲在人群之中寻找鹰四，然而，圆圈里面的“亡灵”和狗群在不停舞动，人群也跟着活跃地摇曳不止，瞧着这一切可真是桩苦事。我疲惫地将目光从人群移转开去，发现妻子正踩着正房的门槛，伸长脖子越过人群往圆圈里看哩。她用右手倚着门框支住身体，左手斜举上去挡住阳光，一动不动地盯着跳诵经舞的人。手掌的阴影，从她的额头直盖到眼睛和鼻子，让人没法看清楚她的表情。尽管如此，可我却已经全然看出，那已不再是自己无根据地漠然企盼、疲惫困窘、不幸的妻子了，犹如朝鲜姑娘“亡灵”那重重叠叠的白绸裙裾一般，她的紧张正在渐渐舒缓，她已变得很有女人味了。我可以确信，是

鹰四使妻子从我们夫妻生活根底里的癌肿——她的性交不能的感觉——中回复过来的。自从结婚以来，这是我头一次把妻子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存在去理解她。她的手躲避着阳光，微微动了一动，于是，她那平和的脸庞的上半部分便沐浴在了光线当中。我直盯着那张脸，突然我觉得自己要被它变成石头，这感觉吓得我反射似的从窗前抽身回来。比起什么幻灭、什么被抛弃者的悲叹，对仓房外喧嚣的好奇似乎比眼前这个青年更有吸引力。他急急地从我的身后挤到前面去，一头贴到窗户上面。我转回桌前，仰面躺倒下来，盯着头上黑色的榉木大梁。而今，那青年已把所有的关注都投向了这种新式的诵经舞蹈，正背对着我瞧得出神。在知道了妻子通奸的事实以后，还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露过面的我只好躺在床上，隐隐觉得自己的体温正保持在摄氏 36. 7 度，血液每分钟 70 次从心脏流出又流回，像虫子一样平静地呼吸着。

我感觉到在我的头脑里面，一股比我的体温高出一些的热血打着旋呻吟着循环流淌。我脑子里闪现出两个彼此无关的念头。我闭起现实的眼睛，让意识的眼睛潜入那念头的火花忽明忽暗的黑暗中。第一个念头是，父亲要去中国做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在他出发那天的黎明时分，母亲在指挥往海边城市运行李的脚夫们时，站到了门槛上面。父亲见了，便暴怒地将她打倒在地。母亲鼻血横流，不省人事，父亲却丢下她，兀自出发了。于是，祖母便告诉我们这些孩子说，若女人站在家里的门槛上，这家的家长一定是凶多吉少。母亲总不肯认同这种土俗的解释，只是对临行前暴力的父亲充满憎恶，也对为儿子的举动进行辩护的祖母充满蔑视。然而，父亲却真的在这次旅行终了时死掉了。于是，我不能不对母亲怀有一种神秘的畏

惧。其实，对“女人站在门槛上”的禁忌，她比祖母信得还要深。在那个拂晓，她不是故意站到了门槛上面了么？父亲也明明知道如此，所以他才会那般凶暴，而且祖母和脚夫们，不是也没有打算劝阻他么？

还有一个念头是，我无法准确弄清妻子裸体时究竟是何种形状、何种肤色的摸索过程。我愿意看美丽肉感的裸体，然而我能够的确寻到的，却只有由于通奸目击者的证言而被赋予了实感的两腿内侧，和一次因双方心血来潮时尝试进行的非正常性交而出现了裂痕、筋肉饱绽的肛门上那令人产生根植于肉体深处的厌恶感觉的细节。久而久之，嫉妒便萌生起来，如同吸了有毒的烟雾后气管变得灼热刺痛一样。这刺激性的烟雾也冲进我意识的眼里，于是，妻子裸体的细微部分微微发红，又渐渐模糊起来。我惊愕不已，觉得过去我从来不曾真正占有过她……

“阿蜜！”鹰四突然在楼下充满活力和自信地大声喊叫起来。

我睁开眼睛，首先见到的是那个一直盯住窗玻璃的青年晃了一下脊背，缩进屋来。诵经舞蹈的乐声，狗群的叫声以及人们兴高采烈的喧嚣声，正要下到山脚那边去。鹰四还在用更加爽朗的声音喊着：

“阿蜜！”

我不理睬本能地企图起身阻止的星男，下到台阶的中间坐了下来。鹰四叉开双腿，背光站在土间里，他的周身披着五彩羊毛似的光晕，而朝向我和他的脸部和身体，乃至伸开的两臂则显得漆黑。看来，要与这样的一个鹰四抗衡，恐怕我也非得把脸沉进黑暗之中不可。

“阿蜜，我干的事，星男告诉你了?”那漆黑的人一讲话，身体的周围便有无数的小光泡闪个不停，如同涟漪水面上反射的日光。这使得那漆黑的人形看上去活像一条跃上水面的山椒鱼。

“告诉了。”我平静地答道。我仿佛站到了小时候的弟弟让一条小蜈蚣咬自己手指的现场和漠然看着他眼馋似的向我恳求时一样，现在，尽管鹰四大声对现时情人的丈夫夸耀自己的通奸行为，可我却显出了一脸冷漠。

“我这么做可不单是出于欲望。我是十分清楚了一件事的意义，才去做那件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的事的。”

我默默地摇头，表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我恶意的箭矢犹如向“亡灵”狂吠的狗群，朝着躁动紧张地企图溜掉的鹰四射将过去，易如反掌地刺进他的内心。

“真的，根本不是出于欲望!”鹰四愤愤地挑战道，“我倒全然没感觉到欲望。为了把心中的欲望清除干净，我必须一个人做许多事情啊，阿蜜。”

我突然觉得愤怒，又觉得滑稽。霎时，这感觉令我的脸变得通红，所有嫉妒的情感骤然不见了踪影。我必须一个人做许多事情?我气得全身发抖，紧咬住牙好憋住不笑出来。这个家伙，他一定做过好多钻牛角尖的事吧，单独一个人!这家伙彻头彻尾是一个幼稚的下流胚!事实上，就算我妻子能摆脱性交不能的感觉，这事也一定是我那性成熟的妻子单独干成的。而鹰四在他作为一个私通者第一次与人做爱时，若是不能顺利射精，便不仅要对自己通奸的兄嫂，甚至对他自己本人也要充满着被热辣辣的耻辱窒息似的恐惧，他大概就是抱着这种恐惧心理去用力做得好些的吧。这不就是未成年人想出来的气氛么?

“阿蜜，我要跟菜采嫂结婚。不许你干涉我们的事！”鹰四烦躁地摇着漆黑一团的脑袋。

“结了婚以后，你也还打算一个人单独做许多事么？也没有欲望？”我连讽带刺地向鹰四问道。

“那是我的自由！”鹰四叫道。他显然正努力把屈辱关在单纯愤怒的叫喊里面。

“当然了，这是你和菜采子的自由。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假如你能摆脱暴动的颓势，把菜采子他们安全地带出山脚的话！”

“我们暴动，已经挽回了颓势。阿蜜，你没见山脚和‘乡下’的那些人围着‘亡灵’时，是怎样的狂热？我们就用这些，给暴动输送了血液！给暴动输足想像力的血液，暴动就转成了强势！”鹰四的声音像刚才朝二楼喊我时一样，又恢复了激昂。“山脚和‘乡下’的一些人觉得不安，好像我们的暴力权威总比不上超级市场天皇的暴力团。可现在，他们在嘲弄那两个‘亡灵’的时候，就获得了蔑视超级市场天皇的力量！他们重新有了勇气，就敢于这么想了：就算他是超级市场的天皇，过去也不过是朝鲜的伐木工一个，现在有了钱，才有了点势力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立刻便振作起凌弱的蔑视心理和扭曲的利己心理，又跑去把电器什么的抢个精光了。一旦他们把敌人蔑视成可以恣意践踏的弱者，他们就能够做出最为无耻的事情。而今，超级市场的天皇是一个朝鲜人，这真正是一个最有利的因素。他们对自己每况愈下的悲惨生活已经看清楚了。从前在树林里，他们感到自己是最悲惨的种族，恐惧而怯懦。可是现在，他们唤起了战前和战争中他们对朝鲜人的优越感的甜美记忆。他们又一次发现，世上还有一种叫朝鲜人的贱民，

他们比自己还要悲惨，这想法弄得他们心旷神怡，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可真是一群强者！只消把他们这种苍蝇一样的性格组成一团，就能与超级市场的天皇继续对抗下去！他们自然是些渺小之极的苍蝇，可如果苍蝇的数量巨大，它们的力量也就会大得无边！”

“可是，你的苍蝇们就总也不会发现，你对山脚和‘乡下’的民众竟是如此蔑视？苍蝇也是可能对着你发动进攻的啊。到那个时候，你的暴动岂不在所有方面全都完蛋了？”

“这不过是你这个居高临下的厌世者的错误估计，阿蜜！”鹰四渐渐沉着起来，“经过这三天暴动，山脚已不是一色的蝇派；那些较为优越的蝇派，他们的意识也已经变了。这些人全是些山林地主。原来他们相信山脚的生活像现在这样令人窒息，就算洼地的所有村民全都搬走了或者全都死光了，也只有他们还可以等着树木成材，直到下一次采伐。可是，通过这次暴动，他们也亲眼见到了蝇派绝望的行动是多么可怕。这就是我们从万延元年暴动的历史教训里得来的体会。而且就在他们具体——虽然这也是虚假的具体，但终归是具体——地觉悟到，超级市场天皇的‘亡灵’不过是个可怜的朝鲜人的时候，他们全都一下子变成了忧国之士。他们无能的先辈用砍伐部分山林所得的资金进入了县议会，没有任何现实的政治计划，只扮演了一个具有地方规模的国中杰出人物。其实，他们的心理反应和他们先辈如出一辙。他们开始觉得，应该把山脚的经济权力收回到日本人的手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与之开战的敌人，应该是那个不戴手套、不打领带，甚至不穿衬衫，只穿件老式晨礼服的、愚蠢的超级市场天皇。因此，他们要几个人出钱，把超级市场连带抢劫的损失一起买下来，还想让山脚的那

些关了门的商店店主共同经营。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了确实的计划。为实现这个计划，那个小住持热心奔走，已经很有收获了。阿蜜，那个住持可不单是个哲学家。他真有一股要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现的革命家的热情。还有，在这洼地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完全没有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他才是个好同志呢！”

“真的，他确实没有山脚村民们的私心。这是他们寺院里代代相传的任务嘛，阿鹰。不过，他不是像你这样满心蔑视山脚村民的人的真正的同志。”

“这就足够了。我是眼下这场成功暴动的领袖，就像战场上咱们的大哥一样，是个有能耐的作恶大王。哈哈，我不需要什么真正的同志。有表面上的合作者也就足够了！”

“要是这样那也就罢了，阿鹰。那么，你就回你的战场去吧。我没心思和你同声欢笑。”我说着站起身来。

“阿星怎么样了？替我安慰他一下。看到我们做爱后，他憋着声音呕吐起来了。真是孩子！”鹰四说着，径自跑走了。

就在那时，我不禁确信：鹰四的“暴动”也许会成功。即便暴动自身遭到了失败，鹰四大概也能够独自摆脱暴动末期的混乱，从洼地逃将出去，与同样从自身危机的沼泽中逃脱出来的菜采子一起，开始一种新的充满日常平静的婚姻生活。这种日常的平静，实在是一种原暴徒的平静的日常生活，其中潜伏着超越了巨大暴力经验的回忆。到那时，弟弟一定会最终填平本体不明的某种东西给他造成的自我处罚的欲望与作为暴徒的自我感觉这两者间的鸿沟，变成沉溺于平静的日常生活的人吧。今天刚读过曾祖父弟弟的信札，这尤其令我深信不疑。他不就是这样身为一个绝望崩溃的暴动领袖，却一个人逃身出去，度过平静的晚年了么！在我回到二楼以后，那个被他的守

护神抛弃、继而遭到嘲骂的青年，依旧徒然贴在玻璃窗上，头也不回地叹道：

“这么多人踩来踩去，院里的雪全化了。我讨厌化得泥塘似的。汽车都给开脏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讨厌化得泥塘似的！”

半夜里，我和星男并排盖着毛毯，把冰冷的身体缩进自己的膀臂，抵抗着大雪开化时逼人的寒气。正在翻来覆去的时候，妻子突然默默地登上楼来。她确信我们在黑暗当中根本没有睡着，就用疲惫无力的哑声叫起来：

“快到上房来。阿鹰要强奸山脚的一个姑娘，把她给杀了。足球队员们全都不管阿鹰，回家去了。明天，整个山脚的男人们都要来抓阿鹰的呀。”

我和星男在黑暗中欠起上身，呆呆地说不出话来，一时间只听见我心脏的跳动和开始疲惫啜泣的妻子的喘息。过了一会儿，我只好说：

“还是去看看吧。”可我那如同盛满水浆的皮囊一样沉重的肉体却依然受着诱惑：如果就这么闭着眼睛，一头躺倒下去，像胎儿一样蜷缩起身体，那我就能拒绝现实世界的一切；如果现实世界的一切全都变成了虚幻，那么弟弟这个罪犯也就变成虚幻，弟弟的罪行也变成了虚幻。这是一种与此前瞬间那顽固的失眠症全然不同的、甘美的睡眠的诱惑，它让我感到惬意。然而，我终于摇一摇头，驱走了睡意。我慢慢地爬起身来，反复地说道：

“去看看吧。去看看吧。”

十二、在绝望之中死去。现在，你们是不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它绝不仅仅意味着死亡。难道它不是后悔生存，在耻辱、憎恶和恐惧之中的死亡？

——让-保罗·萨特①

我和妻子以及那少年一声不响，踏着前院里半冻半融的泥泞往前走。山脚笼罩着黑暗的死寂，恰似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阴湿冰冷的风不断地吹出来。上房的门大敞着。我们三个人，犹如被那门里泄出的些微光亮顶住了一般，挤做一团，犹豫了片刻，便一起跨进了门槛。鹰四正低垂着脑袋坐在火炉旁边，一只手熟练地磨着猎枪折弯的枪身，俨然在做一项他终年常做的娴熟工作。在黑暗的土间里，有一个小个子男人面朝他

①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作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是存在主义流派的倡导者。著有小说《恶心》、剧本《苍蝇》、评论《存在与虚无》、传记《福楼拜》等等。

直直地站着。见我们进屋，那男人微微动了下身子，可他现在还紧张得几乎要僵直地摔倒下去，仿佛连转过头来瞧我们一眼也无法做到。那是隐士阿义。

鹰四有些不情愿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抬头看着我们。他黝黑的脸奇怪地扭曲着，似乎还夹杂着几分惶恐。头发以及左耳到嘴唇的脸部，都是黏黏糊糊、脏兮兮的。他向我缓缓地伸出摊开的两手，这动作有如在梦中所做。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被很宽的布条卷裹起来，两只手的其他部分都斑斑驳驳地满是黑点。他一直在擦枪，可是却未曾把手也擦擦干净。手上和头上粘着的污物，都是人血。鹰四把两手平伸着，颤抖不已，眼睛像忧郁的猴子，怯生生地直盯着我，紧闭的嘴唇里开始不断挤出疲惫之极的吃吃笑声，仿佛涌出了一个个气泡。这笑容如此丑恶，足以使我变得胆怯起来。正在这时，妻子独自先来到炉旁，朝着鹰四那张笑得麻木了的嘴巴挥拳猛击。她的睡衣被膝盖顶了起来，从睡衣的胸部露出了一只圆乳房，恰似一部毁坏了的机器上完好的零件。妻子把那只打过鹰四的拳头在腹部擦来擦去，蹭掉了血迹以后，用睡衣盖住了乳房。鹰四挨了揍，收敛起脸上的笑容，询问般地望着我，理也不理我的妻子，他的上唇糊满了自己鼻子里流出的污血。鹰四努起嘴唇，出声地连同鼻血一起使劲往鼻孔里吸气。我想，他一定把鼻血都吃到了胃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铁青，犹如乌鸫的脑袋。我怀着更加可靠的感觉，再次认定弟弟和妻子是睡过觉。妻子的目光又从鹰四移到了隐士阿义的身上，那小老头生怕轮到自己挨揍，便笨手笨脚地躲到灶旁的黑暗里去了。

"我打算强奸阿蜜见过的那个性感妞儿，可她反抗得好厉害，又踢我肚子，又抓我眼睛。我气得血往上涌，就用膝盖把

她抵在鲸岩上，一只手抓住她的两条胳膊，另一只手拿起一块石头，照准她的脑袋砸。她嘴张得老大，直喊：讨厌，讨厌！还摇着头，好像还要厌恶许多。可我一次一次打她的脑袋，直到把她脑袋打烂才停手，阿蜜。”鹰四仿佛生怕我看不清，把满是血污的两只手又往前伸了伸，一面用一种如同从远方传来的微弱模糊的声音讲下去。在那声音的深处，分明带着一种毅然将自己剥得精光、把最污秽的部位展示无遗的暴露癖的声响。他讲的话没有抑扬，也没有方向，恰似单调乏味没完没了的饶舌。这声音让我从心里觉得厌恶。“我把那姑娘打死的时候，隐士阿义就藏在鲸岸对面，他全都看见了，他是个证人。隐士阿义，在黑暗里面，他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鹰四便转向黑洞洞的灶边，充满信任地叫他犯罪的证人：阿义！阿义！那神情活像在呼唤他保护的一个可爱的弱者。可是隐士阿义不动弹也不回答，缩在那里不肯出来。

“你干吗要去强奸她？喝醉了？”我说这话，纯粹是为了打断他神经兮兮的饶舌。对鹰四开始打算强奸那个很适合穿朝鲜服装、脸色红润的姑娘的原委，我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我可没喝醉。我是想以后清醒地在现实世界里干上点事情。不，我一直都在想以后清醒地干点事来着，阿蜜。我清醒地觉到了一种强奸那姑娘的欲望！”鹰四这样反驳我。他僵硬的皮肤下面，有种粗野的笑意在蠢动。

“你不是说过你虽然和菜采子睡觉却感觉不到欲望么！”我朝着弟弟和在他旁边拄着膝盖、重新一脸茫然地盯着他不放的妻子，连连放出几发恶意的炮弹。

看到鹰四卑下狼狈的神情，我心里感觉到更深的厌恶。可妻子却依然是一脸茫然，面色苍白，将表情凝固起来，眼睛死

死地盯着鹰四。鹰四的脸被死人的血弄得污迹斑斑，皮肤下面黑血迸涌，一片肿胀。正是它想大叫：讨厌，讨厌！弟弟在妻子面前受到我的如此揭露，竟然羞愧难当，全然乱了阵脚。作为一个暴力罪犯，他似乎是太脆弱，太缺乏经验了。或许，鹰四连死者的血也不洗洗干净就坐到那里，不单是要向我炫耀那身血污，也是要保持自己继续做个罪犯的心态。然而，他却振起卑下的蛮横，要把涌上脸来的狼狈慌乱的红晕，转变成充满暴力的昂扬斗志。他狡黠地瞧了瞧我，装腔作势地开口讲话，俨然在他的心里，欲望的余烬还在冒烟。

"那个小婊子真叫性感。另外也真年轻啊，这个毛丫头，把我的欲望撩起来了！"

妻子受到了侮辱，依旧拄着膝盖，往后面缩了一下。她的眼光黯淡低垂，不看鹰四，也不看别人。我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孤立无援者的绝望和愤怒。可以肯定，妻子已然从鹰四情人的宝座上走了下来。然而，她却未曾回转到我的身边。在所有的通奸故事里面，只要丈夫无情地惩罚了妻子的情人，他遇到的便会是我这样的经历。可我并没有惩罚鹰四，只是满怀蔑视地认定，他不过是一个从玩蜈蚣那时起便不曾变过的小毛孩子。这蔑视使得我恢复了观察力的自由。自听到鹰四贸然落入了这困难的罗网以来，我也头一次从困窘紧迫的紧身衣里解脱了出来。妻子退后剩下的空间，我唤星男填充了进去。鹰四笨拙地迅速把枪往自己身边拉了拉，离我们远了一点，于是，他和我便在一个适合讨论的距离上对峙起来。

"阿鹰，你说你想强奸那个姑娘，遭到她反抗，你就用石头把她打死，这不是事实吧？"我开始发动攻击。

"去问隐士阿义，让他说他都看见了什么？"鹰四立刻充

满警觉，高声反驳我说。

“他不过是个疯子，只会没完没了地重述你事先暗示给他的东西。你没有杀人，阿鹰！”

“你说话干吗这么肯定？阿蜜，你看看我满身的血污！你再到那姑娘家，去看看她的尸体！足球队过去的队员，已经把她搬到家里去了。她的脑袋叫石头砸得都像一块年糕似的了。阿蜜，你这没根没据的乱想，你干吗要说得这么自信，还要来嘲笑我？”

“可能那姑娘真的死了，可怜的是脑袋也许确实被人打烂了。但是，恐怕你并不是有意识地犯下这罪的。这种事你做不来。阿鹰，你还是孩子的时候，让蜈蚣咬手指头那会儿，你不都是一心只挑无毒的蜈蚣抓的么？你就是这么个胆小的人啊。那姑娘一定是因为事故才死掉的！”

“明天早晨，山脚的苍蝇们大发雷霆、赶过来抓我的时候，隐士阿义就会重新告诉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别乱想了，去听听他怎么说吧！”鹰四还在反驳我，“他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我是怎么用石块把那个小婊子给打死的，让她像只疯猫似的反抗我、愚弄我！我要让你们知道，在暴动中愚弄领袖，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这几十年来，山脚下人人都知道他是个疯子。你觉得大家会相信他的证词？”对这个抱着幼稚的虚构故事不放的自愿凶手，我开始怜悯起来。

自从听到鹰四说到自己的名字，隐士阿义就从灶旁微微探出半截身子，伸着那对灰褐色驳杂的毛烘烘的小耳朵，听我和鹰四谈话。瞧他的神情，仿佛我们是法官，正在审判他疯狂的隐居生活是不是合法，以决定他的命运一样。但事实上，在他

的耳朵里，我们的对话就像听不懂的外国话，他是无法理解的，只是默不作声、若有所思地听着罢了。然后，他深谋远虑般长叹了一声。

“阿义，别紧张！明天才有你的事呢。先躲到仓库里睡一觉吧！”鹰四鼓励老人道。

于是，隐士阿义立刻像夜行的野兽一样，无声无息地跑到黑暗里去了。我断定，鹰四是不愿让隐士阿义听到我对他杀人告白所做的谴责。于是，我更加深信我原来的推测了：那姑娘先是死于事故，然后，鹰四才在尸体上做了些手脚。只有一点还令人怀疑，那就是鹰四何以要借一个疯子的证词，宣布自己为杀人凶手，怂恿全村的人向他开战。我诚然有自由向鹰四证明，他大为张扬的杀人事件，虽然与他不无关系却终归还是一起死亡事故。然而是否承认我的推断，放弃与隐士阿义联合作战的计划，则是鹰四的自由了。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姑娘带到鲸岩去呢?”我的话俨然是律师忤逆被告人意志的讯问。所谓鲸岩云者，是一大块岩石，形如一条鲸鱼，就在山脚的石板路向桥那边急骤下降的地方。它使石板路在这儿细成了咽喉一般，也阻断了看往那座桥梁的视线。从鲸岩到桥梁的五十米左右的坡路陡峻而又蜿蜒，是山脚汽车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在冬天的大半夜里，那可算不上幽会的好去处。

“我想在雪铁龙的座位上强奸她，就到处找个方便的停车场地。要是把车停到鲸岩的背阴里，就没有人、至少除了隐士阿义以外是没人从山脚往这儿看。而且，有鲸岩遮挡着，那些在桥上昼夜站岗的足球队员也看不见的。”鹰四的话仍然带着顽强的警觉。

"既然你说，你把她按在鲸岩上用石头砸，可见那姑娘是反抗你，从车里逃出来，又被你抓住了?"

"不错。"

"那姑娘若是真的反抗了，在车里她又怎么能一声不吭地任你施暴？逃出车来以后，她在逃跑时又为什么不喊不叫？那姑娘也是暴动指挥部的一员啊，她应该知道，桥头就有她的同志在站岗，她为什么不喊他们救命？你说她被抓住，要被打死的时候喊：讨厌，讨厌！就算是，可是岗哨离你们还不到五十米，他们怎么不过来阻止你杀人?"

"我杀了那姑娘以后，就发现隐士阿义正在窥伺我，就在我同他说话的当儿，岗哨跑过来了。见我犯了罪，他吓得什么似的，连忙跑去叫同伴过来抬死人。这样，我就从鲸岩后面叫上隐士阿义，带他坐着车回家来了。"

"只要听听最先到达犯罪现场的那个年轻哨兵的话，这一切就会水落石出的。既然当时不算黑，你能很快将逃出去的姑娘抓到手，那么那个年轻人也应该窥视到，你正在举起石头，一下一下地砸那个姑娘，要把她的脑袋砸碎。整个犯罪过程时间很短，岗哨即使听不到她在车里惨叫，但在你打最后一下以前还跑不到你背后，可就不对头了。至少他该听到呻吟声吧。"

"没准儿在他跑过来的时候，我正打算启动车子逃离现场，已经都坐到驾驶席上了。这样，他大概就要作证说，他最先看见我时，我是坐在车里的。"鹰四思忖了一下更正道。

"阿鹰！岗哨肯定会这样做证吧!"我热切地寻找着新的可靠提示，"你带着那个姑娘，在积雪初融的石板路上开车兜风。在你们之间有点儿什么事，她就从疾驶的雪铁龙上跳了下去，头撞在鲸岩上摔碎了。你身上沾满血污是姑娘死于事故以

后，你抱住她或是怎么着弄的。甚至你可能用自己的手，把姑娘头上流出来的血抹到你自己身上了呢。然后，你就用把这个跳车的姑娘脑袋砸碎的速度把车开到离这可怕的现场五十米远的地方去了。事实上，别说强奸了，你连对姑娘动手动脚的时间都没有，只会拼命抓住你的方向盘罢了。不过，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才叫那个姑娘从车上跳下来，在鲸岩上摔破了头的，是不是？至于岗哨过来时你已经坐在车上，我想那不过是因为急刹车之后你要返回姑娘跳车的事故现场吧。怕是岗哨听到了附近有刹车的声音才跑过来的。在此之前你不是没从汽车上下来过么？可能岗哨跑去喊人以后，你才找见头已经摔碎的姑娘。至于隐士阿义，他恐怕什么也没有看见。是不是你在回家的路上，把这场虚构犯罪的细节一点点教给了他的？”

鹰四低着头默不作声，让人感到他似乎正在回味着我的话。然而，重又充满警觉地把自己关在孤独的躯壳里。从这样一个鹰四身上我无法看出，我上面的一番推测是否能把他炫耀不已的犯罪过程一举瓦解掉。

“阿鹰！”一直沉默不语的星男，这会儿却仿佛被寒冷以外的什么东西弄得周身颤抖，躁动不安地叫道，“那丫头不是总想和你干，大白天就在仓库的黑地里引诱你么？你根本用不着强奸她，只消你说把短裤脱了，还不是信手拈来！准是阿鹰嫌那丫头在车里太闹得慌，就开足马力想吓唬她一下的。你不是说你在美国玩过这样的游戏么！那丫头吃了一惊，一时紧张，想自顾逃命，就跳下车去了吧。她准是以为，在鲸岩拐弯那里，阿鹰根本打不住舵！”

“果真是这样的话，阿鹰，这也算不上杀人啊！”我附和着这位年轻的汽车专家的话，接着说道，“这是场事故，或者

是一次过失。就算是过失，也不光是阿鹰的过失。那可怜的姑娘也有份儿呢!”

鹰四仍然是默不作声，只顾把霰弹往猎枪里装。鹰四怕子弹突然爆炸，正小心翼翼地集中起注意力。我分明看到他隆起的眉宇下那一张黯然低垂的面孔以及紧张僵硬的矮小身躯上充满了绝对拒绝他人理解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我们的婴儿张着一无表情的褐色眼睛躺在床上、只会安静地苟延生命、与外界断绝了一切交流的日子里，便已经萌生起来；而今，这种力量又带来了一个奇特的幻想：借助满身的血污来展现他刚刚犯下的罪行。我的平静，一直是由鹰四在我们喋喋不休时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来的动摇和缺乏自信来维系的，而今，这种平静就要骤然土崩瓦解。我觉得，我能够充分地论证鹰四大肆炫耀的犯罪的非现实性，然而另一方面，看着眼前这个满脸阴沉、坐在那里像个叫什么新玩具弄得入迷的孩子似的只顾摆弄猎枪的鹰四一直缄口不语，一种奇怪的恐怖心理，却又在我的心里慢慢膨胀起来：鹰四实在是一个罪犯。

“你相信阿鹰杀了人么?”迫于鹰四的沉默，我便向同样沉默不语的妻子问道。

妻子沉思着，对我的询问并没有马上做出反应。而后，她仍然低垂着头，用一种可以将任何情绪变得低落下去的漠然语气说道：

“阿鹰说他杀了人，也不由我不信。至少阿鹰不是那种绝对不能杀人的人。”

我觉得妻子好像是个顽固的陌生人。我曾那般为鹰四辩护，然而对我的话，她却全然是充耳不闻。她没有了听觉，也失去了视觉，全身只能够感受到鹰四所散发出来的一个罪犯真

实存在的感觉。鹰四也觉得奇怪了，抬起头来，用一种几近天真的目光看了妻子一眼，于是，他的皮肤上那云影般的阴翳就不见了。他重新开始仔细检查那支猎枪，一面说道：

“真的，我用石头一下一下地打她的脑袋，把她打死了。阿蜜，你怎么不相信？到底为什么你不肯相信？”

“不是说为什么。这也不是什么信或者不信的问题。我只是说，我觉得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杀人！”

“哈，是么。可这儿有一个科学的问题。”鹰四说着，把装好霰弹的猎枪重新小心地放到膝头上，然后开始用血污的右手，去解开同样血污的左手小指和无名指上缠着的宽布条。“我也并不反对科学态度呀，阿蜜。”

从布条下面露出了被殷殷鲜血濡湿了的纱布，纱布裹得很密，鹰四解得没完没了。最后终于露出了两根奇怪蜷曲着的紫色指根，从两根并齐的圆尖处便立刻涌出淋漓的血来。鹰四任鲜血滴到膝盖上，刚一把伤口举给我看，就马上用右手死死抓住两个断指，按到两膝中间，弯腰屈身地呻吟起来。

“哎哟，他妈的！好疼，好疼！”鹰四呻吟道。然后他竭力挺起身来，重又用血污的纱布和布条，把断指包扎起来。显然这种包扎并不能减轻鹰四的痛楚，我和妻子也只能怯生生地盯着他看。至于星男，则像一条瘦弱的老狗，四肢着地地爬进土间，伸长脖子，发出呜咽似的悲声，大吐起来。

“他妈的！好疼，好疼！”鹰四那极度的痛楚刚刚缓解了一点，他就抬眼瞥了我一下，故作强硬地解释道：“我用左手压住她的脸，右手抓起石块砸她脑袋的时候，她先是叫：讨厌，讨厌！后来，她突然吧叽一声张开嘴巴，想把我的整个左手咬住。我连忙抽手，可她的牙已经死死地咬住我小指的第一

个关节和无名指第二个关节中间那儿，再也不松口了。没办法，我只好用石块往她下颚上揍，想让她张开口。可是恰恰相反，她那可怕的利牙却把我的两个手指咬断了也没张嘴，后来，我想找根木棍把她的嘴撬开，好拿出手指来，也是白费工夫。这样，她那尸体脑壳虽是破碎了，可嘴里现在还含着我的两截断指呢。”

虽然听上去十分虚假，但鹰四这番充溢着痛苦的话却给了我一种超乎逻辑之上的有力证据。我相信了“犯罪”的存在，也同样相信了鹰四作为“罪犯”的存在。我还从鹰四的身上，觉出了一种不断增加的厌恶和恐惧，催我作呕。诚然，我并未开始相信鹰四竟然会用石块一下一下打那姑娘的脑袋，把她打死。我只能认为，那姑娘一定叫在黑暗里高速开过狭窄弯道的汽车吓得要死，自己跳下汽车摔破了脑袋。然而，正是从那一刻开始，鹰四便在一种要创造一个罪犯的自我、并且在虚无的“犯罪”转归己有的偏执渴望的驱使下，开始了另一桩可恶得令人无法忍受的变态行为。他用木棍将那个摔破脑袋的死姑娘的嘴巴撬开，把自己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放到姑娘的牙间，再把嘴巴闭拢。八成就在这时，发出了吧叽的声响，而鹰四一定用右手抓起石头，不断地痛击姑娘的下颚，直到死人的牙齿把他的手指咬断。那死人的下颚每挨石块一击，她的脑浆和血，还有鹰四手指上的鲜血就要从碎烂的脑袋和嘴巴里飞溅出来，鹰四也便全身血污，一片狼藉。

“阿鹰，你真是个疯狂的凶手!”我嘶哑地说了这一句。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继续讲话的气力。

“我头一次觉得阿蜜开始真正理解我啦!”鹰四端坐起来大言不惭地说。

这时，那四肢着地的少年，突然充满悲切地喊叫起来：

“不，不！你们干吗都不想救救阿鹰！那不是场事故么！”

“菜采嫂，让阿星吃一点阿桃吃的那种安眠药，要比正常剂量多出一倍。阿星，你睡觉吧。你的能耐可比青蛙大多了：不光肉体，就是精神受不了的东西有一点儿叫你闻到了，就能马上吐得像把胃翻过来洗了个透！”鹰四恢复了对他年轻的亲兵们使用的那种温存的家人式的口吻，他已很久没这么说话了。

“我不吃药，我不想睡！”星男耍赖似的反抗着。可鹰四带着一种权威，对他毫不理睬，一声不响地看着妻子把药片和一杯水递给星男，看着那少年无力地反抗了片刻最后吃下药去。我们都听到少年在把水喝进肚里时喉部发出的低响。

“就会见效的。阿星挺原始的，从前几乎还没吃过化学药品呢。菜采嫂，你就在旁边守着他，让他睡觉吧。”

“我不想睡。觉得要是睡过去，就再也起不来了，阿鹰！”他无力地提出最后的抗议，声音里透出恐惧。那药品已经使得他朦朦胧胧开始屈服。

“才不会呢。睡上一觉，明早醒来时你还会觉得肚子饿哩！”鹰四对少年说完话，一扫刚才的冷淡，对我说道：“阿蜜，我想，山脚那群人会来抓住我私刑处死。要用猎枪防身自卫，那就得像曾祖父那样，关到仓房里去。今晚，我们换一下睡吧。”

“不会给你私刑处死的，阿鹰。你也不会用猎枪和想要给你处私刑的村民打起来的。这全是你的幻想！”妻子的话里，充满了与之全不相称的胆怯。

“山脚的情况我比你了解。他们对这场暴动，对卷入暴动

的他们自己，都已经是满腔怨气。有些家伙会想，如果把暴动的一切恶果都归咎到我的身上，然后再把我打死的话，那么所有的罪过就都能赎去了。事实真就是这样。就像S哥一样，我做个赎罪羔羊，许多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了！”

“不会有私刑的！”妻子越发激昂地说。她那疲惫的目光里，满是开始重新需要酒精饮料的那种巨大的焦渴。无意中瞥见了我，那双眼睛便盯住我不再移开。“阿蜜，不会有私刑的，是吧？”

“不管怎么说，阿鹰作为这场想像的暴动的策划人，他一定想让想像力的火花一直灼灼放光，直到暴动结束。事情得依山脚村民能把暴动的想像力维持多久而定。这一点我还无法设想。”我对妻子说。她颇感失望，转过脸不再看我了。

“说得不错。”鹰四也觉出一点失望，他用那只未受伤的手抓起猎枪和霰弹箱，缓缓地站起身来。我发现他衰弱得要是被沉重的猎枪带倒在地就会立刻昏死过去。

“把枪递过来，我给你拿吧。”

鹰四凶恶地转身盯住我，眼睛里流露出一股敌意，回绝了我，仿佛是怕我要个花招，拿走他唯一的武器。一时间，我怀疑鹰四是不是已经发了疯。一种恐惧迅速地传遍了我的全身。然而，鹰四的目光却很快恢复了平静、疲惫和迟钝。

“跟我到仓房来吧。我睡觉之前，陪我一起呆一会儿，阿蜜。”他诚挚地恳求我道。

我们起身正要从屋里走向前院，妻子叫住鹰四，如同最后一次向他道别。

“阿鹰，你干吗不救自己呢？我看你真是在盼着被私刑处死，盼着死刑呢，阿鹰！”

鹰四依然板着异常惨白粗糙、满是血污的脸，一声不吭。看他的举动，分明他对妻子早已打不起任何兴趣。也没有确实的理由，可我却觉得妻子和我自己都遭到了惨败。我转脸看了看妻子，她仍然低垂着头，动也不动。她身边的少年，恰似一头中了毒箭的野兽，不自然地半欠着身子，在那里凝固了似的昏睡。在鹰四的暗示下，他竟这样快地进入安眠药发生作用的状态了。我一边盼望着把所有能让妻子挨过这最可怕的漫漫寒夜的威士忌藏匿起来，一边在檐灯微弱的灯光里，颤抖着跟在弟弟的后面。他也剧烈地颤抖着，踉踉跄跄往前走。在仓库那边，隐士阿义正发出小狗喷嚏般的声音。阿仁的住处一团漆黑，没有任何声响。那“日本第一肥婆”已经解脱了对食物的一切渴求，正沉浸在久违了六七年的甘甜梦乡之中。前院的泥泞已经冻得更硬，无法滞住我们的脚步。

鹰四穿着那血污狼藉的衣裤就一头钻到我的毛毯里面，他在毛毯里蜷起身子，像一条装在口袋里的蛇一样，把袜子脱将下来。而后，他重新把猎枪拉到自己的身边，似乎晕眩地抬头看看站着瞧他躺在床上的我，要我关上电灯。事实上，我也正满心希望这样做。他那铁青脏污的脸上，面颊和眼圈的肌肉都像老人一样没了弹性，比起我记忆中他的任何窘困时期都要丑陋不安。他全身缩在里面，却也只能把毛毯和被子顶起一小堆，显出分明的衰弱不堪，惹人怜悯。在新的黑暗深处，我一边等待着视网膜上鹰四仰面躺倒的残象全然消失，一边用星男的毛毯围起腰部，抱住膝盖。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吭声。

“你太太有时说得很对哩，阿蜜。”鹰四像要试探我一样妥协地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救自己。我真的盼着被私刑处死，盼着死刑呢，阿蜜。”

“是的，阿鹰，你是没有勇气从一开始就用自己的意志把一桩暴力犯罪构筑完成。可是，一旦事故和犯罪搅在了一起，你就像等了好久似的把自己勉勉强强地插进去，好让私刑或死刑最终降临到你的头上。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些。”

鹰四如同催着我继续讲话一样，喘着粗气默不作声。然而，我没有更多的话要对弟弟说了。心里异常寒冷抑郁。过了一会儿，鹰四道：

“阿蜜，明天你打算拦我？”

“那自然。只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效地阻止你这个自我毁灭的计划，你陷得那么深。”

“阿蜜，我有话想说。我想把真相告诉你。”鹰四仿佛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表达出了话里的含义，半带恍惚，羞怯犹豫地说。然而，他的话我已经听得十分透彻。

“我不想听。别跟我说！”我很想从自己同鹰四关于真相的谈话的回忆中逃遁出来，便急急地回绝道。

“阿蜜，听我说。”鹰四却更加急切地用一种焦渴的难听声音，挡住了我企图遁逃的念头。那深及内心的打击，早使他变得俯首屈膝，这重又给我极大的震动。“你听了，至少也能在我受私刑时来看看热闹，助个阵脚嘛。”

我只好死心，不再封他的口。于是仿佛在他嘴边想要一吐为快的话早被他宣泄完毕，而他则带着深深的悔恨拼命要全部收回却徒劳一场一样，他提前发出一声疲惫绝望的叹息，像是要越过，越过障碍似的开始说道：

“阿蜜，我们的妹妹为什么要自杀，我以前一直说我也不清楚。而且，伯父他们家也和我一样，宣称自杀的原因不明，这等于给我撑了腰，所以我才能掩盖了妹妹自杀的真正原因。

也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打算认真地把这原因从我嘴里打听出来。我就保持了沉默。只有一次在美国，我跟一个萍水相逢的黑人妓女讲过这事。是用夹夹生生的英语讲的。对我来说，用英语讲话就像戴上面具见人，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那次的坦白全是假的，对我简直是毫发无损。因此，我得到的报应也轻得很，只是一点轻微的性病罢了。我还从来没有用我、妹妹和你共有的语言说出来过。不用说，阿蜜，这些话我对你也没有讲过一点点。只是我觉得，关于妹妹的死，你似乎向我做过些暗示，这让我无法平静，所以你也可能有所怀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举个例子吧，在给我吃山鸡肉那天，你问我的真相是不是指妹妹的事，那时我还想，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了一切，故意嘲弄我呢。于是，我恼羞成怒，连杀了你的心都有。但我觉得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情，这才平静下来。妹妹自杀那天的早上，我去向伯父他们报信以前，先把我与妹妹合住的那个伯父家的房间前前后后搜了个遍，生怕妹妹写下了什么，惹人怀疑。当时，我有一种从痛苦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安全感，可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负罪感，这两种心理在我的思想里交织，弄得我又哭又笑。直到完全控制住自己不再大笑，我才去正房伯父他们那里，告诉他们妹妹自杀的消息。她是一大早喝了农药，就蹲在厕所里死掉的。确认她自杀后没留下任何遗书，使我有一种巨大的解脱感，这是因为我一直怕这白痴妹妹会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别人。妹妹一死，这秘密就被一举抹煞，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想到这一点，我真觉得放心。可是，事与愿违，现实根本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发展。相反，因为妹妹的死，这秘密便在我肉体和精神最深的中心扎下根来，开始从头到脚地毒害我的日常生活以及我对未来的展望。那还

是我高中三年级时的事，可打那时候起，我一直被这事的回忆撕裂了一样！”说到这儿，鹰四仿佛预感到对这声音的记忆会令我在后半生里为那使我难以存活、憋闷抑郁的“时间”的伏击而烦恼不尽，便黯然惨淡地啜泣起来，哭了好一会儿。

“妹妹虽是个白痴，可她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她只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听起音乐，她就会感到幸福。可要听到飞机的响声，或是汽车启动时的马达声，她耳朵里就像叫火烧了似的，直喊痛。我想，她那是真痛。不是有时候光是空气振动就能让玻璃碎裂么？所以，妹妹的耳朵里，必是有什么纤细的东西破碎了似的直疼。可以这么说，在伯父他们的村子里，还没有人像妹妹那样理解音乐，那样非有音乐不可呢。妹妹一点不丑，又干净得很。异乎寻常的干净。与过分的音乐嗜好一样，这也是她白痴的一个特点。伯父村里的那些青年，有的常在妹妹听音乐的时候来偷着看她。只要音乐一响，妹妹就仿佛全身只剩下了耳朵，其他的一切都被拦住，进不到她的意识里去。那些偷看她的人倒不会放肆，可只要看见他们，我就发疯一样地和他们打。对我来说，妹妹是唯一的女性，我必须把她保护好。其实，我和伯父村里的姑娘们完全有来往，甚至进了城里的高中，我还不和同年级的女生讲话呢。我围绕自己和妹妹编造了一种高贵种族的流浪故事，对曾祖父和他弟弟以后的自家家谱，有着非常夸张的骄傲。从同情的角度来看，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抵御寄于伯父篱下这种境遇中的自卑心理。我告诉妹妹，我们是被选定的两个特殊的人，所以，我们谁也不能，也不许对除了彼此之外的其他伙伴有什么好感。这样一来，有好多大人说我们俩，说那对兄妹一起睡觉之类的闲话！我就往说这话的人家里扔石头，报复他们。然而可以说，我反倒受了这

种闲话的暗示。那时我十七岁，正是个浑浑噩噩、盲目轻信的高中生，而且，我郁郁寡欢，又经不起这种暗示。那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一下子喝醉了。那天伯父家的秧全插完了，就在正房里把请来帮忙的村里人召到一起喝酒。我既然是个流浪的高贵种族，自然不会帮他们插秧，但那帮小伙子把我也叫过去喝酒，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酒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伯父见了，骂了我一顿，送我回屋去，开始那会儿，妹妹见我大醉的样子，觉得好玩，就笑。可是，上屋里醉成一团的村民乱唱狂舞，妹妹马上就给吓坏了。她捂住耳朵，像条鲍鱼似的伏下身子，也还是忍受不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呜咽起来。后来，醉汉们开始唱歌，他们哑着嗓子唱那些猥亵卑鄙的歌，一直唱到后半夜，我气急了，那是种狂暴的反社会情绪。我把妹妹抱在怀里想安慰她，可是这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亢奋。于是，我就和妹妹做爱了。”

我们都不说话。我们定定地躲在黑暗当中，屏住呼吸，仿佛要避开这血亲之间莫大的耻辱和昭然于世的莫大的恐怖。如果鹰四的话可以相信，那么他用石块砸那可怜的姑娘的脑袋时那垂死的姑娘喊叫的：讨厌，讨厌！也正是我想要喊出的话。可是，即使是这几句喊叫，在泪眼朦胧之中，也重得令我感到骨销肉散，在我酸痛的肉体里面挥之不去。

“第一次做爱时，酒醉一点也不能给我辩解。因为第二天，我在清醒时，也干了同样的事。”鹰四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他缓缓地讲下去，“开始妹妹对性交又讨厌又害怕。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对我拒绝。我不是没有觉到她忍受着痛苦，可欲望和恐惧叫我昏了头，我无法从她的角度着想。为了不让妹妹害怕，我就把伯父家收着的春画拿出来，对她说，结

婚以后人人都要这样做的。可我最担心的是我上学时妹妹一个人留在家里，把这个秘密告诉伯父家里人。于是，我就对她说，一旦别人知道兄妹之间做了这事，两个人就都要倒大霉的。还从辞典里找出中世纪火刑的插图给妹妹看。我还告诉她，只要不让人知道，我们就可以不与别人结婚，兄妹两个人干这事，在一起过一辈子。我们俩都衷心希望这样，所以我说，只要我们不让别人看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这样不也挺好。事实上，我就是这样考虑的。我相信，只要我和妹妹决心将来背离社会生活下去，那么我们总该有自由做我们热望的事情吧。从前妹妹似乎总是担心，如果什么时候我结了婚，她就只好一个人活下去了。而且我又告诉过她，妈妈在临死以前还说，让我们一起生活下去。妹妹模模糊糊地相信了：如果与我分开，她就无法再活下去。因此，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循循善诱、简单易懂地告诉她，我们要远离开一切别人，兄妹两个背离社会永远一同生活下去，她竟然能够理解和接受。于是，妹妹对做爱本是半推半就，现在却主动要求我干了。有段时间，可以说我们像一对幸福的恋人，过着异常完美的生活。至少在那以后，我从来没那样幸福过。只要妹妹心情平静，她就会勇敢无畏，从不沮丧。她还骄傲地说，要和我这样一起干下去，一直到死。但是……妹妹怀孕了，是伯母发现的，被伯母提醒过以后，我吓得都要发疯了。要是我与妹妹的性关系给人知道了，我相信我会立刻羞愧而死的。可是，伯母却丝毫不往我的身上怀疑，于是，我干了一件不可救药的卑劣的背叛勾当。我是个没有一丝一毫勇气的令人讨厌的阴谋家，妹妹那样正直，我配不上她。我要妹妹说，她是叫村里的哪个不知名的青年强奸了。妹妹照我的话做了。于是，伯父把妹妹带到城里，做了

堕胎手术还不算，又做了绝育手术。回到家里，妹妹因为做了手术，也因为城里潮水一样骇人的汽车马达声音，受了惊吓，整个给打垮了。可她勇敢地听了我的话，一直对我们之间的事情守口如瓶，尽管在城里的旅馆时，伯父逼她说出强奸她的青年的特征，还骂了妹妹一顿。妹妹可从来没有说过谎！”

说到这里，鹰四久久地呜咽起来。他像是最终也没有完全止住啜泣，啊！啊！呻吟了两声，讲起了他一生中最为可怕的经历。我恰似一条丑陋的干鱼一样缩成一团，忍住严寒和头痛，完全被动地听他讲下去。

“就是那天的晚上。妹妹吓得要死，没法平静，希望我帮一帮她，这该很自然吧。那时我们两人做爱已经习惯了，我是想通过这个得到点安慰。可是，即便像我当时那样只有错误性知识的人也知道在那种手术以后不能够马上性交。我害怕妹妹内里还受着伤的性器官，而且也还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不也是很正常的么？可这些常识，妹妹怎么知道。我刚一拒绝妹妹的请求，她突然变得固执起来。她钻到我的身边，硬要摸我的阴茎。于是，我打了她……妹妹平生第一次挨打……那种惊惶、悲切、孤立无援，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妹妹说，阿鹰哥，你撒谎，我没告诉别人，它也是坏事！第二天一早，妹妹就自杀了……阿鹰哥，你撒谎，我没告诉别人，它也是坏事。妹妹就是这样说的……”

山脚一片寂静，听不见半点声响。即便有什么声音，森林里重重的积雪，也会立即将它吸收得干干净净。那已经化成水的雪，重又被寒风吹冻。然而，在四周森林漆黑的高墙中间，分明有一种超越了人类听觉的尖厉叫喊在飞扬。那声音席卷着洼地上面的整个空间，如同一只庞大的怪物高声呼啸。还是孩

子时，有一个冬天，我觉到了这种人类的耳朵捕捉不到，却又能鲜明地感觉得到的叫声，第二天一早，我就在山脚下面那条小河清澈浅显的水底，找到一条庞大的蛇蝮的印痕。我很是害怕，或许那便是半夜里叫个不停的怪物的痕迹。现在，我又觉出了那种听不见的叫声带来的威压。我的眼睛已习惯了黑暗，借着玻璃窗上的微光，找出自己周围不甚分明的各种黑色形体。整个仓房里面，到处都挤着五百罗汉一样的侏儒。

“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在幻觉中，那些侏儒在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我不禁无法抑制地咳了起来，仿佛从咽喉到气管和肺部所有粘膜全都长满了红色的疹粒。我在发烧。所以我的全身才会觉得骨肉解体，散了架一般，疼得要死。好容易我止住了咳嗽恢复了平静时，鹰四看上去也从扎根于灵魂深处的衰弱中恢复了一些。于是，他带着一种毫不设防的自我安慰，朝着我叫道：

“阿蜜，你要是不拦我，就算明天我逃过了私刑，也肯定要判死刑的。把我处了私刑也好，判了死刑也好，反正你把我的眼睛拿去，用那视网膜给你的眼睛做个手术吧。那样的话，我死后，至少我的眼球还能活着看各种事物啊。就算不过当了个透镜，可我的心也就踏实了！阿蜜，就听我的吧！”

我如同被劈雷击穿一样，在意识里突然有一种无法驾驭和排斥的火，从头直烧到脚。林中的呼啸和仓房里所有黑色的侏儒幻影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不，我才不用你的眼睛呢。”我的声音气得发抖，强硬地说。

“那为什么，为什么呀？你干吗不肯接受我的眼睛？”鹰四问道。他的话里已经没有那种自我安慰，倒是充满绝望的疑

惑，听起来可怜兮兮的。“阿蜜，因为妹妹的事，你这样恨我？可是，你只知道妹妹小时候的事啊。在我住在别人家，和妹妹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人在这山脚，让阿仁帮着过日子？你还不是用留给我们的钱，上城里的高中，上东京的大学？要是你不把这些钱一个人霸占，我们三个人本可以在山脚一起生活啊。阿蜜，你没有资格为妹妹的事谴责我。我把妹妹的事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可不是要你来品头论足的！”

“我也没这样说！”我将鹰四越发猛烈激昂的话拦腰截断，朝着他叫道，“即便从感情上讲，我也不想接受你的眼睛，可是更实际地说，我看倒是这样：明天早晨，你不会叫人私刑处死，将来，你也不会被法庭判处死刑。你只是希望成就这一种狂暴惨烈的死亡，用自我处罚偿付乱伦和它造成的无辜者的死亡带给你的负疚感，让山脚的人们记得这个‘亡灵’，这个暴徒。实现了这个幻想，你就真正可以将撕裂开来的自我重新统一在肉体里，然后死去。而且，人们还有可能把你看成你所崇拜的曾祖父的弟弟百年以后的转世。可是阿鹰，你一次次地睥睨危机，然而到头来，你却总不免给自己留下后路临阵脱逃。妹妹自杀了，你却不思惩罚，不觉羞耻，厚颜无耻若无其事地苟延残喘，可见这真是你的天性。这次你也肯定会耍个什么卑劣手段，继续苟延残喘下去的。这样丑陋地偷生以后，你会向死去的妹妹的幻影辩解说，那时你曾积极地选择了私刑、死刑之类的惩罚，特意走进了穷途，可是因为别人多嘴，你只好偷生下来了。这是你惯用的手法。即便是在美国的暴力体验，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我放弃，是事先策划好试图从痛苦的回忆中暂时解脱出来的、继续苟延残喘的口实。而今你只是因为得上了下贱的性病，想来你算是又有了一点自我辩解的余地，可

以让你说，顶好是不在美国再一次冒险。现在你的这些卑鄙的坦白也是一样，如果我说，不啊，你讲的绝对不是真的，绝对不是一旦开口就得被人杀、自杀，或是变成个疯狂的反人类的怪物这样的真相，如果我这样保护你，你不就立刻又得救了？就算是无意识的吧，然而你这样向着我喋喋不休，难道不是期待我把过去的那些经历连带着现在的你一同接受下来，让你撕裂的状态一举得到解脱？比如说，明天早晨，站在山脚下别人的面前，难道你还有勇气把妹妹的事重新坦白一次么？这正是需要一种危险的勇气，然而，你没有吧。纵然在意识里面你不会承认，但是你还是预测，你总会顺利地逃过私刑的。审判一旦开始，你就会带着一种连自己都能骗得过的诚意，大叫一声：'判我死刑吧！'而实际上，你不过是在单人牢房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直到科学的鉴定确认，该案仅仅属于事故以后的尸体损毁。你说什么，在你死后取走你的眼睛吧，别装出一副相信自己死到临头的样子吧，别再哄骗我了，我其实是个连死人眼睛都要的人。别来嘲笑这样的残疾人！"

在黑暗中，鹰四分明是很艰难地抬起了上身，把猎枪立在膝上，手搭扳机，将枪口转向我这边来。那时候，我一直感到，怕要叫弟弟开枪打死了，可占据我心灵的并不是弟弟突然间滥施强暴的罪犯形象，而是对他一再到危险的罗网里面预备生路、苟延残喘的做法产生的一种深切的蔑视。我全然没有畏缩。见到那支枪和弟弟小小的黑脑袋在猛烈的呼吸下面晃个不停，我丝毫不觉得恐惧。

"阿蜜，你干吗这样恨我？干吗总是对我这样憎恶？"鹰四一边想要透过黑暗急不可耐地窥见我的表情，一边软软地叹息般诘问道，"阿蜜，你别是在知道了我对妹妹和你妻子干的

事以前便憎恶我了吧?”

“憎恶?这不是个我如何感觉的问题，阿鹰。我只想谈一个客观的判断。像你这种喜欢一辈子屈从于戏剧性幻象的人，要是不发起疯来，那种危险的紧张情绪是不能持久的。想一想大哥，在战场上或许他真是一个暴徒，可他一旦活着复员回家，却立刻把这些忘得干干净净，轻松愉快地在日常生活里恢复了沉稳的本性。否则，大战结束以后，暴力罪犯会在世界上泛滥成灾的。曾祖父的弟弟，你最信得过他吧，他领导暴动，大肆杀戮，可最后，他的同志们横遭屠戮，他只身越过森林，流亡在外。你一定以为在这以后，他会投身于新的危险环境，继续横暴不仁，以使他自己这个暴徒正当化?可是你错了。我读过他写的信。他已经不再做一个暴徒，甚至在思想上也已经不再立志去领导暴动。他也没干过什么自我惩罚的事，他只是忘却了暴动的经历，在平凡的市民生活中度过了晚年。为了让心爱的侄子免除兵役，他用尽了纤细的心思。努力没有奏效，侄子被迫去威海卫打仗，生死未卜，他又痛苦地牵挂劳神。这位过去的暴动领袖，已经安然地死在了榻榻米上。其实，他也成不了什么‘亡灵’，只是像头羊一样悄然死掉罢了。阿鹰，明天一早，你也别等什么私刑处死了，去到山脚治一治手指的伤，让他们把你抓起来，判个缓刑或者三年左右的徒刑，而后，就做个纯粹的正常生活者，回到社会里来吧。除此之外的一切幻想，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你并不完全相信它。你已经不是让这种英雄主义的幻想搅得热血沸腾的年龄了，阿鹰。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在黑暗当中独自站起身，用脚试着踏板的位置，慢慢走下台阶。鹰四在身后重又满怀抑郁地喊叫起来，我觉得这一次

恐怕他真要打死我了。然而，我还是不曾感觉到别人的暴力带给我的恐惧，只是感到心中厌恶的灼热和遍体的疼痛，让我无法忍受。

“阿蜜，你干吗这样恨我？干吗总是对我这样憎恶？我们可是根所家仅存的两个兄弟呀！”

在正房里，妻子正像朝鲜传说中的那种吃人女妖一样两眼充血，茫然地呆视前方，只顾喝威士忌。拉门打开着，星男趴在桃子的身边沉沉睡着，活像一条累死的狗。我坐进妻子的视野里，从她两膝中间抓起酒瓶，灌下去一口并开始大咳起来。然而，妻子却毫不注意我的存在，径自在酣醉的汹涌波涛上面飘荡。我发现，妻子那漆黑充血的眼里泪如泉涌，一直流到枯干的面颊上去。不一会儿，仓房里传出了一声枪响，那砰然的回声直飞到黄夜的深林中间。我光着脚跑到前院，这时，第二声枪声又响了起来。隐士阿义从仓库里跳将出来，慌手慌脚地寻路逃跑，几乎和我撞个满怀，我们面面相觑。我站在台阶的入口，向现在是灯火通明的二楼喊叫起来。

“是我开枪，阿蜜。明天早晨，要和我那群充满想像力的暴民打仗啊，我想看一下各种霰弹的杀伤力和扩散方式。”鹰四冷静地回答。看来在心理上，他已经重新武装了起来。

回正房时，我告诉默然站到前院里的阿仁的儿子们，什么事也没有出。妻子则仿佛没听到枪声，也没看见我跑出去，只顾低下蜡黄的脸，一遍一遍地盯着自己被威士忌和水弄黑的杯子。星男和桃子难受地动了一下，又继续睡过去。过了半小时，又响起了一声枪响。我用了足足十分钟等第四声枪声，然后，我把脏兮兮的双脚插进靴子，奔向仓房，在台阶下，我呼喊鹰四，但他没有回答。

我磕头碰脑地一直跑上楼去。一个男人半靠着房间的正面墙壁，躺在地上。他的头部和裸露的胸部已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仿佛抛上了无数殷红的石榴子。一眼看去，他活像一具只穿了裤子的红色等身石膏大模型。我不禁走上前去，却被绑在榉木大梁上的猎枪正正地撞着了耳朵。那红色石膏模型的手指垂到榻榻米上，一根尼龙绳，从他的手指直连到猎枪的扳机。在这死人站起身时正对准枪口的高度，有人用红铅笔在墙壁和支撑架上画了个人头和肩膀的轮廓，那头部里只有两只大眼睛画得格外用心。我再走近一步，脚底下便能感觉到是踩着霰弹和血糊，我看见描画的两只眼睛被霰弹打得一团糟，那凹处已叫铅粒打出了许多洞眼。人头轮廓旁边的墙壁，仍是用红铅笔写道：

我说出了真相

那死人还在沉重地呻吟不止。我在血泊里跪下来，摸一摸鹰四伤痕累累的血脸——他真的死掉了。一时间，我竟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在这间仓房里，我与这死人，曾经见过许多次。

十三、复 审

阴湿沉重的空气打着旋儿整夜吹进森林的洼地，在地下室不断激起小小的漩涡。我蹲踞在这里，从倏忽凄苦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只觉得喉咙肿得老高，隐隐作痛。然而，醉意已经消退，满脑子全是昏睡之前的灼热胀大，以及无孔不入的悲哀消沉。脑海里是一片分明，几乎清晰到了可悲的程度。在梦里，防卫本能还在行动：我的一只手兀自抓着从肩膀围住身体的那条毛毯，另一只手则伸向膝盖对面的黑暗，想把那瓶搀水的威士忌拿过来喝上一口。肺部和抑郁的肝脏，都给我一种冷水浸泡过的感觉。梦中，鹰四的上半身石榴一样皮开肉绽，活像一尊红色的石膏人像，他双眼灼灼，满眼是闪亮的霰弹，恰似一个铁眼怪人，伫立在我的右前方五米处的大雾之中。另外一处，站立着一个满脸土色、苍老佝偻的男人，与我跟弟弟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他正一声不响地盯着我们。我身体蜷缩着蹲在那儿，把头埋在膝盖下面，从我的角度看去，他们两人仿佛高踞于舞台之上。原来这是一个剧场，房间很小，天棚却高得惊人，我坐在头排的中央，陪伴着舞台上的两个亡灵。台上的一面镜子，正把最后面的高台楼座照了个分明：在两人头上高高的暗处，一群老人戴着高帽，穿着黑衣，像泥沼里的一堆蘑

菇一样，俯瞰着下边的我们。我那满脸涂得通红、自缢而死的友人，还有植物一般毫无反应的婴儿，他们俨然也转世做了老人，加入了他们的一伙。

“对我们的复审就是对你的审判！”鹰四在舞台上大张着嘴，带着憎恶叫道。他的嘴唇早不见了肌肉，只剩了个黑红色的大窟窿。

于是，高台楼座的老人们（他们大概是鹰四召集的陪审员吧）脱下帽子，转脸朝向头顶的榉木大梁，意味深长地摇晃着那房梁吓唬我。我便在一阵衰弱的绝望中惊醒过来。

去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我曾在后院那个准备安放净水池的坑里，两手抱膝，呆了很长时间。现在，我同是用这样的姿势，久久地坐着。这是个石造的房间，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下属来调查仓房的拆除事宜时发现了它，就让人们住在这里面。邻近我住的里间，外面附有一间厕所，还有一眼井，显然，这里适合一个人过自我封闭的生活，只是那眼井已经坍塌，打不出水来，厕所也因为侧墙剥落，被人关掉了。这两间方形的洞穴里弥漫着无数霉菌的异味，说不定这里还有盘尼西林霉菌呢。而今，我坐在这里，嚼熏肉三明治，饮威士忌，不时还坐着睡上一觉。要是我在睡梦中躺倒下去，埋在地下室里的那些树木般密匝匝的撑柱一定会把我的脑袋撞伤。它们依然是棱角锋利、坚硬无比。

还是半夜。超级市场的天皇自“暴动”以来第一次亲临山脚。从今天一早这个情报传出开始，第一场南风已经吹进了森林和洼地，并且呼啸着直吹到深夜，预示了冬天的结束。本想透过头上地板的裂缝看一下仓房一楼洞穿的墙壁外面的空间，可那乌黑的森林却遮住了我的视线。到了早晨，天空万里无

云，可大陆刮来的尘埃形成了一片黄褐色的浓重阴霾，在天空里盘踞不散，使日光变得稀薄晦暗。风刮得更加猛烈，直到夜幕降临，那天空仍然是灰蒙蒙一片。森林随着越发强劲的风势，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从底里迸发出轰鸣，让人觉得森林中的大地也在鸣叫不已。突然间，林海的每个方向都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犹如涌起的水泡。在森林和山脚之间，有几棵高高的大树，它们曾与我童年的回忆紧密相连。而今，它们依然耸立，在狂风中发出人吼一般独特的叫声。听到这种叫声，我又想起了过去的这片树丛。正如童年时至多约略交谈过一两次、却绝对无法忘怀的那些山脚老人，这片乔木丛，纵然我不曾有复杂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充满个性的“面孔”却唤回了我的记忆。那酱油店的老店员，从前我绝不曾同他搭话，我在山脚的生活圈子也与他全然不同。在酱油酿造库旁边通往河边的路上，我不小心打着了他，他便抓住我反剪起双手，把对我母亲的疯癫的卑下而激烈的嘲讽，劈头灌进我同样狂怒然而却软弱乏力的耳畔。我还记得那老人硕大的脑袋活像大红狗。而今，这令我想起对面山坡上的老椋树。这些椋树面对狂风高喊，这一印象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到早晨，风势已经开始减弱。我仍然躺在微明的炉边，谛听乔木丛在风中的呻吟。我想，在离开洼地以前，总该去看一下那些树吧，于是就又昏昏沉沉地陷入了沉思。一旦离开洼地便绝无机会再见到它们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在最后与它们道别时，自己的眼力是何等的迷离，同时，我又分明地感到，那伺视着我的死亡实在已经不远。我想到的是两封信，它们分别来自东京一所大学过去的一位主任教授，以及为筹建自然动物保护公园而派往非洲的动物采集队的办事处，信中都说给我准

备了新的工作。教授说，他曾给我和我那缢死的友人争得了两所私立大学英文讲师的工作，现在他愿意提供给我。接受这项工作，前途是较为安定的。至于访非动物采集队办事处的那封信，则缘于一位与S哥年纪相仿的学者，他为组建动物公园不惜辞去了动物学培训班副教授的职务。我翻译的动物采集记曾被他在一份大报的书评栏里大加赞赏了一番，现在他急如星火地要召我就职。我曾与这位学者见过几次。在我的眼里，他活像一位翻沉在即，乘客鼠窜的船上临危受命、初出茅庐的船长。他邀请我以访非动物采集队翻译负责人的身份随队旅行。就第一封信来说，友人死时，我与自己母校的研究室不辞而别，放弃了那里的讲师职位，所以对我来说，这第一封信不啻是重操旧业的最后一次机会。另一方面，鹰四既变卖了房产和土地，又未给我留下钱，那么可以肯定，我迟早非得选定一个职业不可。毋宁说，讲师的职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我一直犹豫不决。妻子是从对方的催促电报上知道这两件事的，也便再不同我谈起新职位了。

“要是你喜欢去非洲，就去好了，阿蜜。”听了她这轻松的话，我立刻预感到这新工作会有大量令人不快的困难，随即把她顶了回去。

“做翻译负责人？那可不光管些文件，还免不了要指挥土著的力工和建筑工人吧。我用我会的那点儿可怜的斯瓦希里语叫：‘快走！快走！’”我一面有气无力地说话，一面郁郁地幻想：那非洲的树木坚如钢铁，岩石硬过钻石，它们让我血流如注，再染上重度疟疾。于是，我发着高烧，疲惫地横躺在潮湿的地上，对不屈不挠的动物学家的激励深恶痛绝，还得用斯瓦希里语大叫：明天就得出发！

“可是，比起在大学里教英语，这或许能让你发现一种新生活呢，阿蜜。”

“若是阿鹰的话，他准会马上就去，并且能得到一种新生活。阿桃说，阿鹰还特意把人道主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到非洲捕象的人身上。一旦所有城市的动物园叫核战争毁灭干净，最先去非洲腹地抓象的那个人，恐怕就是阿鹰幻想的人类先生吧！”

“真的，换了阿鹰，他倒会马上把这个工作接下来的。这样看来，阿蜜，像你这种人，遇到一种可能需要冒险一试的工作，真的连积极点儿的选择都做不来，只好等人家接受那份工作，克服了危险，消除了疲劳，写出书来，由你翻译，这才是你的工作吧！”

妻子兀自把对局外人品头论足的冷静观察力发挥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听了她的话，我觉得很沮丧：没准儿真是这样呢。我要放弃自己的新生活和草庐，去选择哪个学生也不想听、若不是隔几周停一次课就会遭学生痛恨的英文课讲师！而且和鹰四在纽约见过的那个研究杜威门徒们的学问家一样孑然一身（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把婚姻继续下去了），满身脏污，被学生冠以“耗子”的绰号受到嘲弄。我就要开始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去面对衰老和死亡了。

鹰四在自杀时，把口袋里剩下的纸币和硬币全部放在了一个信封里。他把信封收进桌子的抽屉，怕自己的血弄脏它，还写明留给星男和桃子。鹰四的葬礼一过（把他葬入我家墓地的最后一块空地时，S哥的遗骨也一并入了葬），星男就拒绝了山脚青年们的帮助，独自开起那辆雪铁龙，让桃子坐在助手席上，径自沿着泥泞的道路，小心翼翼地向便桥的对面开走了。

临行之前，星男向我和妻子饯行，桃子站在他的身边，一片柔顺恬静，不断点着头附和着星男。

“阿鹰不在了，我只好和阿桃两个人生活下去了。我要和阿桃结婚。我们俩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吧？我想到哪儿找个汽车修理厂，阿桃可以到咖啡店做招待，我们俩会生活下去的。以后，我还想开个加油站呢，大故障也能排除，还能提供吃饭的地方。阿鹰在美国见过这种加油站，劝我也开这么一个。现在阿鹰死了，要是我和阿桃不一起干的话，我们就靠不上别人了！”

我和妻子没有搭乘他们的雪铁龙离开洼地到海滨小城。说起来，那时我正在感冒发烧，整整三个星期，手心上如同长了一层热乎乎、软塌塌的海绵，疲乏得连张纸怕都拿不起来。等我恢复了健康，妻子却已经受不了长时间的旅行了。实际上，她经常感觉到恶心和贫血。我自然猜出了她在心理上准备、在肉体上期待的东西。然而，我已无意与她谈这件事了。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妻子来说，这都关系到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于是，在我陷入了对新职位的思虑之时，妻子像脚上系着重锤的木偶一般呆呆地坐在炉旁，在晦暗之中，除了妻子和我之外，在正房里，再也没有人能和我们讲上几句话了。这些天，妻子也会常常突然落进深深的沉默里，从与我对话的圈子里逃得远远的，对我的话睬也不睬。鹰四死后，妻子一时间重新陷入了酩酊大醉之中。然而没过多久，她却自己努力把剩下的酒瓶全都收拾到了世田和去了，然后，除了吃饭睡觉，她便正襟危坐，双手护住小腹，眼睛半开半闭，一声不响地挨时度日。妻子倒是劝过我去非洲，可那也不过是对一个陌生人的选择所进行的一种客观评价罢了。而今，在妻子的意识当中，我

已经引不起任何鲜明的印象。诚然，在我的意识里妻子的形象也全然相同。

下午，阿仁的大儿子躲着默不作声的妻子，悄悄站到土间里来。他报告道：

“超级市场的天皇，带着五个小伙子，走到桥这边来了!”

山脚的村民全然没有想到，超级市场的天皇竟会带一群暴徒闯进山脚。还在积雪初融的时候，那超级市场的天皇便通过他的代理人，把“暴动”引发的一切复杂问题用最为简洁的方式解决掉了。他让最先开到山脚的大卡车装满货物，把市场重新运营了起来。至于遭抢的商品，他不要求赔偿，也未向警察报告。而年轻的住持和海胆一样的青年所推进的那项由山脚富人共同出资连带损失一同收买超级市场的计划则被一脚踢开了。还有传言说，还没有正式地向超级市场的天皇提出过这项要求。鹰四刚死，推进“暴动’的中坚力量便已经土崩瓦解。而今，任何能够再度掀起“暴动”、迫使超级市场天皇甘拜下风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山脚的主妇，“乡下”的众人，都对天皇不追回抢掠品的决定感激涕零、心满意足，尽管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价格比“暴动”之前足足上涨了两三倍，她们却都毫无怨言，照买不误。至于抢得的电器之类的大件物品，已陆续有人偷偷送回超级市场去了，其中有所损坏的物品以特价出售，也立刻被抢购一空。那些在“暴动”中抢走了廉价衣料的“乡下”女人们实际上拥有庞大的现金，可谓潜在购买层，这些女人对这一场特价销售格外踊跃。山林地主们隔岸观火，安心安神，重又缩回到了利己自私的外壳中。

狂风卷起裸露田野上厚厚的尘埃，吹得人眼睛发疼。我跟着阿仁的儿子，赶往山脚那边去。积雪已经消融，地面一片干

爽，且不说暗褐色的枯草地，甚至落叶乔木林对面的那一片暗暗的常绿树林高处，那催发萌芽的力量都带了一种欠缺，如同破损的人体一般。环视洼地，令我觉得一阵微微的畏缩。阿仁的儿子正走在我的前面。低头看去，他的脖子脏得很，现出了斑驳的花纹。这少年原来是窥伺超级市场天皇来山谷的哨兵哩。他顶着把尘土扬起老高的狂风，就蹲在那个可怜的性感小妞送了命的那块大石头上，久久地盯视着桥的那边。从他那埋头赶路的背影上可以看出，他正承受着不应该是小孩子承受的巨大疲劳。我想，这便是屈服了的人们的共同感觉。现在，山脚的所有村民正要去恭迎超级市场天皇及其属下，他们做出的一定是与他同样的表情。洼地已经屈服了。

这少年如此热心地放哨，是因为我去山脚的目的与他母亲有关系。他的母亲几乎不吃东西，正开始迅速消瘦下去，而我去山脚正是为了和超级市场天皇会面。如若不然，他今天恐怕不会为我做什么事情。鹰四的死，使得我重新与洼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隔绝了开来。现在，山脚的孩子们竟然不会嘲笑我了呢。

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我立刻便把超级市场的天皇一行人认出来了。他们正经过超级市场，在石板路上走着呢。超级市场的天皇是个大块头，黑色外套长达脚跟，下摆甩来甩去，正迈着军人一样正规的步伐走将过来。他的那张圆脸上扣了顶大口袋似的鸭舌帽，离得很远，也看得出他脸上气色不错，肌肉丰满。身前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也一律膀大腰圆，大步流星地走着。他们穿着粗劣的外套，光着脑袋，学着头儿的模样，挺胸昂头地只管径直往前走。一时间，我清楚地记起了占领军坐着吉普车第一次开进山脚那天的情形。超级市场天皇的一群

人马，与那个夏日的清晨沉稳地炫示胜利的外国人何其相似啊。那天早晨，山脚的大人们第一次亲眼认证了国家的战败，他们无法习惯被占领的感觉，故意不理睬外国的大兵，只顾忙于自己日常的劳作。然而那“耻辱”，却已经渗入了他们整个的身体当中。只有孩子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情况，他们跟在吉普车后面疯跑，在国民学校接受临教育时“哈啰、哈啰”地叫个不停，也不惮于把外国兵递来的罐头饼干接到手中。

今天，在石板路上倒霉遇见超级市场天皇一行的大人们，也是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干脆背过脸去，活像一群一心找个窟窿爬进去的耻辱难当的螃蟹。“暴动”那天，他们直面这“耻辱”，于是才获得了一种破坏力量，彼此团结在一起了。而今，山脚的村民已经屈服，他们对这“耻辱”懊恼不已，这再也无法成为仇恨迸发的契机。这“耻辱”现在变得阴湿可厌，疲弱无力。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属下，便是踩着山脚村民“耻辱”的踏石，傲然显示着威风。那个不穿衬衫、只穿件晨礼服的阴惨“亡灵”，与现实的超级市场天皇反差竟如此巨大，这使我徒然地幻想，真该让那个扮成“亡灵”的山脚青年来迎候正走在石板路上的超级市场天皇。于是，我自己几乎也骤然觉得了那尖锐的“羞耻”。山脚的那群孩子远远跟随着这一队人，然而他们也全都默不作声，仿佛森林高处打着旋儿怪叫着冲将下来的狂风摄走了他们的精神。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一样，他们虽然一定能最先适应山脚下的新情况，可是他们也曾经投身于“暴动”当中。因此，他们童稚的头脑所能包容的“耻辱”，一定同样令他们懊恼难言。

超级市场天皇很快把目光投到我的这边来。想来这是因为我是山脚唯一一个毫无惧色地直面着他的人吧。超级市场天

皇，在那群长相明显与他同种同族的青年的簇拥下，迎着我站住。他丰满的脸上，一双悠然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眉头皱着，仿佛只是要表示集中了注意力。他一声不响，下属们也都一声不响地盯视着我，嘴里吐出粗重的白气。

“我姓根所。我就是和你做过交易的那个鹰四的哥哥。”我讲话的声音嘶哑，这绝对非我所愿。

“我嘛，叫白升基。”超级市场的天皇说，“就是白色的升再加个基础的基。令弟的事，真够遗憾的。我很痛心，他真是个独特的青年呢！”

我不禁带着感动和疑惑，端详着白先生定定地盯住我的那一双忧伤的眼睛，以及那从上到下肌肉饱绽、神采奕奕的脸。鹰四从没与我和妻子讲起过这超级市场天皇到底是怎样的人，而通过装扮超级市场天皇卑微的“亡灵”，他不仅把我们，也把山脚的村民诓骗了一场。其实，他对这朝鲜人倒是印象很深，也许还要朝着他说，你真是个独特的人！眼下，超级市场的天皇也用上同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他这是在暗中对死去的鹰四给他的称赞所做的回报。这白先生眉毛粗重，鼻梁挺直，潮红的薄嘴唇纤细得像女人，耳朵鲜嫩得如同鲜草。他的整个脸，都洋溢着青春的生机。见我默默地打量着他，他纯真善良地泛出一阵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

“我这次来，是有事要求您的。”

“我正要到仓房去看看呢。算是吊唁一下令弟吧！”白先生皱着眉头，只顾微笑。

“那间独间儿，就是这孩子一家住的。现在他妈妈病了，先生能不能缓一缓再让他们从独间儿里搬出来？”

“病人入夏之前就一天天地瘦下去，怕是就要死了啊！”

阿仁的儿子补充着我的解释，“吃罐头把肝也吃坏了，瘦得没有从前的一半大呢！现在，她什么也不吃了！怕是活不长了！”

白先生收起微笑，注意地观察阿仁的儿子。少年不像我是个外来户，在山脚呆不长久。于是，他一改与我讲话时的那种社交口吻，对少年表现出一种道地的关心。然而，他立刻像责备自己似的皱了皱眉，重新换上了一丝宽宏的微笑。

“要是碍不着拆除仓房和搬迁的话，独间儿的人就先住下去好了。施工的时候，麻烦怕是少不了的，你们只好多克服点了。”说到这里，那白先生稍稍停了一下，像是要阿仁的儿子记得清楚些。然后接着说：“可仓房的施工结束以后，要是你们还想留下，我可不给你们动迁费的！”

听了这话，阿仁的儿子怒火顿生，像公鸡一样昂着头，转身跑走了。他心里恐怕又想与超级市场天皇干上一场了。我没有反驳白先生的话，阿仁儿子的背影便是在向我炫示最后一点友谊的结束吧。

“仓房的一部分墙壁已经坏了，得察看一下拆除的事。”白先生和我一起目送着少年远去，一面道，“我带来了几个建筑系的学生。”

我们一同走上去仓房的石板路。那几个学生身板壮得像摔跤选手，脑袋硬得像炮弹，满脸雀斑，一声不响，甚至不曾彼此窃窃私语。走进前院，白先生道：

“仓房里要是还有什么重要物品，请搬出来。”

我纯粹形式地把约翰·万次郎留下的那个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扇面拿了出来。一个小伙子把扛在肩上的麻袋里面的工具往仓房前面的地上一倒，看热闹的孩子们立刻往后闪开，仿佛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武器。刚一开始，青年们卸下房门，把屋里

草席之类的东西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神情举止近乎虔敬。然而干到一半儿，白先生用朝鲜语下达了命令以后，他们的作派中便立即充满了破坏性作业的气氛。他们砸坍了一楼面朝山脚那边的墙壁，弄得这百年老墙墙基的干土和烂掉的椽头板条飞扬起来，落到旁边山脚的孩子和我的头上。他们轮番挥着榔头，毫不留意拆除了仓房的支架和墙壁后的平衡问题。白先生全然不顾扬起的灰尘，兀立着指挥他们，对这些问题他也是不屑一顾。我觉得，这对山脚村民来说无异于一次使用暴力的积极挑战。这仓房的墙壁，是山脚现存的日常生活最为古老的表现，而今它叫白先生这伙人用榔头破坏无遗。在我的眼里，他们毋宁是在炫示：如果愿意，他们尽可以把山脚村民整个的生活破坏干净。孩子们屏住呼吸盯着他们干活，也分明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大人们，尽管尘土像洪水一样涌向山脚，他们竟没有人过来提一点抗议。这百年高龄的仓房摇摇欲坠，房顶上依然残留着瓦片，可墙却已被掏空，那残垣断壁显然无法负重，仿佛一阵狂风就足以将它吹塌。我突然觉出了一种不安。我怀疑白先生甚至无意将仓房的房梁等重木结构运到城里再建房子，他只是为了在山脚的村民面前拆房取乐，才把仓房买下来的。过了不久，面朝山脚那边墙壁的三分之一，便从天棚到地板统统给拆除了，那一堆风吹不掉的墙土，也用铁锹给清理得一干二净。我站在白先生身后，和孩子们一起盯着那照得通明耀眼的仓房内部。我觉得，它简直像朝向山脚的一部舞台布景。这种印象，很快就在我的梦里获得再生。它显得异常狭窄，整个内部歪斜不堪，却分外鲜明。业已消失的百年来微明的印象连同对僵直地躺在房里的S哥的记忆，如今都已经淡漠下去。那拆去的墙面，竟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展现了一幅山脚远

眺的画面：那是鹰四教山脚的青年训练足球的操场，以及积雪消融之后重现冬日旱情的褐色河床。

“没有铁棒么?”白先生同那帮刚干完活的建筑系学生用朝鲜语讲完话，便朝我走了过来，逼得围观的孩子们怯怯地向后退。他粘着灰尘的眉宇依然皱着，同时露出了一个微笑。“我想把地板拆下一点，看看地下室的情况。这种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是石头铺的，要运出来还得加人手呢。”

“哪儿有什么地下室?”

“地板修得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地下室嘛。”一个脸色苍白的建筑系学生肯定地说。他一下打消了我的自信。

于是，我带着他去仓库，取些山脚人倾巢出动修理石板路时用过的修路铁棒。在仓库的门口，还放着一堆鹰嘴样的武器。那是鹰四自杀后的第二天早晨，离他而去的少年们扔到前院被我拾起来堆在这里的。我们从仓库的地板下面，把生满红锈的铁棒拽将出来。直到这时，我仍不相信会有地下室，便和白先生一起站在仓房的门口，看那伙青年把地板撬下来。那地板已经朽腐不堪，很快就破裂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人为躲开新腾起的灰尘，只好把身体转来转去。突然，一股潮湿纤细的黑灰，犹如水下摄影的电影里乌贼的墨汁喷出了墨囊一样，登时从仓房里面涌将出来，朝着我们缓缓地移动。就在我们躲闪不迭的时候，青年们还在继续撬动地板裂缝，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过了一会儿，等灰尘散尽，我和白先生走进仓房的时候，看见从门口横框到房里的地板已经开出了一长条裂缝，缝里面露出了黑暗的空间。一个青年带着天真的微笑，从里面探出头来，明快地用朝鲜语向白先生喊着什么，还把一张朽黄的书籍封面递给了他。

"他说，地板底下真是一个挺不错的石砌仓室！你真的不知道?"白先生兴高采烈地说，"说是有好多立柱，简直转不过身来。可是里屋外屋都是通着的，外屋还有便所和井哩。他还说，这样的书籍废纸堆了不少呢。难道这里住过什么疯子或者逃兵不成?"

我从他拿的那张污损的书籍封面上看到《三醉人经论问答大全》和东京集成社发行的字样。我茫然失措，顿感自己在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飘摇沉浮。这冲击使我的内心扭曲失衡，而且迅速扩大，随即化成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直接关涉着眼下在地下室里过夜的我脑海里的一切。

"石墙那边开了几个窗子照明用，可从外边看不见。"白先生把钻到地板下面的另一个青年的话翻译给我听。"不想下去看一看?"

那分明具体起来的启示令我心旌摇动。我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启示的中心，便是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之后，并没有丢开同志，穿过森林跑到新世界去。这个发现，立刻变得铁证如山。他没能阻止同志们惨遭屠戮的悲剧，却自行惩罚了自身。从暴动溃败的那一天起，他便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消极的姿态，却矢志不渝地终其一生，保持他一贯的暴动领袖身份。他遗留下来的那几封信，想来一定是他在地下室里耽读之余，追思自己青年时期冒险的幻想和现实凄苦的梦境，想像在别处生活时可能会寄出这样的信件，才把它们写下来交给来地下室送饭的人们。在地下室发现的那页书籍的封面，正表明了曾祖父的弟弟在信中所引有关宪法文章的出处。所有的信札都没有注明发信地点，是因为信札的作者就在这地下室里，他不曾离开这里半步。同样，曾祖

父与他的联系，想来也是全靠书信进行的。在地下室里，他只能够熟读送进去的书报，他把自己幽闭起来，只能展开想像的翅膀，编出些横滨报上的赴美留学广告、小笠原岛附近的捕鲸作业之类的故事来打发日子。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一旦涉及现实问题，哪怕是确认一下他藏身之处的近旁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事情，都是艰难至极。在地下室里，他徒然地竖起耳朵，企图了解一些情况，对于那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的侄子，他又急切地耽心其在战场上的安危，于是才会在与地面的联系信札里写上："乞复帖速告其安否借贴有达乞速致仆以观焉。"

这些水落石出的新情况令我头热脑涨。我正要转身回正房，白先生却突然谈起1945年夏天的事情来。他一定是以为，如果单单是因为找到地下室而紧张兮兮，则未免过于沉重偏激，所以才一面窥察我沉默和紧张的缘由，一面想重新拉起话来的吧。

"关于令兄复员后在部落里死掉那件事，好像还闹不清楚是我们杀了他，还是日本人杀了他。两方的人乱成一团，拿棒子乱打一气，就他一个人毫不武装、毫无装备，垂着胳膊站到中间去，还能不给打死么。说起来，是我们和日本人一起把他打死了！那个青年，也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呢！"

白先生停下嘴来，等我的反应。我依旧沉默着，点着头——仿佛在说：没错，真的，哥哥他真是那样——转回正房，关上身后的木门，把尾随而来的尘土截到了门外。而后，我转身朝向炉边的暗影，听到自己颤抖地叫道：

"阿鹰！"然而我立刻记起，鹰四已经死了，于是，心里产生了一种自从他自杀以来最为分明的痛惜。鹰四，他才该是"真正"了解仓房里这桩新事实的人啊。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

黑暗，便看出妻子木然浮肿的圆脸正现出惊诧的神情。

“仓房还有地下室呢！八成曾祖父的弟弟一直关在那里，做失败的暴动领袖，承担责任！阿鹰是因为他为自己和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才自杀的。可是，我们现在才知道，至少曾祖父的弟弟，他的一生和我们认识的完全不同！阿鹰不该为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我仿佛也要重新向自己证实一遍，便向妻子倾诉道。然而，她却冲着我叫起来：

“阿蜜，是你在阿鹰临死以前，让他感到了耻辱。是你把阿鹰丢在耻辱感之中的。现在你说这些，已经太晚了！”

我茫然地企图在这新的发现当中寻求一种超越逻辑的亲昵慰藉，然而在那时，我却未曾料到，妻子会向我反戈一击，大张挞伐。地下室的发现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妻子公然的敌意，对着我前后夹攻，令我顿时惊得呆住了。

“阿蜜，我并不认为是你让阿鹰自杀的。可你却对阿鹰穷追不舍，让他的自杀成了一场最凄惨耻辱的死。你不断把阿鹰置于耻辱的轮下，以至他只能这样凄惨地死去。”妻子越发激动地说，“我不清楚阿鹰在临死以前，是怎样可怜地怀抱着克服恐惧的那一点点希望。可是阿蜜，你在阿鹰请求把眼睛献给你时，你竟然也要拒绝！还有，阿鹰有多谦卑，他问你，阿蜜，你干吗要恨我。可是你，甚至不肯说一句，不，我不恨你！阿鹰到了这个份儿上，你还要对他冷笑，又给他增加了一层耻辱！就这样，阿鹰怀着最残酷凄切的心情，把自己炸得满面血肉模糊。是你把阿鹰逼上绝路的！现在，阿鹰死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你却要说什么阿鹰不该将曾祖父的弟弟引为耻辱！在阿鹰临终以前，你们曾祖父弟弟的经历，即使不能帮他延长生命，但至少能慰藉一下那颗就要自杀的心吧。现在你倒

兴高采烈地叫着阿鹰要告诉他这些了，要是他活着的时候你把这些事情告诉他，阿鹰怎么能那样凄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刚才说的，是超级市场天皇在清查仓房时才发现的嘛。那天晚上，我怎么能想到这些。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曾祖父的兄弟把自己关到了仓房的地下，过了一辈子自我幽闭的生活。”

“阿蜜，阿鹰已经死了，你以前不知道什么，现在又已经知道了什么，这些对他还有什么意义么！面对叫你抛到一边绝望而死的人，你只好一边在梦里流着自我安慰的眼泪，一边喊上一声：我抛弃了你们！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永远都会是这样！可是即便如此，对那残酷绝望而死的人也没有丝毫补偿，不管你加上多少新发现，补上多少眼泪!”

我无言以对，只是盯着妻子硬质皱胶般充满憎恶的眼睛。我未曾向妻子提及鹰四那份关于乱伦的坦白。其实即使我告诉她，她也只会卓有成效地反驳我，说我听了鹰四的坦白以后，我只会说，你这么些年一直生活在这件事投下的阴影里，你也受到报应了什么的，鹰四的死多少也会明白一些的。她的眼睛睥睨着我动也不动，那激愤的云翳渐渐消退，只剩下一层尖锐的憎恶和悲哀的黑晕。然后她说：

“就算有了新的发现，可以让阿鹰不至于那样可怜地自杀，可是事到如今没有比这再残酷的了!”说着，她泪如泉涌，犹如打碎了憎恶的蛋壳之后，挤出了柔弱悲叹的蛋黄。过了一会儿，妻子止住了泪水，误以为我已经觉察了一切，便毫不畏缩地说道：“两个星期以来，我总是在考虑要不要去堕胎！现在，我想把阿鹰的孩子生下来。我不想给阿鹰的事情再添上一层残酷!”

然后，妻子摆出一副明知我反对却又拒绝我做出任何反应的态度，退回昏暗的深处，躲进自己的天地不理我了。我端详着这孕妇安然危坐的纺锤形背影，想起在怀上我的孩子时，妻子的肉体和意识共同表现出来的绝对的平衡感觉。对妻子决定生下鹰四的孩子这件事情的一切本质意义，我已理解得非常具体，就像见到一个石块以后要去了解它一样。这理解安然存在于我的心中，激不起任何情绪上的混乱。我重新来到前院，但见超级市场天皇叉着两脚，正站在仓房的门口，用朝鲜语大声向屋里发号施令，围观的孩子们在他的身后聚成一团，看得出神。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想去一趟寺院，向那年轻的住持讲一下地下室里的发现及其给予我的启示，便顶着裹尘挟土的狂风，急急地往山脚走去。在阅读住持给我的那本《大洼村农民骚动始末》时，我看到过一桩令人莫名其妙的记述，现在地下室里的发现，使这桩记述立即生出了逼人的光彩，同时，它也成了我之所以确信曾祖父的弟弟曾在仓房自我幽闭这一启示的核心。

《大洼村农民骚动始末》是祖父就明治四年的一起骚乱事件写的一本小册子。他搜集了官府和民众双方的记录，还附加了题解和注释。

一、 此骚乱通称大洼骚动。

二、 尽伐大洼村之竹林，多制竹枪以持之。

三、 骚乱之原因，有云起自厌于新政，尤忌种痘，且于告示中血税云者有所误解，流言绞取人民生血鬻于西洋人，故人心汹汹，遂及此举者。

四、 骚乱之首魁及关系人等无所鞫问，亦无人处刑。

官方记录骚动经过的文章内容如下：

“明治四年七月颁废藩置县令。是年八月初，报××郡大洼村顽民既生物议，募集徒众。乃疾遣官吏说谕，然未易承服。遂煽动诸村，于同日晚啸集大浜城北（距县厅十五丁余）之碛中，其势次第相增，波及七十余村。同月十二日，顽民殆至四万，频放空枪，兼以殴斗，传播无端流言，乃至持竹枪铁铳直入大浜，横行市街。其流言举其大端，则有旧知事归京之大参事所为系之者，又有户籍调查即为绞取生血，种痘乃为植以毒素等，荒谬无谓，不一而足，无遑枚举之。而其横暴无状益甚矣，群集弥日，无所请愿，然窃属望官厅。官吏纷出，百方镇抚；遂见顽民总代，其所主张，一曰止旧知事之归京，二曰复维新前之政体，黜今俱职之吏员，三曰愿执政以下毋予擢用。同月十三日，顽民将迫县厅，兵威压制议决一时；而凶徒为之逡巡，未敢造次，纷纭厅议乃至一变，无行压制，遂成上风。故命若干维新前旧吏员出而执事。至十五日，旧知事亲临恳谕，犹未解散。此日薄暮，大参事遂而退厅，乃归自宅，遂至自裁，传诸顽民。

“凶徒闻知此报，尽颇悲哀，竟至瓦解，顺次退归。迄十六日午后，甫告镇定，派出官员悉皆归厅云。”

至于民众角度的文章，叙述骚乱所用的风格不似记录，倒像是一篇故事。其中描写的一个领袖，亦即作为“顽民总代”与官方交涉的人，或称其“不知何人，修六尺有余，长发大汉”，或提及“彼长发怪汉，本编屡见。盖此大汉诚堪怪异，修丈六有余，面白龟背。而其雄辩滔滔，尤称绝伦，莫之能及，人皆叹服”。这样小型的地方社会，其暴动领袖竟然不为所有参加者所知。对此，祖父只是附上了一条不甚可信的注释：“校者云：暴动同道多以锅灰涂面，其状奇黑，不辨身

份”，而他固然问及“此怪汉抑为何人”的问题，却到底未曾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提及的文章称，这个怪汉永远消失了踪影：“十六日，大洼村口强诉徒党既告解散，彼暴徒巨魁乃匿迹潜形，不知所之。”

这面白弓背的大汉，他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在此处引证的部分里面已经十分清晰。举例说吧，他所用的战术，是既逼近官府，造成威胁，又不激起军人出动，将民众和官府双方微妙的力量均衡一直维持到官府的讨论观点改变的那一刻。对此，祖父做了这样的评论：“且反观骚动遗迹，其未蒙微伤，堪称独绝。想斯惊动天地之大骚动而竟无伤者出，则其指挥奥妙，诚堪特书矣。”

于是，给予我的启示，而今已经展开成形。这面白弓背的大汉，无疑便是曾祖父的弟弟。他在仓房的地下足足关了十年，反思万延元年的暴动。然后，他突然又出现在地上，把十余年自我批判的岁月里获得的一切心得都用来推进这第二次暴动。既然前次暴动鲜血淋漓的成果已经大打折扣，他便致力于不让暴动的参加者和旁观者出现一例死伤，有效地迫使攻击目标大参事自杀，同时又不使暴动的参加者遭到处罚。

寺院东堂的墙面上，依然是我与鹰四、妻子一起看过的地狱图。我便是在这里，向年轻的住持讲述了这一切。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依然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

“万延元年暴动时深受其害、疑心重重的那些转变时期的农民为什么把暴动的领导权交给一个不知来历的奇怪大汉？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正因为传说中万延元年暴动的领袖，以一个暴动专家的身份在农民们面前复活，他们才情愿聚集到他的领导之下。明治四年的暴动，从其结束的实际情形推测，骚动

的中心目的乃是一个政治性的计划，迫使大参事下台。或许这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样的口号激发不起农民的冲劲来，所以，这个关在地下室里研读新近刊物的自我幽闭者，尽管他自己与这样的迷妄无缘，但他利用种痘、血税之类词语语意的含糊，煽动民众，组织暴动，最终搞掉热衷于新型强权的大参事。在这以后，他重又回到地下生活中去，不让任何人再见到他，把自我幽闭的生活再过上足有二十年。我相信是这样。从前我和弟弟都在探求万延元年的暴动以后曾祖父的弟弟到底变成了怎样的人，却都不得要领，没摸到实处。我们只顾探求那个穿过森林跑掉的子虚乌有的人了嘛。”

住持善良的小脸上泛起红晕，一直微笑着倾听我的这番宏论，然而却不置可否。在“暴动”的日子里，他曾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因此，直到现在，他还对我显得忧心忡忡，刻意用一种过分的平静，来冲淡我心中的兴奋。然而过了一会儿，他还是给我提了个旁证。

“明治四年骚动中那个驼背领袖的传说，在山脚很是出名哩。但纵然如此，他却没在诵经舞的‘亡灵’里面出现过啊。阿蜜，这怕是因为它会和您曾祖父弟弟的‘亡灵’发生重复，所以人们才没去造出另外一个‘亡灵’吧。当然，这个证据实在太消极了。”

“诵经舞么？演员们进仓房里落了座之后，便在那里大吃大喝，莫非这也是因为有一个代表性的‘亡灵’曾经在那里的地下室度过长期的幽闭生活？这样的话，这证据可算积极了。我想，祖父在注释这本书时，其实明知道这驼背怪人就是他的叔父，他暗中表达一种敬爱之情呢。”

对我的这种空想连篇的大肆假设，住持仿佛觉得无法苟

同。他不直接回答我的话，倒是转向了那幅地狱图，说道：

“要是您的推测正确的话，这幅画八成也是您的曾祖父给还活在地下室里的弟弟画的呢。”

我展眼望着那幅画。我发现，还是与鹰四、妻子共同欣赏时那种深切安谧的情感，而今，它却不单单是作为被我的情绪唤起的一种被动的印象，而是作为一种独立于我的实在的绘画实体而存在于此。它能动地存在于画面上，一言以蔽之，乃是一种浓重的“温存”。订做这幅画的人，也许要求画师一定要描绘出“温存”的实质。当然，还必须是画地狱。因为他的弟弟虽生犹死，正在自我幽闭当中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地狱，他要用这幅画给弟弟安魂。然而那火焰之河，一定要涂得一片鲜红，犹如阳光映照下山茱萸树那红彤彤的叶背；那火焰的线条，一定要画得平稳柔和，犹如女性裙裾的皱褶。那“温存”也要体现在火焰河中。既然这幅画意在给既为亡者又为鬼怪的狂烈的兄弟安魂，便必得将亡灵的蹉跌和鬼怪的残酷暴露无余。然而这鬼怪和亡灵，纵然各自表现着残虐和苦闷，但必须有一条静谧的“温存”纽带，把他们的心联结起来。在地狱图中所画的亡灵中——诸如那些披头散发的人，他们摊开四肢，瘫倒在灼热的石块上面；或如那些火焰河里的人，他们的臀部瘦成了三角形，正伸向火雨淋漓的虚空之中——或许这些亡灵中的某一个，便是用曾祖父的弟弟做了原型。这样想来，我不禁要把所有亡灵的形象，都在我意识的最深处细细回忆一番，仿佛能寻到一个可称为血亲的固有面容。

“阿鹰见了这画，挺不高兴来着吧。”住持提起了往事，“小时候他就一直害怕地狱图吧。”

“莫非阿鹰并不是怕这画，倒是不喜欢画上画的地狱的那

种‘温存’？现在来看一下，我真要这样想了。”我说，“阿鹰有一种惩罚自己的欲望，觉得他应该活在更为残酷的地狱当中。或许正是这种欲望的驱使，才让他拒绝了如此静谧平和、安详‘温存’的假地狱吧。我想，为保证自己地狱的惨酷不遭到削弱，阿鹰一定做过不少的努力呢。”

年轻的住持渐渐收起了毫无意义的微笑，在他的小脸上面分明现出了一种怀疑的神情。于是我发现，他那对怀疑之事佯装不知的表情里反倒现出一种目中无人的闭锁。面对着这个对于山脚人的生活全无兴趣的住持，我实在无意把自己心中的问题再讲出来。对我来说，那地狱图毋宁是另一个积极的证据。如果需要重新考察对曾祖父的弟弟和鹰四做出的判断，这些新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住持送我到山门的途中，向我讲了“暴动”以后山脚青年们的情况。

“听说，与阿鹰一起做事的那个衣着单薄的青年，合并以后第一次选举，他就选上了城里的议员哩。看上去阿鹰的‘暴动’完全失败了，可是至少，它倒把从前山脚里已经固定下来的人员构成撼动了一下。说到底，既然阿鹰集团里有一个小伙子选上了城里的议员，可见对那些顽固的大人们的头头儿，也是有了点影响力的。‘暴动’对整个山脚的未来都会是卓有实效的，阿蜜！其实，这‘暴动’将山脚人纵向的社会渠道扫除掉，又将年轻人横向的渠道牢牢地巩固了起来。阿蜜，我想，在山脚做长远展望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S哥和阿鹰，他们悲惨地死了，可他们尽了职责！”

我回到家时，超级市场的天皇已经离开了仓房。那群孩子们，本来一直在欣赏那断壁残垣以及地下室上面地板的裂缝，一俟黄昏降临，他们也立刻作鸟兽散，急急地沿着石板路跑走

了。我小的时候，山脚的孩子们便是如此，除去祭祀之类特殊的日子，只要黄昏一到，便立刻气喘吁吁地各回各家，全然不像“乡下”的孩子，到了夜里，还要贪玩不止。今天的孩子们是否是因为害怕树林里来的长曾我部还不得而知，但他们仍旧不曾改掉这一习惯。

妻子用从超级市场买来后攒起的面包和熏肉给我做了些三明治当晚饭，放在炉边的盘里，自己却横躺到里间，俨然一副专心保护腹内胎儿的模样。我用油纸包起三明治，塞到外套的口袋里面，绕到世田和，摸出一瓶满满的威士忌和一个空酒瓶。我洗了洗空瓶，盛满热水，然而那水却很快就冷却下来，像渗入牙龈的冰水一般。我早该想到，半夜里的寒风相当厉害，于是我打算除了自己正用的那条毛毯以外，再从壁柜里把预备的拿几条出来。我正蹑手蹑脚地从妻子的旁边走过的时候，发现她原来并没有睡着。

“我想一个人考虑一会儿，阿蜜。”她厉声说，好像我要找机会偷进她的毛毯里面一样。“重新回想一下我们夫妻生活的许多细节，我看我受你的影响很多，也经常在你替我分担责任的前提下做决断。如果你要抛弃谁，我总站在你这边，附和你支持你。可现在，我觉得很不安呢，阿蜜。保育院的那个孩子，还有我就要生下的这个孩子，我都想自己承担起责任，不再靠你了。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

“是嘛，我的判断靠不住指不上嘛！”我畏缩地说了这一句，再也不说话了。我也想关到仓房的地下室里考虑一下。既然发现了新的证据，那么我必须打破自己的成见，对曾祖父的弟弟和鹰四进行复审，这样，我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纵然这对于死人已无任何意义，但这却是我所需要的。

于是，我钻到地下室里，像一百年前的那位自我幽闭者一样，背靠正面的石墙蹲将下来，把三条毛毯牢牢裹在外套上面，吃三明治，一口一口轮流喝威士忌和早已变凉的白开水(幸好从南面吹进山脚的狂风，还没有让它冻成冰)，陷入了沉思。这地下室长年人迹不至，到处都是让虫子咬坏的书页。凌乱的碎纸，朽坏的书桌，腐烂散破而又干巴巴的草席子，叫强风一吹，它们全堆到屋角，散发着霉味。墙上的石头略有些潮湿，仿佛冷汗津津的皮肤一般，长久的磨损使得它摸起来柔和可人，却也散发着同样的霉味。湿重纤细的灰尘，粘得鼻孔、唇边、眼角到处都是，我不禁想起了二十五年前得上了小儿气喘病那时的痛苦感觉：这灰尘可不会把毛孔全都堵住，让皮肤无法呼吸吧？闻一闻指尖，发出的也是同样的气味，分明已经叫灰尘给附上了。我把指尖用力往膝头上擦，可是赶不走那种气味。在我把自己关在这黑暗当中的这段时间里，也许会有螃蟹般大小的蜘蛛，从尘垢堆的深处爬将出来，在我的耳朵后面咬个不停。想到这里，便有一种厌恶感仿佛直吞噬到我生理的中心，眼前的黑暗当中，便充满了朝着我虎视眈眈的各种怪物：大如乌贼的蠹鱼，比得上草鞋的潮虫，以及像狗一般大小的不合节令的蟋蟀。

复审。然而，在这地下室里，如果曾祖父的弟弟关在这里，把他暴动领袖的身份① 终生坚持下去，那么，我过去深信不疑的判决就要被推翻。鹰四的一生，一直刻意仿效着曾祖父的弟弟，他最后的自杀，也便是用我所发现的曾祖父兄弟的

---

① 原文为英文。

身份[①]之光，给他的“真相”染上了新的色彩。换言之，便是向苟且偷生的我炫示的最后一场壮丽的冒险，于是，我给鹰四的判决，也只好脆弱地土崩瓦解。鹰四还要把它举起来，像旗子一般摇来摆去；而曾祖父弟弟的形象，虽曾挨过我不少的嘲笑，然而却绝不是幻影，于是，鹰四反倒站到了相当有利的位置上去。从上学时开始，直到结婚以后妻子怀孕，我一直养了一只虎斑的雌猫。然而有一天，它被轧到了车轮下面，全身血肉模糊，扁得活像只摊开的手掌。而今，罡风在黑暗里盘旋激荡，我从这黑暗里面，分明看到了那不幸的日子里垂死的猫的眼睛。那老猫的眼睛绝对平静，瞳孔清澈有光，犹如纤细的菊花。在痛苦的静电猛然流遍它那颗小脑袋的感觉器官时，那猫的眼睛却将全部的痛苦紧紧地关闭起来，留给外面的只有平静和麻木。我不仅从未让自己想像过有人在以这种眼神忍受着自己心中的地狱，而且，在鹰四作为这样的人寻找一条通向新生的坦途时，我对他所做的努力也始终持批判态度。我甚至拒绝了面临死亡时弟弟那凄凉的请求。于是，鹰四用自己的力量超越了他的地狱。在黑暗当中，我永久的朋友——那猫的眼睛便与鹰四的眼睛，曾祖父弟弟陌生的眼睛，妻子红得像李子一样的眼睛都联结在一起，组成一个明晰的连环，切实地开始附着在我的经历当中。在我后半生的所有岁月里，这连环将不断增加下去，很快便会联结上百种的眼睛，并且变成装饰我的经验世界之夜的星星。在这星光的照耀下，耻辱的痛苦会折磨着我，而我将用唯一的那只眼睛，像老鼠一样小心翼翼地窥伺着模糊晦暗的外部世界，苟延残喘下去……

---

① 原文为英文。

“对我们的复审就是对你的审判!”

还有房梁上摇晃帽子的那群老人。

我仿佛真的只身蹲在梦中的法官和陪审员面前，躲开所有人的视线，在黑暗里闭上眼睛，屏着呼吸把像是一个球形异物的头放在外套和毛毯裹着的胳膊上。

那些超越了自己的地狱的人，确实有着一种切实的实在感。相形之下，我却没有任何积极的意志。难道我只能在模糊不定、颓唐消沉的岁月里这样苟活下去么？难道我就无法放弃这一切，逃到更加轻松的黑暗中了么？我的肩膀沉甸甸的，动也不能动，活像棺木中的一具木乃伊。我看见一系列分解照片似的场面：从这肩膀的周边，另一个我分明脱身站了起来，从地板的裂缝爬将出去，让山脚径直吹来的疾风吹着衣着臃肿的身体，迅速攀上了台阶。及至看到自己的幻影爬到台阶上面，俯瞰砸塌的墙壁下方那广阔的山脚时，我不得不立刻蹲在地下室的深处，面对罡风逞狂、暗淡深邃的空间，体验那种毫无防备伫立在台阶中央时令人作呕的恐高症感觉，然后用双手的指头按住太阳穴，忍受着头内隐隐的痛楚。然而，那幻影已经走到榉木屋梁的下面，于是，我惊愕地恍然大悟了——缢首之际应该向苟延残喘的人们喊叫的“真相”，我实在还没有看穿！幻影立刻便消失了。我并未与我那涂红了脸，全身赤裸，肛门里塞着黄瓜自杀的人共同占有着他心中的某种东西。我的那只单眼，本该一直盯着头脑里鲜血郁积的黑暗，然而事实上，它却不曾履行完任何义务。既然那“真相”我不得面见，那么，我也全然没有向死亡进行最后一搏的意志，曾祖父的弟弟和鹰四，他们面临死亡时却不曾这样，他们是确知自己的地狱、喊叫着“真相”超越了死亡的。

在那时，我的胸中热血澎湃，一种具体的失败颓唐，使得心里灼灼疼痛。我才发现，原来正如鹰四儿时起就对我怀有抵触情绪一样，我也对鹰四及其追求的影像——曾祖父的弟弟同样怀有敌意，而且竭力去走一种与他们的行动方式截然相反的、稳健的生活道路。而且，正因为我像个冒险家一样给人打坏了一只眼睛，我才感觉到了双重的愤懑，才要打杀苍蝇，更加痛苦地度过住院生活。然而我的抵抗毫无结果，倒是孱弱的鹰四历经骗子般的冒险，在最后面对着即将把他赤裸的上身打成石榴状的枪孔的那一瞬间，确知了自己在仿效曾祖父弟弟时充满热望的一致，完成了自我的统一。事实上，我对他最后呼吁的拒绝，已经无关紧要了。鹰四一定可以听到关在仓房里的曾祖父弟弟以后的所有家人的亡灵承认、接受他的声音。靠这声音的帮助，他为超越自己的地狱勇敢地战胜了对死亡固有的极端的恐惧。

“不错，你说出了真相。”而今，我已分明觉出，在那些凝视过鹰四死亡的那无数家人亡灵的眼睛的盯视之下，我已经完全偃旗息鼓，整个身心都变得惨不可言。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疲惫无力，这种无力和寒冷一起不断加深，深不见底。我可怜巴巴地吹了几声口哨，心情糟透了。我便是怀着这种近乎受虐狂的心情，试图召唤长曾我部，可是，他当然不肯来破坏仓房、把我活埋。我只好像一只虚脱透湿的狗一样，全身颤抖着过了几个小时。一会儿，头上地板的裂缝和身边半开的暗窗，都已经泛出了白色。风也平静了下来。我被尿憋得难受，便在寒风中挺起麻木的下肢，从地板上把头探将出去。那断壁残垣外面的空间，大部分都是沉沉的森林。现在，森林仍然是漆黑一团，浓雾弥漫，只有一抹紫色的光晕反照着黎明的苍穹，而

其右边顶端的一角，却现出了一片熊熊的红色天空。我在洞穴里迎来了黎明。这时，我见到了同样熊熊的山茱萸树叶背，想起洼地的那幅地狱图，觉得接受了一个信号。这信号的意义曾经暧昧不明，现在，我却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出来。地狱图上面红色的“温存”，根本讲来，乃是努力要忘却直面并超越自己地狱的这些人骇人的威胁，在更加晦暗动荡的现实生活中驯顺苟活的人们安慰自己使用的色彩。概而言之，曾祖父叫人画这幅地狱图，实在只是给他自己安魂。只有那些继他之后像祖父及我这样的子孙——我们不希望强行飞跃的某种东西在自己的心中生长发育，也不希望与它对簿是非，唯愿冷漠不安地苟活下去——只有这样的子孙，才能从那幅画里得到慰藉。

房间入口的几层门板，都已经取走了。在入口的外边，有一个人站在昏暗当中，定定地俯视着我。从那个角度看，我的头准像个在地板上滚动的西瓜。是妻子。面前的这个人只从地板缝里露出个脑袋，眺望着那一抹红色的朝霞。对于这样一个人，可有什么平静的问候，可有什么寻常的态度？我便像化成了西瓜的人一样，窘迫地缩将回去，只是盯着她看。

“呀，是阿蜜！”妻子带着紧张和拘谨，仿佛要安慰我蒙受的不幸，压低声音喊了起来。

“哟，吓着了吧。我可没发疯啊！”

“阿蜜，以前我就知道，你习惯在洞穴里面考虑问题的。在东京那会儿，你不就有过一回嘛。”

“那天早晨？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呼呼大睡哩！”我留恋地想着往事，全身觉得懒懒的。

“我可一直从厨房的窗子看着你呢，直到送牛奶的来了，这可算是个把你拉回地上这个社会的预兆！我一直挺害怕的，

怕出什么吓人的事。”妻子也沉浸到了回忆的氛围里面。像是要打破我的沉默，又像是要鼓励她自己，妻子竭力粗声地说道：

“阿蜜，我们重新一起生活下去，好不好？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养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养好保育院的那个孩子，还有我就要生出来的孩子？我想了很久，我要来问你，靠一个人的意志做出选择，是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既然你钻到那里面去思考去了，我就想，该等你靠自己的意志从那里面钻出来，所以我就一直站在这里。我都吓坏了，这次比在里院的洞穴那次更可怕，仓房的墙壁被拆得东摇西晃，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塌，我还从底下听到口哨声！那时候真是都要吓死我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把你从里面叫出来，我就一直等下去了！”

我瞧着妻子。她一面慢慢地讲话，一面小心地把两手护住下腹的两侧，活脱一个称职的孕妇。这样一来，她站在那里，便像一只直立不动的纺锤。她身上披着一层黑色，由于剧烈的紧张，正禁不住抖个不停。讲完话以后，她静静地啜泣了一会儿。

“试试看吧。我想把英语教师的工作接下来。”我吐出了一口粗气，用肺里剩下的那一点空气挤出了一种若无其事的声音。然而我立刻两耳火烧火燎地听出了自己话里的犹疑。

“不要吧，阿蜜。你到非洲工作期间，我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啊。去给动物采集队办事处发封电报吧。为了跟阿鹰作对，你不总要故意把自己心中有关阿鹰的成分都排除掉么？阿蜜，阿鹰已经死了，你对自己也该公正一点才是吧。你既然已经知道，你曾祖父的弟弟与阿鹰之间的联系绝对不是阿鹰臆

造的幻影，那你就应该确信，在你自己的心里，也有一些与他们共同的东西，对不对？要是你真想正当地把死去的阿鹰记在心里，你就得把这一点弄个清清楚楚！”

在非洲只做个翻译，这怎么可能呢。我痛苦而自嘲地想。然而，我没有坚强的意志，向妻子如此反驳。

“把那孩子从保育院接回来，能让他适应我们的生活么？”我的声音里渗出心中的不安。

“昨晚我一直在想。我觉得只要我们有这个勇气，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的，阿蜜。”妻子用一种疲惫无力的痛苦声音说道。我怕她会贫血摔倒下去，就扭身顿足，想尽快爬到地板上面来。然而我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才爬上地面、走到她面前时，心中却响起了一声单纯的话语——现在鹰四死了，我们也只好一起生活下去了！在鹰四的亲兵们申明自己的结婚计划时，他们用的也是同样单纯的话语。我不想把这要求拒绝了之。

“你平安地从那里出来，对我的提议又表示接受，这是我对自己的一场赌博啊，从夜里开始，多可怕的赌博啊，阿蜜。”妻子的话里带着不安的泪水，又是一阵颤抖。

妻子怕对胎儿造成影响，对旅行十分小心。在她下定决心穿过刚刚开始改修的桥梁，离开洼地的那天早晨，山脚有一个男人带了个新的木制面具来向我们道别。那面具的人脸活像石榴，闭着的两只眼睛上钉了无数的钉子。这男人是那个榻榻米店老板，他曾经趁夜出逃，离开了洼地，今年夏天起为重开诵经舞，便被人从城里召了回来。在盂兰盆会之前，山脚的集会场所已用合并时特批的预算修葺一新，于是便有许多地方等他装配榻榻米。在那里，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推敲所有“亡

灵”的装扮。我们便把鹰四从美国回来时穿的上衣和裤子给了他，以供那戴鹰四“亡灵”面具的演员穿用。

“有好几个小伙子说想带这个面具从森林下来呢，现在还在争着哩!”榻榻米店老板好不得意地说。

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恐怕我们不会再回到这洼地来了。鹰四的回忆既然已经化做“亡灵”被山脚的人们所共有，我们也便没有必要把他的坟墓守护下去。离开洼地以后，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使妻子从保育院接回的儿子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同时，在等待另一个婴儿降生的日子里，戴上头盔大喊斯瓦希里语，没日没夜地击打英文打字机，无暇反思自己心中出现的一切，过那种汗垢泥污的非洲生活。我要到伺伏草原的动物采集队做个翻译负责人，在我的眼前，想来不会有一头大象，它庞大的灰色腹部用油漆写着“期待”两字，慢慢地踱将出来。然而，只要接受了这项工作，就总会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至少，在那里盖上一间草房，还是轻而易举的吧。

中 短 篇 小 说

杨炳辰　译

在看之前跳吧

穿过阴冷潮湿的石壁之间，研究室围绕着的院子里，弥漫着晨曦般的微明。冬天里，这景象始终不变。可春天一到，院子里立刻就像过节似的溢满了流光异彩，高高的树上绽出嫩芽，铺展开来变成硬硬的树叶丛，直到把天空收缩得越来越狭窄，亮堂堂的光把眼睛都快照花了。

然而，今年春天来得特别晚，我穿过院子，沉重的静寂像在自己的外侧、内侧，稳稳当当地坐实了下来似的。那决不是什么不好的感情。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来说，真的，只是稍觉不够亮堂，少了点蓬勃的朝气而已。

院子的角落，有个巴洛克风格建筑的石台，冲着阴沉沉的天空伸出一个水龙头，我侧着眼睛一看，那水龙头像沾上水的手指头，闪烁着柔和的光；往台阶走上几步，我直觉得喉咙口干渴难当，于是，我站定下来。冬天，老是口干舌燥的，我往回走了过去。

我记起来，大学当局反复警告我们：这水龙头的水含有不洁成分，喝了可要把喉咙和胃搞坏的。可我还是躬着背噘起嘴，喝了几口喷出来的水。比起忍受火辣辣的嗓子眼来，尽管明知会弄坏身体，也还是润润嗓子的好。这是一种无力的倾向

啊，我将难喝的水包满了口腔抬起头来想着。那时正有一股风潮在大学逞威，我的周围也受到危险的威胁。虽然治愈了口渴，但许多学生的声音却沙哑了，肚子拉得脸色铁青，一点精神也没有。结果是谁也不会关心的哟，我恍恍惚惚用拳头擦了擦嘴角想。青年们个个不关心政治，以后也不关心生病，甚至也不关心找个恋人，只重视眼前，嗓子渴了要紧。至少那不麻烦嘛。这些家伙们对朋友冷淡，既不会叫人们讨厌，也不会给人添麻烦。

可是在同一个大学里，也有些青年不能说万事不关心，他们眼里闪着光和别人议论不停，他们热衷于政治，为了明天而锻炼身体。我上到楼梯的尽头，穿过一年四季阴暗的走廊，来到英文学研究室门前，这时，那些不甘寂寞的青年们正在那里张网等待猎物呢。他们背着那边窗子射进来的光，站在低低的桌子前。他们的桌上，不用说肯定都放着签名用纸和募捐斗争经费用的纸箱。我像个老实巴交、发育不良的孩子，正要通过一群专横跋扈的孩子面前似的，心里紧张却故意放松脸颊和嘴唇，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把眼睛对准他们对面墙上稍高一点的地方瞄着，走了过去。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了句什么话。我装作被自己内心骚乱牵制住了似的，继续往前走。

“帮忙签个名吧。”强有力的声音向我袭来，把我的下巴拉过去朝着他们。

“等一下。”我低下了眼睛。

“请帮忙签个名。”另一个人强硬地重复了一句。

我感到四周充满了浓重寂静的气氛，能让自己沉着下来。

“喂，”第一个男人说，“你是弄法国文学的学生吧。难道还不该有签名的义务吗？”

“亚洲的西方、非洲的一隅，”桌子上贴的纸上写着，“那里发生了泥污满身的肮脏战争。实际上，长期以来法国人和土著人民都在流着血，到处是一片混乱。”这些事我也知道得很清楚。

“咱们可以给法国的内阁寄去抗议书。真要把那些家伙撑满葡萄酒的喉咙勒紧，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我可不干。”我说。

“别说怪话哟，难道你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无动于衷吗?”

“与我无关嘛。”

“你不是在弄法国文学吗?”

“我弄的是十六世纪的东西。”

如果握着铅笔，弯下腰，写上自己的名字，再把硬币投进纸箱就没事了。可我偏偏反感那些学生们说话时盛气凌人的态度。

“你大概还不知道现在的法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吧?”站在最靠角落的第三位学生开腔了。

“我所知道的，”我说，“法国不会采取自掘坟墓的行动。签名之类和想想办法可不是一回事呀。那可是叫人给逼出来的嘛。”

“好歹签个名吧。”第一个学生脸上浮起浅浅的微笑说，“就是咱们，听这些话也听出老茧来了哟。”

“我不干。”我没好气地说。

第三个学生往我面前一站，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兴奋得脸上直抽动。

“你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古怪呀?”他激愤得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你把我们都当傻瓜了吧?”

“再说得清楚些：我呀不喜欢糊里糊涂地签名，还搞什么抗议之类的。”我说。

“给我签名！我可要动武让你签名啰。”

我被他缠上了胳膊，我想甩开自己的右臂，身子一个踉跄。这一弹让我右手的指甲直戳到了他的脸颊上，他轻轻地哼了一声。这时，他勃然大怒拼命揍起我来，我出于防御跟他对打。不一会儿，虽然被人劝开来，可我的右鼻孔里还是喷出鲜血来。好几个教研室的门打开来，连助教在内的许多学生都朝我们这边张望。我按着鼻子跑过走廊，拐个弯进了法国文学研究室。

“怎么啦，怎么啦，一副可怕的模样。”女助教批评似的定睛瞧着我，她生着一张小小的脸孔，连一本正经时看上去也像在笑似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拿张面巾纸给我，不值一提哟。”我仰起头倒在椅子上说。

我用微微带着她皮肤气味的纸，擦去嘴唇和额上的血迹、抹掉手指上的肮脏，然后瞧着助教苦笑起来。助教从我手里拿掉团皱的纸，赶快把它扔到字纸篓里去了。

“你的鼻子眼看着就肿起来喽。”她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人鼻子肿起来的呢。”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吃惊，于是，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我的周围又开始恢复起日常生活那种浓重的静寂来。

“真的，怎么回事嘛。”

“挨揍了，像只鸡似的挨了揍。”

“你可真勇敢啊。”弄得助教倒有些愤愤然的。这词语是一种时髦。我们大学的学生都被“真勇敢”一语蔽之了，所

以，我们常常把这词语像唱山歌一样挂在嘴边。

“要说勇敢，实在是卑鄙呀。”

“和谁，又是?”助教一本正经地问。

“你那小镜子能借我用一下吧?”我微微有所警觉，助教开始刨根问底，于是我赶快刹车。

“真是的，你可真干了傻事喽，真没大人样儿。”她一边走回自己那张桌子去拿小镜子，一边说。

“连咱自己都觉得没大人样儿。”

我从沾着细细化妆品粉末的小镜子里，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自己血色不好的瘦脸：肿胀的鼻子和黑褐色发硬的嘴角上，有一条吸附着血珠子的小裂缝，右边的眼睛也充血了。

“真倒霉，碰上个出手快的家伙哟。”我用钦佩的口气说，“短短几分钟，就让他撩到好几处哟。”

“真打架了吗?”助教一本正经地认起真来。

“吵吵闹闹大打出手哇。”

“你真干了蠢事哟。”助教幸灾乐祸，小眼睛里涌动着意想不到的欲望，盯着我的鼻子和割破的嘴唇看，“嘴唇还在出血呢，舔一下能止住的哟。”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两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反对基地扩张的斗争，淋湿的头发上滴下雨水，流到了眼睛和嘴唇上，又流过下巴直灌进领子，连内衣都弄湿了；在有气无力的寒冷里，浑身颤抖地忍耐着。那时，我还和那个喉咙口肮脏、皮肤上有个剃刀伤疤的职员手挽着手，站在泥泞地上唱着歌呢，头脑嗡嗡作响。后来，我遭到警察的殴打，从队伍中弹出去，我的身体像被愤怒之针刺中的贝壳肉，强制地缩小了；打断的牙根上，血腥气味扩散到满嘴，使我恢复了镇静、积极的情绪。那

时，血腥气味里有着小市民值得赞赏的感情。可眼下这血迹却不是。

“舔得好起劲哟，想起情人的事了吧。”

我吃惊极了，仰面瞧着助教那背着光的阴暗脸盘。那张脸凑了上来，她自己的舌头光光亮亮闪着桃红色，看上去仿佛要来舔我的伤口。我摇摇头，像是为了赶上和同学们一起进教室，我站了起来。助教没什么特别意义地叹了口气。

教室里，我正在听一位体格良好，有一头美丽白发的教授上古法语课。那课程老是令我感动、揪心。我不大喜欢学习，所以，在教室里，短时间内像成了哑巴似的感到羞耻。课一上完，我根本不理睬那些取笑我肿鼻子的同班同学，故意昂然地耸起肩膀，跑下了楼梯。在英国风格的铁门那边，被行人的鞋弄得伤痕累累的砖头道上，停着一辆灰褐色的车，良重和一个眼睛纤细的大个男人卡普里埃尔正在那里等着我呢。

我浮起暧昧的微笑，跑近他们的车子。鼻子肿得全歪了，连笑也笑不出来。卡普里埃尔从司机席上探出身子，打开后座的门。我钻进车厢，他盯着我的侧脸看了一眼，嘴里“嘘”地吹了声口哨。良重从卡普里埃尔身旁下了车，走到我身边来。

“怎么了？”良重不高兴地说，“全肿起来了哟。”

“啊。”我的脸让良重软和厚实的肉板手掌捧住了。

“疼吗？”良重问。

“疼得很呢。”

“有热度哟。”良重用嘴唇触摸了一下我肿胀的鼻子，“不把它冷却一下可不得了哇。”

卡普里埃尔把左臂搁在方向盘上，从座椅背上露出身体注视着我们。他想开车了。

“等一下哟。”良重和普通的妓女不一样，她用发音准确的英语说。“用冷水来冰一下。”

然后，良重微微颤动着身体上缀着的赘肉，向校园内跑去。一进铁门，她就跑到门卫处，从腰间抽出一条宽宽的手绢甩了甩，像在询问什么地方有冷水。只见她心急慌忙地向文学系大楼跑去。我筋疲力尽地把头靠在座椅背上。

“让人揍了吗？”外国杂志特派员卡普里埃尔瞄着我问。

“打架了。”我说。

“有定论说日本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决不斗殴。”他说，“什么样的理由？”

要用外语来给他作解释，我在极短的时间里真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卡普里埃尔正在伦理性地批评我呢。可看来又不像。

“什么样的理由，”我说，“你要问我‘为什么打架’吧？”

“是啊。”

“围绕法国的政策，”我说，“托阿尔及利亚的福哟。”

卡普里埃尔又吹了声口哨耸了耸肩。在良重的情人中，我顶喜欢卡普里埃尔了。于是，我附和着他低声地笑了起来。“笑”给了鼻子一阵冲击，我呻吟了一声。

良重跑近开着的车门，把冷水打湿的手绢捂在我的鼻子上。那手绢冰凉凉的，捂着好舒服。冷冰冰硬邦邦的水珠从那儿滑到了嘴边。良重拼命睁大暗暗射出激烈光亮的眼睛盯视着我。我仰头望着她那重重垂在喉咙口的皮肤，正随着粗粗的呼吸摇曳着。三十五岁才过了两个月，良重已经开始发福了。我忽然想起来，良重的喉咙口，以前可是丰厚地缀着好些肉的。现在变得难看了。

“疼吗？”良重问。这回她对自己的“土药方”像是充满

信心似的问，“哦，怎么样?”

“好多了。”我当心着嘴唇的活动，不让波及到鼻子的周围。

“开车喽。”卡普里埃尔有些焦躁地说。

“好吧。”良重看也不朝他看一眼，只管用手绢捂住我的鼻子，极其冷淡地说。

车子缓慢地向后倒退了几步，然后跑上舒缓下降的柏油马路。初冬时节，卡普里埃尔成了良重的情人，我们除了星期六，每天都一起到“六本木俳优座”剧场附近的法国餐馆进晚餐；它面朝着排列高级家具店的坡道，然后，我一个人回到良重和我租的房间里去。星期六这一天，卡普里埃尔得用打字机给本国的杂志社写稿。

砖墙围起来的餐馆很明亮，屋子里却没有其他的客人。我们一进餐馆，服务生就用充满好奇的亲切眼光盯着我的鼻子看。我毫不理睬。我们系上与鲑鱼色格子台布同色的餐巾开始用餐。用餐时，良重一直担心着我鼻子上的肿块，这时疼痛感已经淡漠了下来。用完餐我们又喝了酒。

“你说过想到埃及或者越南去打仗的吧?”卡普里埃尔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是啊。”我用浸泡着静静醉意的声音说，“想打仗哟，我对和平已经厌倦喽。我常常想，怎么不给我打仗呀。”

“发生战争的话，”良重说着，眼睛潮乎乎的，“鼻子肿之类的就过得去了吧。”

“打起仗来的话，”我又说，“那是当然的啰。对青年人来说，不管怎样斗殴，最多鼻子肿出来之类的，这可太难受喽。”

“说英语哟。”卡普里埃尔说。

“青年人呢，”我用英语说，“要是四平八稳地在社会上度过他的成长期，那他可就太不幸了。穿过战争激烈的混乱成长起来的人，才有可能不容置疑地造就出优秀人物吧。”

“良重在战争期间，已经是姑娘了吧，”卡普里埃尔说，“堂堂正正的优秀呢。”

“是啊。”我说。

良重醉了，她把厚重的脸伏在手臂上瞧着我们。看上去她十分满足。

“我出生得晚，真吃了大亏喽。”我慢吞吞地伸直了背打了个哈欠。我也像良重一样满足：美味佳肴伴美酒，还有明亮的屋子、礼数周全的“包埃”（服务生）。

“没什么可吃亏的哟。”良重说，“喂，你真的吃亏了吗？”

我们相视一笑。可是我真觉得吃亏了，虽然还不清楚那是些什么；我连手指尖都充满了醉意。无论如何有过这样的时代：聚集起十个朋友的话，就有六个杀过人。

“那么，你想去埃及或越南打仗吗？”卡普里埃尔反复地说。“嘿，是吧。”

“和埃及人一起在土屋里，浑身泥巴躺在地上睡觉，再打仗。去打倒剑桥的那些家伙们。潜到越南浑浊的河水中，热得快要瘫掉，一边还在盘算杀掉巴黎出生的家伙们的计划。”

“嗬，看你还真来劲头了呃，”良重睡意朦胧地把手指在眼前晃来晃去。“看你好神气哟，今天和谁打了一架兴奋起来了吧。”

“咱和公司里商量商量，”卡普里埃尔从台子上挺起身来说，“今年秋天，我被派到越南去的时候，说不定能把你也带去。你机灵地逃走，参加当地人的军队不就遂愿了吗？”

我的喉咙像被勒住了。良重醉酒而浮肿的脸、卡普里埃尔忽地变僵硬的眼睛、鲑鱼颜色的台布、墙壁上的砖，一切都在急速地远去。身体在火辣辣地燃烧着。

“打算去吗?”卡普里埃尔用冰冷的声音问。他可没醉。

我低下了头。我的手指被良重汗涔涔的柔软的手给捏住了。良重能够用手指和手掌的凹陷部位巧妙地暗示她自己的性器。作为勾搭外国人的妓女，这也是她的一种技术。我羞耻地把头埋得越来越低。

“我觉得是这样的嘛。”卡普里埃尔恢复了快乐的声音说，“和平对身体有好处呀。”

我感到脑子里出了个坚硬的疙瘩。醉意全消，然后，那疙瘩坚硬地凝固起来。我朝厚厚的杯子伸出手去，那里还剩三分之一“贝鲁诺酒”。卡普里埃尔昂然自得地乘胜追击。

“战争从那边袭击过来，特地把自己从寂静的生活里抽出来，再从这边投入战争实在是很困难的哟。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不行。是吧，是这样吧。”

“啊。”我被打垮了，发出沙哑的声音。

“是谁的诗我忘了，也许是通俗歌曲里的一节吧。”卡普里埃尔说着，心情舒畅地朗诵起来：

“Look if you like, but you will have to leap.”

“看尽管看，但你不跳可不行。说的是这意思吧。”

“追求女孩子的时候吗?”良重仍然是一副喜形于色的表情。

“生活的一般道理嘛，说的是：不管干什么，在看之前跳吧。”卡普里埃尔渐渐地陷入了酒醉的佳境，“有‘看的家伙’和‘跳的家伙’两种人呢。”

只有我一个人从酒醉中清醒过来。因为鼻子的疼痛又开始发作。我浑身颤抖着站了起来。卡普里埃尔他们为了找乐子要到旅馆去，让我一个人回房间等良重，直到天亮都是一个人睡觉的时间。我和卡普里埃尔握了握手，接了良重递过来的出租车钱，默默地钻出车厢。柏油马路腾起冷森森的雾气。出租车好久都不来。我自己清楚不能去越南，卡普里埃尔和我自己都承认，这使我感到强烈的羞耻。甚至成了一种绝望的感情。等了很长时间，皮肤上都起鸡皮疙瘩了，终于来了一辆寒伧的出租车。那车摇晃得厉害，恶性酒醉伴着阵阵恶心又回来了。

“咱迈步来到现实的壁障，从那里又夹起尾巴回来了，老是这样。”我想着，“咱只看着，决不跳。咱是卑劣的。”

从出租车上下来，我少许呕吐了几口。驼背很厉害的司机在一旁叉着手俯视着我说：

“喝醉酒了，架得住吧？”

“你放心吧，别来管我。”

“我可不担心哟。”司机暗地里隐藏着嘲笑的声音，“只要把车费付给我。”

我感到彻底的耻辱，付完车钱，我就往黑暗的小道上一个劲儿地小跑，直跑到我们租借的房子里，那里围着篱笆墙，庭院深深。我连袜子也没脱就钻到床上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良重回来了。她脱光衣服擦完了身体，把我的衣服也脱光了。比起良重其他的情人，卡普里埃尔成了良重的情人后，良重老是显得特别累。可是我半醒半睡，在良重沉重而柔软的身体底下所感到的快乐，是两年以来我们一起生活所保持的习惯。

我双臂围着良重滑爽而过分宽大的背脊。然后，我冷不防

分开背上平坦的展开部，她屁股一开始就滑到我的左手上。我把自己的手指夹在屁股的分叉沟里。我喜欢随着良重身体的运动，手指上上下下那股压迫感和解放感。终于我的手指什么样的压迫都感觉不到了。我睁开睡意矇眬的眼睛。窗帘的缝隙处透出了晨曦之光，额头上泛着青白色的良重睡着了。

我把那沉重的身体从我身体上挪下来放倒在床上。我胸口和肚子上汗水淋漓。我用被单擦去了汗，被撩拨旺盛又没能满足的欲望只好又塞回身体里睡去了。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碰到。良重确实显得累极了。

早上很晚我才醒来。良重过长的胴体胖乎乎的，像埋在褐色木框床里的动物似的鼾睡着。这简直和两年前开始在一起过夜的时候相同。那时我才刚进大学，热衷于学生运动，曾被逮捕，谁知引导我参加过激行动的政治团体也不再理睬我了，弄得我走投无路。我极其粗暴地、性急地爱上了良重。我们两人老是眼睛周围有个咖啡色的圈。眼前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充满爱的浓重静寂气氛。那将在今后很长时间里继续吧，我决不会甩掉这个有着一副苍老的脸和生气蓬勃的身体、抱着强烈欲望的妓女吧。我一生都没有跳过，为了和这个女人生活，恐怕我会去当某私立大学的外语教师吧。只会看不大会去跳吧……

我把卷起的窗帘用把手固定住，关住了良重周围潮乎乎的昏暗，把门外放着的牛奶瓶拿进来放到床边的小桌子上，我把还在轻轻打着松垮垮呼噜声的良重撇在房里，径自往位于本乡的大学走去。

那以后长长的梅雨季节里，良重继续把卡普里埃尔当做情人。可我再没有和卡普里埃尔谈起埃及和越南的事。而且，我

对他所抱有的屈辱感也渐渐影子稀薄了。我又回到浓重静寂的气氛中去了。

梅雨过半，我变得常到学校里去了，甚至还去听其他系里的课。这主要是因为新学了拉丁语的关系。还有和卡普里埃尔、良重一起吃晚饭，等待黎明才归的良重渐渐大汗淋漓的快乐。良重说她喉咙上的肉完全掉光了。

七月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去横滨地下夜总会看脱衣舞。季节更换，地下室里虽然装着换气扇和冷气机，但也许找不到好的处理方法，那里还是十分闷热，人们汗流浃背，呼吸困难。我们走过高低不平的地板，订的桌子在舞台边上的幽暗柱子的阴影里。

矮个儿胖胖裸体女人的屁股，快碰到我的鼻子尖了，正在柔和地抖动着。有时，她踏响铺着亚麻油毡的地板；每次我都必须紧咬嘴唇才能忍住前仰后合的笑。灯光急剧地集中，一名青年女歌手绷紧嘴唇，脸色苍白地来到麦克风前；她穿一件草绿的衣服，一直遮掩到喉咙口。比起听歌手浑厚的低音，我更是让周围顾客们陷入的反应所吸引。裸体女人之后，忽然出来个衣服穿到领口的歌手，观众像被揍了一下似的骚动起来。我想：裸体女人晃着屁股跳舞的时候，肉体化了的确实是女人。可现在，在坚实地支撑住傲慢侧脸的女歌手面前，观众们倒像露出了肮脏的屁股、浑身赤裸着似的。

歌唱完了，裸体女人又上场了，这才松一口气地恢复了猥亵心情，我说：

“那女人，一直苍白着脸唱到最后的那家伙，好奇怪哟。”

“摆臭架子呗，音调也不准呢。”良重表现出对那歌手煞有介事态度的愤懑。

“经纪人说想让那姑娘在最后一场里脱一次，可那姑娘死活不肯。”卡普里埃尔说。

“啊?”良重轻蔑地发出无法忍受的声音说。“经纪人看到那姑娘的胸脯给吓了一跳呢。那姑娘呀，胸部扁平，两乳房的间隔可大着呢，谁也不想看第二次的哟。”

我想起那歌手绷得紧紧的苍白侧脸，笑了。卡普里埃尔催着我把良重的话翻译给他听，我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卡普里埃尔也笑起来。

天花板很低，细长的大堂里胡乱回响着四人乐队奏出的不规则音乐，一声不吭、眼睛不眨的观众和舞女的周围，洋溢着一种饶舌的气氛。

“你觉得淹没这大堂饶舌气氛吗？原形是什么呢?”我大概是醉了的关系，用母音过宽的英语说，“是光和影的饶舌。不是肉体本身，而是其印象摇曳流动的饶舌气氛。”

“别说好听的。”卡普里埃尔说，“咱也在考虑这件事。读过亨利·米勒[1]吧，那儿有的是道德的饶舌。”

“亨利·米勒，”我快活地说，“萨特也是。”

“萨特，那个优秀的萨特。萨特那道德的饶舌气氛。”

“别在搞同性恋那一套哟。”良重生气地说。

我们本想确认一下穿草绿色遮掩到喉咙口服装的姑娘，在最后一曲时有没有脱光的决心，展示一下她那扁平的，距离过宽的胸脯；谁知在这之前我们都醉了，只好决定撤退。而且，我们面对舞台大谈特谈萨特，滔滔不绝地交流着热烈称赞的语

① 亨利·米勒（1891—1980)：美国小说家。有《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等作品。

言，弄得良重赌气说要赶快离开。

车子在黎明的京滨国道上奔驰，车厢里，我们还在热烈地谈论着萨特。不一会儿，卡普里埃尔忽然提出萨特不能让日本人理解的主张来。我也好，卡普里埃尔也好都已经烂醉如泥了；良重想制止由那主张引出的争论，可谁知卡普里埃尔却越说越激愤：

“咱可是朝鲜战争时候的士兵啊。”卡普里埃尔说，“而且，咱们还把一个肮脏、渺小的日本人投进了‘有乐町’臭河浜里给淹死了呢。那时，日本群众谁也没过来揍我们，只是在一旁默不作声地瞅着呢。”

接着，卡普里埃尔又详尽地描述让他们投进河里的日本人，怎样怎样像条爬虫，怎样怎样凄惨、肮脏、微不足道，他絮絮叨叨地重复着。我听了开始有些光火了。

“良重也是那样啊，像那些日本群众，对于侮辱，他们表现得很柔顺，你不知道吧？想听听吗？”

“告诉我。”我让屈辱和愤怒弄得嗓子都哑了。

卡普里埃尔眼里嚓嚓地闪着光，嗤嗤地窃笑着扭动身子，用下巴指了指已经累得把身体深深埋在座位里睡着了的良重说，他和良重一次也没有性交过。他仰面躺在床上等着。裸体的良重把两个脚后跟夹在他的耳朵两边，面朝他的脚站好；然后，慢慢地弯下腰，当她的屁股伸到他眼前，眼看要擦到他鼻子时，她再根据他的指令把身体朝前倒下。于是，他张开嘴唇和牙齿……

“这种猥亵的姿势在其他人身上绝对办不到。”卡普里埃尔用唾沫舔湿嘴唇说，“我自己把毯子紧紧裹在腰上，一根小手指都不给她碰到。”

我愤怒得快要窒息了。我那火辣辣的肩膀还让卡普里埃尔的一条胳膊摇着。他越说越来劲儿。

"总之，我想过了，"卡普里埃尔说，"战争以来，日本人真的变老实，变温顺了。他们决不发火。眼看有人被丢进河沟里淹死，他们也只是无动于衷地默默观看。不管怎样猥亵的姿势都能容忍。那乳房距离间隔很宽的姑娘，早晚要公开的吧。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啊，如此懦弱的国民。你嘛，也不够意思哟。要给你去越南打法国人的机会，你就回答不出了。只会看着。一点不会发火，况且还没有跳一跳的勇气。萨特一生可都是'看之前去跳'人们的代表哇。"

随后，卡普里埃尔洋洋得意地唱起歌来。他用十分欢快的旋律唱着："Look if you like, but you will have to leap."

我决定脸朝窗外眺望。车子正好要穿过黎明前粗犷迷雾中铁支柱相连的桥。我让卡普里埃尔停一下车。他大概以为我想撒尿。于是敏捷地把车停下，打开了车门。雾气和又冷又硬的空气扑了进来，良重一哆嗦醒了，没好气地骂了几声。

我把挡风玻璃角上吊着的一个重重的铜制纪念牌攥在手心里，扯掉那上面的吊绳，钻到了车子外面。卡普里埃尔从铁柱子之间往桥下的沼泽地里，喷出冒着热气的尿。我从背后悄悄靠近，用变得又重又大的拳头，照着他那后脑勺猛击一拳。他慢慢地向前弯下腰去，就那样静静地倒在下面二米左右的沼泽地里。

我跑回去把惊呆了的良重拖出车来，为了远远离开那儿，我们迅速朝流逝的雾中走去。没走多远，我们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清晨回到屋子里呼呼地睡去。睁开眼时，我和良重仔细查阅刚送来的晚报，看有没有刊登外国人冻死、被袭击受害之类

的消息；可一件也没有。况且，警察也没有来逮捕我们。

我没有把从卡普里埃尔那儿听来的话说出来，也没有责备良重，为此，良重很感谢我。不一会儿，就像季节突变似的，睡醒了的我们，爱达到了高潮，于是，我们昼夜不停地做爱。

一个月过去了，停止发作的良重又找到了新的情人。不久，她喉咙口又像原来一样，丰满地长出了手指都捏不住的肉。我们在盛夏里，利用我的休假到海边的避暑地去。半路去一个车站换车，竟碰到了卡普里埃尔，他只是在老远的地方迟迟疑疑地挥挥手臂，没有跑过来招呼我们。关于那有几分滑稽的残暴事件，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都忘记了。

秋季开学第一天的下午，我在大学正门前的咖啡店里和助教会面。她那有雀斑的皮肤晒黑了，像小鸟蛋壳似的，变成可爱的小小脸盘。于是，我答应了她强加于人的请求。

助教让我答应拿很少报酬，当一名家庭教师。她高中时代的后辈同学，从乡下出来，准备报考艺术大学的音乐系。考外语她选了法语。助教希望我能帮帮忙。

“你有情人姐姐供你吃饭吧？还是一心一意的好名声呢。”助教劲头十足地问，“是这样吧？”

“是啊。”我说。

“法文系的人都这么说嘛。”

“老是说些无聊话的家伙们呢，我一听这种话题立刻就烦。”

“大家都这么说的嘛。”助教狠狠地说。

“那有啥关系嘛。”

“是啊。”助教慌慌张张地说，“所以你并不需要许多打零

工的钱吧？真希望你能便宜点。"

助教脸红起来，舌头舔着嘴唇。我生怕助教想要追根究底地询问良重的事。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于是，我就接受了家庭教师的工作。我觉得，反正不管做哪一件事，都是决定不了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周的星期四，我去等我的学生，出了学校北大门来到一个古风十足的咖啡店二楼。那儿音乐也没有，噪音也没有。只有初秋清新明朗的阳光，溢满了宁静的屋子。令人困倦。我打了一小会盹儿。

站在我面前的人，身体挡住了阳光，让我觉得冷飕飕的。于是，我醒了过来，抬头看见了站在我面前的女学生。她穿着直遮到喉咙口的上衣。我心里不觉"啊"地一惊。可还不能清楚地想起来。加上手指间甩不干净滑溜溜的沙子似的，摆脱不尽的朦胧睡意还留在脑子里。

她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拿出助教写给她的字体潦草的介绍信，赌气似的没做声。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充着血，读完了那份介绍信。田川裕子小姐，十八岁，今年报考，复试没通过。

我抬起眼，看到田川裕子胸部扁平，间隔距离很宽。这时我忽然想了起来。笑意在身体的各个角落兜着圈子，我紧咬牙关，防止它发出声音来。我的脸也因拼命憋住笑的发作而现出红潮，我什么也做不了。田川裕子越来越憋闷地说不出声音。我喝了口水，然后总算挤出了一点声音。

"实在对不起，真让人吃惊。"我说，"我在哪里看到过你的。"

"我知道。"田川裕子仍然表情僵硬地说，"我也见过你。"

“你在横滨夜总会唱过歌吧。”我有些颓丧地说，“怎么回事，真有趣啊。”

“你和外国记者还有个女人一起来的吧。”裕子说，“你们一直在说话，根本没想听歌。”

我想起了卡普里埃尔低下头慢慢朝沼泽地倒下去的情景，轻轻笑出声来。

“那外国人以后又来过吗？”

“下一周以后一直来，和其他女人。我还记得他头上缠着个大大的绷带呢。”

我再也忍不住，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田川裕子一副纳闷不高兴的样子。

“那你怎么样？还去那里干吗？”我笑得气喘吁吁地问。

“不干了呀。”裕子痛苦地皱起眉头说，“盛夏那会儿就不干了。”

“为什么？”

“那经纪人要我脱光了唱嘛，这种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就是那经纪人神气十足，我觉得太不像话，就不干了。”

我又笑得直不起腰来：

“他说，你不脱光观众要发生暴动之类的话了吧。”

“我真脱光了，气咻咻的观众可真会发生暴动呢。”

我想起良重的话，笑了。田川裕子也抽动着短短的鼻子得意洋洋地笑了。我为良重的眼力而高兴。

“不干了，也好。”我用手背擦去泪说，“后来呢？”

“后来嘛，”田川裕子再次恢复到苍白僵硬的表情说，“你能做我的家庭教师吗？”

“可以呀。不要钱地教你。”我说，“不管怎样先试试看

吧。”

裕子把法语初步的文典和习题集，与乐谱一起插进纸绳编的口袋里。我简单地翻阅了一下，跟她说好以后每周平均两次在咖啡店里会面，就和她分了手。我决定除了那些书以外，再一起读一下精选用作教科书的列那尔[①] 的著作。

深夜，我和良重一边做爱，一边谈起我的学生。良重喜欢在做爱时喝水、吃东西，要不就是没完没了地胡侃。我说起卡普里埃尔头上缠绷带的事，她笑得前仰后合，结果，她那大汗淋漓、滑溜溜的沉重的肉体，在我的胸膛和肚子上老是安定不下来。良重将笑的残余保留到歪斜的嘴唇和僵硬的脸颊里，同时进入快乐之中，大声地喘息起来。我沉浸在温柔的满足里闭上眼睛，想着田川裕子那张苍白的小脸。我对无报酬地教授法语变得起劲了。

下一周起，我星期二、星期五会见田川裕子，教授初级法语。裕子默不作声地盯着课本，用功地学习。我们的课进行得很顺利。

我下午三点穿过大学的北门，去咖啡店二楼，那时，田川裕子已经在边预习边等我了。于是我教她语法，让她读列那尔的短文章，静静地，黄昏来临了。这一年的初秋，一直是好天气。而且，从咖啡店的二楼窗子，可以望见大学校园内浓浓的橘色银杏叶丛和黑色的树干，被热乎乎的黄昏之光照耀得明晃晃的，特别显眼。往下，能看到右方丘陵那边的操场，长着强劲下巴的学生们，让汗水和泥土弄得浑身湿漉漉的，正在踢足

---

① J. 列那尔（1864—1910）：法国作家，著有《胡萝卜须》、《葡萄园里种葡萄》等作品。

球呢。

田川裕子很难想起“动词变位”，她一声不吭地思考着，窗子里射进的光，给她瘦瘦白白的侧脸一个明显的轮廓，我沉浸在沉重的寂静里瞧着她。学习完了，我们换了杯咖啡，说几句短短的话就下楼，在店门口分手。下楼来的时候，有时也许在一楼的吧台边，挤满了刚练习完毕的田径运动员，汗臭蒸腾弥漫；有时，店门前的马路上，良重和她的情人停着车等我。

有时也让田川裕子搭车，送她到“茶水车站”去。这时，良重一声不吭，没好气地瞅着田川裕子，那眼光像把她看成一只被抓住的老鼠似的。田川裕子呢，闷声不响紧咬着下嘴唇，看也不看良重一眼。尽管有这毛病，良重还像对田川裕子抱着好意；就是田川裕子，也说良重仪表堂堂很出色。

良重好歹做了近十年的娼妓。而田川裕子还不过是个小姑娘。我也这么想。裕子对我和良重的关系，决不表现出好奇心，对我来说正中下怀。教授开始一个月后，碰到了助教，我告诉她田川裕子正积极地学着呢。

秋天过半，还不停地下雨。而且，气温下降，终日冷森森的。良重坐骨神经痛发作了。我得半夜爬起来，把布浸在热水里，然后捺出来，往良重紧绷绷圆滚滚的胖腿上敷；肉长得太多了，似乎敷了也不管用。良重不高兴，老是嘟嘟囔囔地唠叨个不停，有时还迁怒于她的情人。

那一天，又是下雨。关于十八世纪文学评论的特别讲座，拖长了时间；出教室时，和田川裕子约会已经超过三十分钟了。文学系和法学系之间的小道上，铺满了雨点打落的银杏树叶，我在那条道上奔跑起来。出北大门是一条铺着小石子的下坡道，我刚踏上那短短的石阶，立刻就发生了轻微的贫血。我

踉踉跄跄试着踏稳双脚，结果，忽地软下来，一屁股跌坐在石阶底下的水塘里。

我屁股上的皮肤，腿的里侧，下腹部都渗进了冰凉的水。我垂着头，身子抖抖地站了起来。有几个学生从钟楼前的高处，朝下望着我。我勉强站起来走了几步，转过工学部大楼的拐角，脱下雨鞋，把灌进里面的水倒出来。

田川裕子正从咖啡店的门里出来。她极从容的眼光瞅着我贴在腿上的裤子。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裕子说。

然后，裕子摇了摇小圆脑袋笑出声来。我火气上来了。

“摔了一跤。”我不高兴地说，“我身体一歪‘啪’就是一跤。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呀。最近似乎真乏力哟。”

“嗯，嗯，”裕子一副亲近得忘乎所以的样子说，“你冷吧。”

“是啊。”我说，真的很冷，“我好怕冷。”

“不行啊。”裕子咬着下嘴唇说，“要伤风的，不换衣服的话。”

“能不能到大学的卖品部去帮我买内衣和毛巾？”我擦着鼻涕说，“我在那个旅馆里等着换衣服。”

咖啡店的左邻，看得见高台上有个旅馆，古色古香的三层楼房。我和良重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去那里，已经走熟了。

“那我就快去了。”田川裕子用紧张的声音说，“马上给你买来，你先把衣服脱了钻被窝里去吧。”

那旅馆，就是大白天门口也很幽暗，我用雨衣盖住湿透了的裤子，要了个房间，然后爬上同样幽暗的狭窄楼梯，进了三楼的一个房间。因怕冷，肚子疼起来。女招待端来茶和点心

时，我已经脱光了，就那样一丝不挂地跳到床上，用被单擦起身子来。被单擦着皮肤，立即热乎乎地充满快感。我打了个哈欠让身体平静下来。

田川裕子进屋子里来，她抱着纸袋，看上去挺兴奋。我换衣服时，田川裕子暂时跑到走廊上去。可后来，裕子让我把毛衣撩起来，她用毛巾从背脊下部到屁股，“咕吱咕吱”擦得我生疼。然后，我穿上了内衣。可是，长裤子从上到下湿透了，只好拿到汽炉子前面去晾着。我们并排坐在床上，等待长裤子晾干。两人一句话也没说，房间里带潮气的空气让我们从脸颊到耳朵都是热辣辣的。我和田川裕子默默地拥抱起来，我们的身体陷进床上。还是一言不发地互相爱抚。那可是短短的不太尽兴的一次。我想起了和良重的做爱。良重老是身体颤抖，喉咙里迸发出嘤嘤啜泣似的声音喘着气。而且有时，那期间，她会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可我们现在只是长久地互相拥抱，和田川裕子在暗中悄悄地、默不作声交换着的行为，大概不能叫做爱吧。

那天夜里很晚，和良重并排躺在床上时，我立刻确认了一种放心。这种关系的确与田川裕子的关系不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背叛良重。我威猛地面向良重。良重用那几乎是哭喊的尖叫声，追溯着我的强劲。做爱之后，良重像狗一样发着声音，嗅我的肩膀和胸口。我对她那恶作剧似的眼睛报了个微笑。不一会儿，响起嘹亮的打鼾声，我往良重柔和的侧下埋进脑袋，这才完全放心地睡熟了。我们两人之间一直相安无事。

下一个星期二，和田川裕子相会时，她还是闷声不吭。我们按平常的时间学习完了。田川裕子绝口不提那天下午在旅馆的事。我也不提那事。可是，我们之间确实建立起了一种类似

极其亲密的握手关系。课结束了，发酵的黄昏空气纠缠着田川裕子那消瘦的充满感情的侧脸和圆圆的额头，十分美丽。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去旅馆。在那里我们不说一句话，只静悄悄地在床上连接。

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天。由于星期六晚上和情人在夜总会跳舞到深夜，良重腰酸腿疼，再加上烂醉，真是苦不堪言。我用拳头轻轻地捶着良重的头，手指用力挤压她的太阳穴。良重的头在我膝盖上小小地缩成一团，透过头发，头皮微微发青。我轻轻捶她头的时候，良重一直紧紧闭着双眼，额头上挤出皱纹，不停地哼叽哼叽。我的手指不一会就让头发上涂的油弄得粘乎乎的。窗外，冬天第一场雨静静地下着。鲜艳柿色的树叶被雨给打湿了，贴在关紧的玻璃窗上。我久久揉搓着良重的头。良重常常张开嘴，露出厚厚的肉壁，吁着气，那里孕育着金属质的不和蔼、令人讨厌的气味。我就像面对一个已经跟随了二十年的爱人一样，充满温柔和厌恶地揉搓着她的头。我既没有希望，也没有必要维持下去的生活，正在静静地充实。至少我用不着忙忙碌碌。到了下午，良重好些了。她浮肿而发青的脸盘撑满了三面梳妆镜，轻轻地呻吟着。良重说，即使想化妆她也无从着手。我抚慰了她。她不高兴地嘴里嘟嘟囔囔，勉勉强强地完成了那困难的作业。

出租房子前，雨水打湿了小石子路，路上传来了闷声闷气的喇叭声。良重的新情人对我很忌讳。于是。良重慌慌张张地出去了。我又回到深深的解放感和放心感之中。我又沉沉地躺到床上去，闭上了眼睛。时间过去了，我一直躺着。

忽然，电话铃响了。房东的女用人在楼下叫我去听。

我脱下宽松的睡衣，打着赤膊，套上裤子和上衣就匆匆跑下楼去。大概又是良重那睡意朦胧的声音要招呼我吧。谁知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个年轻姑娘的紧张声音。田川裕子在说话。

“是我。”我说。

“在你面前说不出口，所以，”裕子像是带着几分怒气的声音说，“在电话里跟你说，我现在在电话亭子里呢。”

“怎么回事啊？”我问。

“我要生孩子喽。”

“啊？”我说。

“我怀孕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直喘着粗气。像被人从背后打了一拳似的，我一下子懵住了。接着，我全身火辣辣地热起来，紧紧握着听筒。

“而且，”裕子泄气的声音继续着，“我吃不准是不是受着你的爱，对你的生活方式也不了解。我只能自己处理掉这孩子了。不过想告诉你一声而已。”

“你别说傻话。”我突然让狂喜的情绪冲昏了头脑，“别说傻话了，咱不会让你随便干的。我马上去见你，等着！在那咖啡馆二楼等着！”

“我今天不想见你。”裕子孩子气地说着。

“咱可有见见自己孩子的权利嘛。你别瞎说。”

听筒那边传来轻柔的啜泣声。我想说几句鼓励裕子的话。只觉得胸口堵得慌，只能默默地挂了电话。

上衣的胸襟敞开着，我捶着自己裸露的胸膛，站在电话机前发抖。我喉咙里火辣辣地干燥。我赶紧跑回屋子。脱了上衣，刚要穿衬衫，忽然想起自己的手臂、胸脯、肚子上都还渗

透着良重的气味。我赶忙把毛巾在冷水里浸一浸，往身上擦起来，直擦到皮肤红红地生疼。我身体生气勃勃血色很好。我对自己的皮肤、筋肉、松软的肉、硬硬绷紧的肉都充满了好感。我让狂喜冲昏了头脑。“这混蛋，这混蛋，”我狂扭着身子想着，“咱在现实面前难道就只会夹着尾巴缩回去吗？难道咱决不会往现实里跳吗？咱和现实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现实和肉体合伙，用热乎乎、黏乎乎的分泌液，湿漉漉地弄潮了性器。咱要生孩子了，那家伙要生了。咱什么也不能做？咱吗，妈的，活着，甩掉麻烦纠缠，好好地活着。”

我肩上披着雨衣在小石子路上一溜小跑。雨静静地从头上流进了颈子。冰凉的雨点打着我热乎乎的两颊，心里很痛快。雨水慢慢地流到了嘴角。我得意地简直想大声叫起来。我洋洋自得。

地铁里一片混杂。电灯出了故障，一片昏暗。人们疲劳苍白的皮肤上浮起了污垢，板着脸谁也不做声。他们真丑。可我感到与他们有牢固的连带感。一到晚上，他们的性器便硬了起来，她们的性器潮湿着腾起轻轻的气味扩张开来，于是，他们之间喘着粗气发生了做爱的行为。于是，他们要生孩子了，我和他们手挽手要生孩子了。咖啡店门口，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个用布包裹起来的孩子，站在那里避雨。我冲她笑了一下，推门进去。

田川裕子用奶黄色雨衣裹着身体，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她兴奋得脸上充着血，给人厚实的感觉。我生怕自己鞋的震动会从地板传到椅子，再传到裕子的下腹部，让新生命萌芽颤动起来，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裕子又浓又长的睫毛低垂着，深深盖住了眼睛。我在她面前坐下。

于是，我们四目相对。田川裕子眼睛里湿润润的，亮亮地闪着光。眼的周围少许显出些疲倦，看上去老了几分。眼睛深处，汹涌亢奋的感情实实在在传到了我眼睛里。

“真是那么回事吗?”我问。我一点也掩饰不住兴致勃勃的情绪。

“做过兔崽子实验了哟。”

“我想给这兔崽子吃草哟。”

“你高兴?”裕子紧紧盯着我问。

“高兴。”我直率地说。

“我看到你淋着雨跑过来，还笑嘻嘻神气得很呢。”

“是啊。”我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头发已经淋得湿透了，我赶快站起来擦去头、颈子和脸上的水。

“看见你跑过来，”裕子说，“就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可一下子心情全好了哟。我生下这孩子吧。”

“你就是说不想生，”我用力地说，“咱也不答应呀。”

我们说了许多话，兴致勃勃，漫无边际。田川裕子也始终兴奋着。她脸上又充血了。这让我想起我们做爱动作开始时，随着柔软潮湿的接触渐渐往深处去，热乎乎安定的短短一刻到来了，她被筋疲力尽的期待所控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张面孔。憋闷地袭来了最初快乐的闪现，充满沉重爱的面孔。

我的耳朵里已经听不见裕子说的话。一股迅猛的欲望向我袭来。我用沙哑的声音催促裕子到外面去。我的欲望立刻感染了裕子。我们踉踉跄跄，一步步踩着台阶下了楼。雨下个不停的马路上，抱孩子的中年妇女还在那里站着。我和田川裕子用充满爱和理解的眼光注视着她。

我们坐上出租车，在雨中疾驰，去了位于高台的旅馆。现在我们为了渐渐胖起来的孩子轻轻地拥抱。田川裕子像头濒死的野兽，躺着一动也不动，平静地呼吸着；我感到，一开始自己的快乐就传给了裕子。我觉得身体里净是欣喜般充实的健康感情，我小心翼翼地蠕动着腰。这和良重做爱时的运动完全不一样。阳光普照的森林，香气扑鼻的树液，膨胀起来的嫩芽。我忽然觉得孤独的情绪在扩散，那是谦虚夸张却又健康的孤独。我在确实的连带中。我们喷吐着热烈的气息。

黄昏幽暗的灰褐之光关闭了玻璃窗，我醒了过来。我的脸旁边是盾牌上深深刻着田川裕子那淡栗色的肚脐。那下面皮肤的深处，还有螺旋生长展开而去的栗色毛丛，皮肤深处，正孕育着我们的孩子。我抬起裸露的肩膀。裕子在围成金色角落的光线里，小小下巴上的汗毛闪闪发亮，沉沉地睡熟了。紧闭双眼的眼角里还留着一小点泪水，随着呼吸一晃一晃的。我觉得田川裕子放心地睡熟了。于是，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穿好衣服。我决心就在今晚和良重分手。然后，我摇醒了田川裕子。

我回到了良重的房间，整理我的东西很费时间。可是，行李只有一个箱子全塞进去的分量。我把箱子上的皮带收紧，把它横放在地板上，稍微休息一下。夜深了，我一直坐着，微笑像气泡一样浮起来。我抱紧自己的身体。接着，躺上床，喜悦让全身战抖着，我想着田川裕子。我像个长时间干了活的体力劳动者一样十分疲劳。我像体力劳动者那样疲倦透了。就这样进入了浅浅的睡眠。

大门口开钥匙的声音响起，我醒了过来。激烈的紧张感攫住了我，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良重低声唱着歌进屋来了。她有些醉了。她的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每次都重复同一个调

子。良重在我背后点亮了一盏小台灯，借着那光脱完了衣服，只穿一件孩子气的镶边内衣便出去了。扭水龙头的声音传来。我扑扑心跳地等待着。也许应该现在就起来，正襟危坐地摆出有话要说的样子吧。可我还是一动没动。

洗脸盆里的水冲掉了，良重鼻子里哼着小调又回来了。她的歌就一句，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Oh! happy days……”

就唱这句。良重一丝不挂，用洗脸盆里浸过的毛巾擦起身子来。我盯着良重凸出肚子的肥胖肉体看。她悠然地，职业化地、周密细致地擦着胳肢窝和大腿。良重过胖的肉体和短短的手臂和脚，在阴暗的光里胖鼓鼓的，实在不好看。一种类似怜悯的感情攫住了我。我伸出颤抖的手，按了一下床边上的开头，房间里的大灯亮了起来。

良重赶忙跑去关窗，我往下瞧着她那长长的背和垂下的屁股，坐了起来。我喉咙里干燥极了。

“起来等我吗?”良重回过头来问，“呃，少爷，是吧?”

我牢牢盯着良重摇了摇头。我不想说话。可又不能不说。我直起身，两脚垂在地板上。我刚想开口，良重一眼看到抽紧皮带的箱子。

“啊?”良重问，“你想去旅行?”

我又摇了摇头。良重的脸上眼看着失去了血色。她的裸体血色饱满，脸却是白白的，给人一种实在不协调的奇怪感觉。

“到底怎么了，你打算干什么哟?”良重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要走了。”我说，“我决定从你这儿搬出去。”

良重想用说笑把这话给打发过去。可她那退了血色的两颊僵硬了，拒绝她的微笑涌出。良重说：

“说什么呀?”

“我打算今晚就走。”我说，“希望你能理解我，不再跟你一起过了。”

“真不敢相信哟。”良重尖叫了起来，“你想说这话来骗我吧?”

我咬着嘴唇注视着良重。良重的身体开始打颤。

“为什么你要搬出去，少爷?”

“咱要过自己的生活哟。”我说，“现在这样的生活太没有结果了，我不想过了。”

“和那姑娘一起生活吧。”良重忽然睁大眼睛问，“不是什么想不通的事呀。”

我垂下了眼皮。羞耻动摇了我。

“和那姑娘在一起就能有结果了吗?”

“我们要生孩子啦。”我禁不住脱口而出。

“孩子?”良重大吃一惊说，“孩子生出来就算有结果了吗? 就是这无聊的故事呀。”

我没有说服良重的自信。我不知道生孩子这种事给我的冲击，怎样才能说清楚。

“别想傻事了吧。”

“我要搬出去，这念头不会打消。”我一字一顿地说。

良重盯着我看。她把两臂像类人猿似的抱着，黄澄澄的胸、腹部皮肤轻轻地上下波动。我无可奈何地看着良重大眼睛里渗出的泪水。良重慢慢地走过来。然后，她跪下来，使出好大的力气握住我的手臂。我疼得呻吟起来。良重哭起来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弄湿了我的膝盖，透过布料暖乎乎地渗到我的皮肤上。良重一面抽泣一面央求，“都一起呆了两年了，”她反反

复复地说，“真的，两年来一直相安无事嘛。”我忽然感到两年的漫长岁月，又恢复到我面前来了。我让哀痛抽紧了心。我把良重的手臂无情的甩开了。

“无论如何也要走啰?”良重抬起燃着怒火的眼睛问。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良重站起来，让后背和屁股的肉打起皱褶，奔去梳妆台。她气喘吁吁地跑去看着抽屉。那里面该整齐地放着良重积攒的五十万元。我茫然地望着良重对我起疑心的那番调查。

不一会儿，良重一屁股坐在地上，肩膀上打起皱褶，筋疲力尽地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站起来抱起了箱子。良重像狗一样大喘着气盯着我看。我打开门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天已经亮了。清冷的空气袭来，让我有些害怕起来。我觉得自己也许做了一桩徒劳的事情。可我还是向前弯着身子，急匆匆地在小石子路上走了起来。第一趟电气列车正从对面一排参差不齐的幽暗房屋前驶过。

直到太阳升起，我都在深夜营业的咖啡吧台前坐着喝茶。然后，去了朋友租借的民房。他是个心地善良又不太讲究的老好人。我在他房间里安顿了下来，又去了大学里的打工介绍所。于是，下午五点以前，到处奔跑，一周一次的家庭教师工作，一口气找到了七处。每天换一个孩子，教他们英语，或是法语；一周结束，又回到第一个孩子再重头教。又经过大学院学生的介绍，弄到个帮人翻译通俗小说的差使。那是个女作家通过幻想写成的西部牛仔小说。粗犷的男人们，拿着金属杯子咕嘟咕嘟地喝着不掺水的威士忌，躲在树阴下小屋里啪啪地打枪。月亮升起来，他们边唱歌，边把靴子上的马刺钉在马车木

轮上等待情人等等，都是些无聊的情节。

工作的事大致定了下来，我就给田川裕子住的同乡会宿舍打去电话，让她到大学边上一个小饭馆来约会。她很热情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我们吃了端来的劣质小菜。下午七点，为了考试，田川得去上钢琴课，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我们在大学图书馆大楼边上昏暗的散步场上走着。我充满了精力。我唠叨不停没个完，裕子听着，很冷静、很认真地一一点头呼应。后来，我们又来到医学系大楼前，再没有时间了。我们互相笑笑，慌慌张张地分了手。我目送着田川裕子向电气列车道那边跑去，她脚步坚实，毫无危险、稳稳当当地在木砖地上走着。这可是深思熟虑的年轻母亲走路的样子呀。我像个乖巧的孩子一样长时间地微笑着。

我热心地忙着工作。实在太忙了，和田川裕子一星期最多见上一次面。连学校的课都弄得无法出席了。可是，和良重一起生活时几乎没有引起我兴趣的法国现代文学，居然开始吸引我了。在去做家庭教师途中的电气列车里，深夜里，我都粗鲁地翻着书页埋头阅读。我曾经很瞧不起那些不聪明的用功者，看不起那些脸上浮着老好人微笑跑来借研究室新到书刊的打工学生们。可现在我同他们完全一样。而且，他们的一切就是这样，因过度工作而疲惫不堪，却获得了稳妥的满足感。

一个月过去了，年头交换之际，我们自己一点点富裕起来。田川裕子为了考试还得去上声乐课，每周增加两次，那学费都是我给付的呢，尽管如此，还有相当的余钱。于是我们准备寒假到“雪国”去过上几天。

我们一大早从东京出发，一直到了松本市。然后，我们坐

上在桑田间疾驰的电气列车和公共汽车。忽然在我们周围出现了弄脏了的褐色雪。汽车在路中间慢慢地往上爬，到黄昏才停住。一下车，雪又重新积起来。我们听司机说才知道：因为下大雪，汽车只能在那里调头，而我们要住的白骨温泉还得往上走，有相当一段路呢。我们请求电话联络，踏着雪往上挺进。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突然，天上“沙沙”地下起雪来了。道路右侧有个深谷，从那儿涌上来阵阵水声，我们默默地慢慢走着。忽然出现了两股岔道；站在分歧口上，我们不知该往哪里走好，右面的路连着架在河谷上覆盖着雪的大桥，我们选择了沿着山腹较宽较安全的那条路。虽然完全是黑夜了，但在明亮的雪地里走并不困难。

雪道闪着清冷的光。那路仿佛通往无边无际的天空。周围，夜森林的深处，响起树皮开裂的声音。每棵树都像个老实的人。我们皮肤上渗出了汗，忽地又急速冷了下来。可是我们寻找的目的地村落，就是不出现。我们累极了，只能在倒下的树干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口渴了就吃几口雪。田川裕子频频打瞌睡，有气无力地打着哈欠。

我们正要继续出发，这时在道路相当远的下面，有几个男人打着电石灯边叫边跑上来。听他们说，我们走错了道，假如这样一直走下去，肯定会冻死的。我们累极了，连说话都感到吃力，所以，无法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意，跟着他们指引回到了老路上，于是，渡过黑乎乎深幽幽的河谷，绕过凸出的山腹，那儿豁然开朗，终于来到温泉地。我们进了旅馆的门厅，弄掉鞋子上的雪，围坐在煤气暖炉旁。这时，恐惧忽然抓住了我们。

夜里，风一直很大，从防雨板窗的缝隙里吹进来的雪，啪

啪地打在隔扇门上，在边廊上堆积起来。我们七转八弯走过暗渠似的走廊，去浸泡温泉。裕子的胸脯黑乎乎的，可那形状也并不见得不好。两乳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不均衡的感觉。裕子说，和我做爱一开始自己就不再是“平板胸脯”了。裕子脸上白净的皮肤和变大了的眼睛，都明显表示出她在怀孕；透明的温泉水中，泛着青色的小肚皮，几乎没有鼓出来的样子。可裕子说，那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回到房间吃了迟到的晚饭。女招待说我们很相像，简直是兄妹两人。我们两人谁都没有欲望，像兄妹一般睡下了。

清晨，我们看到旅馆院子的白桦上，只有东面沾上了雪。接着，又看到了大雪覆盖的群山那柔和的棱线。有人来请我们滑雪，但我生怕裕子跌跤，只得婉言拒绝了。天冷，我们一直焐在暖被炉里。下午很晚，裕子和上了年纪的旅馆女主人去泡温泉，回来时说，女主人教了她许多生头胎的秘诀，她兴奋得脸颊通红，对我说明了那听了令人吃惊的猥亵，令人吃惊的优美技术，可我听不太懂，终于火了起来，她也就不做声了。我们几乎不大说话，交换着沉甸甸的微笑，甚至完全忘记了做爱的行为，两天就这样过去了。回家那天，我们都已经在穿烘干的鞋子，而女主人和女招待还在争论不休，讨论着我们到底是恋人还是兄妹的问题，得不出清楚的结论。

寒假一完，我又埋头于家庭教师的工作，田川裕子又专心去补课。她看上去有些憔悴。我很担心，可在考试之前，什么办法也没有。田川裕子说，先考试录取进学校后，再休学去生孩子。而我却想着放春假时回趟乡下，把结婚手续给办了。

寒假结束的考试开始了。田川裕子过度兴奋地告诉我说，她学科和实际操作的考试都不错。接下来是简单的面试。过一

周后就是身体检查了。

女子考生的身体检查从下午很晚才开始。我在学生诊疗所前的小土丘上，等着田川裕子检查完了出来。我靠着一棵树，与它相连的浅浅森林那边是草坪，从美术馆里出来的人们悠然地行走着。我怀着充实而平静的情绪望着他们。在我周围，某种寂静已经充满芳醇，无一丝苦味。柔和舒缓的时间流逝着。

从诊疗所幽暗的入口处，看见有几个女学生簇拥着耷拉着脑袋的田川裕子一起出来。我连忙跑过去，过分激烈的冲击让我的身体发硬了。田川裕子说她不正常。她垂头丧气，下巴颤动着走了过来。我叫了她一声。可田川裕子只是有气无力地朝我头顶抛来茫然彷徨的一瞥，像要从我面前走过去似的。她的眼睛像生了病的小鸟。

“哦?”我和田川裕子并肩走着时问她，“怎么啦?”

“啊。”田川裕子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声音。

然后，她嘤嘤地抽泣起来。我的心抽紧了。田川裕子的鞋被草绊住了，她站在那里解开草结，两手捧着脸痛哭起来。她的喉咙像男孩的喉咙，抽动着，一阵阵痉挛，断断续续漏出哭声。别的考生，现出冷淡的脸颊和下巴，都绕过我们走了过去。

“喂，到底怎么了嘛?”焦急的悲哀情绪向我袭来。

“哦。”裕子发出了一声声呻吟说，“哦，哦。”

激烈的爱的日常反复，潮涨潮落般的反复，现在，爱在我的身体里蓬松松地涨了起来，它让我的身体直打颤。我向田川裕子伸过手去，使劲托起被泪水弄脏的下巴。田川裕子狠狠地咬紧牙关拼命哭。从蜷缩的嘴唇之间可以看得出集中全力退了

色的牙龈。那牙齿被唾沫或流下来的眼泪打湿了，亮晶晶的。我盯着裕子让泪水模糊湿润变红了的眼睛，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可以叫它停下来的东西。

“怎么了?”

“我呀。”裕子用力甩了下头，擦把眼泪吐了口粗气说。

我等待着。

“我生孩子的事，”她一边抽泣一边说，“医生说等于自杀哟。我胸口狠狠挨过一下的。”

我身体上，所有的皮肤都唤起一种充满激烈感情的勃起。我晃着火辣辣的脸叫道：

“这种事让人无法相信。”

“我也不愿相信呀。”裕子说，“可不就是那么回事嘛。”

“是啊。”我呻吟着。

我的心里刚开始涌起无数的冲动，就这样一下子融化破灭掉了。我盯着裕子充血浮肿、映出我吃惊的眼睛；我盯着她僵硬的小小下巴。我真的像死了一般被打得爬不起来了。我真想丢下裕子自己一跑了之。

“真不可相信。”

“我也是的嘛。”裕子说。这回她垂下头，嘴唇颤抖着哭了起来。

哭着的裕子一身孩子气的疲劳很难看。我瞧着裕子黝黑的细细颈子，实在难以忍受。我兴奋得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硬是把田川裕子拖到蔷薇科的灌木丛里，让她在脏兮兮的石凳子上坐下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说。

“比什么都要紧的，”裕子说，“必须做人工流产呀。”

我口腔里满是热辣辣的腥味，我没有做声，直盯着自己弄脏的手指看。我没有再要说的了。我止不住索索地打着抖。这颤抖也传染给了田川裕子。天决算不上寒冷，但我们两个互相嘴唇发紫，抖个不停。我们之间长长地沉默不语。

还是田川裕子先开口。她用战战兢兢的声音，一口气地说着充满可怕和寂静气氛的话。我十分有耐心地、惊奇疲倦地听着她的诉说。她说了经过，引用医生的话和说明极为详细。忽地，我让一个小小的疑惑逮住了，我问：

“你对结核了解得可真详细呀。有一种预感呢，还是读过了什么书?”

“就是有预感，就是有前驱症状，这种病也是没有办法的呀。”裕子说，“没有办法吧?”

裕子忽然又将脾气带回了身体。看来只有留给我，服服帖帖反复点头，这样才能让裕子的嘴闭上。

“你打算让活着的嫩芽在肚子里发育，却原来把死和肚子粘和在一起啦。”我为了鼓励裕子故意想开句玩笑，谁知句尾还是颤抖不止的；于是，这句话对我、对裕子只引起了无聊的效果。“十三点的话。”

“十三点的话。”裕子狠狠地说。

那声音里孕育着苦涩模糊的敌意。然后，田川裕子用迟钝的动作，背靠在石凳子上，歪歪倒倒地长吁短叹。那明显猥亵地表示：上午以前抓住她的，失去了光泽的爱之沉重，沉溺于她所有动作里；她忽然变成必须由死来保护自己，在她身上难以看到柔韧。我挪开眼睛，往裕子的肩膀上伸过手臂去。

“喂。”我说。裕子在我的臂弯里，像性交后身体蔫了似的，时不时地打着抖，缩得又难看又瘦小，情欲上涨般凄惨地

哭了。我必须挤碎折磨自己心胸的厌恶感。我们像两头动物的幼仔，摩擦着僵硬的侧腹坐着。我们的头顶上，浓厚的夜之空气，像展翅飞翔的大鸟似的铺天盖地。

寒气迅速地布满了周围。在那里再也坐不住了。我们站了起来，踏上最初让雾气吹拂的木砖道上，朝着上空红红一片的街道走去。

我感到，那个胎儿插在我和田川裕子之间狭窄的空隙里，那个已经决定该去死、缓慢引起自我崩溃作用的、胖乎乎睁大没有视力的眼睛拼命瞧着的胎儿；也许，因此我们才高低不平磕磕碰碰地走着。已经淡忘了的、我们恋爱前充满日常倦怠的生活，又慢慢爬起来，我们都想重新振作起来。我给不安攫住了。我又好几次地打起抖来。

"难哪。"裕子像呻吟一般说道，"找不到好办法哟。"

裕子和我又默不作声了，特地躬着背，在头顶上沙沙作响的枯叶和鞋底"噗"地吐出水花的落叶之间行走着。裕子嘴里不时小声嘟囔着。我觉得裕子翻来覆去地说着"难哪，难哪"。

我被一种决意控制着：从裕子想让我抱住她的时候起，我就在盘算在短时间里解除这种不安。我一点欲望也没有。在虽然已决定要被杀掉，可眼下还让稠乎乎黏膜包裹着、一个劲儿想胖起来的胎儿小嘴边，让性器沉陷下去可实在是你的不好。

裕子忽地站住，抬起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我让恐慌抓住，拼命地摇头。

"啊?"裕子说。

"明天，"我被逼得实在太痛苦了，"明天，去找医院。然后，打掉孩子就好了吧。小事一桩，你放心就是了。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裕子的身体直打哆嗦。我对自己说的话绝望地生起气来。真想把它从裕子的耳朵里给抠出来。可是，我们已经勇往直前，朝着搅在一起的不幸中跳了进去。什么都挽回不了了。我想亲一下她冰凉的耳朵，裕子慌忙从我身边厌恶地抽开身，用狠狠的沙哑声音说：

"是啊，一会儿就会完的。简单的事哟。难的事嘛一件也没有。第一次弄掉孩子，说什么都会干得好的。"

真让人为难的是，医生对准小小下腹部隆起的部位，抡起手术刀，把蹲坐着的孩子，乘他还未发育之际，咔嚓咔嚓地捣碎，掏出来放到银色的盘子里。这我很清楚。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事，实在是无可奈何。

我们决定去找医生，悄悄进行这沾满耻辱的堕胎。堕胎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固定地形成了肮脏而又凄惨的印象。我们到处寻找与此相称的医院，在早春清风吹拂的大街上走着。弄堂里，暗渠的入口敞开着，散发出沟里的臭气；板壁、干鱼，一律朝阳的鱼店背后；下水道泛滥的广场，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

走了很多路才找到妇产科医院的大楼前，阴暗玻璃窗后面，脸色苍白的住院病人正在向外张望，从大门后走出来一个女人，颈子上满是污垢，脸上布满了小颗粒的汗珠；一看到她，我们二话没说拔脚就离开了。我们又走进一家狭窄的大门，大门里，连医生家属的衬裤之类的东西都杂乱地抛撒着。进了大门，忍耐着在候诊室的椅子上坐下来。可是，在候诊室那翘起的三夹板墙上，挂着些只给人猥亵感觉，极度幼稚的画：按月排列成长起来的像干鱼似的胎儿画。我们等着叫号，谁知这时，不苟言笑读着娱乐杂志的孕妇们和护士们，都朝我

们抛来充满好奇的目光，我们再也坐不下去了。从这家医院所在的弄堂里出去，刚才墙上挂着的画，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赶也赶不走。我想，大概孕妇见了那个会心里高兴吧。可我真想吐。

一星期内，我们四处寻找着。我曾想去和良重商量。可那不行。对我来说，实在感到太屈辱了。

十天以后，我们只得下决心了。于是，我们随便挑了个下街的小医院。候诊室里，没有其他的客人。医生的孩子正在玩“套圈圈”，他每次都投不中，几乎哭了出来。裕子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地注视着。

我对护士开口说话。她非常懂事，事务上又特别机敏。我们走进了诊疗室，那里很合理地做成能大量冲水的地面，放着一张赤裸的诊疗床。那儿等着的中年医生长着个海豹似的脑袋。他用鼓励的、强劲的声音询问着田川裕子。我倒是一直注视着他那粗粗的、猥亵的手指，那手指背面密密麻麻地长着可怕的黑毛，圆圆的手指在膝盖上一会儿握住，一会儿绞在一起。医生的白大褂上，沾上了莫名其妙的污迹。

忽地，我一阵恶心，站起来跑向屋子角落里那个没有擦去旧污垢的水池去呕吐。几天来我几乎没有食欲，所以，满口净是苦涩的味道，不过只有些带着金光的土色胃液，还有极少的米粒和蔬菜的硬筋。

我眼泪流到了脸颊上，痛苦极了；向回过头来的医生和田川裕子抛去道歉的目光，我又委身于第二次涌上来的恶心。这回吐出来相当多的旧饭粒，沉入了胃液的褐色泡沫中。我在胃液和饭粒、蔬菜的硬筋面前两膝并拢，真想挖个地洞钻下去。或者像潜入温暖屋子的雾一样，真想悄悄地融化了。可是，我

又硬又结实地留了下来。我用手指甲擦着苦涩的嘴唇，脸上浮着近似自暴自弃的微笑，坐回了椅子。医生没有责备，田川裕子也从我身上挪开眼睛，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我们订好合同，决定第二天再来，先付了三分之一的手术费。医生用粗粗的手指将纸币仔细地捋平，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去。我们跑出门外，冷冷清清的空中像要下雪的样子。那天晚上，雪堆积了起来。

第二天，马路上留下了尚未溶化的肮脏的雪，我们谁也不说话地走着。冬天就像从空中和行道树，剥去附着在肉上的皮似的，拒绝被剥掉，不想分离开。从弄堂两侧压过来的石灰建筑物之间，我们看到的天空，像狗的背那样狭窄弯曲。

“不要紧吧。”我恍惚地漏了一句。

“不可能有什么不要紧的事。”田川裕子没好气地说，“对我们来说不要紧的事一件也没有。”

我盯着田川裕子看，那痉挛、发青的小脸上，一时间愤怒地染上红潮，不久它又消退了。怜悯之情抓住了我。我觉得该从医生毛茸茸的手指间保护田川裕子，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她一下子挣脱了。

“希望你能三小时以后来。”裕子说，“我一个人去吧。我不想让你进去。”

我的嘴里积满了口水，嘴唇颤抖着想要说服裕子。可是，说什么，怎么说好呢？我无力地垂下胳膊点了点头，把裕子留在狭窄肮脏的医院门口，转身走了。

孩子们像野兽一般哦哦地叫着，在阴暗的天空下跑来跑去。女人们挎着购物袋，低着头匆匆地行走。我越过孩子们，越过女人们，大步流星地走着。我头脑里涌上热血，紧咬着嘴

唇，一滴鲜血滴在下巴上。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我浑身打颤，像草原上变化无常的大风，全然不顾周围，冒冒失失地向前闯。而且，我有意避开熙熙攘攘的明亮大街，专门往小弄堂里钻，一排排房屋狭窄的空间，连阴暗空中白乎乎的光都射不进来，房屋交叉错落，杂乱无章。

忽然，眼前出现一片空地。那是一块走到尽头的空地，三面让建筑物肮脏的背墙所包围。空地上，有个马马虎虎的小沙坑和两条长凳，还有一架像紧闭嘴唇似的秋千。这是儿童玩耍的空地，可一个孩子的影子也不见。只有一个穿着退了色的草绿风衣的男人，抱着脑袋，叉开长长的脚，坐在一条长凳上。隔着沙坑，我在另一条长凳上坐下。我的小腿肚子累得都发硬了，一跳一跳的疼痛正往全身扩散。身体一旦歇下来，小腿肿胀就像棒子似的，成了个圆柱形。

我脱了鞋把脚放在长凳上，双手抱住膝盖。现在正是田川裕子让白白的粗布袋套到大腿根部，裸露的屁股和腰被消毒液的泡沫淋得透湿，把剥开的性器架得高高的时候吧。手指上生着一根根可怕长毛的医生那厚实的手掌，正等着田川裕子不自然撑开而充血的性器，光溜溜地洗完后，用力捣进去刺杀胎儿呢。我呻吟了。我是个把情人委托给沾满鲜血刽子手的卑劣男人。我抽抽搭搭的哭起来。实际上我一直在悲悲切切地抽泣着。然后，眼泪干涸了，空落落的疲劳充塞了我的全身。我用照花了的眼睛，扫视着空地角落里狭窄的下水道盖板和堆积着的空箱子。

时间过去了。那里出现了两只极其猥亵互相叫唤着的猫。不知它们是从哪里来的。突然出现时像是刚开始交配。黑黑纤弱的雌猫，把屁股紧贴在地面上撑拒着，性急的“三毛”雄猫

夹杂着温柔和凶暴，以不可思议的精力和形体动作，不厌其烦地挑逗着雌猫。猫们像是故意压抑着兴奋似的，可终于按捺不住，互相发出黏黏糊糊的声音，身体纠缠在了一起。浅浅的阳光下，猫的阴茎一晃一晃地反射着光。雄猫不顾死活地一个劲儿尝试着性交。雄猫发狂般的欲望像要传染给我了。我被死追硬逼着。禁不住心头火起，拾起一块小石头对准猫们扔过去。我站起来，赤脚触到地面上冰凉的泥土，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不一会儿，我又筋疲力尽地跌坐在凳子上穿好鞋。脚像是湿漉漉地肿胀起来，怎么也穿不进鞋去。对面凳子上的男人仰起脸来看着我。那中年男人生着土色的皮肤，皮肤全像是枯萎了似的。我对他不抱恶意。他慢慢走过来，坐到我这边的凳子上，我对他也没有敌意。我们并排垂头丧气地坐着。

那男人用细细而低低的声音说着什么。我朝他转过脸去。

“我从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过。”那男人像说着常有的事，“肚子饿极了连路也懒得走。”

我没做声。那男人对我嬉皮笑脸，右手伸进风衣口袋，像在掏着什么。

“你买我几张照片吧，求你了。不是黄色照片，纯粹的医学资料。”

我懒得用动作表示拒绝，没有动弹。他用力从口袋里掏出个揉得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那上面还盖着医学资料的橡皮图章。那男人看我不想接受，就从中挑了几张来给我看。

“现在我有的，大多是年轻女人生痔疮的照片。女人的痔疮竖着开裂，可是那特征呀。大多是医生说的。”

那男人忽然往我垂着的眼睛底下塞过来一张。那上面映出一个蜷着两膝，像翻倒似的弯着腰的女人。放大了的肛门让粗

糙的阴毛围着，像只腐烂的水果。下一张照片，女人改变了方向，膝盖打得更开，与其说是暴露肛门，实在是暴露性器。女人一脸抑郁、不高兴的表情，却用力打开膝盖。我又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我发出一声动物般的呻吟声，用力撞了一下那男人，流着泪跑出了小弄堂。

三个小时过去了，当我推开候诊室的门时，田川裕子手术完了，她吃力地仰起苍白得难以辨认的脸，躺在假皮做的沙发上。田川裕子很憔悴，眼睛都凹了下去。而我也像长期游手好闲之后累垮了，被打翻在地似的。

我们短时间地互相对视着。我感觉到自己的内部像有一种爱已经结束的启示。我眼里泪干涸了。其后，白花花的干燥感觉扩散了开来。田川裕子慢慢撑着坐起来，下了地。她用奇怪的家鸭走路的样子向我走来。裕子满含热泪像是要来靠在我的胸膛上，我以厌恶而死心的感情、同罪恶相连的感情等待着。可是，裕子像害怕接触我的身体似的，缩着身子从我旁边挤了过去。

在去裕子宿舍的汽车里，我们谁也没说话。在宿舍门口，只有裕子一个人下了车。裕子睡了二十天。第二十一天，我们在大学旁边的咖啡店里碰头。我们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唯一感觉到的是沉重的疲劳和徒劳。但我们还是为恢复爱做了绝望的努力。那也是白费精力。裕子没等看到公布大学合格者名单就启程回乡下去了。这之前，我们一点不激动地分了手。

四月里，大学毕业在银行里就职的朋友把房子让出来给我，这样，我一个人拥有了一个房间。整个春天我一直慵懒地过着日子。所有打工的活，包括家庭教师在内，我都不干了；

学校上课也不去。我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别说夜里，就是白天也一直阴阴的；我就在这一片黎明前的微光中过着日子。我出门只到丸善书店去看看新出的法文书。我有三天没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只喝白水过日子。春天真长。接着，霉雨季节来到。霉雨季节也拖得很长。

雨好容易停住了，那天，我去丸善书店取新到的法语杂志。我把封面印有阿尔及利亚大学生示威游行的杂志包好，挟在胳肢窝里往楼下跑，谁知跑到卖高尔夫用品的柜台时，看见良重有些颓唐地茫然站立着。我的心一下抽紧了，本打算别打招呼就跑到外面去。谁知在中央通道才走了一半路，我就感到被良重发现了。我死心了，回过头去注视着良重。良重那明显疲劳的皮肤上，剥落的化妆品粉末丝丝拉拉地粘着。尽管如此，可良重那有棱有角的眼睛和下巴垂下的皮肤，都有一种庄重的威严。我们俩互相都很尴尬，可还是交换了令人怀念的微笑。良重慢慢地走了过来。

“你好吗?”良重说，肉质厚厚而强健的嘴唇几乎没有嚅动过。

“可以。”

“已经过了六个月了吧。”良重平静地说，“卡普里埃尔从越南寄来明信片了。”

“他还活着?”

“活着呀，老死不掉。可怕的老不死的家伙。”

我们又互相微笑起来。

“还是和那姑娘在一起?”

看到我的反应，良重像是后悔了。她赶忙寻找其他话题。

“喝杯茶去吧?”我问。

“今晚不做生意喽。”良重温柔地说，“碰到你这个原配丈夫了嘛。”

我们到丸善大楼的地下餐厅边喝茶边聊天。不一会儿，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去吃了晚饭，然后极其自然地迁移到银座酒店，在那里喝洋酒。那地方，正是我和良重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与良重情人三人常来喝酒的令人怀念的地方。我们已经醉了。幽暗的光和微醉使良重暂时恢复了她那庄重的美和年轻。我们滔滔不绝地说着话。良重自我离开后，再没有固定的情人，又回去做专门搭讪外国人的游娼。那是为了防止情人突然像我那样翻脸。因做了游娼的关系，良重明显地沉沦下去了。她把脸颊上松弛的皮肤、眼角、嘴角的细细皱纹激动地亮给了我看，想要说服我似的。

“除了星期天，每天到街上去哟。根据得意人们的习惯星期天是安息日。”良重说，“打那以后，几乎与各种各样不同的外国人上过床。和做船长的印度人约定，连月经休息日都没有哇。对方大概也觉得没味了吧，我这头的情绪也变得怪怪的。”

“真是印度人。”我半信半疑地问，“该不是化了装的日本人吧。”

“和日本人，前些日子一个大雨天睡过了哟。”良重舔着嘴唇想了想说，“无聊透顶的寒酸日本人。”

那一晚，雨下得很大，有钱的外国人都躲在旅馆里不出来。街上净是些日本人。其中一个年轻男人胆战心惊地走了过来。当时忽然涌起一阵看到希奇野兽般的好奇心，就跟他去了旅馆。那男人战战兢兢有些飘飘然，一开始就折腾，脱衣服竟花去了三十分钟，这时心里想，可真够厉害的，也许能让人过把瘾。谁知刚熄了灯，三十秒钟后就又得点上了……

“三十秒，嘿。”良重皱着眉头回忆，一边滑出一声叹息，“三十秒钟就完了哟，我还从没有这样丧气过呢。”

我望着良重，她让那“无聊透顶的寒酸日本人”手忙脚乱迅速完了的艳事，弄得愤愤不平，瞧着暗中忽闪忽闪发亮的眼睛，我笑了起来。然而，我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急切地勒紧似的，笑才短短地一现，便消失了。悲惨的情绪抓住了我。

“怎么回事哟，你?”良重敏感地两颊僵硬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嘛。”

“是啊。”我闭上了眼睛，一口吸干杯子里冰块下面仅剩的一滴酒。

我肚子深处，胃的周围有个灼热的硬块。它扩散膨胀开来，把我醉酒发热的身体，湿漉漉地浸泡起来。那立刻凑过来的快要碰到我额头的三十六岁娼妓疲倦的皱巴巴的眼睑，就像砸坏变形水果肉似的柔和黑黑的眼睑底下，一双又大又具悲剧性的眼睛正注视着我。她好几次打哈欠，那眼睛流出的泪把眼睑弄得湿湿的。我闻到良重好看的头上搽着耐人回味的头油。我想，还是和良重都说了吧。于是，我开始讲起来。

良重听着我的话，不时露出轻蔑，不时显出愤怒，不时又悲伤地陷入了沉思。故事老是收不了场。关店门的时候到了，招待为难极了，跑过来催我们，我们让他叫了辆车离开了酒店。

良重新近搬到成城的房子里去了，在往新屋子奔驰而去的小汽车里，我继续着我的故事；说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我的头在良重厚实柔软的膝盖上颤动着。良重把我的头发绕在她手指间摩挲。我们在黑洞洞的坡道上七拐八弯，在最靠里的一个家门口下了车。那比坡上还要黑漆漆的

篱笆墙内，覆盖着令人闷气的绿叶。我们寻找着良重家阴沉的走廊，原来是在北边的角落上。我们谁也没做声，蹑手蹑脚来到了走廊上。黑黑的门打开，忽地扭开明亮的电灯，我流过泪的眼睛一下子被照花了。那里静悄悄地放着我所看惯了的怀旧家具：被磨得光溜溜的细脚木椅和餐桌，还有褐色的其他家具。

“我喝醉了要睡了，就这样躺下了哟。”良重说，“最近老是自暴自弃，回家来身体也不擦。只有今晚特别。”

“我也要睡了，冷得很。”

“我来暖暖你吧。”良重说，“我已经习惯把少爷弄暖和了。用我肚子来暖和你吧。”

我们一头钻进那张一点未改、有着褐色光亮框子的床。良重一边轻轻打着哈欠，一边试着来暖和我，但她缠上来的那条缀着肉过于丰满的脚却更冷，而且怎么也焐不暖。我们互相拥抱的裸体之间，体温开始互相传递起来；这时，良重用充满欲望的沙哑声音催促我。这完全和以往的日子相同。

我坐起身子，钻到良重滚圆、白皙的膝盖之间。我忽然看到闭着眼睛待机的良重，那仍然还是圆圆的喉咙和胸部，我犹豫了起来。那事干不了啦。明白不过的阳痿。我急了。

“又是怎么啦?”良重用沙哑的声音说，她从枕上抬起头睁开了眼睛。

我在她丰满的膝盖之间，竖起自己瘦瘦的膝盖，两臂耷拉着无精打采。我和良重的视线碰上了，那眼神像死鱼一样蜷缩、瘫软。我绝望地感到了羞耻。

良重蓦地直起身体试了试。然后，她把毯子卷在自己裸露的胸脯和腰上抵御寒冷；这边，我浑身一丝不挂冷得瑟瑟发

抖，还在执拗地一次又一次试着那柔软的东西。然而，那不过是徒劳的操作。我们肩靠肩地仰面躺下，熄了灯。

“什么时候开始的?”声音更沙哑了，良重尽可能温和地问。

我可不知道。我发着愣，茫然若失。

“也许得去趟医院。”

“真可怜，是那姑娘手术的关系吧，真可怜哟。”

我不做声地忍耐着。良重开始发出鼾声，我可是一直睁着眼睛。我感到浑身充满了耻辱。终于，直到最后，我精疲力竭，在毫无生气闭着的眼睑背后耻辱紧紧地贴附着。

“啊，咱可是个什么也做不了的男人呀，”我想着，“咱可是个无聊渺小的日本人哪。”我流着苦涩的泪，腻烦的、直达下腹的未满足欲望和寒冷，使我浑身打颤。头开始一跳一跳地刺痛起来。我痛苦地等着窗上映出鱼肚白后好起床。

然后，在浅浅的睡眠中，我梦见了外国兵正往又黑又臭的污水沟里扔一个难看渺小的日本人。接下来那群兵又来追我。我往下望着水沟犹豫了。为了从追逼过来的外国兵手里逃走，我只有往那儿跳进去。周围挤满了沉默的日本群众。他们一点不想动弹。再往下一看，我直统统的下面，能看见污水中软塌塌的、挣扎着失掉力气的被害者。他一副阴暗的肉色就像我那个悲惨的性器。外国兵里有个神气十足的卡普里埃尔，他唱着歌。

“Look if you like, but you will have to leap.”

我让逼到死角抖个不停。随你便吧，看看也可以嘛，可不跳不行啊。我怕极了，决不可能去跳。结果，我寻思着，二十一年来，我一次也没有跳过。今后也决不会跳吧。早上，我趁

良重还在睡着，尽可能不发出声音地穿好裤子，套上外衣。良重沉浸在阴暗沉重的空气里，生气勃勃地打着呼噜。我在门边站住了，回头望了一眼。良重还没有睁开眼来。我拉开门走到了外面。

听“雨树”的女人们

一年以前，我发表了一篇十几年没写过的短篇。这样长久地远离这种体裁，现在自己又重新想在这个领域里做些什么，说明作为作家，我的生活方式，像是内部开始有了新的动向，这大概和后面所写的故事有些关系吧。最终，我说了个“人迎着死亡增寿”的故事——总之，这个久违短篇的主题是“雨树”。

那以后不久，年轻时起的一个也算不上知己的朋友，可称为大师的音乐家T先生，说是写了一段叫做《雨树》的音乐，顺便想在乐谱一开始引用“你小说里的一段对话”。这乐谱和演奏的录音都是在国外制作的（不用说，比起我国来先在欧美发售，这是当时T先生理想的工作状态），因此，有人希望T先生把那段文字翻译成英文。

我把英译的事托付给了Y君，从大学读教养课程起他便成了我的朋友，现在他留在母校，教着一班和我们成为朋友时年纪相仿的学生。他对于我来说，也是个说不上能整体推测其精神生活的，自己构筑了底蕴深深圈子的人（他在英国度过了孤独长期的研究生涯，完成了有关苦闷文学时代思潮的巨大研究），这样的学究朋友，趋向以写作生活方式的愿望，都作为

“人迎着死亡增寿”课题之一的变奏，充实在我的生活里。还有个我曾和他在同一教室里的朋友，将是我后面要说的对象。首先，我想记录下Y君用英语翻译出来，让音乐家T先生乐谱所引用的，我那小说《雨树》的定义。

> It has been named the “rain tree”, for its adundant foliage continues to let fall rain drops collected from last night's shower until well after the following midday. I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iny lesve——finger-like——store up moisture while other teees dry up at once. What an ingenious tree, isn't it?

T先生完成了以“雨树”为主题的音乐，我去听了第一次的演奏会。那时在音乐厅里，我的精神和肉体全力以赴（这种写法也许会让年轻的评论家说：瞧，又是老一套的夸张；可作为我，多少有些随着幽默感而来的，也就觉得想说一下），虽说没出一点声音，但我一开始就不停地流泪。邻座椅子上的妻子纳闷地、不出声地转过身子来。年轻时我们互相理解结了婚，一起面对过大大小小的共同苦难；可渐渐地像是发现了互相之间那些不可理解的疙瘩。在那引导我们走向分离的反面，依然有附带“人迎着死亡增寿”的发现。刚才所说的共同苦难，其最大的一件就是我们之间生了个残疾儿；以此为起因，我写了一部有关这个残疾儿的长篇；从那时起，妻子就不再读丈夫写的小说了，即使T先生的音乐《雨树》，她也只是看看节目单上的标题——五月里雨声淅沥，凄凄切切，说的是那棵桧树吧？看样子她联想起了《草枕子》的作者说的，集露珠倾

盆如雨下树木的可嘉姿态。我也没有去特别订正她的看法。

……我从T先生的音乐里尝到了过于情绪化的感动，“雨树”的暗喻增加了力度。有关唤起暗喻的力量，我经常想，那就是T先生在音乐构思阶段最重要的设计。要把暗喻表示出来，得绕个弯子，追溯到几年前，也是T先生的演奏会，FM实况转播，在消磨休息的时间里，我们几个朋友曾就T先生的音乐作过评论并录了音。现在，在控制室里听了我的话的那个该是演奏会主角的指挥，不是混血种却摆出一副北欧风格态度的日本人指挥。“暗喻，说的什么呀?”他摆出一副权威的不屑一顾的神情。我慌慌张张还想说明几句：“T先生注释的，五角形的院子里，鸟儿们翩翩飞落，这个暗喻是‘提香’[①]和‘泷口修造’的……”等等，年轻指挥拒不理睬，最后干脆扭过头去。后来，我才注意到，这个指挥不过是不知道“暗喻”这个词语罢了。

“雨树”是暗喻。还在写那篇小说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写完小说，特别是在T先生的音乐会上，自己才第一次被充分说服了，小说的目标，正是要把“雨树”的暗喻悬挂在空中，提示出来。我是根据出席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研讨会的经验，写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当然也添加了些虚构的情节，但有关人物的关系却是按照实际情况写的。发挥想像力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一直写下去，都说不清能否充分把握“雨树”的暗喻。等小说写完了，那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化；尽管如此，那些必要的力量全都围绕了这个暗喻，发挥这种效果的“雨树”，悬挂在黑暗的夜空中……

① M. 提香（1887—1968）：法国著名画家。

仅仅牵涉到小说的表层，那个述说者最终也未能在深夜的幽暗中看清“雨树”的整体。只是有一个人物说，那是“密密麻麻缀满‘指腹’般大小树叶（这种说法表达树叶上有一块能容纳手指鼓出部分的凹坑，但‘指腹’这个词语在英语里像是没有充分相对应的表现，Y君的翻译也好，后来科耐尔大学寄来的日语系学生的翻译也好，都把那叶子说成手指那么大小）的巨大树木”。实际上我是被刚刚发芽的“光叶榉树”所吸引的，纤细的树叶，对于树干的粗细、树枝延长的宽度都不相称，但它们数不清地缀在大树之上形成均衡之势，想象就是由那景色生发开去的。夏威夷的“雨树”，每一片叶子的凹坑里，都积存下深夜在这个岛上周而复始降着骤雨的每一颗雨滴，第二天过了晌午，大树又把它们不停地滴答滴答地抛撒在地上。“雨树”树阴下的地面永远是潮湿的。

T先生的“雨树”音乐，是由笔直朝向正面，相隔一段距离占据在舞台上的三个演奏者来进行的。近来，T先生作品的演奏，演奏者在舞台上的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了。T先生的音乐，按宇宙论的视角来排列人和人的位置、人和世界的位置关系。而且显而易见地提示出全新的经反复琢磨的位置。首先那是诉诸我们耳朵，提示的声音位置，接着创作音乐的人、与现在正在演奏的人们之间那各种各样能够清楚认定的位置。这是眼睛能看清楚的位置。“雨树”一开场，舞台上的照明收缩到一点，只打出勾勒演奏者头发轮廓的光、显出高垫肩男子晚礼服的剪影，从中只能隐隐约约看清站在中央的是一位女性；演奏便在这幽暗中开始了。三个演奏者都是打击乐演奏家，他们站在中央电风琴和两侧三角铃的前面。渐渐响起来的是调好音的三个三角铃的声音——关于音乐，我不觉得这个说明能传达

出丰富的意义；但是，各个三角铃偶然的和音、加上了“这些是人类精神经营”的那种清晰的不协和、偏离。从茂密纤细的树叶丛里，不间断地滴答滴答撒落着雨滴，三角铃的音质和行进中，我看到了悬挂在黑暗天空中的幻之树。我在这篇小说中想表现的东西，正是这“雨树”确切的幻影，它不是别的，对我来说，正是我所感到的这个宇宙的暗喻。自己被围在其中所存在着的理想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自身所把握的整个宇宙。它现在作为模特儿，采用了“雨树”的形式，正悬挂在中天之上。我耗费了许多词语，把“雨树”这样的宇宙模特儿作为暗喻提了出来；暗喻好歹让音乐家传达了出来，与此相反射的另一个“雨树”的暗喻，那也是重叠在这音乐家所抱的宇宙模特儿之上，现在又重新在幽暗的舞台上响起……

这时，音乐由电风琴和两台木琴移行到了更壮阔、具有巨大骨架、展望更宽广的世界。我觉得一个人的灵魂被净化了，在“雨树”宇宙模特儿的影响下，屏住气息流着泪。我觉得那眼泪，直接与我在夏威夷的研讨会期间所经历的，却没在那个短篇里写到的一些事情有关。音乐家T先生大概不是个多愁善感的表现者，而我的流泪，也未必只能看作是多愁善感的行为；我在夏威夷所经历过的，老实说是为了隐瞒那段经历，我在写“雨树”故事时有意抽掉了那段情节，那期间我一直让某种悲叹的情绪纠缠着。

关于那悲叹的情绪，直接引起它的事件逐渐被排除，我既然写了那个短篇小说，也就搞不清楚那种悲叹情绪有没有在那里面刻下了印记。那篇小说的语言重叠火爆，应该说只一瞬间便点燃起暗喻的“雨树”；写这篇小说，我就是想确认宇宙模特儿，究竟带上了什么样的情绪色彩？小说最终没有写看见具

体的“雨树”，而是以叙述者走出树木茂盛的院子，听到从“雨树”那墙角传来女人悲痛欲绝的哭声来结束全篇的。可当我回忆起夏威夷逗留期间一个深夜的事情时，就会想起“雨树”之下似乎老是有我一个不幸朋友带来的女人，坐在新英格兰风格的椅子上。那“雨树”的叶子重重叠叠，又遮盖住了女人们，这时，除了称为悲叹的心境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而且，第三、第四个女人正聚集到这里来……

我真想给“悲叹”一词加上英语 grief 的注音。也就是说，我想写出“悲叹”的情绪。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现在称为不幸的朋友曾经是我的同班同学，为了在他一生中最后的致词（那可是肮脏的，什么都能给染上的致词啊）出现在我的宿舍里，那是夏威夷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开端。而且，这个朋友年轻时候常用的就是 grief 这个英语单词……

他的名字，我只能用在教室里叫惯了的来标记。他本来在大学里登记的可不是这样的名字。可他却希望别人那么叫。谁都知道那是作为他十八九岁起生活基本态度的自我神秘化、韬晦的一种表现，但真正的理由谁都不甚了了。那时，教室里的朋友们，对那样一个他都说：“啊，是嘛，那样也好嘛，就那样叫吧”；就这种味儿，轻易地就理解了。恐怕那时就是他不幸的开端；而我们这些朋友在这一点上，也有该责备的地方；实际上我自己也为承认以下的事实而感到吃惊。“高安卡羌”这个通称，对我来说，这二十年来虽然并非什么常事，可一听到这名字就会怦然心动，虽然谁都不知道他的通称、那个“卡羌”，究竟取之于什么汉字。从国外来的信自不必说，就是他在国内的信上也签着 K. Takayasu（卡·高安）……

那时，这个高安卡羌给还在东京大学驹场分校，同一个教

室里听教养课的所有人，这些人后来都升入东京大学本乡总校，分成了法文、英文、西洋史等学科，其中棒球俱乐部有名的A君进了农学系等等，那时，他给所有的同班同学，用打字机打了一封英文信寄了过来，那还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事，信上的盖消印无疑是佛吉尼亚州的夏洛蒂比尔。很少可能有出国留学机会的这一年，高安卡羌作为一个英文系的在校生，不知道通的是什么路子，渡洋到了美国。而且，他还知道那一年，威廉·福克纳[①] 作为Writer-in-Residence（客席教授）到佛吉尼亚大学任教，于是，为了听福克纳的课，他才远渡重洋到美国去的。于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有人说，两年前与来日本的福克纳直接谈判的高安卡羌，正是通过这个知名作家才抓住了去美国的线索。高安卡羌信中说，福克纳讲课就是让学生们质疑问答。搞不清楚高安自己是坐在那个教室里呢，还是后来边吃自助餐边竖起耳朵听来的传闻呢！反正他写起了伴着权威的信来。这种做法，自我认识他以来一直感到是他性格的一方面。总之，我还记录下了让他深受感动的福克纳名言：“……between grief and nothing, man will take grief always.”

就这句话，弄得以专读福克纳升入英文系的学生们一片哗然，必须承认也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都以这段英语文字来嘲笑高安。这段话是福克纳的教室用语，看上去几乎是照抄《野性的棕榈》结尾那段悲剧性的决意的优美表白。既然到了这地步，大概决不能再说那是福克纳所说的话了。“Yes, he thought, between grief and nothing I will take grief.”就是这原

① 福克纳（1897—1962）：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八月之光》等著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因，掺杂着嫉妒高安访美的班级骚动，竟一点点平息下去了。

谁知，两年后的一天，那时我已经开始写起了小说，走上了与研究室无缘的道路，我接到了进大学院深造、研究福克纳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完了，完了，高安卡羌那封信上写的那句话，福克纳的话，真是那么说的哟。一本题为《大学的福克纳》的上课实录出版了，那句话也登出来了哟！福克纳那人也真是老爱干戏剧味儿浓的事哟！”他感叹地说，“嘿，你呀，那以后听到过高安卡羌的消息吗？他就那样一直没有复学，据学生科的人说，并没有开除过他呀。是怎么回事呀……”

那时，我虽然知道高安卡羌的消息，可总觉得难以对朋友们启齿。高安卡羌回国后，一直想方设法继续维持他的学籍，可是，他尽管曾积极追随福克纳直到佛吉尼亚大学，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走学者之路，却专心致志地写起小说来了。就这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可他联系的杂志一律把他置之门外，很快“悲叹”这个词，就成了他的口头禅。高安卡羌冲着我的脸说：“像你这样平常男人的小说很合大众宣传的口味，大致上被大众口味触发而开始这一点确实应该承认；可是为什么会无视咱这样个性丰富男人写出的东西呢，真的，说愤怒更让咱感到悲叹哟！”他对我继续从事作家的工作，对顺利进入大学院做学问的同班同学们，都表示出孩子气的憎恨。“你觉得咱会作为那些家伙的下级学生再出现在教室里吗？还说大学入学考试上让那些家伙来当监考呢！”结果，他和大学断绝了关系，再次远渡重洋去了美国，打那以后就只能听到些外国传来的高安卡羌的轶闻。谁知，过了二十年，他竟突然出现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文化中心”的大楼里。看上去总觉得他黑黑的，加上酒精和药物中毒似的衰弱；高安卡羌背脊直挺挺的，还摆出一副

过分优雅的吸烟姿势，似乎还继续对同班同学，包括我在内的人们，抱着憎恶感。就是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沉重的外套似的悲叹紧紧地缠着他。要是现在高安卡羌还活着亲眼看到这个"明喻"的话，他将会显示出怎样的冷嘲姿态啊。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怀念，我才想起把夏威夷故事里这个不合时宜的修饰句一直留到了定稿。

"国际作家哟，风尘仆仆来夏威夷啦？来是来了，可你会说英语吗？"高安卡羌先开了口。说真的，我在"东西文化中心"的研讨会上，贫弱的英语能力常弄得我汗流浃背；所以，这个连晒得焦黑都像是衰弱标志的高安卡羌，那双瞧着老同学的眼睛里，仍然保持着尖锐的批评力量。

这时，咱两人肩并肩，正要往"中心"专供教师、学生用餐的食堂走，忽听得有人从三楼宿舍叫住我们。"日本人哪，那样忧郁，哭也不出声音，搭伴而行的国民。Ken，别忘了珍珠港！提起精神来！"送过来无恶意嘲弄、即鼓励话的，是那个像不倒翁似的满面髭须的阿兰，他是"垮掉的一代"的著名诗人。我这么一说，高安卡羌突然掀起了嫉妒之火，极力贬低这个诗人近年来的工作。我认为不管怎样评价初期阿兰工作成绩的大小，都是无法穷尽的；但即使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想承认曾经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高安卡羌的批评能力。话虽如此，这次久违的老友相会，从最初的场面开始就一直让悲叹的情绪纠缠着。就是现在，我也常常这么想。

T先生在演奏会开场时，就自己写的全部作品作了解说。特别就第一次上演的"雨树"音乐，他以生就的谨慎态度，语意包含了敏锐的幽默，作了详尽的说明。"我对三角关系抱着兴趣。由这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演奏者表演的音乐……"于

是，场上响起充满好意的笑声。T先生下面的话再也听不清楚了，但实际演奏开始后，立刻，我就看到并听到了“雨树”的暗喻悬挂着，让我感到重叠在刚才经历的“雨树”暗喻，由男女三人具体化了。首先，“雨树”的暗喻，使人感到，像是被作曲构造的核心笔直引导而去，就在那音乐庞大展开的行进之间，不断在意识里留存下来。

我在产生写“雨树”小说动机的夏威夷短期逗留中，真实地体验过从小说表层消失的那些事情，果真有必要称作三角关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我所认识到的：是奇形怪状扭曲了的，所谓在歪歪扭扭球体上描画的三角形；那也是高安卡羌生活方式的根基里显示出某种危机的时候，才采取的那种三角关系的形式。

高安卡羌，大约二十年的间隔之后，对此似乎并不太介意，在研讨会参加者宿舍大门口出现时，他立即就用我所写的挑衅口气说话。紧接着，他说的就是把夫子自己当成一员的奇怪三角关系，有关另一个成员的命运。本来那说的就是，如果高安卡羌相信那个下午说的事情……

“咱特地来见你的哟，”高安卡羌像是先要拦住我也许正渐渐加速的怀念情绪似的说。他像是不肯放松异国他乡会旧友的紧箍似的拒绝亲近感。“和你会面本身可不是咱的目的。斋木正彰得白血病死了吧。你身为治丧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了大殓吧。说是咱同班同学给他办葬礼，咱也有说句话的权利。应该的吧？你为了以此来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在不太合适的大殡仪馆里举行了葬礼的吧？费用全由斋木的电视台承担。听说也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嘛，你为什么要干那种事呢？难道你成了国际作家，就不能出入小殡仪馆了吗？”

“没有那回事哟，不是那么回事嘛……”

“可葬礼在青山殡仪馆举行，不是事实吗？这可不是死去斋木所希望的吧，斋木公司的首脑部不是也拼命动脑筋想改个地方吗？关于斋木的那些消息咱也知道，他那老婆和你不是硬主张要有气派的殡仪馆吗？”

“我觉得，你问题里有一种你自己能得出答案的暗示。可是你这样的责问，想从我嘴里弄到答案，我可是也有话要说呀。这个对你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另当别论……”

“那家伙的人生转折点上，咱可是有巨大影响的人哪，所以，那家伙死后，也不想在葬礼方式这种无聊小事上让人说三道四。不愉快呀，就是说斋木太可怜了。”

高安卡羌话的前半，我觉得莫名其妙。而且，他那对斋木正彰葬礼说法本身有些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对我纳闷的反应，高安卡羌也立刻反抗，于是，我们都默不作声，下楼到教员和学生专用食堂去，那食堂利用火山岛斜面似的高低不平空地建起，从宿舍高处往下能看得见。在那草丛中铺着圆石的细小道路上，头上传来颓废派诗人的叫喊。应该说，这个诗人观察的眼睛也是很正确的。

我们来到“东西文化中心”的食堂里，说是为教师准备的，其实还是学生的食堂；两侧说占领也不过分，排列着硕大的台子。于是，我们就在台子边并排坐下，这也让高安卡羌露出不满意的神色。那样肩并肩地坐着，他重新摆出一副难以回避被人强迫过度怀旧的忧郁脸相。他放弃了刚才贬低的颓废传说的诗人，这回把攻击的目标转向了这食堂本身——国际作家也得在这种地方用餐吗？夏威夷大学怎么就不能准备些更加说过得去点儿的待遇呢？

“对我来说很不错了哟。我们研讨会的参加者中，尽管也有跑外边餐馆吃饭的家伙，但在这里吃饭的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恩拉依特，在日本你也听说过这英国文人的吧？有学者专门调查过他在亚洲的足迹，还写成了书呢。他是我们研讨会出身最上流，又是年龄最大的；每天早晨碰面，他都要说，在夏威夷的晨光中，眺望着日本式的庭院，吃着这里的英吉利小面包实在太美了，简直是天国的享受呀。”

我们眼下正面对着那个由日本政府捐赠资金建造的庭院，下午阳光中，可不是什么 celestial（天国）的眺望，但是，好歹坐在能眺望庭院景色的窗边。高安卡羌并不关心庭院。“那些学者该不会戏弄不会说英语的日本作家吧？”他扯开去说，“那么，他们会端出什么菜来呢？像咱这样的外来人员，能允许在这里用餐吗？大概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吃上了吧？”

用餐的学生已经稀稀拉拉，已经到了午餐时间的下限了。我刚才已经吃过饭了，我把高安卡羌带进自助餐式挑选菜的围子里。于是，高安卡羌往托盘里放上他所选的食物，记得他挑的都是些掺杂中国和日本家庭小吃的菜，菜里全放酱油，就是当地叫做“索依沙司”的。还加上八瓶在冰水里直接冷却的啤酒，那是比美国啤酒还贵的日本进口小瓶啤酒，耸立在托盘上。为了弄到泡绿茶的白开水，他不用小茶碗，而选择了大玻璃杯子，让人真担心那杯子会不会让热水给炸了。在地铁入口处似的围子自动门旁，高安卡羌让我付钱，我并不计较他那副慷慨大方的狡猾态度，倒是很在意他所挑选的菜，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心；高安卡羌尽管在国外的日子已经和在日本生活的日子差不多对等了。但他的食物嗜好类似某种强迫观念，仍然强烈地指向了日本，而且，他没让久违的日本人，而且还是

大学同学的我看见隐蔽的举止。

高安卡羌又拿了杯红茶放在托盘里，半道上我实在看不过去，就帮他从盘里拿出啤酒送过去；作为感谢，他敬了我一杯啤酒，马上就一个人又吃又喝起来，又重新朝我发起牢骚来。

"你换到斋木的位置上试试看：自己的葬礼让服务过的公司上层人士讨厌，让亲朋好友们嘲笑着眺望，太豪华了，参拜者也被弄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哇。咱在这里的海关，照顾过一个日本的摄影师，从他嘴里听来的。还听得十分仔细呢，知道都是你和斋木老婆定的主意。就是在一个电视节目组里干过，和斋木生涯没有很深关系的摄影师之类的也说三道四，总不愉快吧。咱真可怜斋木呀。"

高安卡羌吃着大盆"炒饭"，喝着叫做"帕帕依亚"的豆腐羹，这菜应该可以找到冲绳——夏威夷的根源；他像美国人似的，抓起瓶子直接对着瓶口喝日本进口的啤酒；我呷着红茶听他说，听到这里，不能再不反驳了。

"高安卡羌，你相信死了的人有灵魂吗？我可不信呀。所以，我不认为死人会让死后的事纠缠着而让人可怜的。我们同班的同学觉得尊重斋木太太的意思比什么都要紧。什么治丧委员会委员长之类的，说什么也得按未亡人说的做，她向敌人推出对手，我也只能一起对立而已。那些敌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你看有什么办法？丈夫忽然得白血病死了，绝望的女人，她的常识就是出些错，我呀，在葬礼前后也是不会反对她的做法的。"

"摄影师对你也有详尽的评价哟。"高安卡羌说，"说你啊，可是受到报答了的哟。这种事自己说出来倒能成为一段佳话。斋木的老婆还是很有魅力的吧？……不，咱没有特别要说

讽刺你的话哟。极其一般的意思，她可是谣传太多的女人吧？咱在海关照顾过的摄影师也说，他去过她干过活的酒吧。她呀，和你就不一样喽，你可是极可靠的国际作家的 femme fatale（致命的女人），不是吗？虽然那是咱老早就听说过的事，可摄影师的话也又滑稽又有趣地继续着呢。”

高安卡羌喝啤酒的方法看来不像是普通的。我到底注意到了，高安卡羌跑来见我的时候已经有点喝醉了。于是，我对他的话渐渐变得下流起来，一点儿也不觉生气了。我甚至没有想起大学低年级班上，经常有人鼓动高安卡羌要嘴皮，年轻人们则毫无保留地露出轻蔑的沉默。眼下只是撵不走的厌烦竖在前面，我沉默不语，茫然地盯着还剩下的那些开了瓶塞的啤酒队列。

“斋木正彰为什么要和那种女人结婚呢，这可是个问题呀，斋木的葬礼里凑齐了同班同学，你们没谈起这件事吗？”

“你说‘那种女人’，到底想说什么呢？我不能说十分清楚，我们凑在一起，也没有谈到她的过去哟。那可不是我们的问题嘛。看来，也不是你的问题吧。”

“是嘛？啊，是啊。咱的确不直接认识斋木的老婆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在我都没有责任。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并不喜欢那种女人的表现，可是装腔作势，放下四壁假装没看见。你们从‘东大’毕业二十年，顺风也好，逆风也好总是上升的指向吧。现在都是什么大学副教授啦，文艺杂志的总编辑啦，民间广播的中坚干部等等。连 NHK 的官都做上喽。你么，也是国际作家……”

“你这样说可不对。”我充满凄凉的情绪说，“我看哪，斋木正彰是喜欢那人才结婚的，还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呢。你

说那个未亡人的坏话都是无根据的，本来就说得过了头。斋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假装不知道自己身患白血病，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知道那事的。斋木当综合导演搞了介绍拉丁美洲的节目，我在说文学侧面时，有必要说到了爱娃庇隆的故事。喏，就是庇隆总统的前夫人圣女爱娃。现在说出她是害白血病死的，与此有关的原子弹受害者，斋木一开始说要到原子弹病医院去拍一些胶片。这胶片还计划制作成西班牙语版寄到拉丁美洲去。那时，他已经明白自己染上了什么病哟。斋木发病后立即对他太太说：‘我把你的人生给搅得乱七八糟的。’这话难道不像是斋木说的吗？夫人和医生、护士，不论对象地吵架也吵过了，那时，她着迷似的守在病房里。我觉得这已经够充分的了。所以，没有人想去介入斋木的婚姻。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怜悯他的权利。”

这下，高安卡羌大概会针尖对麦芒地说个不停吧？谁知他竟没有说。这种地方可就和他年轻时大相径庭了，分手后，可真让我担心他的新态度。我要是真不担心的话，那么，这天深夜，高安卡羌带着个中国血统的美国女人来到我宿舍时，也许我不会去打开门的。不管怎么说，像刚才那样我唠叨不停的时候，高安卡羌双腿抵着台子，两手托着后脑勺，大大地打了个响鼻，叹了口气。然后，他没有狼吞虎咽地把东西吃完，而是对盘里的食物完全失去了兴趣，厌倦地转过了脸。我以为他会慢慢恢复过来呢，谁知他把剩下的两瓶啤酒全喝干了，都没有回我一句话。

接着，高安卡羌这回采取了低姿态又说开了，可仔细听听，还是反复说着刚才高姿态时说的那件事。

“可是，斋木回日本，返回工作岗位，在东京搞大众宣传

的生活中，和酒吧女结了婚，是咱给他创造了欧洲的转折点啊。一想起这些心就痛哟。还是那句话，他很可怜哪。……我是打算来说给你听听的呀，那可是老长老长的故事呀，你再去拿五六瓶啤酒怎么样？日本水做的那种，现在正合咱的肠胃。”

不用说我对明显患有酒精综合症的高安卡羌抱着冷淡的态度，但还是按他说的，拿来了日本进口的啤酒，倾听他的吐露。已经是下午三点了，那儿又是大学校园里教员和学生的食堂。我拎着啤酒，穿过付钱的柜台，柜台上的女性，自称国际婚姻嫁到这里来的，两三天前她还问我有没有给东京的家属打过平安电话？我说那可有障碍，那女人还笑盈盈的呢，可现在却也明显地表示出为难的态度。

可是，高安卡羌冗长的故事，假如以斋木生前告诉我的事情为立脚点的话，那么马上可以发现它的虚构性。可以当作事实看的那部分，原来就是些从斋木一侧看到的事，很早以前，斋木就对我说过了。斋木正彰，三十岁那年春天，经法国政府的挑选，在工作的民间广播电台保留着原职位，作为职业研修生去了法国。他在刚刚组建的O. R. T. F国营广播电台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那时候，他谨慎小心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所以斋木葬礼上最感人至深的，就是原来那班同事们发来的唁电。那上面回顾了五月革命时期，发挥了独自作用的这个法国广播电视台里，斋木正彰表现了外国人特有的谨慎，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从斋木那里听到：五月革命的骚乱刚刚平息，在美国的高安卡羌突然跑去了巴黎。和高安卡羌同行的是我国电气铁路公司系统大资本家的女儿，听说是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高安卡羌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进出出，为了构筑那个大资本家的文化前卫，提出要用英、法两国的语言来搞国际性的杂

志。于是，他们找到了已经在从事广播媒体、国际记者的斋木，说是愿意将一半的编辑权让给他。大资本家的女儿，只听高安卡羌说是他的情人，这个事业，让原本把这个事业当成赌博的高安卡羌燃起了热情。资金方面没有任何不自由。说着，高安卡羌不停地催斋木作出决断。

本来斋木正彰把这故事当做荒唐事来说的：“是啊，在巴黎碰到过高安卡羌，还是过去那副老样子呀。”因此，高安卡羌用深刻的语气说的那事情，我听上去老像是早就脱了底的大话。原因是斋木早就说过了。“高安卡羌带来的那个人说是计划的出资人，就是某某人的姑娘，和卡羌说的有很大出入呢。那位该是他情人的姑娘，相当的冷淡，跟她什么话也谈不起来呀。老是绷着个脸，一声不吭地朝这边望着呢。一直就这副模样；后来，某某姑娘回了东京，高安卡羌因为来回飞机票打折扣的关系，只能又飞回纽约，从此就一去杳无音讯了。还是那个不可思议的家伙哇。我呀，说老实话，本来对活字媒体是很有兴趣的呢……”

和我一起听到这话的，还有一个同班同学，这朋友现在担任大出版社社长的秘书，同班同学人人都信赖他的人品，他在葬礼上出色完成了司仪的任务；“高安卡羌有妄想症吧。而且，那妄想与现实连着根呢，这可是最麻烦的呀。”他忧郁地说。“那样的生活，最终只能以破产告吹呀。尽管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不，不，高安卡羌像抱着什么更伟大的计划呢。这事他当然不会轻易说出口的。那个计划要是能实现的话，那么，以前他那以负数积累的卡片，该会一举变成正数的呀！可我不仅在这个计划里，而且在下一个计划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可在高安卡羌对我讲的故事里却不同，斋木像是一下子热恋起高安的情人来，就是那大资本家的闺女；说这是他计划失败的根源。而那姑娘呢，排除其他人只爱着他高安卡羌一个人。她让斋木的求爱弄得实在不耐烦了。可高安卡羌觉得在那计划里，姑娘也好、斋木也好都是他需要的。谁知，姑娘决不移情斋木，斋木到底是斋木，他对姑娘的爱遭到了拒绝，所以他也就不参加那个计划了。

"那时，咱可对斋木说的哟。有什么关系嘛，我们两人不能共有一个女人吗？咱呀，只要对她说就可以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喽，她肯定会赶快答应我的哟。她是个受过国际性高超教育的女人，所以，她是自由的；她比什么都更尊重咱的事业，结果她真的按我的意志做了。咱一说服她，就来和斋木商量，为了营造咱们三人的同居关系，得先去租一间公寓来。要是一个大公寓，那么杂志的发行筹备不是也能使用吗？资金可没问题。谁知那斋木呀，到那份上竟变得奇怪的保守，看样子咱那提议让他受到了冲击吧。畏畏缩缩的斋木作为国际性综合杂志的主干，却偏偏由自己关闭了通往去全欧洲活动的道路，于是他又回到了原来那家电视台。他在东京做那种工作，在纽约、巴黎看起来，简直等于零。几乎都是以后留不下来什么的工作。对于那女性，对于那种接受过国际性很高教育的类型，当然也会引起拒绝反应的吧？不用说，谁都想要正反两极的类型和家庭，不愿把那疮疤揭露出来。咱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所以，咱可怜斋木呀。你还觉得介入得太过头了吗？……反正，那事业的中途夭折真是十分可惜。那以后，再没有出过同种杂志，日本人在'知'的领域里，真是大家受损害呀。对咱自己来说，本应在那杂志上发表英文、法文的长篇小说的。全构思

好了哟。写还是想写的，可是确定不了发表的机关，咱可是动不了笔的。你不也是一样吗？咱从事的工作要不是国际性的综合杂志，那构思就无法生存下来呀，可真麻烦。也可以说，我和你在工作上没有竞争，你尽可以放心，你放心了吧。"

他有这种心思的话，我本可以对高安卡羌说："呀，从斋木那儿听来的，只有关于那大资本家女儿的事哟，他只记得你带来个绷紧脸的冷淡女人呀。"我还能够接着反问他："你的话假如是事实，那就越发奇怪了：斋木离去后，你不是再有和那女人分手的理由吗？看来也不是这样能够轻易分手的关系吧？"可是我没做声，只是听着他滔滔不绝地侃着，看来高安卡羌对我被动的反应有些恼火起来；他那所谓长篇小说的构思，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分别生活着男人、女人们，而集中起来负有打开现代世界命运责任的优秀男女，感应'宇宙边缘雄鹰振翅搏击'起来行动。他透露这个构思时，我还是默不作声地听着。可那'宇宙边缘雄鹰振翅搏击'的意象，斋木正彰在电视台繁忙事务中，已经着手准备，我尽自己所知只对他妻子说过，是他不久应该写出小说来的构思。"

因此，公平地来看，我对高安卡羌太宽大了。晚餐时间之前，清扫妇的工作开始了，我们被赶了出来；这时，高安卡羌对始终抱着被动姿态的我，表示了直接的不满，丢下了几句气话要走。我知道这就能摆脱高安卡羌的纠缠了，心情开朗起来，甚至还往下把他送到开往瓦依基基海滨方向的公共汽车站。

"斋木正彰的想像力有缺陷，你不是也同样具备这种缺陷吗？毕业前，和东京大学有瓜葛的家伙们，那缺陷是公有的。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却还是保守的老一套。男人们互相

协作，为了达到真正伟大的目的，可以共有一个女人，为什么偏偏想不通呢？如果是男人，最终一定会有对立的瞬间。然而，介于当中的女性如果出色的话，决不会让他们叛离的。女人就这样发挥她们那女性特有的巨大力量，可以恢复起失去的友情。然后让他们互相协同作业！你们打算让一夫一妻制那无聊的幻想束缚到哪一天为止啊？”

快深夜了，有人来敲我住的宿舍门。研讨会一开始，左邻的庞贝诗人的那一间，到半夜也会有来客；可我这间一次也没有，所以，我还以为在敲隔壁的门，也就没有下床去开门。我躺在固定于墙上那张奇形怪状很矮小的士兵用床上，敲门声在天花板周围响了起来。走廊上频频传来激愤的含混不清与人拌嘴的声音，那男人的语言，要是让我直言不讳地写出当时的感觉来，那就是：尽管可以肯定说的确实是英语，但听上去又像是一种日本话似的。于是，我站起来走过去。刚打开门，高安卡羌就像一股旋风似的，从已经熄了电灯的走廊上，喷吐着日本酒的气味，一步冲进了屋子。他既像就此一把抱住我，又像要一把推开我似的，往前迈了一步，我不由自主地往后跳了一步躲开。一个比我们小十来岁的年轻漂亮姑娘，从我和高安卡羌的边上擦过似的，哧溜进了房间。

这一夜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想起来愉快的东西，只有这“哧溜”的印象，让我牢牢刻在了记忆之上。我觉得简直可以拿来给她下定义，所以我想先把它写下来。再说这“哧溜”，要是指她敏捷的举止，或者体育选手的体态，那可就错了。不用说她也是悠然大幅度扭动略微丰满肢体的那种人。长着一副东洋人的脸，但背脊却是笔直笔直的，挺直的高腰以下部分不

像坐过日本式地席。这种体态，又穿着平跟鞋子的女人，哧溜地进了屋子。像束发似的收拢头发，她把成纺锤形的头微微朝前倾着，纺锤形的肩膀看上去微微鼓起，其实她没有垂着头，而是往下瞧着我刚才躺过的那张床。我常常躺着看夏威夷植物园的说明书，她正瞧着小台灯光照亮的那张封面。就那样，她也没和我打招呼，可看上去反而更觉符合高安一流的礼仪。——我立刻感到这个女性是个中国血统的美国人。

这时，高安卡羌把后边的门关上了，用日本话说下面这段话时，我感到了顾虑：在他带来的英语、中文双语出色的女性面前，似乎说什么都会暴露似的。那天上午开始，我一直和高安卡羌说着日语。但在我出席的研讨会上，只能用英语说话，我也只能听着英语过日子，我的那种顾虑和那期间的条件也不无关系。

“在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你大概还没有和真正的应召女郎上过床吧。今天咱给你带来个极上等的姑娘哟。等一下付三百美元给她。作为介绍费，咱在你后面也享用一回就够了。女人嘛，在签合同时已经说好了的。你在这边床上干的时候，咱就在那边的床上等着哟……别担心性病，咱读过你的小说，作过推测。你呀，那个，日语怎么说来着？syphilophobe（梅毒）。她可没有病哟。还吃过避孕药，不用担心怀孕。本来呀，是女方担心呀。来吧，打起精神来他一炮、两炮。咱可在那边床上等着呢。”

高安卡羌看来喝醉了。也不应该单单怪罪酒精，深深的酒醉让他的上身摇摇晃晃，就说了那么几句话，也慢吞吞地说了半天。他不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慢慢发音，而是像咳嗽似的说了个词组，不自然地停一停，随后又冲口说出下一个词组，

于是，又堵住了。他朝着与我的床这面墙壁相反的另一面墙上固定着的矮床，踉踉跄跄地走了过去，然后像忽然垮下来了似的，刚好倒在了那张床上。研讨会期间，给我们住的是一面墙上固定一张床的双人房间，两面墙当中夹着的宽阔窗子边下，并排放着两张书桌。床与床之间大约隔着五六米，眼下只点着我那一侧的台灯，所以整个房间里很暗。窗子外边，印度菩提树叶丛深深地关闭着，尽管是月夜，但月光还是够不到窗户。

高安卡羌勉勉强强换了一种姿势，在床上竖起两膝坐了起来，那副孩子气模样看上去颇有安定感，我还记得曾经觉得这床过于低矮是有道理的；然而，在醉醺醺沉郁郁的高安卡羌朝这边看之前，我根本没打算和他带来的女人性交。她看上去也不希望和我性交。还是那副刚才“哧溜”进来时站着的样子，她往下瞧着我床上放着的那本植物园的说明书，瞧着那上面猥亵的绿和红的九重葛藤的照片。我早就从她那种站相里，看出了与那“哧溜”进来时的样子相反的神情，她很紧张……

高安卡羌似乎因为喝醉酒而心情浮躁似的忽然改变了主意，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意图，他用新的行动来解除她、或者说是我的那不上不下的状态。他根据其自身的重量，咔地把向前冲出来的脑袋使劲摇了摇，爬起来；对我用日语，接着又对那女人用英语，交替地叫了起来。两国语言流利地交替着，有一股气势，使人感到高安卡羌在美国生活的经济基础就是这口头翻译似的。

“(日语) 你既然磨磨蹭蹭，那只有让我先干喽。一晚上，三百美元可买不断啊。(英语) 贝妮，上这儿来，用咱们的黄瓜塞到我屁眼里来。(日语) 咱呐，上年纪喽，近来又很累，不那样干可竖不起来呀。咱还特地买了日本血统农民种的日本

式黄瓜呢，挤掉上面的刺轻轻撒上些盐就得了。这种盐可麻烦喽。不洗干净吧，屁眼里火辣辣的，洗早了吧，到用的时候又软绵绵的了。……这边的台灯打开太亮了吧。可也太黑乎乎了。你那边的台灯开着别关。你看也不打紧，可别写广告哇。咱干完后接下来可轮到你喽。（英语）贝妮，快脱光，别磨磨蹭蹭的。”

高安卡羌按照自己说明过的意思干了。我回到床上，仰面躺下，故意拿起植物园的说明书，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了起来，但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让听到的声音拉过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个让高安卡羌叫做贝妮的女人，她把淡绿色紧身连衣裙，哧溜地脱了下来。于是，又摘下了胸罩，谁知那宽宽的胸脯上似乎还有块白布片缠着似的，原来那是夏威夷海滨穿泳装留下的痕迹。她挽起米色的衬裙，脱掉相同颜色的连裤袜，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屁股，又是哧溜地露了出来。于是，女人把衬裙踏在地板上似的脱了鞋，再注意一看，高安卡羌仰面躺在床上，艰难地脱下劳动布裤子，慢慢地翻过身子，把一色白白大腿到屁股的部分伸出床外趴着。坐在床边上的贝妮，从大手提包里拿出一根与植物园说明书上猥亵的绿同样的巨大绿棒子，先伸出牛舌似的长舌头，仔仔细细地把那东西弄湿……

我就看到这里。然后，我闭上了眼睛，然而还是按照高安卡羌说明过的，他给贝妮发出各种各样的指令，所以，不用管他实际上有没有干到射精；她在地板上跪了一阵，完成了摆弄精制黄瓜的任务以后，便急急忙忙爬上床，骑在仰面而卧的高安卡羌身上；那整个过程，我全凭耳朵听来的。那个贝妮始终一语不发，只是在最后阶段发出粗粗的喘气声……随后，高安卡羌像孩子似的套上了牛仔短裤，披上件衣服走到我的床边

来。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高安卡羌的脸，从下面来的脚光，把他那张人脸照得杀气腾腾的。尽管在夏威夷，我也感到阵阵寒冷，竖起了汗毛。

“快，轮到你了，和那家伙干去!”

“咱讨厌呀。你赶快和你带来的人一起走吧。”

“呃？说什么话？咱不是好好地干上了吗?”

我突然怒火上了心头。与其说控制不住自己，不如说我没认真想过要控制自己。我没有猛地站起来，脸贴脸冲着高安卡羌，而是从床上直起上身，把赤着的脚放到地板上去。“咱讨厌。带上那个人，你该回去了。”我翻来覆去地说着。

“你为什么说不干呢？可合同总是合同吧。你订过合同了。三百美元不付，就休想叫那家伙回去。”高安卡羌用沙哑的声音说。他以醉酒的人特有的敏感接住了我讲话的势头，像是在盘算着战术转移。于是，他又对带来的女人用英语发出了命令。虽然不能说我能一句一句跟上，但我觉得听得出从刚才“突发型”愤怒到“凹陷型”厌恶的转换，他是这么说的。“贝妮，我到门那边去决不走动。你无论如何要和这家伙性交，拿好三百美元。三百美元到手之前，别到门外去!”也许高安卡羌只是要说给我听的吧。他还是那样摇摇晃晃地走向门边，又回过头来冲着我说了几句。

“只要碰到十分绝望的女人，那个什么来着，不管她如何偏离常识，也不反对那家伙干的事。不是你说的吗？原来只是嘴上说说的呀。”

高安卡羌出门去面对院子的走廊，关上门。听得出他就倒在门边，坐在滑溜溜的地板上。他从门边拉过纸袋，拿出酒瓶的声音传了进来。高安卡羌真是醉得没话说了，但他倒还想到

了不把酒瓶往屋里拿。我真的感觉到了，感觉到那是一种与美国大学学生宿舍的风气相适应的节度。刚才高安卡羌在屋里干的事，一定和任何大学学生宿舍的风气都相去甚远吧；然而，就这纸袋一件事，像是又让我恢复了对高安卡羌的好感，我对十八九岁时相熟相知的人还是抱着感情的呀。

对面床上，高安卡羌带来的女人，用意想不到的麻利动作收拾好床铺坐了下来。穿在身上的只有先前的那条衬裙，她一点不遮掩乳房，两手撑在腿上，悠闲自在地望着斜下方。她的颈子、手臂，还有乳房，那横断面都让人觉得是纺锤形的。这可是我在本国女性身上从未得到过的印象，除了那两个纸一样白的乳房以外，鸡蛋色的柔润皮肤也是没有见过的。可以说由先前激烈运动引起血的过热，分明在安静的四肢上呈现出波浪形……

她像是觉出我一直盯着她看似的，女人悠然地仰起纺锤形的脸。我对着那张一本正经、看上去挂满汗珠的脸，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女人像是深深地思考了一番，没有化妆的单眼皮眼睛，像透过雾一般朝这边望了望，也把头横着摇了摇，立刻现出了干干脆脆的表情。可喝醉酒的高安卡羌还在门后面等着呢。对我来说，本次研讨会在夏威夷逗留的自由资金，也只有高安卡羌所提示的那点钱了。我走到窗下的桌子边，去取放钱的护照皮夹。这时，我看到该悠然而镇静的女人，摆出招惹人的动作，忽地，我对高安卡羌的愤怒又复苏了。我狠狠地把钱放在另一张桌上搭着的淡绿连衣裙旁边。那衣服的颜色，我来夏威夷后不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没有碰到过，但它却令人感到，那是这片土地上植物的所特有的颜色……

这时，门砰地被撞开了，我心里涌上一股正在性交时冷不

防被人撞破的感觉；高安卡羌抱着一大瓶日本酒和纸袋逃了进来。走廊上远远传来从容不迫的脚步声，我马上明白使高安卡羌害怕的究竟是谁了。他就是我右边邻屋里参加研讨会的西萨莫亚作家。我读过他写的小说，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民俗和基督教结合的新神话风格的小说，我和他成了朋友；这个阿尔巴特也许让一墙之隔的这屋里的吵闹弄得睡不着，一定是去走廊尽头的化妆室。他这时的样子，一定是光着黑油油的上身，腰以下咕噜咕噜卷着极富色彩的布。他的祖先是德意志人，生于岛上的酋长家族，他的肉体在深夜走廊猛地出现，准会吓得人魂飞魄散。

话虽如此，可高安卡羌的害怕却超出了常规，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他沉沉的身子不停地打着抖。一动不动地盯着抱在手里的纸袋和大酒瓶看，既不对我，也不对那女人说句话，只听到他呼哧呼哧喘个不停。这时候，女人和哧溜进来时一样，慢悠悠地，但却很讲求效率地站起来活动开了。她缠好胸罩，套上了连衣裙，从床边的地板上拾起连裤袜，裹起滚落在一旁的黄瓜塞进手提包里。接着，她又很自然地搀扶起失去表情又失去语言的高安卡羌出了门，去到走廊上，她还想得十分周到，估计阿尔巴特要回来，他们故意从化妆室相反方向的楼梯下去，在黑暗中消失远去了。

第二天，研讨会会议日程全部结束了，一回到宿舍，传达室那个第三代日本人后裔的学生，递给我一张来客留言条。说是上午一个女性放着的，那字条上写着圆溜溜的字体，一看就给人美国女学生在报告用纸上写东西的印象，我怀疑这该不是高安卡羌说的，所谓介绍高级应召女郎的事情吧。条子的内容

是这样的。“昨晚上承蒙惠顾的钱，不知是掉了还是被偷了，一时找不见，十分为难。会不会还放在屋里我就这样走掉了呢？假如真的还放在你屋里，那反而正合适，本来我就打算以后还你这笔钱的……”

更让我不愉快的是，那女来宾竟然打听我出发的预定日期，而传达室的学生竟从住宿时间表上推测出来告诉了她。听说高安卡羌在机场海关工作，他候准飞机时间，有可能在飞机场大厅里伏击我吧。果然不出所料。我和乘同一班飞机的印度诗人，搭乘研讨会同事、一个住在“瓦依基基”的诗人的车，来到飞机场；那个真像在机场里工作似的高安卡羌果然已经等着了。办完航空公司的手续，准备陪着印度诗人去免税店给孩子们买礼物（他因宗教的理由有五个自己的孩子，还有三个养子），上了楼梯，那儿有个免税店；谁知免税店的围栏旁边，戴着黑眼镜，穿着夏威夷衬衫的高安卡羌竟真的站在那里。他穿着夏威夷衬衫，不是夏威夷随处可见的那种色彩鲜艳的衬衫，而是朴素而稳健的蓝色，像黎明天空的颜色，那色彩让我忽然感到，像有一种和昨晚那女人连衣裙互相吻合的东西。高安卡羌把我从印度诗人身边拉开，没做出一点解释的姿势，立刻就用下巴颌点了点隔壁的自助餐厅。“怎么样，来杯啤酒喝一口吧，咱呀，已经很长时间决定不再喝酒喽。”而高安卡羌，皮肤不自然、油光光的脸上，一望便知，这天他又灌过黄汤了。

二话没说，我们坐上了吧台喝起啤酒来。那是在冲绳酿造的奥里安啤酒。记住那啤酒，是因为那啤酒和在免税品店里所遇到的冲绳女人谈话之间，有某种联系。高安卡羌一口喝干了自己瓶里的啤酒，也不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瓶里剩下的啤酒也

倒进他自己的杯子。于是，开口说出下面这桩事情："十年前咱有个亲近的女性，现在一时得靠自己赚钱来养活自己。于是，咱隔段时间就寄给她手表，希望这回你能充当一次摆渡人。从海关的立场上，自己的名字出现了不好；但这本来是可以公开的事情，已经和成田的同事们说好了。而且，这是不关自己利益的事情。和你想帮助斋木太太的心思一样。只要是为了那些孤立无援的女性，再困难恐怕你也会接受的吧?"他拼命央求我，"一旦进了这里的海关，就会递给你一个免税品的纸袋，盒子和保证书都不要了，只要把手表拿出来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就行了。在成田机场通过了海关，你只需在那附近站一会儿。有人呼叫，那同你接头的人就会出现。"高安卡羌要托的事就是这些。

我轻率地答应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立刻就答应了他，那种意识的背后，也是在极浅薄的地方，也许潜藏着拒绝了与高安卡羌带来的女人上床后，自己所感到的满足吧，还有说不清楚的、鄙视他的情绪在起作用吧。与此相配合，我和高安卡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剩下的啤酒谈着话，就像趁着学生时代那种恶作剧的情绪而去似的，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话谈好了，我们从椅背高高的吧台椅子上下来，走进了免税店的围栏。这时，高安卡羌说，把买免税品时给旅行者的卡片拿给他看看。在夏威夷所剩的钱，全给他带来的女人拿去了，我哪有钱再买什么礼物，当然也就不会有这种卡片了。于是，高安卡羌就把我的护照给收款机旁的女性看了看，办好了制作卡片的手续。那收款机旁的女性的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在冲绳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声调。我拿着刚办理好的卡片，目送着高安卡羌去手表柜台，一边问起那女性是不是首里出身的。她羞怯地说：

“您怎会知道?”不，其实我不是那种意思，只是我穷于说明，于是，我就说自己是个关心冲绳文化的人，说自己很尊敬研究冲绳古代歌谣《颂神》专家的H先生，这次他也来到了夏威夷大学。女性说她也去听过H先生的公开课，于是她对我表示出一番亲切的态度。谁知，这时高安卡羌回来了，她一看到我和高安卡羌之间的关系，立刻就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闭起了嘴。高安卡羌把穿了孔的卡片递给我，又重复了一遍通过海关，拿出手表后的处理方法，说完就匆匆离开了；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有意让夏威夷衬衫上别着的缀有彩色照片的胸卡避开我的眼睛，后来发生了些奇怪的事才让我想通了……

一出成田机场的海关，我等待有人来招呼，结果，确实被人叫去了。那时我正想往呼叫站去，等着我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看起来忠于职守的海关官员。他把我带进了审讯室，盘问我“走私”手表的事情。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我还十分相信高安卡羌是海关官员，所以无论如何不说出他的名字来。因此，调查取证，一直围绕着如何松开难以解开的绳头不间断地进行着，审问官员们的心境一点点恶化起来。只有手表的商标看了实物能够明白，而那价格我却真的不知道。保证书什么的全给丢掉了。只把赤膊的手表装在上衣口袋里就想混出海关，这难道不是恶劣的手段吗?为什么到了这份上还要蒙混手表的价格呢?可是，我的确不知道，只好走投无路了。审问官把我一个人留在审讯室里出去了，我想想真委屈，低头看到白木桌子上随处放着圆珠笔，还有用钢笔字写的掺杂着“宽大处理”字样的短文。那是不久就要我签名的笔录，被审查的旅行者请求当局宽恕的文章草稿。留在记忆中的我的笔录是这么写的:出海关时，被官员叫住了——但实际上写的是扬声器里叫我，

我出面来到这里，这大概是套话吧，审问官叫我这样写的，又让我写上他从别的屋里打听来的，那手表在免税店的零售价为三百美元。

手指尖给染黑了，我往笔录上按了手印。刚才还热中追究“走私”犯，表情十分僵硬的官员，这回总算露出些和他年龄相仿的柔顺表情说：

“你是作家吧？我还读过你写的东西呢，那本《我们的失败》。”

确实我和高安卡羌失败了，可小说却是别的作家写的，特别是那作家被我混同了，大概会感到羞耻吧；这句话虽然在我胸中涌起，却没有情绪轻轻地说出来。也就是说，即使到了那个阶段，我还在惋惜地想，这事对高安卡羌来说，又是一次失败吧，还在为那个应该得到手表，却空喜欢一场的不幸妇女而感到痛心呢。

其实真该让我痛心的女性，不是那个现在才知道是凭空捏造的取表人，而是另一个不幸的女人。我自己让高安卡羌狠狠捉弄了一番好久都没注意到固然很滑稽，但是在那背后，恐怕有着我那份随同一个班上的同学，对高安卡羌所抱的蔑视吧。高安卡羌即使表示出恶意，甚至连那恶意都遭到明显的蔑视。那件事以后又过了半年，从夏威夷寄来一本精装本的书，书的封面里页上，用透明胶粘着一封信。写信的人叫 Penelope shao-ling lee，我脑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其实“贝耐罗普”的爱称就是“贝妮”；连这一开始也没注意到，这位写信人就是高安卡羌带来的，用他的话来说那个“高级应召女郎”。说是这么说，可她寄给我的书是一个叫道格拉斯·德的研究者写

的M. 劳里[1] 的评传。我起先以为，自己曾在夏威夷研讨会上出席过以墨西哥学者为中心的《在火山下》分组讨论会，所以，研讨会组织者，大概乘美国版偶然出书的机会（我已经有了最初牛津版的书），作了某些增补和修改，把书分寄给我们这些研讨会的参加者吧。

那封信本身，前半没有关于高安卡羌的记述。首先，她写的是自己的事，作为夏威夷大学的听讲生，她是个研究M. 劳里的女性。她少女时代，曾经在香港制作的、风靡一时的空手道电影里，主演过年轻女斗士。后来，又干过各种营生，现在住在夏威夷。也就是说她很像《在火山下》结局，那电闪雷鸣的墨西哥森林之夜，被印第安人放跑的马踢倒了的依芬奴，依芬奴意识恢复的一瞬间，把这事故的情景想象成落入地狱般的永劫不复，如果说依芬奴曾经是好莱坞西部片里少女之星的话，那么。贝妮的经验里有着与M. 劳里的世界一脉相承的东西。

于是，她上了大学（那也是白天干活，晚上念书的业余班级），研究起M. 劳里来，自己所关心的焦点，如果说是他完成的作品，那就只有《在火山下》一部，她的兴趣只在于这个酒精综合症患者作家传记的事实上。说得更清楚些，她被作家的妻子邦纳给迷住了。向大学提出的论文也准备以作家妻子的命运作为中心内容。邦纳相信劳里是个天才，那天才已经在一

---

① 劳里（1909—1957）：英国小说家。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写出以一次大海航行为题材的作品《在海的彼岸》。后与一美国女子结婚，去过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尔，以此地为背景，写出名著《在火山下》。第二任妻子为作家邦纳，婚后又重新改写了《在火山下》。

部作品里具体化地成功了；尽管她常常被辱骂、被毒打，甚至受过伤，但她始终不渝地守护着酒精综合症患者的作家；贝妮对此抱着深深的关心。劳里死后，如果一一读遍邦纳写的信，就能看到粉饰、扭曲，或者说谎的痕迹；也就会清楚地明白邦纳为什么要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丈夫的朋友，诉说自己无罪的原因了。劳里在大量服用酒精和安眠药之前他们曾有过争吵，她生怕人们怀疑她涉嫌杀人。那就成不了 AWARE（内行的）。

那么 K. takayasu（高安卡羌）呢，像 M. 劳里一样多年来患有酒精综合症，尽管他自己多次努力想克服掉，但一直没有成功。他反复多次地进入精神病患者疗养院；可他的努力，比起劳里的“独房”——把自己幽闭在又窄又暗的地方进行自我治疗来，他显得多么没有勇气呀。可是最近，他对进入精神病患者疗养院一事本身，表示出强烈的反抗。那是因为有一次谈起了劳里，听说劳里准备让原来的同班同学来做“前脑白质切除手术”，于是，他让被害妄想攫住了。一九五零年的英国和今日的美国，对“前脑白质切除手术”有不同的评价，理智上能够理解，而感情上却难以接受。劳里的脑子，将要让原来的同班同学切除一部分！虽然认为那手术可行，但高安还是被巨大的恐怖压垮了。事实上在施行手术之前，劳里早已用酒精和安眠药把自己给毁掉了……

教授，当我把发现您在研讨会分科会上的事告诉他时，高安显出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亢奋。而且，他还决心跟您合作写悬案小说呢。和青春时代在同一个教室里生活过的人合作，将是多么自然的计划呀？久久地离开日本，在外国人群中生活过来的高安，准备了根据遍游世界的经验而设立的远大构想，以及多种多样的细节。可他对自己的日语文体感到不安。再加上还

必须一边克服酒精综合症一边写小说，我也觉得他需要一个能束缚自己的伙伴。

没想到您和高安的对话没有成功。第二次我想跟着去再商量商量的，可惜高安那样死醉，实在没有成功的希望。教授，高安把您的拒绝当成了巨大的侮辱，而且他说已经给您加上了相称的报复。这是真的吗？假如那不过是醉了的高安或还没醒透的高安，想入非非自信进行过报复，或对于那种行为所抱的罪恶感的话，教授，您会不会再重新考虑一下呢？您和高安难道真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吗？我觉得现在只有通过这种操作来治疗他的病了，眼前这是唯一能让高安自我恢复的手段。高安小说的构想的确是宏大的。包孕在现代世界的宇宙边缘，一头雄鹰展翅翱翔，搏击长空……

贝耐罗普·李小玲并不指望我会给她直接回信。不用说她害怕这事发生，好几次叮嘱我。最终希望以我自发的形式向高安卡羌提出一起工作的事。所以，信上写着让我向参加过研讨会的美籍华人女作家马克辛·冯·金斯彤打听高安卡羌的姓名和地址，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于是，我怀疑起来：喝醉酒的高安卡羌该不会像马尔卡姆一样，对自己的妻子横加暴行吧？最终，我既没有给高安卡羌写回信，也没有给贝妮写回信。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作为我本身的问题，也是个怎么也应付不了的棘手事。

……正像我开头所写的那样，作为围绕“雨树”暗喻的小说，当然掺杂着虚构的成分，但我是根据在夏威夷逗留的经验写下短篇小说的。而高安卡羌像是很早就看过了由贝妮在日本文学系研究室里复印来的小说。发表小说还不满百天，就从夏威夷来了一封署名贝耐罗普·小玲·高安的信。原来是通知我，

高安卡羌又重新开始喝起几年前已经戒掉的烈性酒，还并用药品；结果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了。信上首先写道：为了避开狂暴的高安，自己在同一公寓里女朋友家的厨房里一直谈话到早上。因此，有证人证实，自己和深夜高安的事故死毫无关系。M. 劳里事故死的时候，邦纳也到邻居家老妇人处避难去了，也就是说，有证人在场……

贝妮写道：高安看过您的小说《雨树》后，说这里描写的精神障碍者疗养院的构思是自己的，那人没有在那种疗养院里呆过的经验。贝妮又写道：高安说，那人没有直接写我的事，可他用暗喻写的那棵在幽暗中不断滴水的大树，确实指的就是咱呀。我还是把贝妮信的结尾处翻译出来引用在此吧。

“我也读过了那篇小说。高安不做声了，我觉得那树木并不是单纯的暗喻。现实中真有‘雨树’。小说里，您写着没有看到过‘雨树’，我觉得您应该看见过的。难道夏威夷的夜晚，黑得连家门口种的树也看不清了吗？高安住过的疗养院里，任何地方都没有‘雨树’。您究竟是以哪里的疗养院作为原形的呢、您能告诉我有‘雨树’的疗养院吗？我想一边听着‘雨树’的水滴声，一边坐在树下好好想想高安的事情。我隔壁有个精神障碍的女性，她和我一起听‘雨树’也可以吧。这个现代世界上有我们这些女人。M. 劳里日记（未发表）里，写着这么一句话：What do you seek? /Oblivion.（你在寻找什么？忘却。）可是，像高安那样一次也未被世间知晓的人，总是在让人‘忘却’我觉得太令人 AWARE（可悲）了。高安告诉我，AWARE 一词，在日语里是 grief（可悲）的意思。从今以后，教授，只有您和我还会一直记着高安吧。高安小说那雄鹰振翅搏击的构思您尽管使用吧。知道自己死期已近，高安原谅

了您。他希望您使用那小说的构思，即使没自己的名份也没关系。真实属于您，贝妮。"

核时代的森林隐士

你为寻求“自由”逃出了森林，从地方城市跳出跑到了大城市，然后继续寻求“自由”，最终你跑到了非洲，你找到“自由”了吗？我尽管没有去非洲，而且一直住在森林深处的峡谷间，要问我究竟为寻找什么而活下来的，那就是“自由”。我最近才领悟到，还在继续确认着。你听到我说“自由”一定会惊讶吧。你自己一味追求“自由”，然而，“自由”却不是实在的东西；所以，永远无法具体地把握它，也许你对只有意识上持续着的慢性饥饿状态还没有充分地领教过吧。可我知道，自己寻求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自由”。以前，我那微不足道的生活里，充满了小小的满足、大大的不满、期待、恐惧和愤怒，不断地重复着，深深扎根于我本质部分里的所有屈辱感告诉我，原来我的意识中只追求着这份“自由”，这正是因为看到了真正只有几幅的电视画面的关系，那里可有个沉默可怜的你啊。

你大概还没看过那些电视镜头吧，也许你连摄像机镜头对着你都不知道吧。可是我，去了森林深处峡谷间山林地主的家里，在电视上，尽管时间很短，却实实在在看到了：屡次逃亡，终于逃亡到遥远非洲的你，正小心翼翼地走到路的尽头。

那是一个叫做《在非洲活动的日本人》的报道特集节目，在非洲活动的日本人，哈哈！那开裂的平地，到雨季时恐怕一定会成为河床吧，你们一行人在那片平地上露营。解说词里说，那里是内罗毕和乌干达国境交界的地方。低矮的木箱里塞着小型的鸵鸟。隆起的蚁冢。离一群当地土著不远，有几个日本人。大家都吃过了午饭，下午还有严酷的劳动，人人都让那郁闷的预感预先弄垮了似的。可一瞬间，从蚁冢背后，正挂捕虫网的你匆匆忙忙跑出来，一头钻进枯萎的灌木丛中去了。于是，下一个瞬间，你不但没抓到大蝴蝶，反而连捕虫网也扔开，两手盖住脸蹲了下去。看样子那些有弹性的灌木枝条，正甩中了那只对你来说十分要紧的健康眼睛。这时，我忽然想起，你为了继续留在派遣去非洲的动物采集队里工作，故意隐瞒了你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的情况。为了不让人瞧破你是独眼，你才过分活动，连伙伴们饭后少事休息的时间里，你都拿着捕虫网跳来跳去地找着事做吧。下一个画面，你们动物采集队一行，坐船沿尼罗河下到地中海去。浮着尼罗河卷心菜的河面上，河马不时抬起头来。一看到河马，摄像机里便显示出队员们兴高采烈的样子，而你却离开了他们，独自一人蹲在船尾的木箱上沉思着什么，正好这也给摄像机抓住了。大概从额头到脸颊都缠着绷带的关系吧，你没戴头盔，裸露的头曝晒在太阳之下。绷带之间，看得出眼睛旁像黑色的弹痕。我从电视上看到你骨瘦如柴，干鱼般黑黑的身躯上青筋暴露，看样子你十分忧郁，还对你自己很生气似的，再加上明显缠住你全身的疲劳阴影；这些情景给看电视的我，带来了不愉快的震颤。他究竟为了什么要到非洲去，那样疲劳困乏还对自己抱着不满，而且受着肉体的煎熬，他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而灰心丧气了呢？为了什么他让

自己掉进那样不成体统的穷境呢？我这样想着，终于意识到原来那就是为了寻求“自由”哇。下面来说我吧：我自己在森林深处的峡谷间，作为年轻的寺院“住持”，妻子跟人通奸，长期以来扮演着滑稽剧人物的角色；那个曾经抛弃我投入别的男人怀抱，已经既不美又没肉体魅力的女人，这回拖着与情人生的两个女儿又回来了；我因这丑闻被赶出了寺庙，于是，住进了位于养鸡场遗址上的小屋，可我最终没逃出森林，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理解了个中的意义。也就是说，我理解成：这也是在寻求“自由”。而且，我决定向无法确定会不会从非洲平安归来的你，讲述一下自己的体验，讲述一下以继续深刻体验为目标的“自由”。假如那疲劳困乏对你自己只有愤怒，且已走到尽头，说不清怎么就那样活着回了国的话；那么，即使让太阳晒黑的皮肤退了色，青筋裸露的身体又再度长出了脂肪，你也再不会和我所谓的“自由”无缘了吧。像我这样，多年以来做僧侣的人，有着一种职业的感觉：自己对那家伙的弱点，会像脚气菌一样牢牢地粘上去，鼓励那家伙增长勇气，把放任下去就会迅速淹死的头颅，从水中拉上来（等它喘上一口气，再把它揿到水里），大体上是为了给予救济，而去发现那样的“家伙”。你至少让这个“我”看到了你缺点的总体，以尼罗河卷心菜和蚁冢为道具，通过色彩模糊混乱的小小荧光屏上那数十秒地一亮一闪。

对你来说，直到一年前左右我意外回心转意为止，在这峡谷所有人面前，我肯定不是个老把“自由”挂在嘴边的人。以前我常常被人说成是个蛋圆脸形的人。一开始为了隐藏“少年白头”，为了能预想以后剪短白发的效果，我老是把头发剪成小平头。闪着白白亮光的小平头，总是微微笑着的，蛋圆脸的

善良男人，除此以外不具备任何别的属性的男人，那就是过去的我。现在想起来，实在也搞不清当时我是有意扮演了那种类型的人呢，还是我天生就该是那样的人？老实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恐怕这两样看法，结果是相同的吧。我是个善良的人，总是微笑着，因此，看上去总有几分忧郁、是个自我牺牲型的虚弱之人吧。实际上，我总是在考虑峡谷和居住其间的人民的今天和明天。只要峡谷间的人们都认为有必要，那么，不管什么事，我都愿意接受。我真是所谓彻底忘我，只为峡谷间的人们而存在的人。直到日常生活细部的各个角落，我简直可说是到了让村里人能按各自意愿，随意蹂躏我的地步了。总之，我微笑着、忍耐着、默默地接受着一切；而且，还专心致志考虑着峡谷间阴险毒辣的家伙们、蠢货们的现在和未来。

现在想来，自己既具有那种类型的演技，又是祖先代代相传给我的超本质属性；我具有让峡谷间所有人任意捆缚的情态，是啊，就这样完全放弃个人的意志，还是要寻求“自由”，半路上，还真的使它成功了。我把自己个人生活的垣墙全部拆毁了，而且，从不考虑自己的未来，渐渐地，连我自己的欲望也变得像别人的，敷衍了事。所以，我被峡谷间的居民们蹂躏，什么都拿来找我，所有的时间都给那些家伙们用尽了，结果，我自己连被人捉弄的抗拒感都没有了。于是，我能够自然地露出温和而善良的微笑。这不就是“自由”的状态吗？村里有个急不可耐的小学教师，有一次逼问我：“你这样放弃自己，真的就无所谓吗？你的心里难道没有乌黑的怨恨和憎恶在打转儿吗？把真心拿出来瞧瞧！”我还是照样默默地微笑着；而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些空洞，不过是“自由”之风从那些空洞里吹过而已。其实那时候，我对“自由”还没有正确地思考过。

那小学教师的质问，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喽：正如你也知道的，我妻子和前面说的小学教师的同事，也曾经是我妻子同事的男人，像在峡谷间敲响钟似的公开地通奸，继而又私奔；这时，那小学教师跑来质问我。也许这个小学教师，对夺走我妻子的同事既冷漠，又嫉妒；这才跑来质问我的吧，可真是个心胸狭窄的家伙呀。围绕妻子的通奸和出走，我让峡谷间的人们瞧不起，被人当做笑料；但也因为那事件我得到了大致的同情；峡谷间的人，这才确认我做个应该说是卫生无害、可怜、献身的社会调查员。可现在看起来，妻子的通奸和出走，我不能说是个完全的受害者。这实际上也正是回到家的妻子天天含着憎恶抱怨的事情。我寻求到了自己的“自由”。我微笑着，要把妻子赶进最悲惨、最无聊的通奸和出走中去，回家来的妻子对此也唠叨个不停：你这黑肝黑心的混蛋男人。平心而论，我那时并不希望干涉妻子的“自由”，只不过希望自己的“自由”不受妨碍。说起妻子的通奸（滑稽的是，妻子把它叫做“我们的”通奸，说的是我和妻子的“我们”哟），就是这样开始的，确实我认为，妻子的道理对了百分之五十，我的意见也有百分之五十正确。与其说通奸就是这样开始的，也许还不如说，刚起步的结婚生活就是这样开始了，然后，以自然形成的趋向，让通奸连结着那场婚姻。好歹整体的轮廓十分简单，请你听一下吧。同回家来的放荡妻子（!）重新开始婚姻生活，还是继续受到我那些想法的影响，希望你能够理解通奸和离婚以前我们的每一天。

我妻子原来是小学校的体育教师，比我要高出 20 厘米，第一次和她认识，我们立刻就开始了满腔热情的大恋爱；当时，她和我体重之差，甚至要超出 15 公斤；这些事你大概都

知道吧？在西伯利亚度过拘留生活，回到峡谷间来的男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红军女战士”，就是这么个坚韧不拔的大个子女人，而且，到28岁和我初次见面的时候，她竟还保持着坚牢无比的处女膜！我们怀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少男少女的热衷情绪，竭力去破坏那玩意儿，那还是在小学校寒酸的宿舍里的事呢。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很明了的事，她对“性”这玩意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固定观念。没有任何宗教的或者医学的根据，只是沉湎于十几年来没有成功的“性”之梦想，伴随着疙疙瘩瘩的罪恶感，她把这观念当成自己对“性”的基本态度。

即：①性交中绝对不能同时触摸性器以外的地方。手指的爱抚（要是用下流日语说就是：前戏!）等等就是“性倒错”。②阴茎贯通时，不管性交多么熟悉之后，也该伴有痛苦。就是这么些她所不舍得抛弃的固定观念。开始的时候，她还整天地沉溺于性的幻想，尚处于分泌物大量涌流的状态，那时，这固定观念还未成为所谓的“问题化”。即使伴有些痛楚，在结婚的最初几个月里，那也是很自然的，老实说还用不着用手指来刺激催促做准备动作。可是，到底过去是体育教师，当她对“性”的体育运动有几分习惯了以后，就是明明自己有欲望，那要紧的部分也出不来润滑的分泌物，于是，固定观念①直接与固定观念②结合起来，形成了“问题”。她那个部分简直像荒野般干燥，又不允许准备动作。于是，疼痛加剧，分泌物更加出不来，形成恶性循环。尽管如此，原小学体育教师还是不具备改变每周有规则性交习惯的意志。还说性交中是我弄疼了她，我脑袋天门周围她那巨大的喉咙里，不停地滚出激愤的声音。我想停下来，她又说，一旦性交上了再中断，那也是“性

倒错”行为，就是不答应。我只得悲惨地继续着活塞运动。

直到善良“住持”的我不得不发出愤怒之声以前，妻子那不平不满的压制逐步升级，终于那一夜来临了。妻子脱得光光，躺成一个大字，嘴里激烈的不平之声和骂声响个不停；妻子上面的我落入了阳痿的状态，于是，妻子又把这事当成“性倒错”狠狠地骂着，这时，常常虚弱地做出微笑的我，在“自由”内侧闷着的人，变成了一个攻击型的轻薄汉，明明是和他人造成不和，相反却像自己丢失了“自由”似的。我也浑身脱得精光，啪地从被子上叉着腿站起来，为了恢复自己萎缩阴茎的名誉，我叫了起来：

“你这样发火，还不如自己刺激刺激自己，把分泌物弄出来试试，那样就不会痛了嘛。你到 28 岁，还没跟男人睡过，手淫之类的事总干过几回吧。要是那也讨厌，那你就自己去找熬得住的男人，去找肯在你干巴巴毛茸茸大腿根部摆弄那玩意儿的男人去！”

第二天，妻子引诱了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年轻同事，开始了那公开的通奸，最终离家出走到外地去了。就这样，我得确保自己的“自由”，也给妻子那“自由”的暗示，妻子实际上行使了那份“自由”。

那么，几年后，妻子为什么又回来了呢？恐怕和她出走的那男人，也终于忍受不住妻子那性的固定观念和秽言责骂吧。以前那个忍耐力极强的男人，在生养两个孩子的漫长期间内，竟忍受了那么久哇；终于也抛下我妻子，一个人去寻找他的“自由”去了，把它归咎于出走也太过分了。也许你会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会接受返回家来的妻子呢？我面对峡谷间的人们，拆除了我个人生活的壁障，自己只能处于被动状态，做出

老实的微笑，答应别人毫无顾忌地蹂躏我个人的内部，这个选择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吧？说实在的，在峡谷的入口处，妻子带着两个别人的孩子，从外地开来的公共汽车上刚下来时，消息便立刻不胫而走；她立刻被阴暗小屋子里跳出来的家伙们围观上了；可她从容不迫，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威风凛凛地慢慢登上通往寺庙的上坡道，这时，我甚至还没想过自己该做些什么。至少连这件事会在峡谷间的人们中，出现什么样的反应都没想过。带着两个女儿的这个中年女人，正要推开本堂大殿的板门，忽然停住了手，她朝着库房的幽暗张望了一阵，骂着两个害怕得不敢进去的女儿，一下子她们在那里消失了身影；不一会儿，她又出现了，大声威吓、驱赶填满了寺庙院子看热闹的人。她以前是体育教师，习惯在屋外大声叫嚷。初夏的黄昏，晚风吹拂着寺庙院子中央的石板路，她像个红军女战士，两手叉在巨大的腰上一直站立着。我坐在钟楼的石台阶上，旁观着这一幕的始终。

她用力跺着脚，挺起胸，只有脑袋渐渐下垂，朝着地面，像在思考什么问题似的，站在黑洞洞库房里等着的幼女们，对她叫了一声“妈妈”。峡谷间的天空上，还从没有一个叫母亲的声音，像她们这样发出回声，直冲上峡谷间的天空。这叫声让那些佯装被驱散了，可还在瞧个不停的峡谷间大人、孩子们，像把这一切当成笑话来听似的，“噗”地笑出了声，不仅如此，这叫声在峡谷中立刻成为最受欢迎的闲话，不久又成了对付返回的妻子和接受妻子回家来的我最简洁的嘲笑武器了。可是，妻子并没有去听那些躲躲藏藏家伙们的声音，她像是听到了“妈妈”的叫声，她似乎正确看清了我刚才一直坐着的地方，像下了场大赌注似的用力把头一昂，生就枯竭、寒伧的头

发让风吹得根根直竖，她以令人骇怕的气势，笔直朝我走了过来。用脚尖踢着大时代那种长到脚髁的裙子下摆，冲着我走过来的妻子脸上，细细的皱纹发着黑，紧张得（我不久就知道，那不用说是出于愤怒）满脸僵硬、青筋暴露；我真的害怕起来。实际上，我在受到第一击之前就已经胆怯起来。她那副样子，让我总感到坐着的自己有几分不谨慎，她站到我面前，我狼狈不堪，忽然她用力伸出手指，点着我的鼻尖；再没有比她叫出的话更令人害怕的了：

“是你这家伙糟蹋了我的生活呀。怎么样，赔我吧？你这狗东西！”

我红着脸站起来，不做声地低下头，催促妻子进了库房。就在这一瞬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震怒的大个女人，开始轻轻地抽泣起来，完全成了女人那种令人同情的脆弱模样。我们挽着手臂进了库房，幽暗里，幼女们胆怯的眼睛，像“睡鼠”般闪闪发着光。这又成了人们散布嘲弄性新闻的种子，但实际上，我要是不那样做，妻子肯定要崩溃的，抽泣着的中年妇女，那身体简直就跟沙袋似的沉重。就这样，妻子带着对我来说是别人的孩子，回到了我这里；也就是在那个月里，“施主”总代表上门来劝告我，叫我离开寺院。连认定我为最佳商议对象的青年团的头儿，也作为一个“施主”代表来了，说“对孩子的教育不好，要是你打算和那个品行不端的女人一起生活的话，就请你搬出寺院”，作为照顾，在青年团组织经营的、已经没有一只鸡的养鸡场后面，说是“给你们盖一间临时居住的小屋子”。

因为对“孩子的教育不好！”其实，拿那些人的“固定观念”来说，恐怕再没有像我妻子那样，为严格贯穿“性的禁

忌”而做着努力；即使出走又回家，结果还是为了这“性”的禁欲主义，她简直该算个真正的受教育女性吧，除了她，这峡谷间难道还有其他什么人吗？在性放纵、胡搞、不检点的峡谷间，被淫乱选择攫住的女人，只能憋闷在峡谷里，成为狂女的角色。我从寺庙里被赶了出来，不可能有祖传的个人资产。我被峡谷间突然变成“性之清教徒”的人们抛弃了，我完全可以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孩子去外地，或者去东京。可我为什么会决定去那不折不扣的“临时小屋”呢，那是个曾经在朝鲜强制劳动归来的家伙们住的部落，接着又成了养鸡场，养了上千只鸡，胡乱生下了利润为零的鸡蛋，而那些鸡们饥寒交迫，终于全部灭亡；峡谷里吞食鸡们尸体的火焰，腾起阵阵又黑又臭的烟雾，难道就在这种地方住“临时小屋”吗？实际上这里真是临时小屋。房间只有一个，当然没有隔板；薄薄粗糙的板壁上，有数不清的缝隙，它只能叫做我和妻子、两个孩子藏身之家的“外壳”，建造这种令人寒心的屋子的家伙们，其用心立刻就暴露出来了。大概峡谷间所有的年轻人和女人们，都想趁着黑夜来偷看我住的临时小屋呢。你在非洲草原上，或在砍伐掉树木的平展空地上露营的时候，夜里大概一直能听见徘徊在帐篷周围的那些野兽们的脚步声吧？我小时候，在南洋一郎的小说里，读到过这样的场面。就是那种类型的脚步，等我和妻子、女儿睡觉的时候，老是能听见。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住在森林深处，过着孤独日子的隐士“基”走来的脚步声呢。可一想又不对，隐士“基”一到夜里跑下峡谷间，茫然徘徊的目的是找吃的，那一贯具备敏锐感觉的隐士“基”，不会嗅不出，我们临时小屋里不会剩给他多余食物的吧？我这才意识到，那些家伙把我再次收容出走妻子的事，看做对峡谷间孩子教育有

问题，但其实是对我们的性生活燃起好奇心了呀。我不由地感到，也许是为了偷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才故意造了这所满是缝隙的临时小屋吧。原来，那些混蛋们期待着：通奸的妻子，不是自己骨肉的两个女儿，这三人同因性欲导致误入歧途的原“寺院住持”睡在一个屋子里，会远远超过可悲的峡谷间人们的想象，出现“性”的狂欢作乐吧！可谁也没想到他们空欢喜了一场，我们夫妇决不可能重开性生活了。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能给那些忍耐性强的偷看者们的余兴节目。那就是，妻子老是怀疑我，是不是已经盯上了还只不过幼女年龄的女儿们，会不会强奸她们，或对她们动手动脚；于是，半夜里，她会突然打开灯，检查胡乱躺着的我和女儿们，检查被子和脱光的睡相。我觉得那不过是最终没彻底解放的性欲给妻子带来的妄想，但我并不想就这一点给妻子进行特殊的心理分析。因为我生怕一旦真的和她讨论起，我“为什么想解放性欲而没有做”的话，即使不那么直接，也一定会落入和妻子讨论“性欲究竟是什么”的尴尬境地。

好歹瞧瞧妻子回到峡谷间来的当晚的事吧；疲倦的幼女们不久就呼呼睡去，不一会儿，就到我们两人必须睡觉的时间了，妻子刚才还面朝围炉，听着柴火烧水时发出的吱吱声打瞌睡，忽然睁开红红的三角眼瞪着我，发出了这样的宣言：

“我已经让医院把我那地方像网一样给缝起来了，不能再干下流的性生活啦。你可绝对别碰我的身体呀！”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自己性的热望，才恳求又恳求地把妻子请回来似的。妻子自己也明明知道那是颠倒黑白，但这种模糊的事实可以倒过来说，正像又窄又硬的领土，抖出绝望而疯狂的蛮勇，硬要扩充岩石裂缝似的。至于像“网一样缝起”之

事，属于她自己肉体的贞操带，我也没去确认是真是假，说实话也不想去确认。可是当她看到我放弃了寺院和施主，选择接受妻子和孩子的时候起，妻子也（失去寺院很失望似的）很少再吐出那般粗暴的语言了。大致上可以说，我们过着日常的市民生活，当然，妻子半夜里突然怀着嫉妒或疑惑，进行执拗检查的时候除外。有一次，妻子大叫：女孩子大腿上流血了。她大动肝火。那事可着实让我吃惊不小，结果仔细一看，原来只是些红的毛线头夹在性器里了。尽管如此，那一夜真让我第一次现实地感到了，强迫猥亵非亲生幼女的原“寺院住持”，那泥绘风格的印象。

真的，搬来原“鸡王国”的我和妻子女儿们，直到一个变化到来之前，除了深夜让人偷看外，整个儿地被峡谷间的人们无视地过着日子。这种被无视究竟到了怎样一种程度呢？举个例子，自从搬来以后，我一次也没有和峡谷间的人们正面互相瞧上一眼，女儿即使得了病，也不可能期待峡谷间医生的诊察，所以，我只得买一辆旧自行车，练习起来；就这两个例子，已经够充分了吧。我打算用自行车驮着我家的病人，送到河下游相邻的镇上去。正因为这些情况，能在超级市场买到食品和日用品已经是很侥幸的了。假如超级市场不是朝鲜人经营的话，我肯定要带着饥肠辘辘的家人逃出这峡谷的。这就是我新生活最初阶段的大概情况。

谁知有一天，微妙的变化征兆出现了。那天过了半夜，正确地应该说是已经快天亮的时候了，刚好我出寺院满六个月，已经是隆冬的后半夜了。这时期已经很少听到有偷看者的脚步声了，可这一晚，又听到了忍耐性极强偷看志愿者们蹑着手蹑脚的脚步声。我睁着眼，心情烦躁地想，从新开始生活的今

后，这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到底要继续到几时才算是个头哇。我生怕这声音来来去去，会把妻子吵醒，又要发怒猛吼，所以在漫长阴冷的黑暗中一直睁着眼。我们为了挡寒，一条被子盖住全家人，大家挤成一团睡觉，妻子为了防止我对幼女们动手动脚，紧靠在我边上睡着。因此，即使妻子醒了，不说话也不翻身地仔细听小屋外动静的话，我也立刻能察觉到。可是，妻子像狗打喷嚏似的大声唐突地呼吸后，又回到沉稳的呼吸来，显示出与起床时同样眼花缭乱、反复无常的变化。她睡着了，让我来确认这夜半小屋周围的脚步声：直到现在，偷看者们所抱着的是敌意的嘲弄和卑鄙的好奇心，它和单纯的愚昧不同，潜藏着什么秘密而肃穆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虔敬一类的动静。说不出有什么确实的理由，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黑暗中，脸上让寒气冻得发硬，从脸颊到嘴角的肌肉却松弛下来，微笑了起来。这可不是你小时候常常看到的我那小小善良的脸，不是那种叫做温柔幸福波纹的微笑。至少在我的主观里，我觉得从自己微笑着的皮肤背面，用偷窥的方式来观察，就会看出我脸上浮起了所谓残酷的微笑。这时，我第一次感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简直就像服刑未满就逃出来（假如越狱犯人有时效的话），又灵活地利用“时效”，堂而皇之变成“自由”的凶恶犯人的那种“自由”。从我的外表来看，随着生长起来的、肮脏灰色的少年白发底下，无精打采的胡须从脸颊一直盖到下巴颌，那“自由”的微笑也许和这张蛋圆形脸上的幸福微笑，没什么两样吧。老实说，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连我自己都不能意识明确而具体地去把握。可好歹让我清楚地抓住了某些东西正在发生的核心。直到天亮我一直睁着眼躺着，后来我听到妻子的叫声，与平时多少有几分不同的叫声，

正如老鼠得救报恩的民间故事里的主人公那样，我起来一看：嗬，我的小屋周围堆满了（说“堆满”一点儿也不夸张）许多米、蔬菜、糕团，还有“方便面”的固体汤料。可是，我并不感到特别惊奇。看到连米袋子都放着的情景自不必说，就是刚在超级市场里买成习惯的糕团，也都放着和曾经放在寺院里的供品一样。由各家各户按自家的方式包扎成多种多样形状的供品，比较这些形状的微妙差异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峡谷间的人们，连“在”部落的家伙们，也依照了商定的方法，也可能是由于每个个人内心冲动导致了动摇，才重新按着以前的习惯，送供品到我这儿来了吧。可是，我现在已经被逐出寺院了呀，这不该再是以前的风俗习惯了嘛。难道是村里那些不懂事的人们，对以前恣意迫害我们家族的行为突然后悔起来，动了恻隐之心，才给我送来这许许多多捐赠物的吧？首先，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你也不会认为我们村里的人会是这种类型的吧？有可能的只有一样，那就是肯定发生了对他们所谓“实际存在”带来威胁的事，于是，他们惴惴不安起来，这才想起需要我来帮他们的忙。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呢？

我对此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考虑。那天，天还没暗下来，以前从来没上门来打过招呼的新“寺院住持”（即我被赶出寺院后，接替我的刚从佛教大学毕业的年轻僧侣），似乎觉得他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似的，抖抖索索、难为情地来拜访我，告诉我那个怪物般肥胖，患暴食症的女人“瑾”终于死了的消息。你大概也已经接到这个通知了吧。小时候一起生活的那女人之死，要是让你感到悲痛的话，应该说有些懊悔吧，我尽管被赶出了寺院，但还是净土宗所谓“会众派”的僧侣，所以，不把死当成祸事，说真的，还是不会放弃这原则的。刚毕业的新

“住持”所担心的是：峡谷间的人都汇聚到“瑾”的家里，他想搞一个令人感到全新的独特葬礼，作为住持，他不知道如何控制才好。我给他鼓了劲。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峡谷间的人不管要干什么，你只要披上住持风格的长袍出去，在那些家伙们中间坐下别做声，那么，就不会损你面子，一切会自然而然进行下去的。其实，我就是在给“住持”鼓劲的时候，头脑的大部分功能也都没使用。大个子女人“瑾”死了，于是，以峡谷间人们经济生活越来越下降为轴心，村民们对峡谷间一切都不能顺利进行而感到不安，其“不安”的总量必须由一个人来承担；我左思右想，看来那“替罪羊”的角色，这回该轮到我了吧。老实说，我还暗地里有些兴奋激动呢。也就是说，我事后承认了天亮时来拜访的崭新微笑的意义。把袭击峡谷间和所有“在”部落之人的“心理鼠疫”病原菌集中于一身，凄惨度过一生的替罪羊，必须由任何人眼睛里看起来，都明显觉得是峡谷间最可怜的落魄者，这人才可充当候选人。隐士“基”已经不合格了。因为他是个最终离开峡谷、选择了丛林生活的男人。而且，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让峡谷间最大厄运之团碾得粉碎的牺牲者，他是气宇轩昂的独立者，所以不能让他充当峡谷间共同体垃圾桶的角色。于是，最终只有我可能被选中。只有我才是那个病态肥胖、老是让激烈而无结果的饥饿控制着的暴食病女王王位的继承人。其结果“在”部落和峡谷间的家伙们，不知羞耻地背叛了往日的冷淡态度，可还是抱着几分罪恶感，虔敬地蹑手蹑脚，趁着黑夜把最初的供品，把替罪羊最初的诱饵都送了过来。

那天下午，我剃掉了好久没刮的胡子，又让妻子替我剪了头发。让意想不到的赠品之山围住，女儿们、妻子都很高兴，

这点服务还是乐意承当的。自从被赶出寺院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笔直地仰起脸，踱过进入峡谷的桥，攀上了石板道，尝试着去侦察峡谷间那些被不安攫住的人们的领地。假如前一天，我用这种态度在石板路上走的话，令人讨厌的峡谷间的孩子们，会秉承那些肮脏保护者的旨意，朝我扔石块的；就像你哥哥在朝鲜人部落里所遭遇的那样，不看到我吐血倒下，他们是不会罢手的吧。我常常看到峡谷间的孩子，成群结队扔石头攻击野狗。懦弱的红狗，夹着尾巴缩成一团的时候，孩子们当然会抱着胜者的残忍继续不停地扔石头；有时，勇敢的狗愤怒地狂吠起来，这场战斗本身像是由狗的意志发起似的，孩子们立刻就会拿出自卫的本能，或受恐惧心理驱使，更加残酷地拼命扔石块。可怜的狗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吐血倒下。与此相同，在与狗相等地位的我身上，实际上也曾发生过这类事情。这些孩子们，对那个朝鲜人来说，即现在那个超级市场的店主，经济上的压迫者，是个唯一具有一定抵抗力的野蛮雇佣兵组织。大人们雇佣了毛孩子，常常去破坏那个超级市场呀。这峡谷间革命暴力的执行者真是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可那天下午在峡谷间，就连孩子们也都知道“瑾”一死，现在，承担峡谷间所有灾难的人已不复存在了，他们也感染到了大人的不安。而且，他们还都知道我被选中做新的“替罪羊”，不会再向我投石块了；他们对我充当“替罪羊”，能否把他们所有的灾难都担在肩上，露出一副缺乏信心的样子，做出有些胆怯的、看上去灰暗的丑陋表情。真是的，同那个胖而又胖的“瑾”比起来，尽管说我和通奸的妻子以及其通奸果实蛰居于临时窝棚里，可我作为“替罪羊”的肉体特征似乎还不够充分。就是峡谷间的大人们，也是一副忧虑寒伧卑下的样子，

避开了我的眼睛；对我昂然的出现，只能作出暧昧的反应。所谓那个天亮之际，我小屋周围所堆满的各种杂多食物，其实相当于用优厚条件选拔一头“替罪羊”的合同费；在这之前，这些家伙无法确信，我对当事人来说，到底有没有实际接受最坏差事的打算。

无论如何，我作为峡谷间人们关心的新焦点，自己决没有什么不满足，我脸上又堆起没有丝毫改变的微笑，可现在，这微笑的背后，像寄生的卵一样，牢牢依附着“自由”的感觉，让我十分快活；我登上了你们一家曾经居住过的原粮栈仓房的高台哟。虽然粮栈仓房给拆除了，但你知道吗，你小时候居住、生活其中的建筑物，还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呢。那房子，对峡谷间的共同体来说，真是不可缺少的场所呀。泥地深处，女人们忙忙碌碌烧起熊熊的炉火，大屋子里聚集了许多人，像是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我想，那些家伙们大概在商量如何调整葬礼中的步骤吧（是吧？我们峡谷间，大约几百年来，不仅葬礼的构造有规定，而且，死人出殡时，邻近的人都要聚拢来，像这峡谷间从来没有出过殡似的，饶有兴趣地讨论），实际上，那天他们谈的，还有关于准备举行盛大早春御灵祭的讨论。坐在大屋子外面廊沿上的隐士“基”，想让自己也进屋子参加讨论，他频频透过格子门叫着，可是，谁也不理他，他越发愤愤不平地继续要求着。距今几十年间，隐士“基”总是在森林深处居住，只在夜里下到峡谷间，虽然现在已是下午很晚了，但是他大白天出现在这种地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吧。确实，对我们这些峡谷间长大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情景。实际上，你弟弟带头挑起的峡谷间骚动，接着又是你弟弟的自杀，打那以后，峡谷间这儿那儿，聚集着一

些喜欢唠叨骚动前前后后的懒惰家伙，他们中间，隐士“基”还曾有过一段英雄般的历史呢。总之，据他说，就只有隐士“基”一个人，正好在你弟弟用石头砸碎姑娘脑袋时的现场，而且，他长年生活在森林的深处，得到过锻炼，看得清任何黑暗之处，就是这双眼睛使他成了目睹一切的目击者。那时的隐士“基”一大早就急急忙忙下到峡谷间来（说不定隐士“基”根本就没有回森林，而是潜到你家空关屋子里过的夜吧），不停地说他所看到的残忍杀戮的情景。那时，隐士“基”就是这样，通过新的形式，和生活在峡谷间的人们交流；几十年过去了，他开始盘算回到峡谷间来过白天的生活，即想复归到村里的共同体里来。况且，他觉得自己的“目击说”，给了峡谷间人们深深的感动，他又曾经是峡谷间受教育最高的人之一，所以，他像是提出了条件：既然回峡谷，就要给他一个负有什么责任的地位。一旦耸人听闻的骚动被压了下去，原来峡谷间一本正经的家伙们，把骚动的一切都看做是耻辱，谁都想一味地忘掉它，于是，隐士“基”先被峡谷间有势力的人物讨厌，渐渐地就再也没人理睬他了，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大概隐士“基”白天也从森林里下来的话，他也就再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魅力了，不过就是个老朽的疯子吧。我觉得他可怜，在隐士“基”复归共同体的愿望里，是不是有一种他老年在森林深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情绪呢？不管怎样，隐士“基”那模样谁也不会去理他，而他却在还为了能进大屋子参加“瑾”葬礼的讨论，做着谦恭的努力。

拆掉粮栈仓房后，孩子们在底层铺着石板的地窖里玩。“瑾”的孩子是那地方的主角，他们从其他孩子那里得到一些贡品。谁的一个家属死了，那家的孩子便在峡谷间毛孩子的共

同体里，暂时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这和我们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站在地窖的边缘，往下瞧着冬天下午的峡谷，迟到的白光把眼睛都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承认自己生活中还从没有由高处往下看过什么的经历。我瞄了一眼你家房子的角房——“瑾”她们的住房，摆设着手制佛坛，那前面躺着小小的“瑾”，用白布盖着脸，身体上盖着被子，应该是比裸体增大三倍的遗体，我想起了看惯的那“日本一大女人”“瑾”那异样肥胖的样子，“瑾”的身体像是让死的压力缩小成了十分之一。假如活着的人十分之九是灵魂，剩下的十分之一是肉体的话，那么，人也就相当地超越了兽的界限。原来那么肥胖的“瑾”，不可能在死之瞬间突然缩成干瘪一团的。她在患肝脏病通向死亡的路上，每天靠把庞大的皮下脂肪，当作“卡路里”一点一点地燃烧，来维持生命的，所以，她在几乎只是喝水的状态下还拖了很久。终于，她那象征现世侮辱的皮下脂肪全部燃烧而尽后死去了。

“瑾”小小的遗体前，坐着她的丈夫和峡谷的一个主管人，还有那听了我的有效忠告穿得像模像样的年轻“住持”，他还带着个充当辅助的小和尚，一定是急急忙忙求邻镇支援来的，他正和主管人仔仔细细说着什么呢。我倚着打开的板门，朝里张望了一会儿（我在村里人面前还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不检点的样子吧？从寺院被赶了出来以后，我作为贱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那一定是首先具体看得清晰的“自由”发现），主管人像是注意到了我的出现，又像没注意到似的，他用这种峡谷间人特有的茫然若失的样子，侧耳倾听着住持的轻声细语，那样子似乎说有必要以后说千遍也可以。而那个新上任的住持，像要赶快忘记先前想岔了跑我那里去讨教的事，明摆着把我当

成了累赘。“这混账和尚！”我喉咙深处尝试着咒骂。我心里在说：瞧着吧，不出几天，峡谷间的什么人肯定会重新来咱这里诉说烦恼的；咱不仅是这个峡谷间的替罪羊，咱还要重新代替你小子，为了那些家伙灵魂的平安，咱得作为守护神复活过来。

证据已经有了，“瑾”的丈夫朝我仰起了脸，那张瘦弱得活像患了热病的狗脸，在住持和主管面前什么也不说，只是那双失神的眼睛里充满着说不清楚的可怜情意，一直盯着我看。我产生了一种预感：要不了很久，任何人都会流露出这样的眼神，即使缠住我也不会感到难为情的吧。而且，峡谷间所有的人，天生具备了一种异样的狡猾：只为了传达与表面意思相反的意图而说些什么话，“瑾”的丈夫也不例外，他让那个肥胖而又肥胖的丑陋女人，那么异样的暴食弄得无时不无烦恼，可表面上他对她的死是怎样深深地悲痛啊。我自己也像要愚蠢地落几滴泪似的，所以，我中止了朝“瑾”的遗体再看一眼的举动，就这样返回来了。我作为一个认识了独自“自由”的男人，与这个峡谷间家伙们低层次交流的眼泪，难道不该流下吗！

我从粮栈仓房的遗址下到了峡谷间，当我正要往低洼的独木舟似的石板路走下去的时候，没想到，隐士“基”为了掩饰他的老朽，以夸张的敏捷跑过来追上我，频繁地在我的周围跳来蹦去地和我说话。不管隐士“基”说什么话，“自由”的我一旦开步走了起来，就不打算停下来听他说话。即使我想重新来倾听峡谷间人们的烦恼，但我这次可不打算答应他们重新踏进肮脏的脚，来蹂躏我生活和行动的内侧。隐士“基”到底要向我说什么呢？现在，我听着那家伙讲的话，而且，一旦我获

得听他说话的力量，那就会将旷野里呐喊的人，在峡谷间所有地方巡回叫喊的内容，改写成现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记录下来，于是，它就成了诗一般的东西。核时代之类的语言，隐士“基”虽然没有直接用上，但意外的是，他很清楚原子弹爆炸、所谓“死亡之灰”等等。这意味着他在森林深处，熟读了用来包裹剩饭的旧报纸吧。至少发疯以前的他，或者假装发疯逃避征兵、开始过隐士生活之前的他，是村里数一数二受过教育的人呀。我把他骇人的、啰啰唆唆、翻来覆去的话整理了一下，翻译成常识的语言，给你看到的隐士“基”的话就是这个模样：

核炸弹、人工卫星播撒
放射能之灰与无线电光线之毒
散布于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人群　家畜　栽培物饱受浸蚀时
森林中发生了令人惊奇的
生命更新。森林之力强悍
进入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衰弱相反就是森林的恢复。
只有放射能之灰与无线电光线之毒
成为树木之叶、地面之草与湿地之苔
吸收之“力”。
树木和草叶未被二氧化碳所杀
看吐出氧气来喽
要在核时代延续生命者
快将森林之力与自己同一化

逃出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隐遁森林哟！

一开春就要搞大规模的御灵祭，还是“在”部落的农妇们，把这情报送到我这里来的。其实，临时地、必要地被强迫搞御灵祭，对峡谷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名声的事。那些家伙，根本就不会希望把这消息告诉我这样的人吧：让村里共同体蒙羞、住在峡谷的角落，只能作为替罪羊而活着的人。“在”部落的农妇，就是那些对我与离而又返妻子的关系说三道四、嘲弄我的家伙们，为什么会特地抱一捆蔬菜来给我传达情报的呢？原来，提供情报只是这伙人的借口，现在农妇们真想做的，是要把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改换成另一个，就是改成常说的、那个创造了强大信徒团体的佛教。峡谷间的住持当然反对这件事。可是，不仅从河下游镇上来的折服者攻势强大，而且，她们自己也被根深蒂固的不安所动摇，要寻求什么新的方向，现在，“在”部落正处于宗教改革期混沌似的小型旋涡之中。于是，现在又来找上我，虽被赶走，但我好歹曾经是这峡谷间祖先灵魂的管理人。然而，我的回答老是一句鼓励那些家伙的话：

“这种事不是你们的自由嘛！”

关于春天开始的御灵祭，最初，那些代表山林地主们的有势力人物出来反对，说不管怎么做，它都是不成体统的羞耻事。说他们也对峡谷间的前途感到了不安，以前长期培养起来的自尊心，是决不允许把这话直率地提到表面上来的。可是，情况忽地一变，现在，他们率先亮出要搞御灵祭的心思。而农妇们反正处在贫困的极点上，能够免去那场灾难，她们幸灾乐

祸地说，搞御灵祭理由是峡谷间全部有势力的人物在股票投资上蒙受了巨额亏损的关系。还有怪事呢，听说有势力的家伙们是听了“超级市场天皇”——那个朝鲜人经营者的推荐，才做了投机性最强的股票买卖；谁知，还在往大阪打电报联络时，事情就发生了。听说一时也有赚了大钱的，一旦这冬天碰上大暴跌，蒙受的伤口也许会更深吧。原来只有“超级市场天皇”在大暴跌之前全部脱了手，一点没损失；所以有人说，朝鲜人战时在极恶劣条件下受到强制劳动，这是不是他们一系列报复行为的一种啊。尽管没有人上吊，可那以后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发了疯。那些贫困的农妇，本来对山林地主所抱的反感，就可谓根深蒂固的，说只要有势力的人在众人面前洒几滴眼泪，立刻就会叫那老爷发疯的。因这事受到极大打击的峡谷间有势力者，这才下决心搞御灵祭祛除厄运。

于是，初春时搞御灵祭，又发生了一个恐怖的事件……说这故事之前，我必须先详细说一下，从“瑾”的葬礼到御灵祭这段时间，森林隐士“基”作为狂热的说教者，在野地里呐喊的声音不停地在峡谷间回响。他成为狂热说教者的内在动机，在于他最初对我所说的现代文明观；外在的契机呢，据刁难使坏的家伙们说，就是上次那可怜大个女人的葬礼上，他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响应而生气的缘故。隐士“基”不能正式地坐进大屋子和大家一起吃豆腐饭，当然按以前的老习惯，他可以领到那些剩饭剩菜。可是，刚刚回心转意成为“新预言者”的隐士“基”，竟然夸耀起自己的自尊来，不接受剩饭剩菜。就因为这个，他度过了好几天最痛苦的饥饿与愤怒的日子，终于燃起了敌意，成了在野地里呐喊的人。与其说是为了救助峡谷间的人们，不如说他自己如同核时代魔鬼的代言人，对峡谷间发

起了进攻，他不停地呐喊着先前那些说教：

要在核时代延续生命者
快将森林之力与自己同一化
逃出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隐遁森林哟！

御灵祭如何进行你知道吧，峡谷间传下来的祭祀，给这峡谷间带来灾难的所有人的御灵、还有生前就是这峡谷间荒疏者的御灵，在大鼓和铜锣敲响的时候，纷纷从森林深处羊肠小道上下来的景象，你一定还知道得很清楚吧。在初春御灵祭上，应该特别提到一笔的：一个是眼睛周围凹下去部分胡乱钉着许多钉子、戴着大红面具的御灵，那就是用散弹击中脸部自杀的、你弟弟的御灵；另一个是加在队伍末尾的一个新御灵，尽管它未被允许加在队伍的末尾，可它还是执拗地追着队伍。它要加入队伍，被拒绝不接受，它发狂地猛烈追赶队伍而来，它就是隐士“基”所扮演的“森林”之御灵。

尽管他不是御灵祭的正规成员，但隐士“基”所扮演的御灵，却真正成为这一天最大的观赏物。特别是孩子们的关心像是让“森林”独占而去似的。隐士“基”的扮相奇怪而又滑稽，而且，这个御灵始终在呼喊着那个说教，他像是在夸耀通过森林树木吸收，成为他活力源泉的个人原子能，用人们难以相信的活泼，横冲直撞。

隐士“基”把“森林”之御灵化作了意志，实际上，他肯定想弄一些缀满翠绿茂密树叶的枝条来缠绕身体；可还是初春之际，也许砍不到充分发芽的灌木吧，而那长青树的枝条对于

老年的他来说又显然太重了吧。于是，他将缀着茶色枯树叶的干柴枝条缠绕在身体上，活像一只肮脏的刺猬。如果他不是一路高叫着那个说教，全没有一点根据可以判断他就是隐士“基”的扮装：他用缀着枯叶的小枝条覆盖着全身，只露出青筋暴露的两只细腿，手臂，两条手臂从茶色枯叶球体之间，孤零零地伸了出来，握着尖尖的令人害怕的竹矛。你看到过用枯草和苔藓来做球的昆虫吗？你只要想象一下，就是那种形状：巨大的球里，伸出两只细腿，又伸出两条拿着危险竹矛的胳膊。

御灵祭一行，不停地驱赶这个疯子志愿参加者，一路下到你家的宅院。要是以前，须进入仓库，有个做宅院墓铭的程序，而那个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属于仓房的，现在只剩一个地窖之底。这天，正好从初春晴朗的天空上，吹来了旋风，大篝火可以取暖；于是，御灵们绕着大篝火兜了几圈，组成了一个新队形。仪式一结束，御灵们和主管人纷纷进入你家的正房，开始吃喝起来。而那隐士“基”，既没让他加入绕篝火转圈子的队伍，又不让他进入正房用膳，只让他尝尽屈辱。首先，他那鼓鼓囊囊的装扮能不能安全进入正房的门还是个问题呢。院子里，一般跑来看热闹的大人、孩子，不论谁都在啃着领来的粽子。有人往正房里瞧着，有人品评着御灵的演技，有人想让篝火烧得更旺，一个劲儿往里投进新柴，只把隐士“基”一个人留在了不满与愤怒之中。那场面里最激愤的只有隐士“基”一个人，我们看热闹的人却悠闲、舒畅地等着御灵后半场的出现。

正房里，刚才那盛大宴席还在继续。完全和往年一样，就是在峡谷间人们的生活水平如此下降的时候，御灵祭也照样大

摆宴席。我不知道咱们峡谷间的居民，为什么一到那祭祀，就会绝望似的亢奋起来，大吃大喝喧闹一场，直到最后有什么人醉倒，难道喜欢快活地搞祭祀吗？（有时也让人感到祭祀是桩苦事呢！）那举动简直就像只有那祭祀，才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似的。可就在那祭祀之前，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准会有人发出叹息：啊，又是祭祀！真是无精打采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啊，又是祭祀！特别是这回的御灵祭，不过是临时的祭祀。实际上，直到那天之前，还有大多数人表示出怀疑的态度，真是让人明显感到厌倦的御灵祭呀。谁知，御灵祭这天一到，那些家伙立刻就像疯了似的，在祭祀时狂乱起来，大吃大喝，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难道不该说这是集体的疯狂，是又大又深的不满，无可奈何的爆发吗？峡谷间的居民，就像只在祭祀这一天，才坐上大喧闹的火箭，从他们日常生活阴暗的引力圈，朝着更加黑暗的外部，自暴自弃、高高兴兴地集体逃亡。

正屋里大吃大喝正闹得起劲，院子里却发生了恐怖的事情。刚才正规御灵们围着仓房遗址地窖上的篝火跳舞的时候，扮“森林”御灵的隐士“基”，不允许加入那行列的圈子；当正规的御灵们都进了正屋去以后，他一个人绕着篝火的周围转，一边开始大声叫起先前的那个说教。孩子们，以“在”部落来的家伙们为中心的一般观众，齐声为他喝起彩来。这时，隐士“基”第一次成为御灵的主角，他弄出更加激动人心的声响，用夸张昂扬的沙哑声音呐喊着，宛如树叶包裹的大球蹦蹦跳跳，抡着令人害怕的竹矛。

人群　家畜　栽培物饱受侵蚀时
森林中发生了令人惊奇的
生命在更新。森林之力强悍
进入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衰弱相反是森林的恢复。

突然（峡谷间的毛孩子，奸猾得连大人都替他们害臊，他们浑身充满了无法抑制的破坏冲动，听说好像是他们一味地挑逗唆使着隐士“基”：隐士“基”哟，假如你真的通过树叶吸收原子能的话，你能像电视里的超人那样飞起来吗？你能打穿铁壁吗？你能经得住一百亿度的高温吗？）隐士“基”一个踉跄眼看要跌倒似的，跳进了地窖底下的篝火之中。依我的解释，至少一开始恐怕只是个事故，刚掉进篝火的瞬间，我觉得隐士“基”一副十分狼狈、茫然若失的状态。立刻，他的“森林”御灵装束上着了火，让篝火烧了很久的地窖石板，像个巨大的平底锅，一定十分烫吧。隐士“基”像个具有什么说不清能量的物体弹跳了起来，以十分激烈的气势，嘭嘭地跳着！

听到看热闹人的叫喊，从正屋的酒席宴上，跑出几个青年团员来，与其说他们被志愿消防队员的使命感所驱使，不如说他们出于夸耀自己英雄主义的需要，极想跳进地窖去救助隐士“基”；我们都觉得当时可以从火里救出隐士“基”的，可突然一切努力均成了泡影：隐士“基”为了阻止勇敢救助者的行动，竟把竹矛伸到了他们的鼻子尖上啊！腰的周围已经开始冒烟，又出现了小小的黄色火焰，他还不脱下枯叶的扮装。这个瘦弱的小个儿老人，以习惯的动作抡起竹矛，胡乱地挥舞刺杀着。隐士“基”的身体终于让火舌给包裹住了，枯叶快要全部

烧着了；戴着老式邮差帽子、缀着饴色胡须的隐士“基”，那张缩皱起来的小脸，看上去焕发出大红的光彩。这红光不仅来自抓住隐士“基”内心的愤怒和外侧的烈焰；也许还由于隐士“基”偷了御灵祭宴席的酒，喝醉了的缘故吧。总之，直到最后阶段，隐士“基”一直大张着嘴，大得和那张通红的小脸一点不相称，那张嘴也是通红通红的，仿佛一直在叫喊着已经化作他固定观念的说教。他一刻也没停下挥舞竹矛戳着前来救助的人们。

要在核时代延续生命者
快将森林之力与自己同一化
逃出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隐遁森林哟！

结果，我们只能呆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看着烈火吞没了隐士“基”的头。这时，竹矛啪地发出一声令我们大家发抖的激越声响炸裂了，尽管隐士“基”不能再戳前来救助他的人，可谁都承认：无法再救他出来了。……不久，大篝火的火焰熄灭了（那可真需要大量的水哟。可你家的井太深，灭火行动不能顺利地进行）。这时，隐士“基”烧得像黑黑的橡皮娃娃，活像个村里出身的年轻人，在广岛挨了原子弹爆炸而死的御灵的扮相。峡谷间的人们开始和隐士“基”的说教深深联系了起来，他们受到了最根本的动摇，我觉得，那正是因为他们望着这隐士“基”的尸体，受到了最后一击的缘故。

要在核时代延续生命者

快将森林之力与自己同一化
逃出每个城市　每个村庄
隐遁森林哟！

打那以后过了一年，又是一个初春，这十二个月里，有很多人离开了峡谷间。不仅有出外赚钱的年轻人，还有刚上了年纪的家伙，甚至还有女人、孩子，就是说，是合家离开峡谷而去哟。他们大致都说是去大阪、东京那些地方。听有人说，在森林的深处，发现了一些本该在大都市贫民区能找到生路的家伙。就是“基”作为隐士生活了几十年的森林深处！也许有的人从峡谷间逃出，还在选择安顿之处的阶段，心里就早已放弃了去东京、大阪的机会，而要改变进路去围绕峡谷的森林深处。于是，这些家伙可以称为实行“入信”的最早组织，他们相信与隐士“基”生前所散布的教义有关，真的有核时代令人害怕的怪异黑暗！

我客观地说出有关这些家伙的事，这峡谷间，肯定有人一听就立刻反驳说“这是欺骗”吧。他们怀疑我是不是负责提供路径的人，帮助那些人往大城市跑；假如那些传说是真的，那么，我是不是还帮助那些往森林深处跑的人呢。确实我作为被自由解放的人，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在峡谷间兜圈子，也不屈服有势力者的任何权威，峡谷间的所有人已经都十分清楚：我不是那种掌握有人夜间出逃的情报，就会向债权人密告的人。于是，深夜，峡谷间那些想腻烦了的年轻人和中年男人，有时甚至是刚上年纪的女人，都跑来我那临时窝棚来拜访：

“什么地方好哇，想从这里到其他地方去，没什么不好吧？”

真的有人问这话，很自然的。我立刻反问他们：

“为什么不能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呢?”

我就是这样给了他们一些鼓励。老实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将开始怎样的新生活，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而我自己仍旧留在峡谷间，住在临时搭建的小屋里过着日子；每天让永远满足不了性欲、保持着有机质贞洁带的妻子挖苦几句，孩子们则常常警惕着我那强奸幼女的恶习复发。我打算无论如何留到最后，现在不断发生的峡谷间人的外迁，要是再继续下去的话，峡谷间的村落和“在”部落就会灭亡或者消失，我想看到这一情景。

峡谷间已经没有活泛的气氛了。空屋子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人去购买，结果，到了看上去被超级市场天皇征服了的时候，其实，峡谷间的人们正像其祖先似的逃散开去，以弱者绝望的最后抵抗，来报复压迫者，就这样，他们全部让“超级市场天皇”给吃掉了。

我和家属们，享用着峡谷间人们送来的公开供品活了下来，要是峡谷间完全空了的话，我们当然也得离开峡谷。然而，直到最后一家离去之前，我是绝对要留在这个临时窝棚里的，我还打算告诉那些从一百代以前就一直受到束缚的峡谷间的家伙们，“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至少我打算不停地让他们嗅一嗅“自由”所在的隐约气息。那些家伙，最终执意离开这个被森林包围住的峡谷，该从怎样沉重而顽固的束缚下把自己解放出来呢？这是你，说是青年、实际上还是孩子时候就离开峡谷的你，并非完全不知道吧？为了那些肩扛沉重包袱抬不起头来，在峡谷间石板路上走路的人们，我打算把自己“自由”生活的情况给他们看，为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解放的

启示。反正我祖祖辈辈都是以峡谷间的人为对象，从事救济事业的，所以，这一半是由本能支持着的工作哟。

终于峡谷间的人家都走尽了，我也只好带着发怒的妻子和猜疑、胆怯的女儿离开峡谷，可我们究竟能去哪儿呢？也许去乘上夜行列车，成为东京或大阪贫民区的一员；也许调转头，踏上做森林深处居民的路。我那时从这个峡谷出去，为了再度充当开始新生活人们的巫师角色，我追上了他们，只有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事是确实的呀。我最后一个人，离峡谷远去，我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在恐惧和不安的追逐下逃跑着。我是为了在峡谷间一旦逃跑的家伙们中，再次捕获峡谷间共同体的巫师之名，这才追赶他们出了村子呀。假如从这个理由出发，我更希望："逃出峡谷间的家伙们，那原始共产主义的共同体，已经来到了森林深处"的传闻是正确的。你继续追求你自己的"自由"吗，假如相信已经取得了"自由"的话，那就请继续确保你新鲜的感觉。假如我们能够再会，让我们来创造一个就是在昏黑处也能对上的暗号吧。说不定这个峡谷出身的你，最终大概也会加入幽暗森林深处那个传说的隐士组织吧！好吧，再见，暗号是"自由"。

静静的生活

还是父亲应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作为“访问作家”赴美的那一年发生的事。母亲也随同过去帮忙。临出发的前几天，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晚饭的气氛似乎比平时要严肃得多。这种时候，总是家族成员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商量；这天，只会说蹩脚笑话的父亲，提起了有关我的“结婚计划”这样一个愉快的话题，因为我最近刚刚过完了“成人节”。我这个人，自小就有一个习惯：不论别人说什么，哪怕以自己的事为中心，我也不过侧耳倾听周围的发言默不作声。尽管如此，父亲一杯啤酒下了肚，心情舒畅，便不肯罢休地继续说：

“好歹你也说个最起码的条件嘛。”

我一开始就打算来个冷冰冰的回答，可父亲半闭着嘴，正笑容可掬地瞧着我呢。终于，我产生了一个欲望：把平时老在脑子里盘旋的念头说出来吧。我注意到自己声音奇怪而干脆地响了起来……

“我要嫁人，得和义幺在一起；至少要找个弄得到两房一厅的人。我要在那里静静地生活。”

我一闭上嘴，立刻就明白父亲和母亲都各自受到了冲击。首先，两个人都把我说的话，当成了孩子气的滑稽念头，打算

支支吾吾一笑了之。以这种展开方式来进行家族的对话，也可以说是父亲的拿手好戏。叫做义幺的人，是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他在智能障碍者呆的福利工厂里工作。若是新娘真的把这个人带过去，年轻的丈夫将会以怎样一副脸孔来迎接新娘呢？结婚典礼以前，即使预先说得再好，那新郎官，也许只会把那话当作莫名其妙的事，听过算数了吧？结果，新生活的第一天，好容易弄到手的两房一厅里，忽然出现个大个儿的舅子，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知该会怎样吃惊呢？

可我听出，父母亲表面似开玩笑的话底下，像有什么一本正经的意图，我紧张地低下了头。即使有悖常识，一旦说出口，在我可就成了顶要紧的事了。因此，我不可能就此默认放它过去的。

“我可是一直被人说成没有幽默感的人，没错，正是如此，”我接着说，“也许爸爸你们传达了隐蔽的意义……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提起当新娘的事，不用说你们该有具体的目标了吧。即使作为假定来考虑，那么，眼下各种各样的实例很多，不管用什么方法，刚开始就会撞上死胡同，所以，我一直是这样考虑的。”

刚才的话，说我的念头荒唐，我也承认，没人肯接受我自己和义幺两个人的呀……爸爸和妈妈能不能教教我，实际跨越死胡同的本领呢？

我说的就是这些。而且，我还清楚地知道这些话还不够充分。我从小就有个习惯：母亲一走进化妆间，我就会跟进去站在一旁说话。正是这个缘故，第二天一大早，谈话又继续了下去。借用“奥”弟“大致上”的口头禅，我说，大致上，准备好了。其实倒是应该说，“甚至连下意识，我都准备好了”，这

话才算更正确……

昨天我说过的话，自己都感到失望。我觉得甚至比不说更不好。我退回到卧室，正好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事，渐渐地精神疲劳，可怕的梦开始了：我仿佛一个人站在空落落的地方。可谁知刚才醒着时的现实意识还残留着，它们不知不觉混了进来。在那悲哀、旷远的心境之中，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立着。——可我又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躺在床上。

这时，我在梦境里感到：自己身后，站着一个和自己具有同样心情的人。就是不回头去看，我也知道那就是“未来的义幺”。应该立刻从斜背后迈上一步的“未来的义幺”，是新娘的陪嫁人；这么说来自己就是新娘啰。我整整齐齐地穿着新娘的衣裳，把尚在懵懵懂懂打量“未来的义幺”的新郎官，撩在了空空如也的地方站着。那里是黄昏中广袤的原野。就是这样一个梦……

夜深了，醒来时回忆梦境实在不是滋味，我想转换一下梦中那种比什么都浓郁的寂寞情绪，无法在床上再躺下去了。于是，我登上楼梯，怕哥哥上厕时摔跤，所以走廊上彻夜点着灯，我从窄窄开着的门里进了哥哥的卧室。就像孩提时那样，我不由自主地拉过一条旧毯子盖在膝盖上，坐在义幺床边的地板上，听着超过一般人肺活量的打鼾声。过了不到一小时，哥哥在浅浅的幽暗中下了床，迅速跑到紧对面的厕所里去了。哥哥一点也没注意到我，我心里变得更加孤寂了。

像以往一样，义幺小便时发出很响的声音，完了后回到屋里，像条大狗似的，用头和鼻子凑过来辨认主人，他弯下腰用额头按着我的肩膀，在我的边上坐了下来，看来就此打算睡过去。我心里一下子感到了幸福。不一会儿，哥哥用那种大人憋

不住要笑的说法，用听上去还是孩子般清纯柔和的声音说："玛姐儿，怎么回事呀?"我完全恢复了健康，把义幺安顿到床上睡好，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从秋天学期起，父母访美的日程就要开始了。明天就是他们出发前夏日最后的一天。父亲坐在长椅子上看报纸，身边放着装得满满的沉甸甸的箱子，他像是说给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和我听似的，又更像是他深思时不知不觉漏出来的自言自语。

"非得给义幺恢复体育活动才行啊！也许还是游泳好哇!"

父亲身边地板的铺垫上老趴着哥哥，平时作曲他老那样；哥哥应该像以往那样，慢半拍似的说出逗得全家人哄堂大笑的回答：

"体育活动嘛？游泳，拿手的!"

我没想到：父亲的话会像棒子那样咕噜咕噜地捅进我的心。哥哥滑稽地充当着家族间的缓冲材料——其实，他也不一定全没有感觉。

可是，今天父亲突然说起体育活动之类的话时，义幺并不在旁边。一大早，我把哥哥送到福利工厂，回来又帮着母亲收拾早饭的餐桌，这时，起床迟了的父亲正在读报。就像刚才我所写的那样，"咕噜"，我心里像堵上了一个异物。父亲上书房去后，我立刻准备打扫客厅。这时，我从摊开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伤害事件的报道：一个智力发展不全的青年袭击了林间学校的女学生——被看成是"性"的动机。

这时，我心里涌起阵阵反感："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感到与其说这话是突然蹦出的，还不如说它是准备已久的。最近，我常常说"什么玩竟儿，什么玩意儿!"之类的

话，义幺责备说那都是“粗话”。这天的报道里，多次出现精神障碍者“性的暴发”之类的词语，不知报社是否要搞隐瞒意图的宣传活动呢？我甚至同母亲商量过，是不是能把我家的报纸换一家。可现在，父亲对那张报纸上“防范智力发展不全的青年‘性的暴发’宣传活动”——即使真的发生过——做出了坦率的反应，即使他还没接触过那篇报道，本来就想好要说哥哥需要体育活动的话，我也感到很抵触，心里觉得冷冰冰的。

义幺确实到了性成熟的年龄。上学或回家的路上，在大学校园里，我也见到过和义幺相同的二十岁左右的健康青年。尽管不能说他们的全部，但至少那些搞“无偿奉献服务”的伙伴们虽然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但有时也放射出与“性”有深深关联的闪光。周刊杂志载有此类的报道，电气列车里吊着的广告牌也比比皆是。

从一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看问题，难怪父亲和新闻记者有同感，表现出对义幺“暴发”的担心，作为对策（!?），才说他有体育运动的必要。难道父亲也有看不清事实的“小市民气”吗？我就是在此处觉得有抵触情绪的。

在福利工厂里，我其实已经好几次听到一些近乎“暴发”的事例了。那些事，都是我加入了“接送母亲”队伍以后，在旁边偷听到的；然而，和健全年轻人那急咻咻的样子比起来，他们完全是有节制的，真可以说是可怜的“暴发”。说话人，谁都不会想到，我坐在座位一角、老老实实地听着，心里却涌起阵阵“混蛋，混蛋！”的叫声……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根本没必要惊动警察。

义幺刚开始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只是跟着妈妈去看看的，记得福利工厂周围是一片空地。可现在却一排排耸起了正

面采用木料的整齐公寓，于是，看不清拐角的路，十分危险。假如真有什么事发生，新搬来的居民肯定会发起反对福利工厂运动的吧。

这年初春，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我送完哥哥回家，半路上，从交通异常拥挤的甲州街道，插入了沿旧汽车商场围墙外的小道。一个男孩子把裤子拉了下来；福利工厂刚刚点好名，那男孩子肯定不是哥哥工厂里的同事，但一望便知是个智力低下的孩子。他把裤子直拉到膝盖下面，露出白白净净的屁股。他一边望着围墙那边的旧汽车，一边用手揉搓着自己的性器。搭伴一起回家的母亲里有个首领，言行果决的A妈妈“啊呀，啊呀!”叫了起来，“玛姐儿别在这儿。M妈妈和我先上去!”她用奇怪的口气制止住我，自己靠近了那孩子。

车道对面的人行道上，正好有三个搭伴的女人走来，她们用责怪的眼光瞧着男孩子，正想要抱怨。A妈妈一把上前，帮男孩子拉上裤子，再把扔在地上的双肩书包替他背好。然后，确认好这孩子学校的方向，把他送走了。送走那孩子的程序麻利地进行着，边上那三个女人连说句抱怨话的时间都没有，只是示威性地回头朝这边望了一眼便走开了。

我追上A妈妈，和她一起去车站，她对我说：“要是附近没有看笑话的太太们，要是不担心会和我们工厂的孩子搞错的话，我准会听之任之随他去的!”

这回轮到了M妈妈。出于对我的关心，她“啊呀，啊呀!”地叫着。不用说，我是赞成A妈妈的，我只是在心里说着：“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红着脸，快要流出泪来了，我寻思着恐怕要被人当做什么坏品格了，倒霉……

其实，我并没有责难那男孩子的心情，至少自己家里人尚

未见过义幺出现同样的动作。即使在我们目力够不到的地方，以前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可今后就一定能保证没有吗？这是我实在的感受。其实根本谈不上我放心、喜悦，应该说还很复杂……

义幺的性格里，有一种本原性的认真，对类似“性”的恶作剧，他老是做出拒绝的反应。父亲喜欢把那种事当做愉快笑话来说。听母亲说，学生时代爸爸完全不是这样，而父亲则说他把说那种笑话当成了第二天性，是自己开发出来的。哥哥总是斤斤计较般的严格。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也许哥哥对于家里经常使用的词语“茎”也很反感吧，会不会他凭着意志力在强忍着呢？

“茎”。这种说法立刻能转化为愉快笑话型的“性表现”，那是父亲发明的。我也知道这词语在词典里是不会刊出的。而且，父亲还真把它当成万能用语来使用的。若是站在父亲一边说，当义幺产生他自己无法应付的“性”方面的不便时，用这个词语，可以立刻岔开去，顺利地把那“不便”当成愉快的笑话来处理。

我想起了义幺还在上养护学校高中时的一件事。哥哥像往常一样趴在地毯上作曲，听FM立体声广播，他想把身体换个方向，拼命把腰往后挪，一副笨拙模样，用英语来说就是awkward（笨拙）的模样。父亲一看到那模样，故意大声地“我也听得见”地叫起来。“义幺，‘茎’伸长喽，来吧，快去厕所！”

于是，就像医院里常见到的、那种下腹部异常的女人似的，伊姚一扭一歪地走去厕所。我们担心那伸长的“茎”擦着内裤会不会让他生疼，该想些什么办法来帮帮他呢？可是，这

时的哥哥却是极具防御性的，绝对不允许我们插手，我们其实什么也帮不了他。这一点上，连妈妈都说不得要领。

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亲眼看见过义幺伸长的“茎”呢。哥哥从小一直兜着尿布上床。后来，铺在尿布上的塑料袋一般能买到的尺寸都不够大，一家人去市中心时，父母亲在百货店杂物架上一阵好找。谁知，这时养护学校的老师却提出要想法治好夜尿症，说每晚十一点到十二点把哥哥叫醒，带他上一趟厕所。这个任务大都由母亲或父亲来担当，偶尔碰到父亲去外地旅行，母亲又太累起不来的时候，那就由正在准备高中升学考试的我来承担。

打开卧室里的电灯，义幺虽然敏感地睁开眼，可他不会自动起床。让你觉得他像一头小熊似的躺着，把毯子耸得高高的。先得掀开毯子，把那魁梧的身体放平，帮哥哥脱下睡裤；这阶段，哥哥会“嗵”地躺平，给一些微妙的配合，让你很顺利地脱下裤子。

尿布还没尿湿的话，他去过厕所后，还照样能使用；你得小心翼翼地去掉吸附的胶布，不能让折过的整体形状损坏。要是他小便出来过了，那湿漉漉的温热气息腾起来马上就能知道；来得及的话，会感到一阵欣喜，大概有些像狩猎者捕捉到猎物时的那种高兴吧。

只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把吸附的胶带拆掉，从内侧把尿布挪开的一瞬，那“茎”会猛地跳起来。就这样把下半身暴露出来，义幺会自己坐起身来下地站着，尽管这时不需要你再多动手，但他嘴里会喷出一种气味：像巨大野兽的气味，像金属化合时的泡沫般的气味，就是闻过好几次都还习惯不了。这气味和白天哥哥呼出的气息完全不一样，和他发作时嘴里的气味

也不一样……

义幺克服夜尿症，是在提出要求的半年以后。他在养护学校的宿舍里进行住宿训练，由热情的男老师给一次治好了。打那以后，我想，家里任何人都不会再看到过哥哥的“茎”了，那像墨杜萨[①] 头上的蛇那样竖起来的情景。再仔细回忆一下，我似乎觉得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茎”伸长，也没见过哥哥那awkward（笨拙）的模样了。既然义幺具有一本正经的性格，又不是那种能够障人耳目而有意隐瞒起什么的人，那么不就不再会有“茎”伸长之类的事了吗?

我跟妈妈说起这事时，妈妈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也许那时期已经过去了哟，短暂的青春呐。”在客厅里听到我们谈话的父亲说：“反正不是什么坏事，可以放心喽。结果嘛……”我听了又一阵抵触。

“这事对伊姚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我在心里反驳道。当然，变成这样就不会再做出那男孩子的举动来，可是，这也不十分清楚，只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实在不想说就此可以放心之类的话。心里还想着：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父母亲从成田机场出发后一星期，尽管已经预先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是，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层出不穷。夜里，我只睡四五个小时，白天忙里偷闲往床上迷迷糊糊地歪一歪，还得一天写两回日记，这是和妈妈出发前说好的“家庭日记”。还就是有你写的内容。

---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她头上长着蛇的头发，要是有人看见她的头，这个人就立刻会化成石头。

不用说，琐琐碎碎、手忙脚乱的事缠在身上，倒也就没工夫感到寂寞、不安了吧？只有两件事，或者说两个人的事，让我隐隐约约担心起来。实在像有一种肉鼓鼓的东西，悬在胃之上正当中的感觉。那就是以前被性子急的我唤做“狂热信徒”的两个人。父亲对我的叫法有些不以为然，默不作声；只有妈妈说，让我在别人面前可不能这么叫。

从去年年底起，这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每星期一趟来我家门口送东西。我观察他们的举止，才把两人叫做“狂热信徒”的。一个人拿来的花束不是那种花店里常见的扎好卖的，而是将一支支小花随意归拢起来的花束——那人老是低眉俯首，动不动就想进来，那花也是阴森森的花束！——送过来，另一个人往装清酒的大瓶里灌满水，塞上软木塞送来。这个人只是在大门边的砖墙上放好瓶就回去了；有一次，我出去拿“岁暮送礼”的邮包，和他打了个照面。那人大大的个子，浑身肌肉发达，是那种干粗活少爷的感觉。宽阔的额头底下，缀着两个浅茶色小点似的、分得很开的眼睛。

前面那个人，按响电铃然后给去开门的家里人递上花束。那是个银行职员、教师模样的小个子，花束里总是附带着一个小信封。尽管我没有读过那信上的内容，可我记下了信封上那人工作单位的地址，我感到他像是个比较正派的人。父亲、母亲说不清楚，这样说来，只有我还有些记得那次大骚动，记得这个人几年前的样子。那是深夜里发生的事，当时我还没有任何心事，睡得很沉，只模模糊糊记得个大概，为慎重起见，我又问起了义幺。“啊！……真有些记不起来了。警车没发出声音就来了呢！”他的回答和往常一样，尽管说得有些玄乎，但像是确有记忆似的。于是，我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说

不准，说不准!”他老实巴交地低下头，像是躲避我的问题。我想，大概是父亲叫他别说的吧。

据我知道，以这些访问者的出现作为顶点，其他具有相同性质的，诸如信呀、电话增加之类的事，都源于父亲在某女子大学的讲演《无信仰者的祈祷》，那讲演在电视里播放以后，才出现这些怪事的。即使作为直接蒙受困扰的一方，谁也没有必要特地把自己说成是“无信仰的人”，但父亲还嫌不够出格，又提到了祈祷；尽管并非直接针对谁，可我总觉得确实有些不礼貌吧。既然做了这种事，父亲受些轻轻的惩罚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他还给家里人带来麻烦！我对妈妈说过，像是也给父亲通报过了的样子。“狂热信徒”这种说法就是从那时起挂在我嘴上的。

实际上，如果是给自己的轻惩罚，父亲倒还像能够忍受；可是要是想到一家之主不在的时候，有人来拜访，他便觉得有负于我似的，特地给送花来的人写信，希望他们别再来访问。于是，小小的花束果真不再送到家里来了。然而，送水瓶的人，我们这边一直无法和他联系。出发前一星期，父亲一边在客厅里工作，一边老是留心着门边的动静，还准备好了等他来时交给他的信，可星期六黄昏时候，留心一看，那只水瓶又在墙上了。

等父母亲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后，我老是担心和拿水瓶来的人撞见。即使不和他撞见，只要看到水瓶心里也会沉甸甸地发毛。

父亲写的信还原封不动地插在大门的门牌上。我对谁写的、针对谁之类的事，毫无兴趣；也没有兴趣打开别人的信看看。可只要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它还在门上。父母亲在大学法

加里底宿舍安顿下来后，来了第一个电话，母亲先传达了父亲的担心，然后说希望能把那封信交给拿水瓶来的人。信里父亲写着，把孩子撂在家里，父亲母亲都暂时逗留在海外；可是，看了这封信，也许拿水瓶的人反而会产生某种使命感。要用自己的信仰之力来守护义幺……所以，玛姐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父亲拿过电话安慰了我几句，我感到简直就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妈妈在家里时，一直担心有一天那人会开口叫把水瓶还给他，所以她按照顺序把它们排列在储藏室的一角。相同形状的瓶口紧紧地塞着软木塞子，调弄得整整齐齐的，看来那是外行人手工劳动做的，虽然没有高温消毒的样子，可是，把陈旧的水拿在手上摇一摇，也没有水质变腐的现象，它重新让我感到胃的上部有什么东西堵得慌……

父母出发后第十天的傍晚，警车，和哥哥所记忆的时候不一样，“呜——呜——”地叫着，骚动着涌到离我们家只有一个街区的地方。尽管那事件的内容我已经知道了，但还是想按一个个时间段，把自己所感到、所想到的，原封不动地一边回忆一边写下去。关于送水瓶的人，我已经这样记来着。

警车的警报声，四面八方“呜哇”地涌过来的时候，我吃惊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忽地阴云密布，贫血的我一下子跌坐在刚才还趴着写报告的饭桌上。我这样慌张，是因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哥哥出去理发了。

我的任务是把哥哥带到站前大街和汽车大街交叉的拐角上，让他进理发店，我预先付了钱；长期以来，哥哥一直都在那家店里理发，所以，义幺自己也习惯了那手续。理完了发，“好了吧，好了吗?”哥哥喜欢饶有兴趣地听年轻老板反复地问。大概理了发心情也为之一新吧，哥哥理完发喜欢一个人慢

悠悠地散步回家。我一个姑娘家在理发店里坐着等人总觉得心情别扭，所以，哥哥说他一个人自己回家，我也是求之不得的。

警车以各种各样方式重叠地叫响着，我一遍又一遍徒劳地确认着义幺有没有回家——奥弟去了补习学校——我真后悔，不该养成不等他理完发就走的坏习惯……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下子跳起来，蹬上胶鞋就跑了出去。在哥哥回来该走的路线的第三个拐角上，从家里到理发店连接线上脱离开来的外侧方向，有一片空地、建筑物、篱笆墙等都像过去那样原封不动保留着的住宅地，那里停着四辆警车。这是盛夏的一个黄昏，人脸和头颈上的皮肤看起来净是汗的闪光，住宅区里的人们都站在阴凉的街角，眺望着忙忙碌碌的警察们。

我的身体已经朝那个方向移去了重心，赶快调整好放开脚步的力量，向站在最近旁一个穿短衬裤的老年人打听："交通事故吧?"我心里怦怦地跳着。那老人回过头来，古风犹存的脸上，出现了刚看完波澜壮阔的电视剧后余韵未尽的神情。这时，我说不清怎么就会觉得，眼前警官正在调查比交通事故更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老人浮起血色的光光亮亮的皮肤，因感情的作用更加红了起来。

"不是交通事故。"他愤愤地说，"色情狂呀，你还是别往那边去的好哇。"

我朝他鞠了一躬，掉过肩膀转换了方向，沿着哥哥回家的路线重新跑了起来。怎么回事，是色情狂呀；这个国家里还没听说过有袭击男人的色情狂，所以，义幺安全，安全！我心里刷地一下石头落了地。可当我跑到理发店时，等待室、理发室

里一个客人也没有，店里已经开始做关门前的清扫了。老是说“可以了吧”的师傅，拿着扫把直起身来，惊讶地问：

“你家弟弟早就回家了呀。”其实，说我搞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回家路上，我被新的恐怖构思抓住了。没听说过有同性恋怪僻的色情狂，自然可以放松一些，可反过来，义幺不是也有可能去袭击别人吗？即使哥哥一开始没有这种打算，对可爱的小女孩只想做些亲切的动作，其结果也会让女孩子害怕……义幺真的很讨厌叫声、哭声……

哥哥早就平安地回到了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着晚报上一周的FM立体声节目表。我在哥哥身旁坐下，刚才还怦怦地跳着的胸口总算安静了下来。哥哥纳闷儿地瞟了我一眼，又默默地用红铅笔在古典乐曲的曲名上打起圈来；从他那剪短了喷上发胶的头发上，从他那穿着敞领衬衫的宽阔的肩膀上，散发出阵阵浓密的植物般清香的气味！这时候我彻底地放心了。谁知，到了第二天，我“懊恼”的直接物证，使我新鲜地想起这阵阵青叶的气味。那天，出去关门时竟看到砖墙上放着久违的——完全没有怀念的意思——水瓶，我瘫软了下来。

第二天早报的地区版上，登出了我们这条街上有色情狂的报道。上小学的女孩子被袭击了。我以前没听说过，据说，相同手法的色情狂自去年年底起就出没于这个地区了。结果，昨天还是没有逮住他。过了两三天，我在院门口扫地，听到对门的太太正在同老是结伴去车站前购物的同年龄太太，说着那色情狂的事呢。我拿着短扫把弯腰扫地，关闭的门那边，两个站在低一节的马路上说话，当然不知道我也在场。

那色情狂像是在街角上等着，抓住了女孩子就往篱笆墙的

凹陷处按下去，一只手紧紧抓住女孩子的两个手腕，另一只手弄着裤子，朝女孩子脸上喷了些什么。像是用了“脸面射精”这样的词语。假如有艾滋病那该多么可怕呀，加上女孩子的泪水，脸上弄得脏兮兮湿漉漉的。女孩子为什么不叫唤呢？像是一开始给打怕了似的。这么说来，那家伙一直在篱笆墙那里站着，准有人看见过他的背影吧……

我得去扫门的外侧了，打开门，朝两位太太点了点头，太太们微笑着点头回礼，赶忙换了话题。我还没扫完，她们就一个进了自己的家，一个骑上自行车匆匆忙忙地消失了。

出现色情狂的第二天起，我心里像是老有一种“懊恼”附体似的；太太们的话更加深了不祥的兆头。我从门上伸出小小的圆脑袋，站在篱笆墙那边的人立刻就中止谈话；这些情节一下子来到我面前。我内心“懊恼”不已，虽然心里觉得对不住哥哥，可实际上还是做了一次测试。

一天，我和义幺去站前大街的咖啡店，我预先去收银机前付了账，就说自己要去超级市场买东西，让义幺喝完咖啡一个人先回家去。我跑到了对马路，站在细叶枯黄萎缩的槐树树阴下，向对面的咖啡店张望。我内心寂寞而紧张，眼下该是将替换微笑的柔和表情收起来的时候了，因为心情好的哥哥出现了。接受了我的特别提议，自己一个人行动大概让他很愉快吧。交通繁忙的汽车大街上，哥哥小心翼翼地等候着车子的间隔过了马路，他慢悠悠地走着，像很久以前游览旅行时的那种悠然态度。

要是他严格按照我们家到站前大街的“往返路线”走，那么，我的“懊恼”就成杞人忧天的白辛苦了。眼下，哥哥按着“路线”拐了个弯向前走去。我觉得松了一口气。谁知到了发

生色情狂骚动的十字路口，他竟向反方向的南面而去，哥哥在走回头路哇。他像充满自信似的，那有故障的腿也一反常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是在一座古旧的房子前，院子的篱笆墙上映山红都挤在一块儿，哥哥忽然把右肩插进夏天茂密的篱笆墙凹进的地方站住，看来是想要隐蔽身子。

我觉得我不能再多看一分钟了。附近没有人走过。只看见远处，有两个结伴同行穿制服的女学生朝这边走过来，给人以蓝鹊或乌鸦的感觉。我完全让“懊恼”控制住了，拼命奔过去，站到义幺身边。

“怎么啦，怎么啦？走错道了哟，快回家！”我用颤抖带哭的声音叫起来……

又过了十天，我还是在回过头阅读“家庭日记”才知道日期的。这十天里，我成为巨大“懊恼”疙瘩的垫底物，那可真是个深刻沉重的东西呀。谁知事情一旦过去，那“懊恼”的标志，竟不可思议地一样也没剩下。我挣扎着在“懊恼”里持续了十天，竟也过来了，难道我多少改变了一些自己吗？畏缩不前，胆小鬼似的过日子的我，居然做出了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发生情况的那天，并不比平时凉快，风平浪静停滞般的大气里，只有西方天空的晚霞十分美丽。我出去拿晚报的时候，看到门边的砖墙上，照例又放着那个水瓶。折射出黄昏的室外空气，紧靠着软木塞底下的狭窄水面，像镜头似的汇聚了晚霞的色彩，通红通红的——我感到得意地红了脸——我忽然想到，如果那水瓶是刚刚放上的话，也许能追上去还给他呢。我脑子里涌上血来，我对自己突如其来的念头热衷起来。

我返回大门边，透过镶花边的窗帘，看了一下趴在房间里地板上继续作曲的义幺，然后，轻轻地带上门，推出自行车来。我把还有些温热的水瓶，横着放进自行车把上的金属网兜里，让它安定好——其实一踏起来，它就晃荡晃荡了——朝着车站方向迅速踏上脚蹬，骑了出去。

我笔直地骑到汽车大街，转过人行道往南，来到一个有红绿灯的交叉十字路口；往左面拐就是站前大街，这时间交通繁忙，即使真的追上了他，也认不出来呀；只打过一个照面，根本就记不清楚那张脸。倒是我家门口直通汽车大街的那条路，黄昏几乎没人走；那是条南北向的路，我要是往那条路骑着看过去，果真能碰上送水瓶的人，兴许还能清楚地认出他来呢……

还是在那无忧无虑的年代里，我经常在群马县山上的小屋里度过夏天的，爸爸常说我像头小仔马。好久没骑自行车了，真像骑马那样，肩膀一耸一耸地踩着脚蹬。我先从汽车大街往北到第一条横马路，跨过十字路时，眼睛不眨地往路的两边看。一直骑到了北面的角上，打算调个头，再从下一条路往南骑回去。正在这时，我看到一座旧公馆，刚修剪过的茂密冬青和桂花树篱笆墙连着街角，邻居家未修整好的桧树叶篱笆墙更显得杂乱；就在两家院子篱笆墙的分界线上，有一对人影纠缠在一起，一大一小。

再往那边骑了五六米，我一把紧紧地握住了刹车。我看到两人纠缠在一起，像是在打架：一个是穿着爽快的深草绿色风衣的男人，他的一只手看来抵住了穿连衣裙的小学高年级、初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让女孩子蹲在他叉开的两腿下。他另一只手，则插进风衣的腹部，前后频繁地活动着……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采取了行动，后来，在警察面前说起自己的行动来，连自己都会感到可笑的。我像小时候玩“探子”游戏似的，从座子上挺直了腰，低下头，拼命踩着脚蹬，“滴铃铃，滴铃铃”按着车铃，从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身边骑过。一瞬，我横眼看到穿风衣的男人，用茶色小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就这样骑了十五六米，我从自行车上一跃跳下，转换了个方向，又跨上自行车的座子，一只脚点着地，笔直地朝那男人望着。这期间，我持续不断地按响着自行车的车铃。男人赶紧收住在风衣门襟处蠕动着的手臂，集中手臂上所有的力气，硬是把女孩子按到地上坐下，像是在考虑应急办法似的，把两眼距离隔得很开的脸朝向了我这边。这时那男人从风衣里撩出手臂，做了个赶狗似的动作。

我委屈得差点没哇地哭出来，我也把脸甩动了一下；这时，我注意到杂乱篱笆墙那边的屋子，为分隔开地界而建造的箱式楼房二楼上，有个女人正朝下面望着。

“嘿，嘿！救命，快救命！”我朝她叫喊起来。女人弄出很大的声音打开窗子，先探出身子往周围张望了一阵，然后，用力地收回脑袋，朝自己肩膀后面大叫起来。我回头看了一下那边的新情况，风衣男人已经放了小女孩。肩膀斜斜地令人奇怪，快步地跑开去了。女孩子这才“呜——呜——”地哭起来，用膝盖走路往这边逃过来。我仍然按着自行车的铃穿过了女孩子的身旁，去追那男人。要说我所能够做的，那就是：当那男人注意到我停住脚步时，我就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停下车，他用小点眼睛死命盯着我时，我也狠狠地回敬他。这时，那男人像个“垒球手”似的把风衣一扬，撒开腿朝旁边的小道飞也

似的跑起来……

那男人是被二楼女人的弟弟抓住的，他迅速发动起摩托车，也不像我那样傻乎乎地跟在后面追，而是先绕到汽车大街，在那儿等着。只有我才能够指认那个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佯装的色情狂；虽然我迟到了很多时间，但却一直在后面拼命按响铃声。我只有骑着自行车追赶色情狂的份儿；我觉得，当时我也只能起到这些作用了。

警车到来之前，倔强的摩托骑手和他家里的主人——女人为了安慰小受害者而留下了——从两侧抓住了那家伙。眼前，那个茶色小点眼睛，像患热病鲶鱼似的家伙，牢牢地盯着我，使我竟有些后怕起来。听警察说，那男人已经知道我记住了他的脸，所以，也就不再逃跑了。

男人好像还说了，他一直给我们家送水。听这话之前，我发现自己的裙子前面湿了一大片，真觉得晦气；我这时才想到，原来放在车把上网兜里的瓶塞，给震松开来了。

第二天起，我发了高烧，连床都爬不起来，义幺没人送到福利工厂去，连饭都得由奥弟来做给我们吃。“大致上嘛，我考虑营养的平衡啊。”他说着，收拾好桌子，一看，全是超级市场里特价销售的方便食品，而且，还精心挑选过呢，看了让人觉得可笑。发烧卧床期间，大概只有吃饭的时间，我的心情才会宽松起来；每想到沉重而痛苦的恐惧，白天黑夜都让人疲倦不堪。

为什么送水瓶的人竟是色情狂呢？警察说，在这条住宅街巡逻时盘问过那个人，他谎称是给你家送水瓶的，大概他任意选了个上过报纸的家庭吧。可是，我总觉得，那男人挤压女孩

子的时候，逃跑的时候，甚至连被抓住时那目不转睛盯着我瞧的样子里，似乎都隐藏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我像是感到了这些“狂热信徒”的内心，他们对父亲的“祈祷”十分关心，从那双茶色小点眼睛看得出来，他将这“关心”，对我这个“父亲的女儿”表示了出来。

夜深了，我睡不着，照例是一半梦幻，一半清醒，我考虑起更可怕的事来。那人即使被叫做“色情狂”，但他不可能永远被关着不出来。那男人从监狱里出来，怕是又会来到我们家附近，埋伏在篱笆墙里，还会抓住我——那个死死盯视他、而且又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他该会使出蛮劲逼我跪在地上吧？和那个被打得不敢出声哭的女孩子一样，我连最起码的抵抗都不行，小瓶子里，冷冰冰永远不会腐臭的水，注入了我的眼睛、鼻子里……

总算到了烧退尽、渐有秋意的一天，我和义幺去车站前超级市场买东西。我变得浑身乏力，两个购物袋都让臂力强劲的义幺拿着，慢慢地往回走，半路上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正好又是那个映山红挤在一起的篱笆墙围着的屋子跟前，上次我看到哥哥一个人站在那里。哥哥像是自认为有义务要把我领到那里去似的，他迅速往那边转过身去。“怎么啦，义幺？兜远路了哟！”我一边小声地提醒着，一边跟着他走过去；他还是在那映山红篱笆墙凹下去的地方插进肩膀站下。哥哥一脸认真的表情，侧耳倾听着。这时，传来一阵有些拘谨的练习钢琴的声音。听了一会儿，义幺脸上露出安详满足的表情，回过头来对

我说："克歇尔目录[①] 三一一的钢琴奏鸣曲，不打紧了。后面再没有困难的地方了，已经全过去了！"

我觉得一下子跨越了曾紧紧攫住自己的"懊恼"。以后，就是有新的更多的担心事，同那"懊恼"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吧……

① 克歇尔目录：澳大利亚人克歇尔（1800—1877）给莫扎特的作品所作的目录。简称为K，或者K. V.

随　　笔

杨炳辰　译

传统与文学

我在一个关于现代文学的讨论会上，谈了有关传统的意见。我说，自己的精神状况远离所谓的传统；或者说，自己的文学表现方法里，从未注重评价过所谓传统的要素。我这么说，是为了清楚表明反对开高健他们的想法，他们主张：日本人审美意识具有“无常感”传统。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说明：日本文学史，至少在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历史里，“无常感”一词，根据时代的不同，其含义未必具有完全等同的意思。另外，“无常感”词语的本身，也很难说一直有明确的意义。我期待着“国语学”研究者们，能给这个词语一个确定的意思。但眼下的问题与此不同。我觉得有必要清楚地表明自己对“传统”一词的看法。

使用“传统”一词，有时意思极其暧昧模糊。这个词以原汁原味的模糊性，作为不可多得的润滑剂通用于世。

一开始我就把话题限制在文学上。现代的，一九五八年的文学里，所谓“传统”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比如一个“小鸟铺”，所谓“传统”，就是做饵料的方法，做小鸟笼子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一一规定好了的。对歌舞伎来说，那“传统”一定就是“老把式”了。

可对文学来说，“老把式”究竟在何方呢？是文体吗？也许是吧。日本文学的“文体”，难道存在着“小鸟铺”里规定作法那样的“老把式”吗？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绝无此事。

明治以前的文体和明治以后文体，当然明显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这话无可厚非吧。问题是，明治以后所谓“近代日本文学”，究竟有没有仅用“传统”一词就能概括的文体呢？另一个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的文学工作者们，究竟有没有把“传统”当成镣铐，或者意识到“传统”是一块跳板呢？

我认为，以战争为分界线，战前和战后的文学，其间显然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共同文体。法国文学里，就连萨冈①也沐浴在斯丹达尔②文体的温柔余香里，然而，在一九五八年的日本文学里，却没有什么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另外，我们新一代的文学工作者们，在可怕的孤独之中，一直持续着模糊暧昧的斗争。

其实，和文学中的所谓传统不同（它是以复杂的形式悄悄进入日本文学，缠上日本文学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还有个日本的传统要素，究竟有没有强力发生了作用的问题。

开高健氏阐述了一个悲观的意见：日本人有被时间冲走的倾向，即所谓“无常感”倾向，连这个也能成为传统。开高健氏在文学上所作的出色努力，不用说曾抵制过这个恶劣倾向，极力拒绝过这个恶劣倾向。

可是，“日本人所谓的‘无常感’，就是传统”这一想法，

① 萨冈（1935—　）：法国女作家。著有《你好，忧愁》等。

② 斯丹达尔（1783—1842）：法国著名作家。著有小说《红与黑》和《巴玛修道院》等。

本来就是危险的。这是从伦理上给予那些懒惰、孱弱的日本人，不参加自我实现的行动，或者不参加政治行动的借口。

因此，我不支持开高健氏。在日本人精神中扎根流传以外的想法，开高健氏把它唤作"传统"，我觉得，那是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清楚地给他自己的"传统"下的一个定义。

于是，所谓"传统"，就像一个柠檬，一把米，而并非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他从现代日本人的精神倾向，随意选出一个方向，把它扩大开来，其"作法"就是他的传统。开高健氏选出了散发着"无常感"气息的侧面，再把它当成"传统"扩大开来。由此类推，我当然也就有自己的选择法、有自己的扩大方法，即有所谓"我的传统"。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传统"一词以正确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以自己的作法，尝试着认清一九五八年的现实，然后，再努力创造出自己的传统。

仅就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拒绝承认"无常感"正日趋严重的想法。比起对阿尔及利亚沉默的法国人来，我就更难以忍受"自己是充满'无常感'的卑劣小人"这一想法了。

我觉得不仅要勇敢，而且，为了不让那"卑劣"悄悄地挤进自己的生活方式里来，毋庸讳言，还应该下定严厉警戒的决心。

作为年轻文学工作者之一，作为选择了文学，并决心为它奉献一切的年轻人，我很想通过文学来实行这个严厉的警戒。

这至少给予我们这些在可怕的孤独、暧昧的文学圈子里斗争的青年，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我相信"严厉的警戒"。而"相信严厉的警戒"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传统。

文学的民族性之表现

把“民族性”这个词语，换成“nationalism、national 民族主义、民族性”等外国语进行操作，我立刻就会感到，往“国民性”那词语反向置换操作，似乎能让自动装置来进行。

当我耳朵听到这些外国语，脑子里把它理解成两个翻译词语的时候，就会习惯地出现：根据当时的场合、当时的状况，有时理解为“民族性”、有时理解为“国民性”。我是个使用日语生活、创作的人，如果人们也承认我能分清楚“民族性”和“国民性”在日语里的不同语感，那我应该这样来考虑。即，对我来说，这些外国语能唤起两个意思内容的日语词语，它是多义的，是暧昧的。意思有些模糊。

于是，我得甄别民族性、国民性来使用它，可以把它和不熟悉的外国语表象上的锁链割断，但是，在我的原来印象中，民族性、国民性这两个词语，从其成立之时起，它们就流贯了相同的血脉，实在是很难区分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亚非作家会议东京大会时，有过一次体验。和英语圈的人们、法语圈的人们谈话时，一定会出现“nationalism、national”，或者是（不管语感会怎样变化，都依赖于外国学者）“nationalism、national”等词语。而对于这些

语言，那些亚洲、非洲的作家们的反应，有着十分微妙的、阶段性的、有时是忽然而来的不尽相同。

在刚果那样的国家里，对国家政治抱有疑问的人们是把这个词语清清楚楚地翻译成“民族性”来使用的。像桑给巴尔那样的非洲各国，本来大众宣传就很活跃，而且又很安定，这些国家的人使用这个词语时，已经像我自己所感到的那样，具有“民族性”和“国民性”分裂的倾向。而像越南那样，自古以来，文明和独立战争浑然一体的国家的人，就把这一个词语按两个目的，清楚地分开来使用。

同样在那个时候，我读了一本非洲人写的英语小说。那是一篇叫做《非洲》的长篇小说，作者是威廉．康坦[①]，冈比亚出生的年轻黑人。那小说写的是非洲独立运动家的故事，与恩克鲁玛[②] 的经历很相似；在英国留学，完全成了英国派头的知识分子费罗回心转意、开始从事起独立运动的那部分，引起了我各种各样的感慨。

首先，在海外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把它叫做 been-to；小说着力描写了他们回到非洲尚未开发的土地后 been-to 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剑桥学习，阅读泰晤士报，属于某俱乐部，还和白种女人结了婚。尽管如此，可他们还是扎根于时常感到羞耻的过去，扎根于永远无法完全洗净他们黑色皮肤的过去。”

这个非洲人忠实地模仿英国人的国民性，或者模仿他们其中的一个侧面，可他同时又感到了一个非洲人“民族性”的脚

---

① 威廉·康坦（1925— ）：冈比亚作家。

② 恩克鲁玛（1909—1972）：加纳政治家，指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1957年任总理，60年代初任总统。

镣；我就是据此来分开使用并理解这两个词语的。于是，某个夜晚，他读了南亚联盟种族歧视的报道，觉醒了。我们的这些非洲人，从日常生活中，驱逐了所有英国式的东西，甚至故意向父母亲提出一夫多妻的结婚请求，作为迈出参加独立运动的第一步。他实践地统一了自己非洲人的“nationalism、national”。

这种令人略感过分的、以再次发现自己内部民族性与独立运动相结合的事，正是在海外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黑人领导者，经常让人们看到的。恩克鲁玛喜欢穿民族服装，他从狱中被释放回家，就用鸡血来洗他那裸露的脚。肯尼亚的领导者乔默·肯雅塔[①] 抒情地赞叹并拥护割除阴蒂的女性割礼。这些宣传活动除了对他人具有某些意义以外，还对自己有意义：海外接受过教育的自己要返本归祖。

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多少带有一些 been-to 的要素，与尝试一夫多妻，涂抹鸡血，欣赏割除阴蒂的非洲 been-to ，实际上有着本质上相同的地方。有关思考“文学的民族性之表现”的课题，也就是其中之一。

如同政治、文明落后国家里有“nationalism、national”一样，先进国家里面也有“nationalism、national”。有像美国黑人文学那样，在先进国家之中，后进领域里人们也有“nationalism、national”。同时，美国的年轻白人为追求自己独特的“nationalism、national”，而造就了一个文学的世界。这所有场合，分成“国民性”、“民族性”这样两个词语来理解，是很有

① 肯雅塔（1891—1978）：肯尼亚政治家，民族运动领导者。1964 年初出任肯尼亚总统。

效果的。

最近，我读了几篇英国小说，读了几本英国评论集。我感到那里面表现了正宗的、英国人式的“民族主义、民族性”。说是英国人式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实在也有与英国女王的荣光毫不相干的地方。政治上，英国人长期以来存在着可称为“民族主义、民族性”的敌人；凯因斯[1] 的运动，就像经济上的文艺复兴似的移向了“民族主义、民族性”，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在“英特纳雄耐尔（国际性）”的英语一词里，甚至能体会出反英的爱尔兰独立主义那种特殊的意思。

我在英国文学的现代作品里所想到的，所接受到的英国人式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如果能进行抽象化，就是那所谓的观察力。那观察力本来就具有幽默感。除了英国人式的“民族主义、民族性”以外，它什么东西也不是。除了英国人的国民性之表现以外，它什么东西也不是。

M. 斯帕克[2] 的长篇小说《独身者》里有这种情绪，K. 泰南[3] 一群人的评论集《渐弱》里有这种情绪；C. 威尔逊[4] 和 P. 皮得曼[5] 那具有特殊性格的书籍《凶杀百科全书》里也

---

① 凯因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主义的创始人。著作有《货币改革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② 斯帕克（1918—　）：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曼德尔鲍姆的大门》等。

③ 泰南（1861—1931）：爱尔兰女作家、诗人。代表作《爱尔兰的复兴》。

④ 威尔逊（1931—　）：英国作家。属于“愤怒的青年”一派。作品有《黑暗中的仪式》、《局外人》等。并参加编写《凶杀百科全书》。

⑤ 皮得曼：英国作家。参加编写《凶杀百科全书》。

有这种情绪。连L. 达雷尔[①]的《亚历山大四部曲》也把异国情调（有时也能感到它像国际主义的底片似的）当成大武器，赤裸裸地表现了这种情绪；他的弟弟谢拉尔德，在一连串的“红企鹅”动物采集旅行记里，也塞满了这种情绪。难怪人们涌出了叹息：英国人到哪里都是英国人！

在文体、文章方面，其方法像朝着今天法国“深夜丛书派”作家作品的那个方向发展。然而，法国作家的民族性与其说取决于观察力，不如说它更明显地取决于观念性。因此，比起反浪漫主义作家们的文章来，他们譬如英国K. 艾米斯[②]的驳杂文章，更加就事论事，更加遵循实体，以更加具体的印象来把握现实，表现现实。

如果用法国的反浪漫主义作家们所尝试的一种方法——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表记对象，那么，不用说他们是把英国现代小说中的艾略特[③]和奥登[④]的诗表象之现实性当作先驱的，后来渐渐地不断完善着。不论是技法方面，还是表象的质方面，我都觉得最发达的小说该属英国的现代小说，我的根据就是上面所说的。

英国的新戏剧方面，在极具体的日常性之中，表现危险的

---

① 达雷尔（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长期滞留在地中海各国。著有《亚历山大四部曲》等。

② 艾米斯（1922—　）：英国“愤怒的青年”一派的作家。作品有《幸运儿吉姆》。

③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生于美国，注重宗教和传统。著有诗集《荒地》、评论集《神圣的森林》等。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 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1930年代新诗运动领导者。后转移到左派神秘主义。入美国籍。诗作有《不安的时代》等。

不安情绪，其观察力发挥着更深刻的效果。在那里，直接而明确地抓住了英国阶级的感觉、东部伦敦和西部伦敦、大城市和地方小城市、农村的差异。英国是个动物园，那里有无数个牢笼，有一种印象，像是那里居住着各种不同、接近无数的动物群。现代戏剧，那阶级观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又不同于凯因茨的阶级观，是最具体体现英国日常生活的阶级观，由此酿成了一种葛藤；这情况大概只会在英国吧，只会在先进国家的文明社会里才有吧。一个地方小城市的贫穷青年，如果要走进别的大城市或者去伦敦的社交界，那么，纠葛立刻会展现在整整齐齐的舞台装置前面，那一定就是所谓英国式的民族主义、英国式的民族性了。在法国，于连·索雷尔和俊友[①] 时代曾实行过，现在早已成为了过去；在美国，虽有“美国的悲剧”这样的语言，但它不在国际政治方面，而只在人道主义方面被使用过，只有那个时代才有过这样的事情。

即使在英国的诗歌里，那诗的表象也仿佛有具体的观察力。

譬如，奥登的诗：

冥想间忽然抬头注意，
孤寂男人端坐在长椅上哭泣，
筋疲力尽垂下头，紧紧闭上双唇，
颓废、丧气，活像只雏鸡。

完成了具有观察力的诗句，那手法就是在今天还仍然不断

① 法国作家斯丹达尔小说《红与黑》和莫泊桑小说《俊友》中的人物。

地向其他领域的文艺形式里扩张着。

我以为，英国现代文学里，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应该是通过最具英国风格的方法、扎根于英国人身上的方法、所谓观察的方法，实在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而且，这种场合，的确英国人所谓观察力文学方法的本身，就是英国人的“nationalism、national 民族主义、民族性”。

这在政治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问，今天有没有政治地表现英国人式“民族主义、民族性”的文章呢？我想是有的。具体来说，新左翼杂志上汤姆逊的文章，的的确确就是构成英国观察力的文章。

美国的青年作家，特别以凯鲁亚克[①] 为中心的“垮掉的一代”文学，即使他们有瞄准美国新“民族主义、民族性”的指向，但也是和亨利·米勒[②] 连结在一起的。介绍他们的文章，常常夹杂着一些反美的词语，其实那都是错误的。我觉得，他们在战后的作家里，是给予美国式“民族主义、民族性”最具体文学表现的作家。

他们能够具体地抓住“美国”这个他们自己国家的表象，把它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这就是他们文学行为的终点。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里，两个青年迪恩·毛利阿蒂和萨尔·帕拉塔依斯像发了疯似的，也许真的让疯狂攫住了，开着车在美国大

① 凯鲁亚克（1922—1969）：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在路上》等。

② 亨利·米勒（1881—1980）：美国小说家。受超现实主义影响，以前卫派的独特文体，描写神秘的思想。著有《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等。

陆上飞驰；就这样，清晰地显示出他们的文学表现，与“民族主义、民族性”息息相关。他们的确用了美国式的手段，驾驶着高速的高级轿车在美国大陆到处环游，想以此来理解美国。

亨利·米勒也想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他长时间在美国本土上旅行，思考，写作，然后开始了《冷气装置的噩梦》的创作。凯鲁亚克为了写《在路上》那本有关与美国的书，他驱车环游美国，尽述各个侧面。他不像亨利·米勒那样把美国的文明批判地说成是“冷气装置的噩梦”。与此相对，他只是具体而细致地描绘了那个巨大的美国、美国人。他们不像那些不顺应美国现代社会青年而成为反美者、或世界主义者，这群青年实际地感受到了自己内部和外部均衡的神圣美利坚。

比如，写了《太阳照样升起》的海明威[1]，确实是个美国人，但同时他又是个具有反美倾向的美国人。海明威不论在巴黎生活，还是在马德里生活，都保持着作为“民族主义、民族性”的美国人本质；但他同时又十分明确地在国际主义世界里，设下了他文学表现的核心。

相反，凯鲁亚克在任何意义上，都从没有指向“英特纳雄耐尔（国际主义）”。他像狗一样地忠实描绘出多少带有些受虐狂似的美国“民族主义、民族性”，描绘出追求那幻影而驱车飞驰的不幸的热情青年们。像他这种人作为作家，也许除了美国，不会在其他国家出现，这一点正说明，他是美国“民族主义、民族性”的儿子。反过来，美国式的“民族主义、民族

---

① 海明威（1899—1961）：美国现代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著称。著有《永别了，武器》、《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性”，正是通过现在凯鲁亚克的文学，才十全十美地表现了出来。

反过来，美国的现代文学一般是小说的、电影的。以凯鲁亚克作例子来说，他的文学构思，或者作为美国人态度的文学表现，都关系到怎样理解现代的美国；我以为，那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等力关系的缘故。失去了巨大的超级美国和孤独的、充满热情的小小自信，对一味求道的美国青年来说，那不是戏剧的纠葛世界。

可是，在美国，经常让纠葛状态缠住不放的，有其存在自身本质的人群，有那种文学。黑人们和黑人文学的问题，正是美国式“民族主义、民族性”问题的另一面羽翼。

他们这些黑皮肤的美国人，并不像凯鲁亚克等美国人那样，燃起热情投入理解巨大美国的行动。不用说，黑肤色的美国人，只对理解自己自身倾注热情，L. 赖特[①] 和鲍德温[②] 看上去都想要发现文学表现的世界。对白种美国人来说，美国巨大而宽阔，充满了希望；而对黑种美国人来说，美国渺小而狭窄，只能听到来自未来的拒绝之声。

抗议的行动，处于其“民族主义、民族性”状态的人群，充塞在落后的国家里，以数亿的规模，充塞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然而，先进国家也存在那些人群，他们用先进国家的语言和文明水准来表现自己，我想，这大概只有在美国才会

---

① 赖特（1908—1960）：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土生子》。

② 鲍德温（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著有三文集《土生子札记》、长篇小说《向苍天呼吁》。

有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至少听不见他们的抗议之声，仅此而已。

像L. 赖特的《土生子》那样，只用抗议之声、反抗的呐喊构筑一个作品世界，实属罕见。那里有地地道道的美国黑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在他的作品世界里，白人和黑人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最终就是到了破局也无法解决；这一点与英国现代小说的纠葛有着本质的不同。不用说那是一种永久的纠葛。

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有下面这一段文字，传达了从黑人世界的美国世界而来的具体隔绝的情况。那是互相隔绝的世界。一个黑人少年站在小山坡上，前方面临的是白人的百老汇，后面则是黑人聚居的部落，他发出了基督教徒式的感慨。

> 真的，地狱在舔着走在那条街上人们的脚底，巨大的高层建筑之中，灯火阑珊腾起了叫声。……百老汇，就如其名字那样，一条宽敞的通往死亡之路，许多人往来于这条路，到达永劫生命之路却很狭窄，很少有人能找到那条路。可是，琼所盼望的不是狭窄的道路。可大家都走着狭窄的道路——不用说，那里没有高耸的建筑物穿过不动弹的云彩——与此交错的，是蜷缩、平板的寒伧屋子，低矮地拥挤在不干不净的地面上……在那狭窄的路、苦难的路上，等着他的设置，只是永远的屈辱。

如果说给凯鲁亚克笔下年轻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充满理解美国的热情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

以看到，鲍德温笔下黑人少年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在于身在美国却抗拒美国，在于赌咒巨大美国的不是之处。

在日本，“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表现给现代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呢？从外国人的眼里来看，日本现代文学的各个侧面有没有感染上了这种表现呢？我以为，应该就这些问题来考虑。

日本在经济构造和社会构造等等方面，兼具了先进国家的要素和落后国家的要素，它们很难分开地混杂在一处；这大概是启蒙家的一般说法吧。因此，我觉得可以考虑把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分开成先进国家的侧面和落后国家的侧面（大致上是可以分开来的）。

当然，就我这个日本人来看，把日本的“民族主义、民族性”一分为二来观察，不可能是平静的。比如，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来观察，是可以作出一些假说来的。

我自己也曾生活在“安保斗争”那日日夜夜深刻的动荡之中。而且，我很想能知道“旧安保条约”成立之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反应，那愿望常常攫住我。于是，我去了图书馆，混杂在对“安保斗争”毫无兴趣的学生们中间，抱着奇怪的、意想不到的稳健心情，翻阅着十年前过期杂志的合订本。那时，读过的好些文章，直到现在还留下深刻印象的，要算竹内好氏那些关于国民文学的论文。那些日子，竹内好记着的那些日子的文章，现在都会引起我最激动的感慨，所以，我有了微妙的双重体验。

我记得大概是在一次安静的示威活动时，我从笔记本里取

出下面这段文章和朋友们一起讨论。开场白里有一句“正好是十年前的话哟”。

> 即使“国民文学”一词曾被玷污过一次，今天，我们仍然不能丢弃对国民文学的愿望。那是阶级文学、殖民地文学（反过来说是世界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无可调换的重要东西。不以它的实现为目标，我们还有什么可干的事呢。可是，国民文学和阶级一起，不可能达到包括全民族的人性之实现。不可能产生尚未植根于民众的革命。
>
> ——竹内好：《近代主义和民族的问题》

还有另一段文章。

> 我认为，国民文学论应该朝三个方向发展。一个应当称为本质论，是从国民形成和国民文学成立来考虑的方向。一个是文学运动的组织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这里，必须弄清楚阶级和民族两个要素的关系，文坛的构造也有必要更加明确。然后，再出现了文学教育的问题，最后有个创作方法的问题。
>
> ——《文学自立性等等》

竹内好在“旧安保”时期提出的意见，在“新安保”将要成立之时，在游行队伍中苦思冥想的头脑里，我决不是把它作为过去意见照搬上来的。它也不是能清楚地给出什么唯一答案的设问。战争责任的问题朝后退了一些。众所周知，日本浪漫

派的超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不能和现实的日本式“民族主义、民族性”相结合的灰色思想。可那些都被认为是“安保”十年间的进步。我眺望着游行示威的群众抱着一种感慨。在哪里能成立统一战线呢？在哪里可以弄清阶级和民族的问题呢？我们这些作家，以文学者的名义理解认识这些群众，抑或以文学者的名义向这些群众发出号召，该找出怎样的创作方法呢？

示威游行队伍里的群众，能观察到他们确实具有日本的日本式“民族主义、民族性”，是极活泼的人群。因此，在这个示威游行队伍里的作家，为了避免让自己感到的羞愧，只好在自己的文学里表现该“民族主义、民族性”。而且，只有表现其结果的文学才应叫做“国民文学”；而且，展现在读者们眼前的，应该是集结游行示威队伍的群众。

英国年轻文学者们的方法，美国“垮掉的一代”年轻人的方法，黑人文学的方法，很明显都是不可能表现日本“民族主义、民族性”的方法，日本文学者只要发挥面前活泼的群众“民族主义、民族性”，就不会让人如坠五里雾中。

安保斗争以后，在其影响下已经写出了许多作品。但若问那时有没有成功地表现日本式“民族主义、民族性”的作品，那就不得而知了。像深泽七郎氏的《风流梦谭》那样，能够表现先进国和落后国共存国度里人们“民族主义、民族性”的“物力论”，不用说是个例外了。

进步作家们的作品，只要把英国现代小说像催化剂一样放在旁边，立刻就能明白，但是，所谓具体的日本式“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观察，就是无关地，或者故意无视它地创作抵抗文学。另外，也有作品从所谓挫折的观念出发，创作了只能背弃“现实的民族主义、民族性”持有者的日本人像。结果，

安保斗争之后，在获得读者这一点上，最接近国民文学之名的该属一批推理小说，这也是明摆的事实。

黑人歌手们开始明显地意识到并加以强调美国的黑人音乐、爵士乐那种抗议音乐的性格，还是前不多久的事。譬如，最近“打击乐·皮塔·斯威特”，是作为美国人清楚地突出了美国黑人态度的鼓手，M. 罗奇[1] 的音乐，他和 K. 布朗演奏的时候，不可能特别意识到那是抗议音乐。

可能那正是受非洲独立运动的刺激，M. 罗奇回心转意的时候。在这之前，他那吸引无数白人听众的音乐，原封不动，就变成了抗议音乐。

回心转意之前的 M. 罗奇的音乐，确实也是深深扎根于美国黑人“民族主义、民族性”的产物。而回心转意后他的战斗音乐，也同出一辙。音乐本质的力度就像在其周围似的。表现日本及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最成功、最具世界性艺术的实在不是文学。以我的经验来看，我想那是音乐。比如说像武满彻的各项作品。同绘画有些不同。又如田园谦三氏的“游戏主义”，表现了日本式的国际主义，作为今天日本式“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表现实在很弱，有的地方缺乏具体的观察力。

听武满彻氏的作品时，我总是想到，听到“nationalism 、national“民族主义、民族性”等词语的武满彻氏大概不会发

① M. 罗奇（1925— ）：美国爵士乐鼓手和作曲家，现代打击乐器演奏家中最有影响和录音最广者之一。拥有打击乐合奏团“麦克西姆”。1971年任马萨诸塞州大学终身教授。

生“国民性”、“民族性”意思内容的分裂吧。对他来说，这词语是单义的，不暧昧的，明晰的。

可是如果从我们作家的角度来说，到达这等明晰的路实在太远了，要说到达了那里，显然是不诚实的。依据国民性、民族性分裂的基本实感，跨过理解“nationalism”、“national”的阶段，互相接触具体现实就会变得不可能，这一点，恐怕在作家身上都会存在的吧。

作家在他的文学里，对“民族主义、民族性”给予一个具有量的表现，这就是作家其人对现实，对日本一九六二年的现实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可作家往往对于现实很难采取一个具体的态度，很难采用一个“nationalism、national 民族主义、民族性”，假如这个作家不希望失去对于现实具体的观察力的话。

就日本人及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问题，我不敢苟同日本共产党人的态度。同时，我认为，新日本文学会人们的停滞不前，也是以此为轴心的。另外，日美文化协会人们的态度也让人疑惑：他们对日本及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民族性”是不是太钝感了？

日本人是怎样的人，与朝鲜人有什么不同，与美国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希望以这些朴素的设问开始，引发起新安保体制下的国民文学论。仔细想一想，我们日本人自近代以后，跳跃过真正多样、真正广阔、许许多多“nationalism 、national 民族主义、民族性”的深渊而活了下来。有时，窥测深渊比跨越深渊更困难。

世界文学能容受日本文学吗?

我在大学里是个不善于学习的学生。我曾对学院式按部就班上进的高材生和朋友们抱着仰慕之心。现在我能够在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研究者，还有日本研究者的面前说话，的确感到十分高兴。

另外，这个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所长梅原猛先生，方才似乎说马利乌斯·约翰先生的身上，加入了几分土佐地方的血（笑），可我是个出生于伊予的人。就伊予地方的人来说，自“长曾我部”以来，一直与土佐地方的人，气味极不相投。约翰先生写了有关坂本龙马的出色的研究文章，坂本龙马从土佐“脱藩”时，特别从我长大的村庄边上走过。我们就被留下来了。利用这个机会，我想把一个情况传达给马利乌斯先生：多年以来，所谓日本近代开始以后，伊予一直和土佐有着很大的差距。

众所周知的获奖以来，我家里陷入了一片恐慌。还给这个会议事务局的先生们添了不少麻烦。

我的大儿子光，智力发展上存在着障碍，与此相关连，他对声音极为敏感。直到深夜都源源不断打来的电话，使他前所未有地大发作起来。我们都很担心他发作以后无法收拾。于

是，我反复考虑，砸坏了电话（笑）。这个研究所打来的电话，有没有接不通的时候呢？我也给新闻社报道组添了麻烦。我内人忧虑的是，你这样一个极富破坏力的人，到底和瑞典的学院奖相称不相称（笑）。幸好我不是去领和平奖的。

光把花束上附着的卡片和电报全部收集起来，这么对我说：

“老爸，学者方面的人来贺喜。老爸让作家方面欢喜。可老爸在演艺界没人欢喜。”（笑）

于是，每次附有电报的新花束一到，我们就一心专等演艺界方面的贺词，终于发现了林家五平先生的贺卡（笑）。那上面写着：

“先生，我高兴。”

因为后面将要说的原因，在这个会议上的讲演稿，我得重新修改，所以，我没有给其他人回信表示感谢，只给五平先生写了封回信。

这里聚集了从国外来的优秀专家，先生们都是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我想也许还不太了解日本的演艺界吧。我担心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那“信”的文体是受谁的影响吧。我觉得，同声翻译也恐怕难以应付吧。

我们这一代的英雄，有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名叫“林家三平”的单口相声演员。五平是三平的长子。

于是，我用三平的文体写了封回信。很短，请大家务必仔细注意听好。

“获诺贝尔奖谢谢。可了不得。”（笑）

其实产生了更大的问题。为了这个会议，我把草稿全写好了。谁知又必须重新改写。那么，我就从这里说起吧。

我原先围绕现代日本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具体关系写就了草稿。当时，我整理了日本文学的三条线，论述了日本文学与外国文学、或者说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第一线上的日本文学，孤立于世界：孤立于东西欧洲，也同美洲、拉丁美洲分离开来。特别孤立于亚洲。

韩国的优秀诗人金芝河最近的工作，像是把北亚的世界性、普遍性作为目标。听金芝河先生解释，我觉得，这所谓“世界性”一词，应该和法语中的“托答利特”相接近。与其叫它做“世界性”，倒不如叫它“整体性”更能在日语中流通；也就是说北亚有整体性，更有普遍性。与这种亚洲文学最不相同的就是第一线上的日本文学。其代表人物是谷崎润一郎[①]、川端康成[②]，还有三岛由纪夫[③]。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第一线上的日本文学已经作为世界文学，得到了承认，可以这样说吧？谷崎润一郎进行了“七星派”[④]版的准备——也许已经出了吧——三岛由纪夫则在这个剧作里特别充当了世界性的角色。

第二线是学习世界文学的日本文学。他们学习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或是学习俄国文学。由此创作具有独特

---

①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唯美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著有《春琴抄》、《细雪》等。

② 川端康成（1899—1972）：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著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鹤》、《古都》等。1972年4月16日以煤气自杀。

③ 三岛由纪夫（1925—1970）：日本著名作家。著有《禁色》、《金阁寺》、《丰饶之海》等。1970年11月25日自杀。

④ 七星派：16世纪法国7诗人团体。他们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提出改革诗歌的主张。巴黎伽里玛出版社现有“七星文库丛书”，收入现当代大作家的全部作品。

经历的日本文学。学习世界文学，创作日本文学，如果可能的话，面对世界文学，获得回授的反馈。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群体。

我以为，它具有一种把世界文学转变为日本文学的性格。这条线上的作家有大冈升平①。一个出色的作家，优秀的人物。然后是安部公房②。这会场里坐着用各国语言翻译安部公房作品的人们吧。而这条线的末尾，我想，大概就算我的文学了。

第三条线该说是怎样的“线”呢，我把它叫做“村上春树、吉本巴那那”线。这条线上虽然只有这两个人，可他们卖出去的书却明显高出第二线作家的两百倍（笑）。我以为：在全世界亚文化群体变成一个统一体的时代里，他们是特别典型的作家。

那还是二十年前的事，我曾在墨西哥城呆了半年，在科莱西奥·特·墨西哥大学教书。那时，我曾会见过奥克达比奥·帕斯先生。

我从帕斯先生那里听过这样的事。他在文章里也写过的，现在，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柏林、墨西哥城、东京，一个亚文化群体抓住其整体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不久就会有新的文学创作问世。

现在，这条“村上春树、吉本巴那那”线，就是作为一种

---

① 大冈升平（1909—1988）：日本作家。以俘虏经验为基础，创作了战地小说《俘虏记》和《野火》等。

② 安部公房（1924—?）：日本作家。作品采用寓意式的变形故事，情节离奇，明显受到卡夫卡的影响。著有《砂女》、《墙壁—S卡尔玛先生的犯罪》等。

新文学，开始创作起他们独具风格的文学。他们的作品，在美国受到了注目，在意大利也受到了人们广泛的阅读。可以说他们的文学极具世界性。

由此看来，被世界承认的文学线是“谷崎、川端、三岛”线，加上“村上、吉本”线，中间层次陷落了。在那个凹陷下去的地方，大冈、安部、大江都掉了进去。

安部公房的《砂女》，也许可以说是根据他天才的预感写成的。说的是掉进砂丘坑里去的人们的故事。我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尽管尺寸很小，但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呆在后院挖出的坑里。大冈先生不是这种受虐害的人，所以，他只是把在收容所里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总之，我们陷落了。这一点，我国有代表性的学者、批评家佐伯彰一先生也曾直率地指出过。

根据这种分类，我构成了这样一种理论。我们第二线上作家的文学的确是从世界上学来的。接受了世界文学的许多东西，也不乏其本质的东西，创造了自己的文学。可是，我们不像第一线上的人，谁也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又不像第三线的日本文学那样，在美国、意大利——我在这里没说国内的情况——十分畅销。我们难道是从世界上接受最丰厚的赏赐，又让世界早早遗忘的人物吗？

再假托一个墨西哥的神话来解释一下，阿兹迪克神话里，有个叫凯茨阿尔克特尔的神。据说他的眼睛发蓝。他变成了鹰、或者大鸟离开民众而去的时候，曾发誓要再回来一次。努埃巴·阿斯帕那侵略时，看见了西班牙来的征服者们的蓝眼睛，印加帝国最后的年轻国王就觉得，这些人也许就是凯茨阿尔克特尔的卷土重来吧。于是，国王想不抵抗征服者的进攻，期望

缔结和平关系，没料想被征服者给杀掉了。

我们第二线的作家们，颇有些像这个印加帝国的国王，我们向西欧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可结果，不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吗？大冈先生的《野火》、安部先生的《砂女》、我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在国内、国际都成了少数派，难道只能被当作特奥蒂华坎① 的金字塔那样，被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吗？

这话仅作为序论，我的讲演就此展开。谁知，这讲演的方案又让那件事情给搅了（笑）。一个富有智慧充满幽默品格的声音，从瑞典学院打来电话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讲演怎么办”。只剩下三天时间了（笑）。

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开始着手准备新的构思。站在这些学者和研究者面前，难道有作家敢于不用稿子讲话吗？于是，我总算写好草稿，还规规矩矩地誊写好；但为时已晚，只好强迫同声翻译那方面作出点牺牲了。我想大家能够原谅的吧。大家仅仅能听听声音也可以嘛，声音确实很美吧（笑）。

那么，我重新考虑的方案是这么回事。所谓世界文学，是很不容易下定义的概念。所谓世界文学，本来就有具体的表象。我想到了托马斯·曼② 那篇动人的讲演《歌德与托尔斯泰》。托马斯在讲演中说，托尔斯泰是世界文学。歌德当然也是世界文学。可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不然。它是俄罗斯文

---

① 特奥蒂华坎：纪元前二世纪到六世纪，以现在墨西哥城东北约 50 公里处的特奥蒂化坎为中心的都市文明。以太阳和月亮的金字塔等巨大建筑物而闻名于世。

②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希特勒上台后，托马斯·曼流亡美国，入美国籍。

学。曼坚信：席勒的文学是德意志文学。

这些想法若加以严密的抽象化，我以为要给世界文学下个定义实在是很困难的。譬如，我们有谁比托马斯·曼更能够巧妙地列举出托尔斯泰、歌德的特质呢？即便这么说，我还是觉得托马斯·曼的定义在这个命题上的论证也是不充分的。

那么，暂时不说世界文学，我想请大家还是先来考虑考虑世界语言吧。

不仅是我，一般小说家都没有持续做学问的习惯，可现在反倒在学者、研究者面前发言，实在有班门弄斧之嫌吧。可至少我觉得，若真的有世界语言，那实在是太好了。实现世界语言，我以为这大概是文学者的梦吧。

当然，实际上，文学只能用某个国家的几种语言中的一种来表现。

首先，提起一国有多种语言，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政治家们想推广单一民族的幻想，其实早已破产了。若问文学方面用什么有效方法可以来确认这个事实呢？你只要去读一读“阿依努”语的长篇叙事诗就清楚了。去读一读“琉球”语的“奥莫洛”就可以知道了；还可以再去比较一下日语的“万叶集”，或者是《记纪歌谣》。由此我们才能够彻底地认识到，日本单一民族论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既然承认了这个事实，我就又想到了世界语言。

我直截了当地想起了弗朗索瓦·拉伯雷[1]《巨人传——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第二册，就是《庞大固埃传》第一卷的

① 拉伯雷：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写有长篇小说《巨人传》等。

一个场面。在大学里，我个人受到过渡边一夫[①] 大学者的教诲。可大学者就是教得再勤，学生也成不了学者；但我的一生是在渡边一夫的光阴之下度过的。我反复阅读了渡边一夫的译作，那个描写庞大固埃王第一次会见愉快的巴汝奇时的场面。旅行回来的巴汝奇肚子空了。还想喝酒，更想上床去睡觉。他期待着出现个有钱人来救救自己。

这时，正好庞大固埃一行通过。巴汝奇以为来的是外国人，就用与自己国家语言不同的话来打招呼。他先用德语说。然后用“安迪波特”语来说话。十六世纪，发现了刚才说过的努埃巴·阿斯帕那，把别的半球叫做“安迪波特”。这语言，假定也算进去的话，接着他又用意大利语、苏格兰语、巴斯克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希伯莱语、古希腊语、卡斯科纽语、匈牙利语、布留达尼亚方言来说话，可结果没有一种语言能够相通。终于，他死心了，用法语来说话，于是，他得到了食物、酒和床。

关于能不能在世界上通用普遍语言，我想到了拉伯雷的想法。

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组织：希望发挥各种语言的作用，勇敢而有效地来维持工作，它就是在日本从事推进不同文化间医疗工作的组织。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来了许多各种语言背景的外国劳动者参加工作。他们之中，总有人在精神方面或肉体方面发生异常的。譬如，有的患了神经官能症、有的患了胃溃疡。我上面所说的那组织，就是专门为了救助这些人而建立

① 渡边一夫（1901—1975）：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的。

他们实际上使用着十几个国家的语言，还建造了医疗场所。我衷心希望：也是这个出色会议支持者的某个国际交流基金会，也能给予那个组织一些援助（笑）。例如，只会使用辛哈拉语的斯里兰卡青年生了病。在医疗商谈中，他只会用辛哈拉母国语，他带来一个会说英语的青年。于是，辛哈拉语→英语→日语地进行翻译，使治疗疾病成为可能。而且，收到了必要的治疗效果。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一般日本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认为有必要接受充分的语学教育。那无非是为了当外国人叫住自己，能有效地用地道的英语说话，否则就抱头鼠窜的缘故吧（笑）。

可实际上，试着用必要但又不充分的语言来说说看呢？在这种诊疗所里，医生也好，病人也好，双方都得说出必要的话。这种话一定是从语学角度看来并不充分的话。用这种不充分的语言来诉说自己，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深深理解。我认为这就是语言的有趣之处，进而也是文学的有趣之处。

关于这一点，我想举出自己有障碍的儿子的语言世界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叫做“光”的孩子，一直在制作音乐。他今年三十一岁了，若叫他依靠说话来自我表现，那他只有三四岁小孩的程度。但是，他通过巴赫、莫扎特的音乐语言来理解世界，于是像把音乐再重新还给世界似的，他来表现自己了。音乐嘛，原本都刻上了各民族、国家、地方的差异，但我还是觉得音乐可能是最接近世界语言的表现方法。

一家体育报纸的文化栏里登着记事，说现在，在这里，京都，“光”的 CD 唱片很畅销。快达到销量第一了。问是为什么，似乎听说失眠者听了有好处。我在想，眼下的京都，有多

少人会被不眠症所苦恼，要听“光”的音乐呢？其中有几个是这个会议事务局的人吧（笑）。

我是个纯文学的作家，书不大卖得出去，我也想借此机会为自己做些宣传，听了“光”的音乐还睡不着的人，能不能再读一读其父的小说呢（笑）？

所谓“音乐”的世界语言，我以为，也许有些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想一想伊拉斯谟[1]的拉丁语，它虽然只限于欧洲世界，但它依然是很清晰的世界语言。请把眼下听古典音乐人们的世界，和文艺复兴时期用拉丁语说话、写字人们的世界重叠起来看看。

一般认为伊拉斯谟和拉伯雷有着深厚的友情，可以进一步说他们是师徒关系；这就能意味深长地捕捉到拉伯雷与伊拉斯谟之间的继承关系吧？前者用法语这种世俗的、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语言来写作；后者则一生坚持用拉丁语来表现，拉开了巨大“知”的交流。我想，再加上斯宾诺沙[2]，他也可以称得上使用更彻底的世界语言的能手。

实际上我早有个打算：等手头的小说写完，不再写小说了，至少花好几年时间，每天只读斯宾诺沙过日子。四天以前，对我来说，特别对我妻子来说这还是相当深刻的问题：一家之主连续四五年只读斯宾诺沙过日子，那养家糊口的钱从哪里来呢？现在可好了。有几万瑞典克郎，读斯宾诺沙过日子的

---

① 伊拉斯谟（1466/1467—1536）：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痴愚神礼赞》等作品。

② 斯宾诺沙（1632—1677）：著名荷兰犹太系哲学家。著有《神学政治论》、《知性改善论》等。

条件都齐备了。我感到，斯宾诺沙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根本的乐观思想，看上去也总觉得不像那么正确（笑)。即使什么也不写就这样读着书死去的话，对我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幸福吧。

我年轻时候起，就开始读斯宾诺沙了，那契机竟是因为读了自学成才的小说家B·马拉默德[1] 写的《修理匠》，那是一篇写犹太人在俄罗斯生活的小说。小说的最后引用了斯宾诺沙的一句话："国家对于人来说，当它用令人生厌的做法行事的时候，那么，灭亡这国家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我作为永远不会回心转意的民主主义者，很赞成这样的想法。于是，我就一点点地开始读起那翻译文章来，还想不久以后年纪大了，能创造一种整天读斯宾诺沙的气氛。对这个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只用饭后茶余的时间去读，显然是有愧于大师的。

马拉默德写那本小说是在三十年以前，那时，苏联当然还没有崩溃。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或苏联的崩溃，也许正应了斯宾诺沙刚才的那句话。所以，我更觉得，我国的民主主义体制，创造了允许"国家对于人来说，用令人生厌的做法行事"的制度。

让我们更具体地来考虑一下世界语言吧，日本文学者中有志创作世界语言的人，我首先想到了宫泽贤治[2]。宫泽贤治恐

① 马拉默德（1814—1986）：美国犹太人小说家。描写犹太人忍受苦难生活的黑色幽默作品有《店员》、《修理匠》。

② 宫泽贤治（1896—1933）：著名诗人、童话作家。著有诗集《春的修罗》、童话《银河铁道之夜》、《风之又三郎》等作品。

怕花了大功夫，将日本东北地方方言和世界语言结合起来，创造了优美的语言。也许他认为那简直就是世界语言了吧。

另一个人，就是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初期有一篇叫做《墙壁——S卡尔玛先生的犯罪》的杰作。临到小说结尾处，他写了一句，“对立于地球的另一个星球是书籍”这样一句话。安部的构想，不就是梦见了世界语言的一种隐喻吗？

安部公房一生，直到最后仍不断关心“库雷奥尔语”[①]。安部对“库雷奥尔语”的理解，虽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但却有其独创性的奇妙。安部想把制作人们本身所具备的“库雷奥尔语”本能、或者叫“语言潜势力”的东西，与人脑这个具体器官结合起来。当人脑这个小小器官出现的时候，人类就和猿完全分开了。

据说安部公房与拉伯雷差不多，原先也是个学医的人。可他本质上是个搞文学的人，他一直持有医学的思考，或者将文学与科学对照起来思考。安部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造就了社会，因为有大脑这一器官，而其发展与语言机能相关，与语言机能有着有机的联系。

这想法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承认，安部公房这位作家，也成为日本最具世界性的作家。思考语言对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也许是因为安部受到日本语这种语言的限制吧？这难道不是十分辛酸的想法吗？由此又可说明，安部公房是个想用世界语言来写作的作家。

如此想来，我所接受的奖金，老实说最合适的要属安部公

---

① 库雷奥尔语：在旧殖民地，殖民者的语言和原来当地的语言相混而形成的独自的语言。有英语系、法语系、西班牙语系等等。

房了。如果他还没有去世的话，在大冈升平和我的联接线上，当然应该由他去领奖。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讲另一个伟大的现代作家——米兰·昆德拉[①]，这人也是具有拉伯雷式深刻洞察能力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个具有宽容精神、也可以叫做“笑之精神”的人。他宽容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制度，嘲笑过分认真的人。昆德拉把那种与拉伯雷连结在一起的精神，称之为“小说的精神”，声明它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已经完成了。

昆德拉曾经亲赴以色列作过演说。以色列这个地方，像欧洲以外的欧洲心脏，他的论述里，称以色列是象征欧洲“小说精神”的土地。从各种各样国家汇集而来的人们，对以色列的评价也是各有千秋的；但米兰·昆德拉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把欧洲语言作为一种世界语言来构想；不是人们都同意透过这个想法来看昆德拉所具有的境界吗？这想法渗透在相当具体的感触里。昆德拉对待自己作品的翻译本非常严格。比如，他对自己作品的意大利语译本，曾写过措词激烈的文章，说那全都错了；在欧洲，捷克语同其他语种的区别，他是特别敏感的。

语言的个性和普遍性是很有趣的现象。昆德拉的作品里，也有些让人怀疑也许是用法语写成的小说。有一篇叫做《不灭》的小说。这是个新的长篇，写的是亡命巴黎的生活，当然他是用捷克语写成的，可只要读一读法译本，你就会随处发现用法语构思的痕迹。它不用说是作为地域性语言——法语的产

① 米兰·昆德拉（1929— ）：捷克著名作家。1968年苏联出兵布拉格后，作品被查禁。1979年流亡法国，多次获国际性文学奖。作品有《笑忘录》、《为了告别的聚会》等等。

物。

再说，昆德拉年轻时写过一篇可以称之为不朽杰作的《笑忘录》。这小说以捷克的几个村庄为舞台，用捷克语写成。与《不灭》相比，《笑忘录》这部小说是真正的世界性的小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作品。《笑忘录》里边，出现了一个研究巴托克音乐的人。好像是个收集研究巴托克音乐的人吧。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实际上昆德拉的父亲是这方面的专家。虽然未把民族音乐的收集和世界语言联系起来考虑，但如果和欧洲语言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也许能找到一把钥匙。我期待着来自欧洲，合作研究久仰大名的武满彻、一柳惠等自觉大音乐家的乐理专家们。希望他们钻研日语、钻研日本音乐，用这把钥匙，来打开一扇大门。

米兰·昆德拉的命运，我不用说大家也比我了解得更清楚吧，再广泛一些，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米兰·昆德拉和东欧文化的命运吧。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东西方冷战开始了。特别是在东方，战后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被圈进苏联势力范围土地上的民众开始往西移动。关于这事，罗马尼亚人曾当过外交官的、研究比较宗教史的 M. 伊利亚德[①]，在日记里表现过忧虑，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他好几次、好几次地表现出这种忧虑情绪。

有一种扎根于东欧土地和历史的文明。换句话说也许就是东欧犹太人的阿什肯那齐文明。伊利亚德慨叹道：东欧原本也

---

① M. 伊利亚德（1903—　）：罗马尼亚的宗教学家、神话学家、作家。小说有《禁断的森林》等。还著有《宗教学概论》等。

有非犹太人系的文明，可随着东欧人大规模地移民、亡命移动到了西欧，东欧的文明也就从整体上变得稀薄，变得浅陋了吧。

这些亡命者中，可以说具有“笔杆子”资格的米兰·昆德拉，当时就在巴黎亡命。他今后将怎么办呢？东西冷战眼下已告终结。于是，五十年的时间能简单叫做大大的“迪阿斯·波拉”吗，民族大逃亡也能一笔勾销吗？而且，还能让自己一伙被压迫的文明再恢复过来吗？例如，昆德拉曾经和哈贝尔总统是朋友，可看来也未必就一定能搞好关系吧。无论如何，在那里应该有世界文学所面临的、二十世纪最庞大的课题。

若本杰明[①] 还活着的话，这一定会成为他最大的话题吧。拿活着的人来说， G. 格拉斯[②]在德国统一的时候——我和他在这次会议之前偶尔碰上，和他公开讨论过——曾对退路保持着冷静，近乎沉郁的态度。格拉斯说想用波兰人的眼睛，或者用捷克人的眼睛，即作为大德意志周围的小国人来看这个问题。从 M. 伊利亚德到本杰明的所有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还有一个人，原是外交官，是个和伊利亚德完全合不来的美国人乔治·克南[③]，他是个外交官出身的学者，广泛受到注意。他和伊利亚德相反，当然属于制造东西冷战装置的一方。冷战五十年，他曾是个担负过相当责任的外交官。

---

① 本杰明（1892—1940）：德国评论家。犹太人。著有《历史概论》等等。

② 格拉斯（1927— ）：德国小说家。著有尖锐讽刺社会与戏谑相结合的小说《铁皮鼓》、《猫与鼠》、《鲽鱼》等。

③ 乔治·克南（1904— ）：曾任美国外交官。以提倡现实主义外交而著名。曾任驻苏大使、驻南斯拉夫大使。主要著作有《美国的外交 1900—1950》、《苏联的外交政策》等等。

谁知，他辞去外交官以后，一改初衷，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彻底批判自己、批评美国外交上所积累的东西。而且，他还自成为独特的思想家。乔治·克南很早就在担忧人们由东方往西方移动这一现象了。克南和伊利亚德，可以看作一对思想家的两个侧面。

克南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还是个重要的人物呢。他对核武器、原子弹、氢弹等有着深刻的思考。我们有过广岛和长崎的经验，可日本人到底会不会将它真的思想化，把它作为日本文明来考虑呢？或者把它作为日本人的文化问题来对待呢？我觉得本身就该是这样的。这可是一个作家羞耻的坦白，美国外交专家乔治·克南朝着这方向先行了一步，他给了我们重大的启迪。

假如人类再来一次广岛、长崎那样的核战争将会怎样呢？提到这个问题，克南写了下面这段话，稍微长了一点，我来引用自己翻译的文字。

> 我们所谈论的文明，并不只属于我们这辈人。我们并不是所有者，仅仅只是保管者。文明要比我们广博得多，重要得多。它是整体，我们只不过是部分。我们并没有构筑它，而是其他的人们构筑了文明。我们没有创造文明，我们只是继承了文明。我们是受惠者。但文明又是伴随以下沉默的义务来赋予我们的。我们应该善待它，维护它，使其发展，朝着良好的方向改良它；至少我们不应该破坏它，使其能保持原貌传给后来的人，文明所伴随的就是这样一种沉默的义务。

发动核战争，就是在破坏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在其他场合，就人类身体思考的时候，曾经改用过思想家的这段文字，在这里要贴近世界语言之梦，我想再次改动一下这段文章。我们就自己的语言，即，就日本语、就英语、就法语，或者就我们所梦见的世界语言，能不能这样地来改动一下呢？

> 我们所谈论的语言，并不只属于是我们这辈人。我们并不是所有者。仅仅只是保管者。语言要比我们广博得多，重要得多。它是全体，我们只不过是部分。

我想把乔治·克南就核武器和文明的思考，作为身体和语言问题来展开学习。正面地来模仿他，将广岛和长崎的课题，作为日本人经历过的二十世纪最大事件来重新把握，那么，只有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才会第一次获得本世纪末过渡到下一世纪的思想或者文明。

正如马利乌斯·约翰教授已经成为古典的定义那样，又如特奥·那杰塔那种新历史学家再下的定义，我们都未能将始于江户时代终于维新之时，近代历史上所发生和展开的东西，灵活地运用在开国以后的第二个近代之上。甚至可以说还有些倒行逆施，掉入了深深的地狱里去，在那里广岛和长崎闪着光芒。

我那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作品，正是偶然不顾小说家的无能，来正面对待这个主题的。我们制造了歪曲的、贫弱的近代。而且引起了巨大的战争，有过悲惨的教训。那顶点就

是广岛和长崎。难道我们不该把这事当做自己的文化问题来看待吗，不该把文明的问题再重新彻底地考虑一番吗？它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最终可以成为连接世界语言的构想，成为参与世界文学的出发点吧？

我认为应该赔偿广岛、长崎的巨大牺牲。赔偿者应该是我们。我们还必须治愈包括广岛、长崎在内的，那以后决不能说完全愈合的国家病症。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本来也就包括文学——才能第一次描绘面向二十一世纪、具有地球规模的蓝图，遵照安部公房的说法，就是描绘具体化的蓝图。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想告个长假，终日阅读斯宾诺沙过日子；因为自己直到生的尽头，我都会让这苦痛的希求缠绕着，受其操纵。我衷心祝愿这次给我各种各样教益的大会圆满成功。

(1994年10月17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京都会议”)

我们的性世界

性的存在，多少总带有些滑稽的侧面，同样，总带有悲剧性的紧迫感。勃起的阳根，直率地显示出这两个侧面，疲软萎缩的阳根本来就是滑稽的，且又被极其切实的悲剧性紧张感所纠缠。

下面举的例子，所谓性的存在，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件事。一个五月的夜晚，在神户的一个小酒馆里，我受到了极度的“性感动”：那是个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士兵，19岁，生于美国旧金山；他亲眼看到战友在战场上死去，自己也像经历了比战友们更完整的死似的，他头昏眼花被恐惧击垮了。

这个人因恐惧战争而陷入了阳痿，其后，又染上了从小就有征兆的“露阴癖”。他使我这个没有上过战场的人觉得，战争恐怖（被杀的恐怖或杀人的恐怖；或者说，在战场上到处流窜着的、那种由暴力或非条理的死自身所带来的，既无敌人也无朋友的恐怖），总是和激烈的“性”结合在一起的；战场上的强奸与其他任何场合的强奸都不同，它让人幻想成是一种极切实感受的人性流露。这个从战场回来的阳痿者，在酒店泥地房间昏暗的一角，瘫软地靠在木椅子背上坐着，一缕黄色的光照在低垂的额头上，裤子前门襟的拉链松开着，露出萎缩的性

器。“夜之女郎”们看见他，哄笑着喝倒彩；他像根本没听见那嘲笑声，只是不时地抬起头，用真挚的、祈求神助似的目光扫视着四周，很久很久地暴露着自己萎缩的性器。

勃起的阳根可让人抱着美的印象吧，但那萎缩的东西，却具有一种排斥美之感慨的力量。如果把人的肉体比作一个国家，那么，它就是其中的贱民。自古以来，有许多诗歌咏叹过勃起的阳根，可这贱民决不会有一首歌来咏唱它。战场归来的阳痿者，他那阳根，丑陋得使人不忍卒睹；但在他的眼睛里，却有一股来自真正人性的切实紧迫感和悲剧性的眼神，它让我感动得心里热乎起来。

从卖淫女人的职业意识来看，不用说，她们当然只会以嘲笑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但受感动的我，却似乎有一种连带意识，即任何瞬间都有可能看着友人们被拖向死亡的战场，并很可能因为恐怖过度而变成阳痿；而且，作为一个现代青年，自己很有可能成为那战场回归的年轻人，不得不执著地去注意那令人丧气而又无法勃起的性器，从这种连带意识出发，我一直注视着他。

这个滑稽、悲壮而又疲劳的现代唐·吉诃德[①]，从战场上归来，阳痿而又染上了露阴癖，他向我明显地表示出一种几乎抓住了所有现代青年的世界性黑暗疾病：“战争的恐怖和性的焦躁”。他使我深深体味到了人的悲惨；另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他试图越过极度恐惧的黑暗，祈求恢复勃起，他的人性中充满了顽强的勇气。他忍受着四周围的嘲笑，一直低头望着自己松开拉链的裤裆，瞧着那丑陋萎缩的性器；他像个基督教国家里

---

① 唐·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的青年，真挚地期盼着应该出现的奇迹，神的奇迹。已经无人再能嘲笑他这个无限期待人性本质的人了。

在我脑子里，虽然经常浮起一个表象：现代社会里“性”存在的滑稽和悲剧性的紧迫感；但我还是觉得应该与自己，或者与现实世界存在的总体来一番对抗。

劳伦斯[①] 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时代里。他觉得，在战场上变成阳痿的人，有机会在恐怖（=死自身）和性（=生命能源自身）的相关夹缝中，把人参与斗争的荣光和悲惨当作主题；但他并不认为就此得作出努力。劳伦斯的“性之太阳”，是照亮阴湿基督教社会的太阳，充满教育家的光辉；但它却不会照亮“人的性存在”与“人存在自身”之间，那纤绳般扭曲的、悲惨绝望的黑暗。

性是生命的火焰。它是从背后迫近我们却看不甚清的黑暗火焰。它深深地积聚在男人身上，作为男人，它是核心的火焰之一。

什么，说同它嬉戏试试看吗？你想把它当作便宜的、不正经的玩意儿吗？

买一条大眼镜蛇，可以和它玩玩。

“性”，甚至潜藏积聚着太阳里的荣光。

在朝鲜战场上因恐惧而阳痿的年轻人，要是真能引发勃起的话，他很可能会认真地与眼镜蛇大玩一通。即使再便宜再下

---

① 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作品有自传性小说《儿子和情人》，1928 年发表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和她的情人》曾遭禁印。

流也无妨，那青年不管什么方法都会用，如同犯了职业病似的，他想让“生”和“性”之绳再次在那双手中恢复。劳伦斯同“检阅狂”战斗，可不幸的青年却必须站在绝望黑暗的深渊面前，那个似乎要把“性自身”和“生命本身”吸进去似的黑暗深渊；他悲惨地，但又十分人性地持续着见不到太阳的战斗。

亨利·米勒，是个被辛酸的性热情攫住的现代人，那是一种与劳伦斯的荣光积聚，潜藏于太阳里的光辉之“性”有所不同、在别的层次里所具有的“性”之热情；他远离劳伦斯却迫近于我们。亨利·米勒以性热情强烈悲剧的固执，在“性”快乐、“性”太阳的一侧，确立了他的文学地位，他实在是一位现代的作家。对他来说，性行为即使真的伴有快乐，本质上也是一种痛苦，它与“人之存在”背后的深渊紧紧相连着。

回到房间，马拉一边吸烟，一边一个人玩耍。欲情燃烧起来。我们又开始干起来，这回用的是学狗性交的方法，但谁都没有上劲。屋子开始像波浪般起伏弯曲，膨胀起来。墙壁出汗；眼前，稻草的垫子乱扔在地板上。开始的演技与恶梦的模样取得了平衡。走廊角落上断断续续传来哮喘病人的喘息声。那声音让人想起，疾风拖着长长尾巴吹进老鼠洞穴的声音。

再过一会儿，她就快要成功了；忽然听到有人在窸窸窣窣地寻找房门。我从床上下来，伸出头去看了看。是个醉鬼在找寻自家的房门。几分钟后，想用冷水淋浴冲洗阳根，我就去了洗脸间。回来一看，那家伙还在找自己的房间。雕花格子的窗全开着，从那里

漏出响亮的不协和声音，仿佛吃蝗虫的使徒约翰出现了似的。回到屋子，又想再经受一次考验，可那阳根简直就像用旧橡皮胶布做的。尖头儿没有任何感觉，简直就像把硬脂肪块插进下水管道似的。不仅如此。大炮里已经再也不剩一发炮弹。所以，这种时候，要是真发生了什么，也就只有胆汁草似的蛆虫般的东西，或者像乡下稀薄奶酪的一滴浓汁吧。令人吃惊的是，它依然如同金锥子一般坚硬起来。它已经完全失去性道具的外观。简直是五分钱、一角钱就能从商店里买来的、新设计的便宜货器具似的；或者是涂上花花绿绿颜色、缀上诱饵的鱼竿；让人一看就大倒胃口。马拉像条鳗鱼似的将身体牢牢缠住这亮晶晶、光滑滑的代用品。她可不是个精神正常的女人。不，连女人也不是。她不过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通过凸透镜反面看到的活诱饵，不过是难以名状、乱翻乱滚的扭曲的肉块而已。

比亨利·米勒更具现代意识的，是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杰克·凯鲁亚克，关于他，亨利·米勒这样说：

“假如有人问他在哪里能弄到这种子，他会回答：从你那儿弄到的。”

从我们这儿弄到了种子，凯鲁亚克所唱的歌里，明显表达出，在这个充满忧思的现代世界里，性行为已经成了现世的绝望深渊及赤裸裸的买卖；凯鲁亚克接下去在我们面前所表现的，就是我在那个五月的夜晚，在神户小酒店里所见到的那张青年的脸；出生于旧金山、在战场上因恐惧而阳痿的青年，那

张充满真挚祈求的"露阴狂"的脸。

> 当我们一起品尝到兴奋战栗滋味的时候，她说："我怎么忽然就热衷起来了。"这并不是她自己鼓上劲的缘故，而是我兴奋得发了狂，她才兴奋得发狂（莱奇所谓赞叹混乱的那种），那又是她所喜欢的吧——我们在床上互相诉说，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她，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我们精力旺盛地一起发出呻吟，一起发出哼哼唧唧的奇妙声音。

在这里，在劳伦斯的"性之太阳"所未表现的、生之苦难的黑暗深渊之中，互相靠拢不安的身体和心，虽然我们有忍耐的悲惨，但也有真挚的"生"之姿态。

"政治之人"与他人冷冰冰地对立抗争，总是力图打倒对方，或者把他人消灭在自己的组织里，从而让他人自己放弃作为"他人"的意识。"政治之人"同某个"他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于是，在下一个瞬间里，他已经摆好了架势、站好了位置，要同别的"他人"抗争一番。如果"政治之人"，逃出与"他人"处于对立、抗争关系的地方，那么，他就再也不是"政治之人"了。

与此相反，"性之人"则不同，他不与任何"他人"对立、抗争。他与"他人"不仅没有冷冰冰的关系，而且，对他来说，"他人"根本就不存在。

一片分光镜，分别将现代人划出了"政治之人"的矢量和"性之人"的矢量。这两个矢量虽然不可能兼有相同的内容，但它们作为"政治之人"和"性之人"相互对立的两个要素，

构成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宇宙，除此以外，精神对肉体的模式，不暗示任何政治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必须首先明确下来的。大体说来，精神极其靠近“性”，具有“性”的指向；而肉体却本质上具有政治的特性。

当“政治之人”把“他人”作为“对立存在”的时候，他就开始发挥他那出色的机能。那机能的最终目的，有时是把“他人”当作对立者使其存在，有时则是把“他人”作为对立者，使其灭亡。围绕“政治之人”的这个宇宙，只是一些用“他人”来充塞的异物。

反之，对“性之人”来说，这个宇宙不存在异物，也不存在“他人”。“性之人”没有对立，只有同化。

“政治之人”排斥“绝对者”。只要“绝对者”存在，“政治之人”的政治机能就会被窒息、被封锁。为了与“绝对者”一同存在，有时他会放弃“政治之人”的身份，作为“性之人”，接受“绝对者”，就像阴户接受阳根似的；或者就得像雌性从属于强大雄性似的从属于“绝对者”。而且，“接受”和“从属”的行为，就像性行为那样一定会带来快乐。可是，就像性的世界里有性感缺乏症一样，现实世界里也有“复合病毒”，所谓局外人的存在，就是个值得一并考虑的问题。

在独裁者专制的国家里，国民把与其精神和肉体有关的“政治”与“性”两者，按照极不均衡的比率置放，于是，不得不使“性”的存活具有宽广的幅度。只是独裁者不可能像神那样是个“绝对者”，所以，允许在国家幽暗狭窄的一角里，存在少数反抗者；这些反政府活动家，其周围大多数的从属者，是一些以相反不均衡比率放置的“政治之人”。

从国际势力来看，可以把某个强大国家当作“政治之人”

国，把某个小国家当作“性之人”国。

我认为，现代日本这样一个东洋国家，简而言之，就是在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下，渐渐变成“性之人”的国家。现代日本人对建立“政治之人”的志向极端不感兴趣，是“性之人”的国家化。

任凭左翼分子高叫“危机”，仍无法抗拒广泛而沉重地存在于现代日本整个国家里的“天下太平”的风潮。正是这“天下太平”的风潮令左翼分子呐喊，扩大他们左翼的圈子，于是，总算令“天下太平”风潮有所收敛；但是，一到大选，尽管进步阵营非常强固，被人们戴上了正义的桂冠，压倒地受人欢迎（这主要是通过有影响力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亮相、增加宣传效果）；然而，大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经常抛头露面的保守党大获全胜，这说明“天下太平”已在日本人心里根深蒂固了；可以断言，日本人满足于日本现代社会政治形势的现状，显示出他们其实是在享受这份安逸。

选举中保守党的胜利和进步政党的败北，源于“保守”这个概念抽象的、强劲的魔力，它把保守党内阁不计其数的贪污行为、渎职、背叛行为等日常而具体的证据抽象化了，因此也就无法令人们不信任保守党的；固然有很多部分显出日本人抽象能力的薄弱，但这种时候，日本人不断沉醉于根深蒂固、具有抽象魔力的“保守”，说明了现代日本确实有“天下太平”的风潮，日本人正深深地祈盼维持这个现状。

这个席卷现代日本的安逸风潮里，且不说“政治之人”的斗争心和焦躁，我觉得，“性之人”退缩的满足感，落下了浓重的阴影。现代日本演化成“性之人”的国家，作为强大雄性美国的从属者，委曲求全、贪图享受安乐；相反，我们也可以

想见，这个国家里进步的政治活动家所遭受到困惑和不安，以及在他们面前的巨大壁障。在“性之人”的国家里，“政治之人”只能是局外人。局外人不仅无力而且滑稽悲惨。

社会党前进方向的混乱和丧失，极端明显地表示出这种无力感和滑稽、悲惨。社会党终于无法在这个“性之人”的国家里，发挥出“政治之人”的作用。

我曾抱有最强烈的关心，一直在现代日本寻找着“政治之人”。而且，我对日本的左翼，特别是青年层抱着最强烈的关心。青年，不仅在这个“性之人”的国家——现代日本，而且在其他国家，恐怕在苏联—俄罗斯或者中国，虽有人抱着“政治之人”的志向，但“性之人”设下的陷阱，时刻都准备在他的脚底下。

譬如，一个青年作为“政治之人”入党的时候，认识到他自己与壮年领导者和下级党员之间，或者与同志之间，只能是“性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日本共产党将“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者、年轻的“政治之人”们除了名，给老实的“性之人”年轻党员们做了个示范。《赤旗报》读者投书栏“读者来信”里，有一封优秀模范的青年党员来信；看起来他再三地说对权威主义的想法和感觉，其实应该是一篇极端“性之人”的文章。

萨特《肮脏的手》中描写的青年政治运动家和壮年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浓重地漂浮着机械政治的印象；其结果，青年雨果因嫉妒贺德尔而枪杀了他，“他因嫉妒而抠动了扳机”。

毋庸说，领导者贺德尔的死，其结果是极具政治性的；青年雨果曾发挥过政治作用，但青年雨果是作为“性之人”去发挥政治作用的。

现代日本青年政治行动困难，也许源于“性之人”的国家；因为“性之人”青年极易堕落，他们被设下的必须发生政治行动的两重陷阱所困扰。

现代日本的青年是“性之人”，但他们决不会像青年雨果那样，既是“性之人”，又能起到政治的作用，他们始终一贯地、只能发挥“性之人”的作用，青年雨果的侥幸最终没有奏效。这就是现代日本青年活动家们最根本的不幸。

我想描绘一下折磨着现代日本一般青年的停滞感觉：我打算以固定的性的表象，来现实地塑造日本的青年像。

我想描绘的是停滞的不幸，特别是停滞青年的不幸。而且，这不用说正是现代日本“性之人”青年的不幸。

性的表象，只限于表现在“性之人”身上，它是一种伴随人们多样侧面的统一而又能够转位的表象。“我们让致命的精神及肉体的阳痿折磨着”这个命题，给“不能勃起”这个性表象之“力”蒙上了一层其所有意义以及那个意义的复杂阴影。

一个评论家曾嘲笑我政治行动的表象，说那是罗曼蒂克的，因此不具备现代的意味；其实根本就等不到他来指责，也不可能有浪漫的革命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我曾经极其浪漫地描写过憧憬阿拉伯民族运动的日本青年，丝毫没有想过去描写应有政治运动形态的阿拉伯联盟，我只想描绘一下，“性之人”浪漫地感觉到异国革命敲打着心扉，却致命地“不会行动”、停滞不前。而且，我想请这位评论家理解的是，我只想透过这个“性之人”，透过这个作为浪漫革命信徒的日本青年，透过这个性表象来抓住、并想真实描绘出那份停滞的感觉，这只能说明我“决不是浪漫主义者”。

有个畅销小说家，好几次发表颇带贬意的意见，说我的小

说紧紧顺应时代潮流，而那位小说家则大大凝聚了反潮流的厄运，其奋斗的结果，是制造出一些新的时代潮流；我与之相反，我所瞄准的是现实地描绘深居在停滞谷底的青年，那些只能将任何通俗之人眼里的时代潮流，转化为思想和感慨而浮在自己脑际的青年，那些与独创完全无缘的“性之人”现代日本青年。我期望着编成沉浸于时代潮流里的各项要素，现实地描写同时代的人们，完成小说家唯一独创的任务。

对我来说，所谓描绘同时代人的现实主义，就是描绘现代日本青年的现实主义，就是描写这个现实世界的“性之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性的表象”是有效的武器。

对我们来说，某几个星期里，全部精神、全部肉体最具昂扬的时刻就是性的昂扬，那是极有可能的事态。而且，它作为不幸的事态，正表现在我们日本青年的身上。

劳伦斯的至福时代、性的昂扬，是太阳光辉装饰的生命的昂扬。可是，受到亨利·米勒一大回转的影响，年轻的杰克·凯鲁亚克的时代、现代的性的昂扬，已经不再是太阳里的波澜壮阔了。

这不安时代里的青年都知道，性昂扬的结果，不过是输精管的一次震颤；他们过分地了解突进尿道所引起的一滴无益精液的意义。

性昂扬以外的昂扬要是都不来造访的话，那它就该成悲剧的核心了。对我们来说，性的存在罗列起滑稽的侧面，兼具有悲剧性的紧迫感。

当然，人的存在，多少总带有些滑稽的侧面，同样经常持有悲剧性的紧迫感，我应该奔赴自己内心的深渊。

我的小说作法

我新近写成了《个人的体验》，正准备出版。同时，我又开始了写新长篇小说的准备。一篇小说写就，改定原稿，还在校正印刷小样的时候，下一篇小说的雏形就会在弥漫的大雾中，渐渐地、实实在在地浮现出它的身影。这时，我才会觉得自己跨越了完成一篇小说后的过度亢奋或者同样过度虚弱的感情陷阱。我把它想象成小说家的头脑与肉体生活的最基本的循环形式。

于是，我从这循环轨道上通过，不会有"就此到头"的感觉，不会过分地躲懒，也不会过分地兴奋，只是由自己控制着车头循序而进。也就是说，我想使自己写小说的量和速度，都遵从这个循环的秩序。具体来说《个人的体验》，写出五百页第一稿时，花了五个月，改写、校正小样的阶段是两个月，就是这么一种速度。

然而，这个循环，不可能一直是畅通无阻的。不用说，常常有晦涩难进的时候。特别是准备工作结束，实际开始动笔，第一稿写到十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作为小说家，竟会如此缺乏职业智慧的积累；我让这种心情反复折磨着。木匠的徒弟仅仅才修炼了几星期，就要

让他动手盖高楼。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而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那样的。这个阶段，我得绕过困难，改变原计划，结果，小说也跟着萎缩了。既然确实要接受困难的总体，那就得磨练攻破的方法。

有时，这些困难，使人很难把握小说整体的展望；有时，细部的一些场面，恰如侵入人体主要部分的癌，把充满危机的困难，带进了小说的整体。不管你要对付哪个方面，唯一的武器就是时间。

困难的酸，换成甘甜的蜜，小说整体的把握和细部的表象，像熟了的葡萄一样能让人收获，这固然是最高的境界；但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作家不乏其例，就连我，也常常把半生不熟的果实撕得粉碎。我警告自己必须把小说世界的循环速度再放慢一点。尽管如此，有时我也注意到：小说越过最初的暗礁开始进行，自己准备并且养育起来的一些文学种子，会散布在小说的各处，作为确实的线索支撑着新的小说。《个人的体验》中有关“性”的表现就是如此。我以《性之人》为中心，以自己的做法来展开有关“性”表现文学的效用。而且，我认为，自己有关“性”的表现，在《个人的体验》中构成了最令人满意的、充实的十几页。

第一稿完成，我立刻就进行修改，开始订正。那时，我所注重的是将暧昧的、即有歧义的意思删除掉，使句子单一化，明朗化，使文章尽可能具有自然、流畅的形式；就是声音方面，也要尽量使韵律具有安定感。我是以曲曲折折文体出家的人，眼下我正在努力避免“生理之癖偏重”的疾病。然后，校对小样。对小说家来说，我找不出其他比研讨自己的小说更能直接批评自己的机会。

小说的语言和随笔的语言

去年秋末，我将近几年来写的所有随笔编辑起来，出版了一本叫《持续之志》的书。这本书里所收的，全都是与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执笔时期的情况，以及小说内容有所关联的文章。于是，又重新有人抱着好心或是怀着恶意，向我发问：你的随笔和小说，简直判若两人嘛，到底哪张脸才是你真正的面孔呢？以前，随笔集《严肃的走钢丝》和小说《个人的体验》也是一同发行的，当时的情景与眼前的情景竟如出一辙。

如果我回答“对自己的随笔和小说，都承担责任”，那么，涉及到本质的话，我的回答已经算够圆满了；但是，生于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我会经常想一些问题，语言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扎根于想像力的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等等；于是，我想顺着这些问题，再来回答前面人们提出的疑问。

我曾经从各种方向反复考察过有关语言想像力功能的问题；可是，在实际运用语言为职业的人们的脑子里，这种考察究竟是如何落实下来的呢？具体来说，看不出有什么进展顺利的情景。诗人的语言、小说家的语言、评论家的语言，都各自

具备其独特的功能，但是，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看起来也常常有界限混乱的情况。一般理论总说“日语暧昧（多义)”，然而，既然语言只在发言者和接受者的想像力之中才得以成为实际存在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应该说使用日语的人，他们的语言意识暧昧（多义)；这样，理论上才是合情合理的。

我呢，是个又写小说又写随笔的人，所以，就拿我自己内部的语言存在的实际情况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诗的语言功能要除外。而且，眼下就诗的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不同功能，正在进行比较广泛的考察，所以，我认为，最近无视这种差异的议论风潮有些不合时宜，持有这种议论的本人，自己会进行反省吧。

小说里使用的语言，经常具备其中的两个定向。即主张某个意思的同时，与其相反的否定定向也会露出端倪来。一篇文章，强调了A定向，同时，相反的B定向也会活泼紧张起来。

现实世界里，我们活着的人，总是内部潜藏着自我否定的契机而行动的。当我们执行A选择的时候，与其相反的B选择也实际存在于我们的体内；于是，人们的行动才能具有本质上的活力。一个人不论采取什么样严肃的行动，他身上仍有其严肃性本身所反照出来的滑稽、卑微。人们不管怎样继续某个持续连贯的行动，他不得不受到切成一段段的“刹那性”的纠缠，而这“刹那性”正是由持续性、一贯性本身所反照出来的。这种内部幽暗的无法抹杀的特点，才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因由。反之，一个人无论多么滑稽、卑微，或者以切成一段段的“刹那性”行动，他们的身上也具有与之相反方向的内部之光，他们也会期待那分光明，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由。

小说是一个人意识的产物，而小说家的努力，就是千方百

计、尽可能地接近现实世界里某个人身上所存在着的、互为否定的多样性。这份“努力”，要求小说的语言，也一定要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必须同时实际并存两个定向。这与暧昧性不同，和多义性也是两码事。现实世界里的一个人被拽了出来，我们能不断听到他内部发出的否定之声，或者，他实际存在于互为否定的两个定向的争执之中；而小说世界里的人物也该显示出相同的状态，小说家必须通过语言来保障这个“实际存在”，因此，他只能自发地使用上面所列举的那种类型的语言。福楼拜① 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同时，那话的背后又潜藏着“我不是包法利夫人”这样一层语意，那才是真正的意思。

可是，写随笔的人，应让随笔的语言简洁明了，只能具有一个定向。就像铁的分子朝着一个方向能带来磁力似的，语言中的意思也必须统一到某个方向上来使用。写随笔的人，正是尽可能笔直地向他人传达所要叙述的事情，若非如此，大概写随笔便没有意义了。对小说里所有的类型都可能加以理解，它们各具其意。可是，随笔呢，如果作者设定的方向被人相反地接受了，那么只能说这是作者使用语言的不当。

尽管如此，随笔作者，作为现实世界里实际存在的“人”，他内部当然也包含着一个与“随笔定向”相反的定向；随笔的读者即使清楚地反对随笔的“定向”，作者也决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只有与否定的东西互为排斥，随笔的语言，才能给作为现实世界一员的实际存在的读者，带来相互对抗的多样性。

---

① 福楼拜（1821—188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

可是，随笔具有的定向所带来的责任，并不能说它是相对化的。随笔的写作者，无论会受到何种反应，他也只应该对自己语言所承担的定向负责。他因此会受到惩罚或羞辱，这惩罚与羞辱，正好反过来认定：写随笔的人在现实世界享有正当的市民权；这成了相反一侧的支柱。语言不孤。

小说家的无意识

弗洛伊德[1]曾对达利[2]说过：自己能够从古典主义绘画里探索出潜在的意识，从现实主义流派的绘画里发现意识的东西。达利画的草图挂在一个伪上流社会趣味的宾馆展览厅里，我于是看到了弗洛伊德的肖像：松弛呆板的脸上，瞪着黑暗深渊般的奇怪眼睛；我又看到了达利的照片：尖锐紧张，令人恐惧的脸上，长着一对老好人的迟钝眼睛；遥想两个巨人在伦敦的会见，我觉得，就像在眺望滑稽恐怖电影里，好人和坏蛋初次相会的情景。

二十世纪初叶，小说家们全被弗洛伊德捕获了，在心理学的圈子里，过着家畜般的生活；后来终于冲破了樊篱，大伙儿再次瞅准无意识的旷野，逃了出去；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界所发生的变化。可逃亡出来的家畜，究竟百分之几忘掉了家畜的习性，恢复了兽性呢？

总之，今天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发

---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② 达利（1904—1989）：西班牙出生的超现实主义家，以细密古典手法画异常的幻觉。

现意识产物之外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希望能从小说中惊讶地发现超出意识领域的东西，所谓那些和“潜在意识”有关的东西。刚从心理学的高速公路出口驶出，又驶进过分光亮、赤裸裸的意识高速公路，“嗖”地驶向了远方；在这一点上小说家与达利颇有些相同。特别是小说家们，老是不安地尝试着暧昧的赌博。完全外行的读者，也想迅速地尝试与小说家交流；其实做法很简单，只要说一声，“你没意识到吧，我呀，从这一页瞧见了你们夫妻生活不和谐的征兆喽……”小说家肯定会高兴得发狂，而不会发出意志消沉的叹息。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小说家的技法越来越有意识地讲究起来，在这时代里，小说家想在无意识旷野里获得驰骋犀牛般的感情，看来是很困难的。因此，今天的小说家，一般都装出没有自信的善人相。同明治时期的小说家相比，今天的小说家，蓄须的人数远远不及过去，依我观察，这不单是流行的问题，而且是受到了介于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弗洛伊德的影响。

于是，当我面对书桌的时候，代替有意识的小说家生活，我过着与其他时间无异的个人生活；我依靠一种强迫观念，绝对驾驭不了自己的无意识偏向。这就是几年来我一直扪心自问“我该怎样生活?”的问题。这种生活里，首先物体、桌子都会发挥出特别的象征力量，拒绝的力量。从学生时代起，我就有个习惯：左手翻词典，右手用铅笔在书的空白处做记录；所以，我腾不出手来支撑书本；也就是说，我只能面对书桌读书。可眼下，我除了写小说，其他时间根本就不沾书桌。书是躺着读的、小随笔，譬如像现在这篇文章，我是站着把原稿纸摊在音响设备的箱子上写成的。

《个人的体验》出版了，我现在正开始着手写下一个长篇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老是觉得去不了书桌边，老是进不了实际动笔的阶段。于是，随着无意识放任自流了几天，可我并没有感到蜜一样的甜美。昨天早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了精神病医院的情景。我自己悠闲地捧着斟满牛奶的早茶杯子，瞧着让不安弄得筋疲力尽的人们。那里出现了一个曾经是小学教师的中年妇女。每次跨过门槛时，她总要用脚擦擦地，来来回回祈祷几十分钟。我忽然想起自己也是这种类型的人，面对书桌，开始写小说第一页之前，我也是久久地举棋不定，得来一番擦脚运动；立刻，我感到早茶杯里的牛奶发酸了，我瘫软了下来。

确实，在小说实际开始进行之前，即有规则劳动的日子开始之前（在这一点上，诺曼·梅勒[①] 曾把小说家归于体力劳动者阶级，我举双手赞成。我只能写出流行作家十分之一的作品，即使能有每月写出一百页的生产量，也得小心谨慎地干，每周最好是四天有规则的劳动），我也不住地来回不停地擦起脚；伴随着些许恐惧心和拒绝，我怔怔地瞧着“意识之城”的桌子。

我无意识的偏向，大概就是面对破坏自己的一种冲动。说起来怪没意思的，连着几天，我不停地喝着威士忌酒，神经质的忧郁之泥涂满了全身；我茫然地坐在电视机前。脑子不过像海螺的内脏，软绵绵地窝居着，就连胃也到了最差劲的时候。而且，运气还真不佳，不认识的人会打来电话，似乎不来点小纠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再加上我多年的朋友——不眠症。

① 诺曼·梅勒（1923—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裸者与死者》等。

从这类死胡同钻出来的契机，大概总是一本书。我一贯采取这种方针：自己不在道德方面批评自己的无意识；可是，我十分疲劳，又实在应付不了自己怠惰情绪所产生的厌恶感时，我就拿起一本书来读，这情况大致又是连锁发展下去的。比如渡边一夫教授的《我的人道主义》、《三条道路》、《泰平的日记》、《乱世日记》，还有岩波文库的《痴愚神礼赞》等等。其结果，我立刻被挪到书桌的旁边。可以说，别人的书起了桥梁的作用，把我从无意识的世界带回到“意识之城”的书桌边。

我就是这样过着小说家的生活，就是再曲折也得活下去；结果，比起对书桌的恐惧心来，确实，对深一层无意识的偏向，我更具有浓重的恐惧心；我常常怀疑，自己会不会永远越不出被弗洛伊德擒获的小说家的范围。

·附　　录·

授　奖　词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谢尔·埃斯普马克**

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倾力描写光。讲述人蜜（蜜三郎）因为长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就与渴望成为激进派活动家而壮烈捐躯的弟弟鹰（鹰四）一起回到故乡四国，来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偏僻荒凉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见弟弟在性兴奋的刺激下赤身裸体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转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转滚动。此时此刻，鹰就是一个世纪前农民起义领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

有人认为，从这个场景可以窥见大江叙述的精彩，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还有人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场，情节展开变化。大江的作品中，这种为数

众多的来自过去的挑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回答。我们真切地回想着逃避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僻远的深山、一个世纪前的农民起义、龃龉不睦的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孩子的残疾造成的精神打击。

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即应该认识难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现实，这就需要“模特儿”。

这种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其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读一读《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T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长短篇小说以及去年译成法语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确这部作品的位置关系。为了创作幻想式的自传，大江采用了日本第一人称小说的写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百分之八十的情节是虚构的。对于讲述人的人生绝对必需的人物吉哥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以与实现留在祖先的森林里耽读但丁这个梦想的讲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场。于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着新颖的文脉的新光，获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不仅改变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变更了祖先生活的有关资料。

我们处理大江作品中连续出场的作品主题以外的东西。作品群在一个伟大而精巧的构思中互相感应、变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位作家不仅仅在写书，而是在“构筑”作品。如果再补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烧的绿树》中，将

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从而把他先前的整个题材颠倒过来。他以反论语言“Rejoice!（高兴吧!)”结束全书。

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严谨缜密的构思，其实并非如此，莫如说这种固执的尝试似乎产生于富有诗意的迷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中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全体关注的感人形象。

大江先生：

您主张如果要以我们的感觉把握现实就必需“模特儿”，实际上您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接连变化和持续不断的神话的“模特儿”。通过这些模特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可以区别作品中人物的微妙处境。

我高兴地代表瑞典文学院对您荣膺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并邀请您前来接受国王陛下的颁奖。

郑民钦 译

我在暧昧的日本[1]

——受奖演说

大江健三郎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2] 和《尼尔斯历险记》[3]。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

① 本文为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著作权属诺贝尔基金会**（The Nobel Foundation 1994）。讲演标题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

②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

③ 19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国被译为《骑鹅旅行记》。

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

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Criat-il.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20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

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 Light 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①] 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 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

① 此处意译应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因文章中多处将其与《暧昧的日本的我》作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特直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

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味”，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

坦率地说，与26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1971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①] 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②] ——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③]，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

---

① 威·勃·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狱的结婚》（1790）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创作了一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③ 书名为《熊熊燃烧的绿树》。

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 vague 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① 所下的定义——"是 ambiguous，而不是 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 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

① 凯·雷恩（1908—　）：英国女诗人，著有《坑坑洼洼的土丘》、《失去的国土》、《在荒凉的海滨》等诗集。

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50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灌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

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像，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像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

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①]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②]语）。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③]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① 威·休·奥登（1907—1973）：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1941）和《不安的时代》（1948）等诗作。

② 弗·奥康纳（1925—1964）：美国女小说家。

③ 乔·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年》（1949）等讽刺性作品。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 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traduisible Rabelais”，意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2] 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

① 弗·拉伯雷（1494—1553）：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师、人文学者。

② 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1] 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

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2] 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3] 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

---

① 米·巴赫金（1895—1975）：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② 塞·卡斯泰利勇（1515—1563）：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③ 玛尔戈王后（1553—1615）：1572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庞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做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 in 和 nocea 组合而成，即没有瑕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

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许金龙　译

晚宴上的答谢辞①

大江健三郎

我是一个在幼少年时代全面接受尼尔斯·霍格逊影响的奇怪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甚至能够详细地说出瑞典美丽的国土的地名，比自己国家的地名更加熟悉。

我先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比起紫式部女士，我更对S. O. L. 拉格洛芙② 感到亲近、怀有敬意。但是，我必须再次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呼唤天空飞翔的大雁，要它寻找梦中都无法相逢的亡魂的去向。

我在尼尔斯的引导下追求西欧文学也是灵魂的去向。我作

① 这是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

② S. O. L. 拉格洛芙（1858—1940）：瑞典女作家。曾任教师，作品宣扬母爱和人性的善良。著有童话《尼尔斯历险记》、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等。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女作家首次获得该奖。尼尔斯·霍格逊是《尼尔斯历险记》的主人公。

为一个日本人，希望我对文学、文化的探索对西欧能多少有所报答。

这次获奖不正是给予了我报答的机会吗？给予我的还很多，而报答才刚刚开始。这盛大的晚宴也是一个给予。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年谱

王中忱编

1935 年

1 月 31 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间排行第三。大濑为一森林峡谷间的村庄，这里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颇有影响。

1941 年　6 岁

4 月，入大濑国民学校读书。是年 12 月 2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4 年　9 岁

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家里男人只有健三郎一人。

1945 年　10 岁

国民学校小学五年级。是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7年　　12岁

3月，大濑小学毕业，4月，入大濑中学。是年，日本学校制度改革。5月，战后日本新宪法公布、实施。新制中学把原来的修身课改为新宪法学习，这对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0年　　15岁

3月，初中毕业；4月，入爱媛县县立内子高中。

1951年　　16岁

4月，转学至爱媛县立松山东高中。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自是年起，开始了以后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

1953年　　17岁

3月，高中毕业；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准备大学考试。

1954年　　19岁

4月，考入东京大学文科。

1955年　　20岁

9月，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基础教育部）学生杂志《学园》上发表作品《火山》。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索尔·贝娄、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6年　　21岁

4月，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于本年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创作剧本《死人无口》、《野兽之声》。

1957年　　22岁

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小说《奇妙的工作》，获该报五月祭奖，并获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8月，小说《死者的奢华》发表于《文学界》杂志，成为日本文学界最为推重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由此正式登上文坛。

1958年　　23岁

1月，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并于当年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同年，早期作品集《死者的奢华》由文艺春秋新社出版。发表《感化院的少年》等作品。因突然进入作家生活，写作过度紧张，服用安眠药过度，几至中毒。

1959年　　24岁

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毕业后，专注于文学创作；是年，发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

1960年　　25岁

2月，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创作电视歌剧《昏暗的镜子》；参加“安保批判之会”、“青年日本之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5月，作为第三次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成员，与野间宏等访问中国。9月，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

1961年 **26岁**

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杀事件为题材，创作并发表《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因此遭到右派势力威胁。本年8月起，赴欧洲旅行，曾在巴黎访问萨特。

1963年 **28岁**

5月，发表中篇小说《性的人》；6月，长子大江光诞生，头骨先天残疾。夏，访问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种种情况。

1964年 **29岁**

8月，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出版，获新潮文学奖。10月，长篇随笔《广岛札记》开始在《世界》杂志连载，至翌年3月载完。

1965年 **30岁**

夏至秋，赴美国旅行，参加哈佛大学的研讨班。

1966年 **31岁**

4月，新潮社开始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翌年2月全六卷出齐。本年，为创作新的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

1967年　　　32岁

1月，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7月刊完，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同年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长女菜采子于同年7月诞生。赴冲绳旅行并发表《为与冲绳共叹共怒》等文章。

1968年　　　33岁

3月，赴澳大利亚旅行。4月，发表《参院选举反映了民意吗——当投票意味着放弃权利的时候》等文。5月，《个人的体验》英译本出版，应译者与出版社邀请赴美旅行。8月，发表《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文。

1969年　　　34岁

8月，长篇随笔《冲绳札记》开始在《世界》杂志连载，翌年6月载完。

1970年　　　35岁

7月，讲演集《核时代的想像力》由新潮社出版。是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大江健三郎曾就此事件多次发表意见。

1971年　　　36岁

夏，参与创办并编辑季刊《冲绳经验》；7月，出版与重

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本年起，“启示录”“末世”、“末日”等词汇频频出现于大江的作品和谈话里。

1973 年　　38 岁

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上、下）由新潮社出版，同年 12 月获野间文艺奖。

1974 年　　39 岁

2 月，在日本作家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署名。11 月，出版《文学笔记》（新潮社），其中详细记录了《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推敲修改过程。

1975 年　　40 岁

5 月，为抗议韩国当时的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而参加有关活动。大学时代的恩师、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一夫去世；本年，山口昌男著《文化的两义性》由岩波书店出版。大江后来曾把这称为“两个重大事件”，并说，这两个事件在他的内心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把渡边一夫视为终生之师，而他开始关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则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响。

1976 年　　41 岁

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思想史”。

1977 年　　42 岁

9 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二辑，全六

卷，翌年2月出齐。10月，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东西文化在文学里的相遇》研讨会，做了《关于边缘性文化》的报告。

1978年　　43岁

5月，《小说的方法》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小说论著里，可以明显看到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

1979年　　44岁

11月，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由新潮社出版。

1980年　　45岁

1月，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发表于《文学界》杂志。6月，《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全十卷，翌年8月出齐。

1981年　　46岁

先后参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冈子规纪念馆开馆等活动并发表讲演。

1982年　　47岁

7月，系列短篇小说集《听雨树的女人们》由新潮社出版，翌年获第34届读卖文学奖；系列短篇《新人啊，醒来吧》第一篇《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发表于《群像》杂志。

1983 年 **48 岁**

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由讲谈社出版。系列随笔《小说的图谋·理性的愉悦》开始在《波》杂志连载（4月），翌年 12 月载完。

1984 年 **49 岁**

1 月，与作家堀田善卫的通信，以《核时代的乌托邦》为题发表于《朝日新闻》；5 月，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做了题为《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演。9 月，辞去芥川文学奖评委职务。

1985 年 **50 岁**

长篇小说《M /T》序章发表。

1986 年 **51 岁**

《M /T 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由岩波书店出版。

1988 年 **53 岁**

理论著作《为了新的文学》由岩波书店出版；该书结尾部分，大江提到了自己“最后的小说”；他说，关于广岛，关于核笼罩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将构成这部作品的核心。

1989 年 **54 岁**

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认为，大江对欧洲文学也给予了相当的影响，他创造了能够表现个人体验与普遍性经验相结合的文体。同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瑞典文版出版。

1992 年　57 岁

4 月，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持续至 1994 年 3 月；所撰评论，表示出对中国“文革”后文学的关注，认为从中国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说日译本，可以看出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

1993 年　58 岁

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1994 年　59 岁

10 月 13 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2 月，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本月 7 日发表受奖纪念讲演《我在暧昧的日本》。同年，表示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拟议颁发的文化勋章。《小说的经验》由朝日新闻社出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个人的体验　（下册）
作者＝（日本）大江健三郎著　杨炳辰　王新新译
页数＝１１０４
ＳＳ号＝８０４０３８４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０３月第１版